





中华秩序

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美国) 王飞凌 (Fei-Ling Wang)著

王飞凌 刘骥 译校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封面图片说明

上排自左至右：南京中山陵的“天下为公”匾额；据说是秦始皇的传世皇帝玉玺之铭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照壁上的“为人民服务”题词。

下排：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秩序

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美国) 王飞凌(Fei-Ling Wang) 著
王飞凌、刘骥 译校

©2019

英文原版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By Fei-Ling Wa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SUNY
http://www.sunypress.edu/p-6460-the-china-order.aspx
https://www.amazon.com/China-Order-Centralia-Empire-Chinese/dp/1438467486/ref=tmm_pap_swatch_0?_encoding=UTF8&qid=&sr=

繁體字中文版
《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
(美國)王飛凌 (Fei-Ling Wang) 著
王飛凌、劉驥 譯校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八旗文化出版社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8-2 號
©2018 八旗文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3413?loc=P_007_004

简体字中文版
《中华秩序: 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美国)王飞凌 (Fei-Ling Wang) 著
王飞凌、刘骥 译校
©2019 王飞凌
fw@gatech.edu
https://inta.gatech.edu/people/person/fei-ling-wang
https://wang8692.wordpress.com/

(注意：如欲商业印刷、发行本书的简体字中文版，请务必事先取得作者的书面授权许可)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中 国 人 民

To the Chinese People

目录

目录 v
图表 viii
简体字中文版序言 ix
英文版鸣谢 xi

引言 1
中华秩序 3
本书之章节安排 6

第一章 中原与中华：渊源与基础 11
中华与中原：不仅仅是语义学问题 12
作为一个世界的中华：生态地理塑造心灵 16
中国人与中华多民族 22
历史与中华历史记录 26
初起：先秦的中华世界 36
战国时代的辉煌与和平 39

第二章 秦汉政体与中华世界帝国 47
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 48
秦政体：中华极权主义 52
秦”天下”：一个世界帝国秩序 54
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 58
儒家和法家的聚合 64
中华秩序的巩固和扩展 67

中华秩序之复兴与东西方大分野 69
中华秩序的演变和升华 74
从第二次大分立到终极型中华秩序 81
满清世界帝国 89

第三章　被遗弃的宋代大转折 95
宋朝：一个非同寻常的秦汉式帝国 96
宋代之中华世界 101
澶渊体系：欧亚大陆东部的新世界秩序 104
澶渊之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中华版 109
中国人心目中的澶渊体系 113
锦绣辉煌的宋代：澶渊体系下的中华世界 116
中华古典文明的顶峰 120

第四章　评议中华秩序 125
中华秩序的主要特征 128
中国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比较 145
完美而昂贵的专制统治 150
不相兼容与长期停滞 154
致命的西西弗斯与无尽的炼狱 161
垄断导致停滞 170

第五章　百年国耻与进步世纪 173
中华秩序之衰败与消隐 176
西化成为生存之道 182
满清帝国不同寻常的崩溃 186
中华民国：机遇、成就与失望 191
重新评估晚清与民国时代 199

第六章　大跃退与新崛起 205
民国政治：顽固但转型中的威权主义 206

中国共产党之兴起 209
毛泽东与民命 216
枪杆子、诡术与诺言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新秦汉式政权 230
后毛泽东时代之中共秦汉式政体 239
次优化经济与富国强军 251

第七章　天下与威斯特伐利亚之间的中华博弈 259
天下使命 260
毛泽东的新中华秩序世界战争 263
为敌所救而且致富 272
对外开放与韬光养晦 278
中国梦：中华复兴与全球治理 281

结语　可能的未来 291

引用文献与著述 297

图表

图 1.1 中华世界：绝缘与隔离 16
图 1.2 中华世界：降水线界定的中原 17
图 1.3 黑河 - 腾冲线 17
表 1.1 例举中国及中国历史的不同解读和表述 34
表 1.2 中华世界历史上的战争频率 44
图 4.1 中华世界历代的战争频率 158
图 4.2 人均粮食年产量和粮食亩产量 164
图 4.3 中华世界与地中海-欧洲世界的人口变化 169

简体字中文版序言

本书原著(*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于 2017 年 9 月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UNY Press) 出版发行，10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令人鼓舞的是，本书已经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关注、赞扬与回馈，多家刊物发表了积极肯定的评论文章，在学界内外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书的繁体字中文版(《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于 2018 年 11 月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12 月在台北市信义区的诚品书店发布，得到了读者们和媒体相当热忱的回应与支持。在中央研究院等地还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们的评议、探讨与指教，令我受益匪浅。

现在本书的简体字中文版先以 PDF 电子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毋庸赘言，我十分期待简体字中文读者们的批评与指正。如欲商业化印刷和发行本书的简体字中文版，请务必事先取得作者的书面授权许可(电邮 fw@gatech.edu)。

本书中文版力图保持英文原著的全貌。限于篇幅也考虑到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中文版删并了一小部分过细的注释和引证出处。读者如果有兴趣细察，可以进一步参阅英文原版。中文版保留了略显冗长的附录即“引用文献与著述”，希望能藉此方便读者的深入批评和继续研究。为了减少翻译的失真，行

文中附带了有些术语和专有名词的英文原文。在改订翻译稿的时候，有一些细微的文字句式改动和顺序调整，试图增加一点中文版的可读性。本书的简体字中文版与繁体字中文版都是基于英文原版译出，在内容上基本一致，但在遣词用语、句式、排版乃至装帧设计上，有所不同；另外还增补了几条最新信息资料。

在本书的中文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内人、许多朋友尤其是台湾八旗文化的富察编辑及团队的大力帮助、专家编审和文字修饰，在此衷心致谢。

本书的中文版翻译与校对基本上是伴随着幼女的牙牙婴语声而完成的。她那纯净眼神和成长呢语，不断地提示着我们辛苦遭逢、穷究过去以求明辨未来的意义与价值。

我真诚地相信，只要有自由、完整的信息与充分的辩论和选择，伟大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全面而准确地解读历史与现实，掌握自己的命运，扬弃过去的秦汉政体及其中华世界秩序，走出一条全新的、利己利国利人类的和平繁荣而充满尊严与自豪的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共竞共进，共建人类更好的未来。这本书代表着我为此的一个小小努力。如果能起到一点点作用，则余心足矣。

王飞凌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2019 年

英文版鸣谢

本书是我从大学和研究生院就开始的多年学术旅程的一个收获。我先前关于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户口制度的英文书籍(分别于 1998 年和 2005 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开始了通往这个项目的路途。2005-06 年间，我为《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撰写关于中国崛起的专栏文章，以及 2010-12 年参与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的“美中关系与世界秩序”研究项目，促进了我的有关想法的进一步形成和完善。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身处五大洲十多个国家的许多人的无法估量的恩助。对那些给过我线索和灵感的人们，那些忍受了我的各种问题和请求的人们，那些帮我寻找事实和联系人的人们，以及那些提供了批评和协助的人们 - 他们的名字实在是举不胜举 - 我在此向你们一一致谢。

我在乔治亚理工大学的同事们和学生们一直以来都是我的耐心听众和有益评伦员。过去几年来，以下的机构(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友善地接待了我与本项目有关的访学：欧洲大学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院、东海大学、美国空军学院、澳门大学、东京大学和延世大学。富布赖特委员会 (Fulbright Program)、日立基金会 (Hitachi Foundation)和密涅瓦基金(Minerva Initiative)慷慨地资助过我有关的研究。我曾在下列场合(按英文字母顺

序排列)介绍过本书的部分内容并得到过宝贵的批评意见：美国政治学协会、中国文化大学、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研究协会、美国特种兵联合大学、高丽大学、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中兴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中山大学、美国国家战争学院、马来西亚理工大学、丹佛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马来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

非常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有力支持，热情鼓励和有益建议。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校对员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毋庸赘言，我个人对本书中任何可能存在的缺陷负全责。

如果没有我的家人朋友们一直的关爱和支持，我将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为此我真的是非常幸运，永远感激。

最后，这本书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正如我所尝试在本书中表明的那样，中国人民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深重苦难与无数牺牲：我个人所面对过的所有艰难，痛苦和不公平，与之相比都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有着我真挚的热爱与美好的祝愿。

王飞凌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2017 年

引言

人们很容易列举出一长串关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种特别之处。然而，困难的是如何解读和权衡，从而确认和判定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真正代表着什么，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因应。整个世界和平、世界秩序的未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都有赖于这个判定 。

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很匪夷所思的几个悖论和谜团：中国经济按 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从 1990 年的世界排名第十跃升至 2012 年的第二位，预计不久就会取代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同时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大军费预算(其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种种无休止地追求更多权力、强化控制的行为，传达出强烈且不断加重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情绪。按人均 GDP 和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它却在世界各地大量撒钱，培育、提升其形象和影响力：仅在 2012－2015 年就对外承诺了 1.41 万亿美元，以当今美元计价是 60 多年前美国马歇尔计划的 10 倍。尽管如此，中国在西方(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从巴西、埃及、印度、以色列、约旦、菲律宾到土耳其、越南，都不受多数民众欢迎。北京一直誓言永不成为欺凌他国的霸主，承诺“始终维护国际法治、公平与正义”，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当第一次面对国际仲裁庭的海事纠纷裁决有利于其弱小邻国时，

其行为与其他任何霸权强国并无二致[1]。

如同预期的，有关中国及其崛起的书籍文章已经汗牛充栋。 2014 年的六个月里，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种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2]。其共同主题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有些还特地去“揭秘”中国。但是关于中国的著述与七十年前研究另一个崛起的异己力量前苏联的学术成果很不一样。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 年在《对外关系》(*Foreign Affairs*)杂志匿名发表分析苏联的文章之后，西方学界迅速汇集起来，产生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对苏遏制和冷战大战略。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及其崛起的海量文献大多充满迟疑，具有浓厚的模糊性和混沌感，缺乏可靠的预测和坚定的政策。多年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直是描述中国及其崛起的关键词。对现在主导世界的领袖们的标准建议，大体上都是一个应付与蒙混战略，通常混合着一些对中国崛起表示欢迎的接触、绥靖和让步(engagement)；某些心存恐惧、以防万一的后备措施(hedging)；以及一种顽固的、试图同化中国的期待(incorporation)。

所有这些朦胧不清和犹疑不决，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的理解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对于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什么的认知更是偏颇游移。研究中国，的确很容易迷路，至少是困惑不解，因为传统的分析工具如现实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看起来并不大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堆积如山的各种讯息甚至神话(经常是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巧妙故事)混乱而自相矛盾，似乎每分钟都在闪烁变幻。因此，已故学者包瑞嘉(Richard

---

[1]中国经济和军费开支数字见 ICP 2014, IMF 2014, SIPRI 2015. 对中国的民意调查见 Pew 2015。对于国际仲裁的反应，见 Xi 2016 和 Allison 2016。

[2]关于中国及其崛起的新近英文学术书籍包括(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列)：Callahan 2013, Christensen 2015, Chung 2015, Deng and Wang 2005, Dickson 2016, Friedberg 2012, Goldstein 2005, Hung 2015, Kissinger 2011, Lampton 2008, Lieberthal 2005, McGregor 2012, Nathan and Scobell 2012, Naughton 2006, Pillsbury 2015, Rosecrance and Miller 2014, Ringen 2016, Shambaugh 2013, Schell and Delury 2013, Shirk 2008, Sutter 2012, Wasserstrom 2013, and Westad 2012。

Baum) 评论说，观察中国是一个“奇特、令人沮丧、迷人与危险交织在一起的工作”；资深观察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则认为，以错误的假设进行一厢情愿的思考，让“西方决策者和学术界一再把中国搞错”[3]。

如今的西方学界，有人在争论中国的现实与幻像，以及观察者该如何解释与构建；有人探讨中国人在想什么、如何想，及其各种结论和假设；有人转向过去，寻求历史的相似性，讨论中美冲突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了无意义的悲剧宿命。有人开始探索中国特有的中国中心观念及其影响；有人断言中国的崛起是一场中国要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百年马拉松；有人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去塑造中国的政策选项和行动偏好，而不是遏制其崛起；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了一个强大的“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与“完美的独裁”，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个低效而劣质的独裁国家；还有些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走向结束而不是什么崛起，它的统治正在溃败。无论如何，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看法：中国崛起，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对整个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都将带来难以确定但深远的影响[4]。

中华秩序

本书加入关于中国和中国崛起的探讨，试图全面分析中国力量的本质。通过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根本性地展示“中国是什么”以及“崛起的中国代表着什么”。具体而言，本书着重描述与分析”中华秩序”(The China Order)。中华秩序，亦即中华世界帝国秩序，是一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

[3] Baum 2010; Pillsbury 2014; Kennan 1947 and 1954、Shirk 2008、Hachigian 2014、F.Wang 1998a、Bader 2013、Lampton 2014、Galtung and Stenslie 2015。

[4] 详细参阅 Mann 2007 and 2016、Lampton and Mann 2007、Ash et al. 2007、Hessler 2006、Leonard 2008;、Halper 2010、Rosecrance and Miller 2014、Ford 2010、Callahan 2012 and 2013、Pillsbury 2015、Christensen 2015、Ringen 2016、Chang 2001、Mattis 2015、Shambaugh 2015a、Kissinger 2014, 4–9。

且往往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基于用儒学粉饰其表的法家帝国政体(即秦汉政体、Qin-Han Polity)之上[5]。凡秦汉政体，必然要以中华秩序作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来证明和捍卫自己，去统一、规范、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中华秩序因此意味着一个世界性的秦汉政体。它植根于长期形成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地理生态，这个中华秩序下的世界帝国(world empire)，从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统治了整个欧亚大陆东部的各个民族，并不断演化以趋于完善[6]。作为一种理念和政治传统，中华秩序决定了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些关键性特质。在这两千多年里，整个中华世界(Chinese World)其实也有过多次分裂，形成多国分治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断层期是宋代(10-13 世纪)。宋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而重大，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探讨。本书第三章将会对此仔细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帝国的扩张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义/全球主义(political universalism)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各个大陆上都曾出现过可以识别为世界帝国或“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权[7]。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即整个已知世界)近似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ίκουμένη* 和 oecumene)，以及后来欧洲人的整个“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国统治者们，从罗马人、西班牙人到英国人，都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大帝国，以统治整个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但中国人的天下体系即中华秩序，却是最持久、最独特的存在，彻底而精致；在今日中国依然有着无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实际的影响力。与历史上许多其他世界帝国(以及想成为世界帝国的政治力量) - 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国、

---

[5]帝国, 指一种“中央集权政体”政治制度，一个统一的官僚统治体系；它“以自我为中心”, 在一个“没有政治竞争的世界”里“自我独占一切”, 征服并统治所有其他的社会政治社团、群体和组织(Eisenstadt 2010, 21–2; Wesson, 1967,46-47)。

[6] Levenson 1965 & 1967; Pines 2012, 11, 22-3; Smith 2013, 5。

[7] Wesson 1967,21-54; Bang and Kolodziejczyk 2012。

穆斯林哈里发、帖木儿汗国、印加帝国，或者世界法西斯主义运动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等等不同，中华秩序曾连续数百年存在，并统治了其支持者们确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两千多年内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国人)深深内化为某种信条：中华秩序不仅可行，而且优越。作为一个代表特殊社会经济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中华秩序是一个仍然活着的思维范畴，犹如欧洲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 “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为一种政体和世界秩序，中华秩序在实践中可行，经过历史考验，在政治上也是诱人的。但在社会发展与经济成长方面表现不佳，是个次优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称为 “中国人的生活秩序”[8]。中华秩序在中华世界里形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罗马帝国之后的地中海—欧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后者在事实上遵循、随后在法理上认可一种国际比较和竞争的世界秩序，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中华世界在 19 世纪中期后，也被强力纳入了源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然而 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并践行了秦汉政体。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国君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规范世界，获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权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汉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它的人民实行低劣欠佳的统治，但却有能力富国强兵，在国际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秩序的意识形态，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特别是 “美国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战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观念根本对立。一个固执不变的、重新崛起的 “新秦汉政体”，必将强势追求一个新的中华世界秩序，从而给全球人类带来新的选择。这对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意义重大。

---

[8] Lattimore 1951, 512。

本书之章节安排

本书的第一部分(一至四章)，描述和分析了中华秩序的来源、性质、前景和意义。我也尝试在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化和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水准各个方面，评价中华秩序的历史表现。许多世纪以来，中华秩序对各种威权主义统治者们而言，都极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瘾；在中华精英人士中也建立了一种似乎不可动摇的合法性。但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记录却不甚优秀，甚至十分低劣。尽管有过多次王朝兴亡，中华秩序下的中华文明却是长期停滞，形成了“超稳定”结构[9]。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华秩序才因外来力量的冲击而崩溃，中华世界不再是天下，而被降低为仅仅是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国的统治者们对此从来没有满意，尽管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这个所谓的“百年国耻”(1840 年代－1949)期间其实经历了伟大的试验和进步。与中国官方和主流历史叙事相反，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实际上是中华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时期，即中华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实上采取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时期。这些时期包括：先秦的中华世界、宋代、以及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中华秩序的基础——秦汉政体——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但这一变革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强力中止并扭转。中共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史诗级的历史大跃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试图揭示秦汉政体所固有的寻求中华秩序的内在逻辑和使命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顽强存活，及其对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剥去掩盖在中共秦汉政体及其驱使中国去追求中华秩序的必然这

[9] 长期停滞和超级稳定指缺乏科学技术创新以及没有像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那样的社会与经济质的进步，尽管人口和经济还会有数量上的增长。在理论上，糟糕的统治如果有关键的精英群足够的支持，完全可以维持长久(Morrow et al 2003)。

个核心问题上的种种有意无意的包装粉饰，如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其崛起的性质，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力量，就变得十分简单明了了。这或许会令许多经常误报信息、并误导人们的故弄玄虚的分析家们和过于热心的辩护士们大失所望。详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治理上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总体记录，将是笔者另一本书的任务。在这里，本书仅简略地描述中共为了生存、权力和控制而在国内国外的不断斗争。身处一个没有中华秩序的世界，深受其必需要建立一个中华秩序的艰难命运所驱使，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质上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悲剧性大弯路：耗费了惊人的生命、金钱和时间，除了维护其政权外却所获甚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政权本身也只是通过选择性地接受西方领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才得到拯救并得以致富壮大。回到 1949 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力量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发展，而不成比例地强盛起来；深藏不散的中华秩序意识形态也随之复苏。因此，中国力量的崛起，代表着对当前世界秩序的一个系统性全面挑战。这个挑战包括了国际关系学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所描述过的两种基本路径：一、国际体系中力量的重新大分布；二、世界政治秩序之各国主权平等定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的改变[10]。北京的新秦汉政体日益强大，由此变成一个“非常不满足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的诱人的窃国腐败官僚政治(kleptocracy)，只会令中国对世界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更具有结构性、更有力，也更影响深远[11]。

本书的各章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旨在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或者中华？中国历史是如何编写的以及应该怎样解

[10] Morgenthau 1948; Waltz 1979; Gilpin 1981; Wendt 1992 and 1999。

[11] Machan 2008, 272–73; Khatri1 et al. 2006; Kingston 2013; Wademan 2012; Bai et al. 2014; Pei 2014； US DOS 2005.

读中国历史？什么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思想和传统？藉由对中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个世界、一个自成一统世界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诸项基本事实的重新解读，本章探讨了中华秩序的丰富而多元的起源。它论述了历史对中国人的宗教角色以及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迫切需要。本章也概述了公元前三世纪之前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封建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中华世界秩序。

第二章是关于中华政治和中华世界秩序的理念与传统。中华秩序是一个中华中心主义天下体系旗号下的世界帝国政治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是基于秦汉帝国政体之上的，即表面上是儒家，但本质上是法家(或现实主义)的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的性质是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命中注定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去(或者假装去)征服和统治整个已知的世界。中华秩序是人们特别努力为之和精心设计的结果，凭借武力、权术、诡计以及纯粹的运气等偶然因素而得以成功。作为人类政治治理的一项重大成就，中华秩序有着自我强化并不断复制的机制。它对各民族的统治精英都极具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瘾，因此在中国人心里获得了一个超稳定的地位，从而能够主宰中华世界，并使之停滞不前，长达许多世纪。

第三章中，我对中华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特别阶段提供一种修正的认识。探讨了极有意义、但长期被忽略的宋代(10－13 世纪)时中华秩序的中断。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存在一个法理上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世界秩序，即澶渊体系。这是个深刻的、一直被曲解乃至抛弃的历史大转折，里面蕴含着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领导人都非常有裨益的丰富信息。宋代之澶渊体系的消亡，就像秦国结束战国时代一样，是对中华文明的另一个悲剧性摧毁。

第四章考察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的特点和历史记录。本章总结和评议了中华秩序的主要特征、异常的持久力、及其强大的复辟能力。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华秩序对统治精英、对有政治野心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记录显示，与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的世界秩序相比，它在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基本是停滞、落后、极为次优化(suboptimal)。中华秩序下的人民不仅苦难深重，还周期性地大规模非自然死亡。本章就如何理解中华秩序的长命与停滞提出了一些看法。

第五章重新解读并分析了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的中国政治史。在这个时期里，中华秩序在实践中分崩离析，但是作为一个深远的传统观念和强大的政治理想，它并未消失。本章考察了中华世界在这个漫长世纪里经受的巨大冲击和经历的宏大变革，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实验和进步的世纪，而不仅仅是中国官方历史叙事所宣称的“百年国耻”。这是一个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都取得了各方面伟大进步的时代，但也确实是一个秦汉统治精英们遭受巨大挫败和屈辱的时代。顽强的秦汉政体通过 1949 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一个看似不可能但最终却不可阻挡的全面复辟，打碎了许多厚望也令中国人民错舍了重大机遇。

第六章介绍并解释了现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创立及其本质。巧妙地用民命或者民意(Mandate of the People)取代天命或者天意(Mandate of Heaven)，毛泽东带领由外国创立和资助的中国共产党，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崛起为一个秦国式的极权主义政权。凭借其精明的权术和强大的武力，中共在 1949-1950 年赢得了内战，结束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中共借助于进口的意识形态术语和重要的外部援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中华历史的一个大跃退和大弯路，抵销了中国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取得的诸多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新的专制集团统治下转世复活的秦汉政体，一个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党国。没有其必需的中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秦汉政体为了其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对内对外都一直殊死奋斗：对内，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上个世纪以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懈斗争；对外，同时反对几乎整个世界。这样的无休止的拼斗，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悲剧性的政治治理，及失败的社会经济政策。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被迫退回到

1949 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通过引进和模仿外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成果，尽管其总体纪录迄今仍然是相当次优化的。在政治民主与自由权利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比不上七十年前被它取代的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相比了。

第七章概述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这是一场持久而剧烈的中华大博弈，一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新秦汉政体固有的天下政治使命，一方是其难以摆脱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被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所驱使，毛泽东本能地竭力推动中华秩序的重建，但是他的世界帝国梦凄惨破灭。当北京被迫暂停它的世界革命事业、隐藏其中华秩序的雄心之后，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拯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并使其富强起来的正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袖们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领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由此获得了丰厚回报。然而，中华秩序使命深藏未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的崛起而再度复活，成为主导中国外交的中国梦的一大主要成份。于是决定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中华大博弈，将会更加强烈地持续下去。

结语总结了中国力量的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次优化的巨人，但是在国际上仍然颇具竞争力；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中华秩序与当今世界秩序，二者之间不匹配和不相容的程度既深且广。在概述了中国崛起的几种可能的未来走向之后，本结语也预告了这本书的续篇：探讨因应之策。

第一章. 中原与中华: 渊源与基础

若欲了解中国是什么以及代表着什么，人们需要面对生活在东亚大陆上数千年之久、占全球人口大约五分之一的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所积累起来的信息海洋。与之相称的是，关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知识，还被无数的神话所歪曲、不断地混淆视听，甚至会误导一些最勤奋、最专业的观察者。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阐明了中国的诸多神秘之处，但是还有许多顽固难解的中国特殊性仍然阻碍着中国学的标准化和理论化。学者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已经呼吁许久：中国学急切需要更多的植根历史的扎实研究。今天，解读中国历史依然是正确理解中国的关键。然而，那保存完好、丰富而庞大的中国历史记录里充满了故意的遗漏、无意的错讹、巧妙的扭曲和公然的伪造。因此，仔细而全面的、带着修正的态度去解读中国历史，是打开这个"中国特色"这一黑匣子的前提。本书的第一步是澄清有关中国或中华(China)、中原或中土(Centralia)的一些常被错漏、讹传或误解的基本事实。揭示和纠正的这些基本知识，将会有效地展现中华作为世界帝国的多重源头。为此，本章将探索中华世界的命名来源、生态地理、各族人民及其对历史的修撰，起点是公元前三世纪之前的封建社会，即先秦时代。那时的欧亚大陆东部，处在一个类似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的世界秩序之下。

中华与中原：不仅仅是语义学问题

中国或者中华的国际通用名称，英文是 China(拉丁文为 Sina，梵文为 Cīna，法语为 Chine)。该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处今天中国西部的一个封建城邦国家秦(Qin 或 Chin, 公元前 770-公元前 221)的语音翻译：秦啦。秦后来演变成王国，再成为帝国，并统一了整个欧亚大陆东部的主要部分(秦朝，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秦国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结束了战国时代，为后世的中华统治者们创设了一个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语，几乎所有印欧语系的外国人都用 China(秦)这个词来指称欧亚大陆东部这片广袤土地，类似于欧罗巴(欧洲 Europe)、美利坚(美洲 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 Africa)等地理词汇的用法。俄语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来称呼中国，源于十到十二世纪时统治今天中国北部的辽帝国(916-1125)的统治民族。中国周边使用汉字的国家如日本，以及许多中国人自己，把 China 这个世界通用名字音译为"支那"(最早由八世纪的中华佛教学者们从梵文的 Cina 一词翻译而来)。支那是地理名称 China 或 Cina(秦)的音译，然而在中文里有"分支"的意思，也绝对不是一个多么宏伟壮观的名字。1930 年代以后，由于使用"支那"名字称呼中国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国，这个名字对有民族主义情怀的中国人来说变得极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国"；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称支那。在 1965 年据称北京介入印尼内政，煽动政变，印度尼西亚血腥屠杀数十万华人，并疏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雅加达下令改称中国为"支那"(Cina)而不再称中国(Tiongkok)。直到 2014 年印尼才恢复使用中国这个名字。今天，中国自身完全拒绝使用支那一词，唯一的例外是继续将 Indochina 翻译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国。

China(秦或者支那)这个国际通用名，与今天中国人称呼自己国家的中文名字"中国"其实毫不相干。"中国"的字面意思

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国家”、“中心国家”或“处在中间的国家”。它的同义词是中华，意思是“中央精华”或“中央辉煌”，并据说与华、夏(两个史前部落)的名字相连。考古与古籍文献表明，“中国”一词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迟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已经被用作一个地理术语来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个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国”一词被用于表示一个部落、国家或者政权的中央位置。它还经常被用来描述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人口、财富和权力中心。《尚书•周书•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国民”之说；《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1]。但是，“中国”一词在十九世纪之前从来不是中国的官方名称。十九世纪后期它才出现在一些外交文件里，作为正式的官方国名“大清”的同义词，对应外文中的 China(秦)。秦(或者支那)这个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国(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外，只有在公元四至五世纪时、政治分裂的中华世界里地处今天中国西北的三个王国(前秦、后秦、西秦)，曾用它作为国名。实际上，秦帝国的继承者汉帝国，曾经称当时遥远的罗马帝国(及其统治下的地中海—欧洲世界)为大秦[2]。

中华世界有记录可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 3500 年前的殷商。从那时起，欧亚大陆东部的各个国家，几乎都是以统治王朝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统治天下(即整个已知世界)的帝国。或者以地名来命名，比如秦、汉、唐、宋；或者以统治者特别设计的名字作为国名，比如元、明、清。满清帝国在 1689 年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Nerchinsk)条约中，第一次使用满语短语 *dulimbai gurun*(处在中部或中央的国家/地区/族群)来称呼自己。清帝国后来还用过这个满语词汇，来称呼它占领征服的中华世界的中心地区，即中原。然而，满清帝国的正式官方名称一直是“大清”。

[1] Chang 2009, 169-256; S. Yu 1998,1515-24; Chang 2002, 17-20。

[2] Foster 1939,124; Jenkins 2008,64-68。

只是到十九世纪末，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汉族(中华世界里最大的民族，以二千年前的汉帝国命名)精英，才开始使用中国(中原)作为正式国名。被满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汉族精英，当时强烈感到需要将他们的国家与入侵的外国(主要是欧洲列强)区分开来；他们在政治上也需要抛弃大清国的名字，因为大清是异族征服者满洲人建立的帝国(1644-1911)。满洲人是来自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古代肃慎、女真等通古斯语民族的后代，侵略并征服了汉人的明帝国。清帝国政府十九世纪末期与外国签订的条约里，其正式国名的中文几乎总是大清国，只是偶尔使用中国一词。英文翻译则是 China(秦)或者 Chinese Empire(秦帝国)。中国和中华只在 1912 年汉族政权取代了满清帝国时，才成为官方正式国名。这个新的国家被命名为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英文翻译为 Republic of China(ROC)。中国(中央国家)和 China 被分别用作国名的中英文简称。1949年，中国内战的胜利方把正式国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的共和国)，英文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国和 China 作为中英文简称[3]。

在帝制语义学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为社会政治的中心地域，实际上由于王朝反覆更迭及中华世界内的政治分立，而在欧亚大陆东部迁移不定。二千多年前，秦汉帝国在今天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建成"中原"，并将其神圣化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它采用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威权或极权统治，通过中央与周边的等级秩序，去统一整个已知世界。就被视为建立了中华秩序。建立天下一统的世界帝国，是任何一个秦汉政体都必需的政治使命；而当一个"秦汉世界帝国"(无论其具体的国名是什么)崩溃后，所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军阀政权或对立国家，则各自抱持一统天下的渴望，为了赢得"中原"这一神圣天命而激烈厮杀。中华世界统一战争的得胜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国，决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统治者认定和记录的

[3] Zhang 1944, 2-11; Liang 1900,9; 故宫博物院 2011; Wei 2014。

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华世界里多次移动：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以南，再回到华北平原。官方史书在事后于是就简单地予以记录并加以认定[4]。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将中国(中华)视为整个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当性的名称，以区分"我者与他者(野蛮人)"的观点，并不完全是汉族中国人特有的传统。日本武士道意识形态的主要创立者、儒家历史学者山鹿素行，在其十七世纪用汉字书写的《中朝事实》中就主张，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或"中华"。日本继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满清帝国征服的中国，已经沦为"异族王朝"统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时期，水户学派的儒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以汉字编撰的纪传体《大日本史》里，更是把隋、唐、宋、明诸帝国描写成一个日本主导的"中原/中国世界"之外的"边陲"国家，和北海道、萨哈林岛、千岛群岛上的虾夷以及琉球(冲绳)诸岛没什么两样。在日本本州岛上，一块有五个县大小的地区，从九世纪以来一直被命名为"中国地方"。朝鲜亦然，在十七世纪满清帝国征服了明帝国之后，精英们把弱小的朝鲜自诩为"真正的"中华文明"继承者"，用到也是类似的"中国在我"的概念。韩国儒家学者、反对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锡(유인석)，直到 1910 年代依然主张一个以汉族和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十九世纪初的韩国王室档案也充分反映了这种观点[5]。

因此，也许今天"中国"在中文里的名字应该改为"秦国"或"秦汉国"。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国名比较准确，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对中国的真正称呼。这个命名，还可以消弭"中国"或者"中原/中土"名称中所包含的种族偏见、自大和政治歧意。而这些偏见和歧意，不仅误导中国人自己，也令外国人误判，

---

[4] Guan 2014。

[5] Tokugawa 1928；Ryu, 1990；韩国研究院档案, 2005-06；Z. Ge 2014。

造成学者所观察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身分认同上喜忧参半的“两难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也可以改为“秦汉人民共和国”或者简称“秦汉共和国”。如果要沿用旧称而不计较其语意，或可称之为“支那人民共和国”(2016 年香港的一些政治异见者的说法)。一些中国网民还将国名翻译为语音近似、但语意颇为讥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国”[6]。

作为一个世界的中华：生态地理塑造心智

中国的命名反映了中国人心里独特的自我身分认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观念。它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互动。如同欧亚大陆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欧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中华世界的历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所决定。中华文明的长寿及其“离心机式地理传播的模式”，也与它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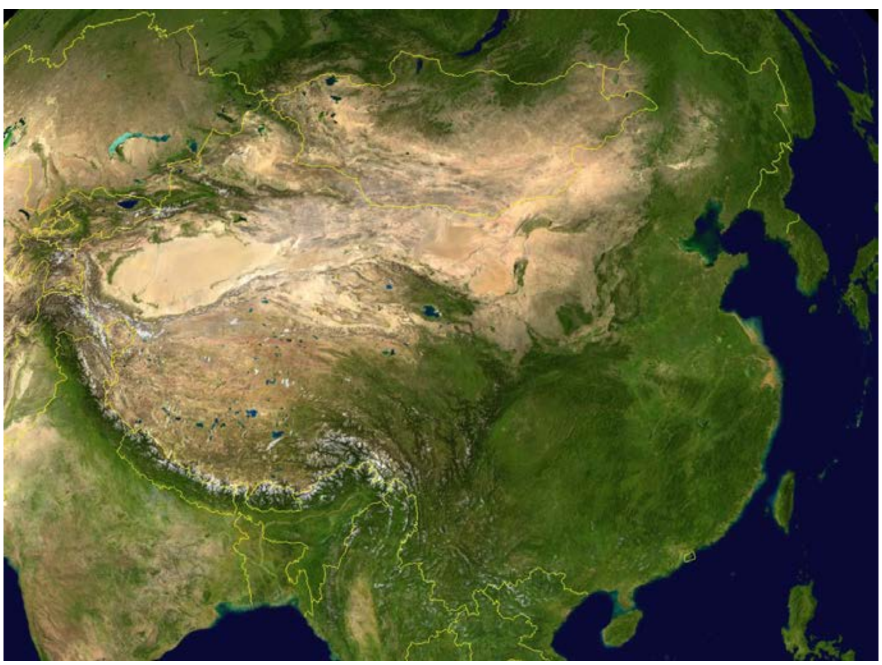


图 1.1。中华世界：绝缘与隔离
en.wikipedia.org/wiki/China_100.78713E_35.63718N.jpg，美国国家宇航局图像。

---

[6] Callahan 2012, 13；(Chaina 2015)
[7] Jones 2003, ix-xxxvii, 3-44,225-60; Ho 1976, 54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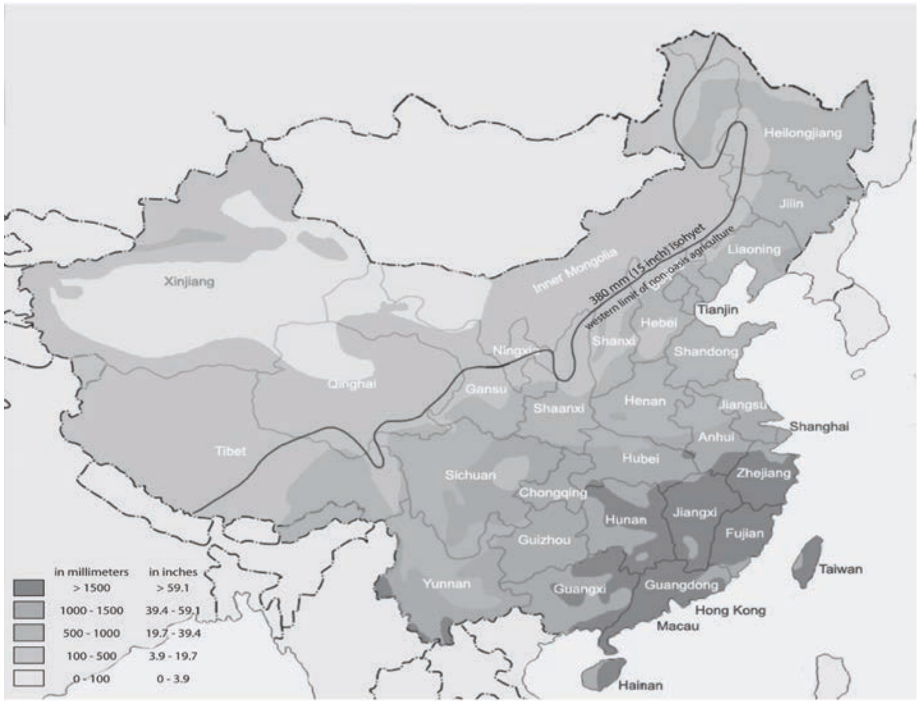


图 1.2。中华世界：降水线界定的中原。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 Average_annual_precipitation_in_China. 共享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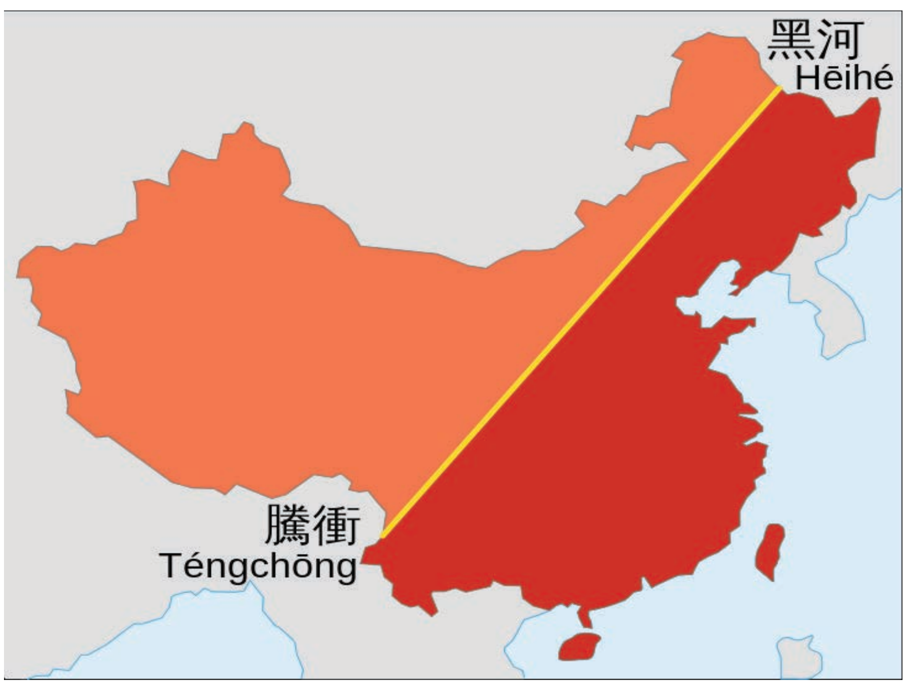


图 1.3。黑河-腾冲线。neogaf.com/forum/showthread.phpΔT=728038.共享许可。

整个中华世界与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显地隔

离甚至绝缘开来。它的东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亚，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脉以及广袤沙漠，南部则是海洋和热带丛林(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如疟疾)。中华世界被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包围，更进一步被气候、尤其是降水格局所制约。由此形成了两个独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国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边地区。中原主要位于每年十五英寸降雨线的东边和东南边(图 1.2)，其降雨来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风。主要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后来还包括满洲(东北)的东部。这里地形相对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维持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巨大黄土地带，加上降水稳定充沛，适宜的季节变化，造就了一个伟大的非绿洲农业经济，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社会。因此，自史前以来中原一直是中华世界里绝大多数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 年，中国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绘制了一条想像的中国人口居住分界线，即与中国的十五英寸年降雨线大体一致，他称之为黑河(瑷辉)—腾冲线(图 1.3)。此线以东的中原仅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 43%，但在 1935 年拥有中国总人口的 96%，2002 年拥有 94%，到 2011 年仍拥有 92.4%[8]。

从这个相对孤立的中华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国本土)出发，中国人很早就轻松抵达了它的边陲。游僧、朝圣者、商人带来了来自异国的奇闻逸事和各种物产，他们自然地也想了解边界的前面还有些什么。然而，难以逾越的边界以外，通常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世界。直到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大体上是忽视中华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国人对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即东方极点)、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之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们的心态。中原(中国本土)在清朝被最后明确定义为十八行省，是一块相对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当于今天中国全部领土的大约三分之一，大致等同于阿尔及利亚或伊朗的面积。中华世界的交通线南北长约 1300 英里(北京到广州)或

---

[8] Naughton 2007,21-22；胡 1935, 1990; Charles Parton 5-25-2014。

900 英里(北京到长沙)，东西长约 850 英里(咸阳到杭州)。在冷兵器时代，某个帝国军队的步兵和骑兵，就完全能够对这块土地实行统治。故历史上大多数中华帝国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边有着良好的自然缓冲区和隔绝带，实际上统治的领土比拜占庭帝国还要小。虽然中原也有山脉和河流阻隔，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技术上，对这块土地实行统一的、集权的统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图的，甚至因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个例外是较难逾越的南岭，它的存在，在多个世纪里使得广东地区避免或者减弱了北方帝国的统治，直到二十世纪依旧保存了与众不同的粤语社会文化。同样，因为山地的交通困难，中华世界的许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续于今天的广西、贵州、云南和福建的偏远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会(Zomia)的组成部分[9]。

作为对照，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欧洲世界，高耸的大山脉(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和扎格罗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罗的海)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分割成许多个容易维持自立、面积可观的农耕国土。多个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发展，在冷兵器时代，通过军事征服、集中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成本变得极其高昂，滞碍难行。此外，地中海—欧洲世界的各个民族，还可以通过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实行大规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进入、逃出乃至重新进入这个世界。而中华世界在地理和后勤技术上，都很容易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处于竞争状态的各国很难长期共存，因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们也没有什么选择，可以逃出这唯一适居的中原。“外部”竞争主要是来自同一个方向的游牧骑兵，劫掠中原的农耕定居社会，从而也促使了后者的联合防御。因此，中华世界常常是(后来变成“应该是”或“必须要”)统一为一个政治上单一的政体，尽管这个世界政府的名称会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不同。总之，由于上述生态地理和社会经济的原因，

[9] Taagepera 1979, 115-38; Keightley 1983, 3-64; Wittfogel 1957； Scott 2009。

中原倾向于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

地理上受隔离的中华世界，自远古以来都与其他世界有着重要的联系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着今天中国西北部连结中亚的绿洲带，以及绕行喜马拉雅山脉、穿过东南亚丛林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而不断来往。超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华世界之外，在东亚地区一直都有着一个可识别的“国际社会”。考古证据表明，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白人定居者，从公元前1800 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国西部。笔者 1998 年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曾看过一个“内部展览”，陈列了新疆发现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学者通过 DNA(核糖核酸)检验和其他考古方法，断言大量移民曾经从欧亚大陆西部经由新疆迁移、定居到中华世界。公元前三世纪随秦始皇埋葬的闻名于世的兵马俑，据说就受到了当时希腊雕塑艺术的“启发”。一个少数但越来越流行的观点(包括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认为，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和书写系统，可能起源于西方(希腊世界)和西南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们的影响。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还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语言都来自非洲，通过西亚而抵达中国。中国四川惊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战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标准观点。非中华世界在很多方面对中华世界的影响确实贯穿了整个历史：从进口的诸多意识形态到进口的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麦、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黄瓜、胡萝卜，以及后来的玉米、薯类、西红柿和烟草等等。然而，这些外部影响主要是涓滴细流和缓慢间接的。非中华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对一般中国人来说，他们确实有坚实而简单的理由相信中华世界就是整个世界；而中华天下帝国的历代统治者和精英们，其强大而不懈的宣传与灌输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理念[10]。

中原的生态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个坚定而强

[10] Buzan & Zhang, 2014, 1-50; Mallory & Mair,2000; Nickel 2013,413-47; Z. Wang 1994，30; D. Zhu 2014；四川广安三星堆博物馆。

大的统治者可以相对容易地去统一和统治整个中华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国际比较和国际竞争的影响。而国际比较和国际竞争一直推动了罗马帝国以后整个西欧和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除了一些个体的、单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游僧、传教士、渔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见的政府资助的陆上或海上探险(比如著名的张骞在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对中亚的探索，及郑和在十五世纪早期的航海)，中国人在几千年里基本上一直被锁于内陆。主要的外部威胁和挑战几乎总是来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亚洲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后者曾多次入侵、征服并统治了部分甚至整个中华世界，蒙元帝国的统治长达近百年，而满清帝国的统治则长达两个半世纪以上。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由此赋予中国政治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许多深刻而持久的特点。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即一个世界帝国。为了统治的效率、舒适性和稳定性，中华世界的统治者们后来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强其地理上的与世隔绝感。相对容易进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许多中华统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与外国人的海上接触来往，以明清帝国(14-19 世纪)的海禁最为严格持久[1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世界在地理上隔绝孤立的初始条件，逐渐变成了一种持久的心态、甚至是观念和理想，支持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秩序。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科技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华世界。就地缘政治而言，现在的中国只是由二百多个主权单位构成的世界中的一个国家而已，隔绝中华世界数千年的地理障碍已经不再重要了。但是，本书稍后将显示，关于中原和中华秩序的观念和传统仍然存在，对当代中国人仍然至关重要。

今天的中国包含两个事实上互相独立的部分：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国内战的胜者在 1949 年建立，统治了大多数人口和土地，是一党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另一个是中华民

[11] J. Zheng 2002; Z. Chao 2005。

国，它从 1912 年到 1949 年是统治中国的威权主义政府。但在内战失败后逃离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演变成在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国家。2013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为 13.54 亿，为世界最多；中华民国则有 2335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两个暂时实行内部自治(分别到 2047 年和 2049 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别行政区(1840-1997 年曾是英国殖民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1535-1999 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狭义而言，“中国”一词现在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两个特别行政区)，而中华民国被称为台湾。它们常常一起被称为“大中华地区”(Greater China)，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和密切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口数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领土面积计算排名世界第四。与台湾(中华民国)统一与否不会改变这两个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坚持并教育其公民相信，该国拥有世界第三大面积的国土(许多国际组织也接受北京的此种说法)，因为它声称完全拥有几块与邻国有争议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 大约 9 万平方公里)。

中国人与中华多民族

就文化、族群和语言而言，作为一个世界和一种文明的中国，有着看似单一而稳定的身分及持久的历史记录，往往可以追溯到 3,700 年前。史前各种部落与民族的互相竞争、不断迁移和合并，在中华世界很早就创造了以稳定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中国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则声称中国文明开始于五千年前，“延续至今，从未间断”[12]。但事实是，中原经常受到许多种族、文化和语言都不同的“蛮夷”多次征服和统治，乃至发生改变。这些不同(有些现在已经消失)的部落、族群和民族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纽带。几千年里，中华世界一

---

[12] Chien 1939, i; Institute of History 2012，chap. 1。

直是许多民族和文化共存、持久竞争，时常沸腾乃至爆炸的民族大熔炉。源自先秦时代(公元前三世纪之前)的一些思想观念，经由官方的准许、修改，后来又神圣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其中有两种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分别成为中华世界里政治体系的道德外壳和本质内核。

汉语言文字本身有许多不同的口语和书写系统，主要是被政治力量逐步塑造并维持。在公元前三世纪，汉字—使用符号和象形方块字的书写系统—被秦帝国标准化，作为整个中华世界的通用书面语得以固化和维持，后来日益僵化，成为难以掌握的古文(文言文)，其功能类似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欧通用的古典拉丁文。中华世界的口头语言(汉语)则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地方方言，经常与书面的文言文脱节。另外，中华世界里还有许多其他非汉族的语言和文字。今天汉语的标准发音是基于中国北方(北京)口音之上的所谓普通话或国语，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才出现，仅仅在 1932 年才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的法令成为官方语言发音，并于 1956 年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重新确认。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权力长期全力地维护书面文言文，汉语言恐怕早已演变成许多种语言文字，使中国在语言地图上会非常类似于今天的欧洲。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统治着整个已知世界，在汉语里也制造出以权力等级为中心的种种敬语，其诡辩虚矫与僵化晦涩，无视甚至排斥逻辑推理并牺牲了语言表达的准确和真实[13]。学者如李克曼(Simon Leys，原名 Pierre Ryckmans)认为，皇权维护的书面汉语和汉字书法“艺术”具有“原始性，...是(政治)统一的标志”[14]。政治化语言尤其是毛泽东的“辩证法”语言，进一步加剧了汉语和中华文化里这些固有的问题。到 2010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断言，汉语

[13] Keightley 1983, 570-71; P. Chen 1999；有关汉语的发展，参阅 Link 2013; 关于出于政治动机对今天书面汉语的滥用，参阅 H. Yu 2011 和 C. Li 201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语言的例子，参阅 Lao 2014；关于帝国集权将中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语言群体聚集在一起，参阅 Crossley 2010。

[14] Leys 2013, 302-13。

本身已经被政治化，变得暧昧模糊、退化混乱、无礼低俗。像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们经常把某些词语列为禁忌避讳一样，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时会发布“禁用词语”的官方清单[15]。

即便统一而极权的世界帝国藉由长期掌控教育、宗教、社会政治流动性、资源分配和文化活动而推行以华化夷的政策，在中华世界里，各族、各地人民依然保留了他们的地域特点和多样性。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体格相貌、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依然有很多差异。这种多样性完全不输给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异。十三亿多中国人大多属于蒙古利亚(Mongolian 东亚)人种，以汉族占压倒性多数(目前占总人口的 91%)，此外还有官方承认的主要按语言和宗教而划分的 55 个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在中国之外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如蒙古、韩国、越南和泰国)。汉族主要是共享一种书面语言的族群团体，其内部包括了拥有各种不同文化、宗教、语言(方言)、服饰、传统、甚至相貌和体征的多个族群。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在 2007 年总结说：根据 DNA 分析，“今天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是不纯的”，也不是独特、单一的[16]。

为了顺应满清王朝治下的中华世界帝国之现实(从而不失去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民族集中生活的土地)，并适应被强加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著名的汉族知识分子梁启超于 1902 年在政治流亡中创造了一个政治概念：“中华民族”。这个以汉族为中心、包括满清帝国治下满蒙藏回各族人民的概念，被汉民族主义灵活利用，既对抗外国侵略者，也反对满洲统治者。梁启超的政治对手章太炎，则主张一个地理上的中国(中原、中土或者中国本土)概念，以及一个语言文化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章把韩国人、越南人和日本人都包括在中华民族内，但是排除满洲人。中华民国的统治者们自孙中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自 1980 年代起)，采用并发扬了这个

[15] X. Xu 2015; Morong 2015; W. Zhang 2014; Z. Su 2016; Lei 2010; Xinhua 7-21-2014, 1-3。

[16] X. Xie 2007。

人造的人类学概念，推动“爱国主义”(一个单一、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并在政治上利用民族主义，尽量减少这个从满清帝国继承来的多民族国家里容易出现的各种不利政治因素，比如地方自治、联邦主义和分离主义[17]。

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 1920 年代开始，就在政治上承认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它们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的大约 8.5%。非汉族人口的增长比汉族略快，并且获得政府一定的优待。名义上，中国现在有五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及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它们分布在中原的周边地带，目前共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土面积的 64%。由此，中共的斯大林主义多民族国家政策，与其现在更加依赖的单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政策相左，造成了民族分离主义忧虑，被北京的一些学者视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风险”[18]。

通过线粒体基因(mitochondria)分析可见，中国人，就像所有的现存人类一样，都是从东非地区迁移出来的智人(homo sapiens)后裔。这些智人在大约十二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前抵达中亚和东亚[19]。化石和考古学证据表明，东亚地区在五十万年前，甚至更早，有过猿人和其他人类种群。这些可能是类似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最终灭绝的人类分支。然而，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这些“本地”猿人，才是“中国人尤其是汉族的直接而独特的祖先”。在中国科学家们通过 DNA 分析，最终确认了中国人的非洲渊源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有许多人强烈坚持中国人是东亚大陆独自发展的人种。他们主张人类“多元起源”理论，反对“走出非洲”的演变理论。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至今仍将中国描述为人类发源地之一，声称中国人是 170 多万年前居住在中国本地的猿人后裔，完全无视人类的非洲起源理论。有些出版物甚至认为，中国才是整

---

[17]梁启超 1907; 章炳麟 1907。

[18] R. Ma 2011, 88-108。

[19] Quintana-Murci 1999, 437-41; Armitage 2011, 453-56; Bower 2011。

个人类的唯一起源地[20]。

因此，许多中国人相信自己是人类族群中绝对不同的种族(通常也是官方的观点)，并且暗示自己更优。然而，中华世界帝国下族群大熔炉的历史现实，也维系着中国人一个强大的信念：如果"其他人"能接受、或屈服于同一个中央的统治，那么所有人群都有可能、也必须成为同一个文化族群。这构成了独特的中华世界观的重要基石：既严格地按高低排序各族人民和各种文化，实际上也常常或透过武力、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容并推进其他种族和文化的归附与融合[21]。

历史与中华历史记录

中国人有着一个本质上是多神教信仰和泛神论的精神信仰体系，这是先秦时代中华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长期分治而自然形成的传统。在秦帝国以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政治权力将这个传统加强并制度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标志。统治者(皇帝)自命、且被臣民们接受为天子(上天或上帝的儿子)，是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的、超越任何有组织的宗教所制约的神圣主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旧通过严格、广泛、权宜变通的政治控制来压服宗教。祖先崇拜和父系亲属关系的维系，往往得到有关天地的道家自然信仰体系的诠释和神圣化，取代了有组织的自治独立的宗教，有效地解决了人们的大部分精神需求。如同韦伯(Max Weber)等学者们所观察到的，这是漫长的中华帝国社会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无神论(共产主义)的统治精英们继承了这个中华特色。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宗教组织都被迫向政府注册并得到批准，由此受到国家的监控乃至供养。关于祖先崇拜的自然宗教得以继续实践，反映在对毛泽东遗体的保存、展示和崇拜

---

[20] R.Zhu 2004, 559-62; Chien 1939, 2; X. Wu 1988, 286-93; Ke 2001; X. Wu 2012, 269-78; B. Liu 2008 ; Institue of History 2012, Chap. 1; Editorial Board 2013, 2–3。
[21] Levenson 1964, V1, 137-39; S.Chen 2008,12-15。

上。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陵墓，建立在该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成为准宗教圣地。前苏联对列宁、越南对胡志明和中国对毛泽东的这种保留和展示领袖遗体的做法，据说意味着后现代(post-modern)的共产主义政党通过偶像崇拜寻求其政治合法性，反而鲜明揭示了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颇为前现代的(pre-modern)。

普通的中国人以及精英(包括皇帝们)，和任何其他民族没什么两样，都有着宗教渴望和精神需求。他们对于生命的忧虑与思考，通过崇拜天地的自然宗教，只得到了一些最低限度的解释。对于中华世界里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来说，历史，与强调家族亲属关系和祖先崇拜密切有关，就成为宗教权力及神明权威的合适替身和委婉代称。历史持续而永恒地记录、评判、奖惩人们的行为，解释过去，并赋予生命永恒意义。帝国统治者们崇拜和畏惧的上天，也就被历史记录所人格化。一些中国学者写到："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在其他国家由宗教所提供的，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其他民族向宗教寻求帮助，而我们只有历史。在我们的精神地图上，没有最后的审判，但是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一个公平的上帝，但是相信有一个公平的历史。所以极权政府总是想要系统地重写历史。...用谎言来埋葬事实"[22]。

自称"无法"也"无天"的毛泽东，事实上就像任何一位皇帝一样，对历史将如何记录和评判他深感恐惧。他因此使用了一切可能的阴谋手段去粉饰、隐藏、"创造"(伪造)历史，甚至以迫害、牺牲数以百万计的人和欺骗更多的人为代价[23]。为了重塑历史，从而规避历史的最后审判，毛泽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开启了若干统治传统：除了宣读仔细准备的讲稿外，避免公开演讲；不经专门的允许和修订，禁止发表讲话的任何录音甚至

---

[22] S. Yu 2012,23-28; G. Fu 2010, 297。

[23] P. Hu 2015; S. Shan 2015; Z. Xin 2009,17,268-308, 436-67； L. Qian 2012 V2, 154-55。

文字记录；用模糊的、双重的用语来包装行为和事实；口头发布重大指令(比如致命的大清洗)以减少文字记录等等。这种畏惧历史、但试图自写历史的传统一直延续：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和输家，据说都“非常关心历史对他们的看法”。毛泽东的副手和指定接班人刘少奇在他被清洗迫害的时候，据说最后的希望是，他未来终将受到“由人民书写”的历史的善待[24]。

虽然退位、但仍然有影响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江泽民在 2012 年写道：每个人，特别是中共官员们，都要好好研究历史，才能“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培养个人的价值观和规范、学习如何治理和振兴中国。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认为，“历史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他还像一个宗教领袖布道般地要求他的干部们，为了自我修养和为了服务国家与世界而“学习历史”。习近平相信，通过阅读历史建立的“文化自信”，是形成“对(我们)的方向、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所迫切需要的基础。任职十年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2012 年在卸职之前，公开用宗教式语言自我总结道：“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人民日报》在 2014 年还公开呼吁，对官方的历史叙事要抱有“神圣崇敬”。于是，正如预料的，中共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继续维持它“劫掠历史来证明其当前野心”的传统，以便通过“重写过去控制未来”[25]。

强大而持久的政治动机和精神需求因此结合起来，使中国保持了世界上最长的、持续不断的、用同一书面语言写就的历史记录。这个历史记录基本上还是用同一种风格和原则加以编辑和维护，使用了据说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删改编年史《春秋》时所建立的一套价值观及标准。史官们记录了每一个政权的每一个统治者，甚至包括每天的生活细节，从而产生数以万卷的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也是中国统治者理解世界、统治人民、

---

[24] S. Guo 2014, 47-54; W. Su 2015；Q. Li 2013, 57；Z. Huang 2011, 1。

[25] Z. Jiang 2012； Xi 8-23-2015 和 9-2011； F. Li 2014；温家宝新闻发布会，2012 年 3 月 14 日； J. Cai 2014, 5；*The Economist* 8-15-2015。

端正自身行为而为人楷模的各种经验与教训的主要来源[26]。

然而，中国近乎神圣的历史记录，其撰写大多受到帝国的赞助、编辑控制、官方标准化以及大规模审查。它们基本上是帝国官僚和宫廷史学家们小心翼翼的作品，为了达到其公开宣称的用历史来指导行动的目的，而垄断了历史的信息及传播。中国的皇家和官方历史记录，虽然浩繁细致、连绵不断、且常常有高度可读的文学故事，但其大部分不过是些宫廷事务辑录和帝国统治大事记，至多部分地反映了中华世界的历史。这种历史叙事几乎完全忽略和排斥了普通人的真实历史，基本上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无名小民”(*l'infime* 与 *l'infame*)的大众生活无关。科学技术以及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在官方历史书中基本缺失。中国历史学最盛名的开山巨著，即司马迁(公元前 145/135-公元前 86)编纂的伟大的《史记》，虽然非常优雅和可读，但明显包含了许多虚构的和依偏见取舍的材料，从而有许多不准确、遗漏或扭曲之处。中国一直存在的“文史不分家”传统，助长了历史撰写和解读中的大量虚构、迎合读者和耸人听闻的渲染，以及政治化导向。即使是最高领袖如毛泽东，也经常用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流行小说来解读历史[27]。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的不完整性尤其是不可靠性，从八世纪以来更为严重。因为自那时起，编写历史主要成了帝国宫廷的官方工作；后来修史还被官府垄断。到了满洲人统治的最后一个中华世界帝国(1644-1912)时，政府更是用死刑(有时会处死历史学者的整个家族)来禁止民间保存和编写历史。帝国政府还全面审查、删削并大量销毁书籍，以控制人们对过去的了解。十七世纪的学者张岱评论说，中国官方甚至民间的历史记录往往充满了谬误、偏见、欺骗和忌讳。一位当代中国学者在2015 年评论道：“中国历史，特别是 1840 年以前的历史”，大

[26] Chien 1975, 1-27 and 1979, 1-77; G. Wang 2013, 1-22。

[27] Foucault 1979, 90； J. Chen 2015。

多是以追逐权力为核心主线，“其实是非常乏味的”[28]。

乾隆年间(1735-96)，满清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长达数十年地努力征集、购买、并在必要时用血腥手段没收中华世界里所有的书籍和文字材料，加以编辑(常常是重写和改写)，形成一套有 3,557 种书籍(共 79,070 卷)的丛书，即著名的、但被官方过度赞誉的《四库全书》。这套“全书”一共只抄印了八套副本，并由皇家控制和收藏。用行政力量审批和锁定“全世界”所有出版物，从而达到修改历史、垄断知识和控制信息，是这个行为的唯一目的。乾隆皇帝对历史档案和各种出版品彻底而广泛的重写和伪造，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也无出其右。更恶劣的是，帝国统治者利用这个机会禁止、并焚毁了至少 6,766 种书籍(后来的学者估计多达 10 万种书籍)，共 93,556 到 15 多万卷，以及无数刻字印版，比《四库全书》收集和保存的书籍要多二到十倍。后来的书目编纂者正式统计的一个不完整名单表明，到 1780 年禁书活动的鼎盛时期，已经有超过三千种书被禁止和烧毁。这种极端蒙昧主义的反智行为，对中国的科学与教育发展的阻碍难以想像，对中华世界的文化历史纪录以及所积累的各种知识，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总体大毁灭[29]。当然，出于政治原因的焚书并不是中国独有。但是，如此大规模、“全世界范围”、长期和系统的破坏，实在是独此一家[30]。

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尤其是中华民国时代(1912-1949)一些受到外国教育和影响的历史学者，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启蒙哲学思想来重读和重写中国历史。他们立足于事实和逻辑，打破了国家的垄断，跳出传统治史的立场与方法。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开始呼吁“写一部新的中国历史”，以摆脱那荒谬的帝国史籍里的种种讹误。这期间，一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包括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垣、

[28] Xie and Wan 1996; Kong 1980; Z.Qiao 2013; Zhang 1655; S. Tang 2015。

[29] G. Gu 2001, 7; F. Zhang 2001, 412–17; Yao 1882; Shi 1925。

[30] Polastron 2007; Guy1987。

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钱穆、吕思勉和张荫麟。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使不是大多数)，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过去的传统，将读史和写史视为准宗教与政治活动，服务于当下的社会政治和个人理念，特别是推动汉民族主义以及自己心仪的政治变革[31]。

1949 年以后，中国史学在中国大陆令人扼腕地退化和堕落。执政的中共回到了帝国时代独霸的对历史的记录、传播，尤其是解释。对历史记录的扭曲、伪造和破坏的程度，其规模与深度都达到了新的最高水平，完美体现了奥威尔(George Orwell)描述过的那种“历史的可变性”或者“修改过去”，即“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的信念。中共不仅有系统地伪造、遗漏和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一直隐瞒、重写和伪造共产党自己的历史记录，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数历史出版物，包括许多“官方文件”、最高领导人的著作、“原始”史料以及“目击者”回忆录，现在都被很多有良心的知情人士认为是充满了故意的欺骗和扭曲[32]。

出于政治动机(后来也有的是受利润驱动)，得到官方批准的虚假历史和错讹信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是无处不在，如同许多其他的造假产品一样。中共党史本身的写作一直是个精心控制的政治“工程”，理直气壮地以“党作为衡量评论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唯一标准”。一项研究表明，中共自 1950 年代以来系统地(有些是反覆地)篡改了至少五百幅重要的新闻照片。一本由中共领导人和元老们讲述的“真实”口述史的书，序言中明确宣称要“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历史的判断意见”，并“拒绝采用任何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党史之指导意见的材料”。无数关键事实和基本信息由此而被隐藏、或扭曲或伪造出来。有学者认为，中共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伤亡人

---

[31] Moloughney and Zarrow 2012；Lu 1933。

[32] Orwell 1949, 19, 194, 143; W. Yuan 2006; F. He 2005。

数由六百万增加到七百万后，又夸张为四千万。在 2010 年代，中共继续惩罚敢于在课堂上质疑党的官方历史叙事的行为。然而，对历史的歪曲往往很容易就露出破绽。例如，在 2015 年的同一天，中共官方一份有关毛岸英(毛泽东之子)的公开出版物，在具体史实上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词完全矛盾[33]。

更糟糕的是，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除了无限期地隐藏文件、大量伪造材料外，显然已经系统地销毁了许多敏感、关键、被认为是不便公开的档案(常常是唯一的文本)。在 2014 年，中共一位权威历史学家公开宣布，为了"保护党的核心利益"，一些历史文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被永久封藏的。据报道，毛泽东在他指定的继承人林彪于 1971 年在神秘叛逃途中飞机失事而亡后，命令手下销毁了"两个装满了绝密档案的大袋子"。又如，被废黜的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在 1999 年(他被软禁的第 11 年)私下对访客说，1980 年代初，邓小平曾命令他"销毁所有"前总理周恩来与文革中的政治迫害案件有牵连的文件。与此同时，无数半真半假、甚至完全捏造的"事实"，通过国家垄断的教育、出版和媒体系统不断推广开来。确实，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被称为"无时无地不在制造假货"的"山寨超级大国"，伪造历史也就很自然地不足为奇。这些政府行为至少使得在中国研究中国历史非常困难[34]。

由此，自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以来(除了中华民国时代那几十年的短暂光景)，对中国的精英们来说，写历史就意味着记录恩怨、塑造和重塑记忆、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以及构建传统和认知框架。因此，历史编撰和教学就成了中华世界里事实上的国家宗教。不同于组织良好的独立的宗教，这个事实上的准宗教，其"圣经"和"神圣裁判"都可以不断地被重写、改变和扩展延伸。按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撰写历史，从而塑造

---

[33] C. Jin 2014; M. Zhang 2016; D. Zhang 2010; L. Lu 2002, 2; Q. Huan 2005; B.Lin 2005; Xi 5-7-2015; G. Yu 2015, 9。

[34] Smarlo 2004, 332-34; 谢春涛 in Wan and Li 2014; S. Guo 2014; Du 2010, 174; X. Hu 2008; Shi 2014; Zubov 2009。

和控制自己的命运，就成为权贵们无法抵御的巨大诱惑。于是，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的帝国统治者，必然要经常地审查、修改和伪造历史记录。一个直接做法就是用所谓谥号“盖棺论定”，根据自己的标准和爱憎在官方历史里褒奖或羞辱他人。比如历代帝王授予孔子荣誉称号非常长，将刘彻(汉帝国第七位统治者)赞为武帝，将杨广(隋帝国的第二位统治者)贬为炀帝，曾国藩(为满清帝国镇压太平军)被赞为文正，等等。

当然，使用今天的价值标准去重新解释或修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形像，既不稀罕，也不是中国所独有。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很久以前就提到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文化价值观、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规范的影响。无论在古代或现代，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试图控制历史的写作、解释和教学。最恶劣的政府之一就是中共的缔造者和老师前苏联。在苏联解体近二十年后，扭曲的俄罗斯历史才终于得到广泛地重写和纠正。即便是在比较开明的中华民国时代(甚至在今天的台湾)，以中华中心观扭曲历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学者们发现，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歪曲历史的共同事例，就是它们都美化蒙元帝国和贬低宋帝国。然而，中华世界的帝国统治者们篡改、伪造历史的记录无与伦比，也无出其右：因为他们长期垄断了“整个中华世界”的历史撰写和解释，而地中海—欧洲世界的各个分立政体，自然而然地有各种(各国)不同说法，彼此制约，从而抵销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历史记录的单一性及其被扭曲和伪造的程度[35]。

因此，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们，学到的是从人类起源开始“中华历史”就单线发展，而且不许争议的官方叙事。对此一些激进的中国异议历史学家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里现在教授的历史，高达 95%都是扭曲或欺骗。比如，一个出

---

[35] Bhabha 1990; Anagnost 1997；Croce 1921, 19, 51, 135-39 & 1955, 149；F. Zhao 2015。

于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的重要例子，就是政府一直鼓吹和灌输的“百年国耻”(1840-1949)的概念，它高度有效，影响深远。而在 2015 年北京官方关于新闻文化界一百条审查标准里，许多都是关于修撰和解读历史的[36]。

表 1.1 例举中国及中国历史的不同解读和表述*

问题/事件/事实	中国官方叙事	不同观点
中国的版图	世界第三大	世界第四大
人口和民族	多族群的中华民族	多民族国家
中国人的来源	170 万年前土生土长	五万年前来自非洲
中国历史的开端	五千年前，黄帝	三千七百年前，考古证据
历史的延续性	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社会文化和同一个国家	像欧洲一样，多次分裂，转化，被外族征服
战国时代	混乱的分裂国家 奴隶制度	中华世界的各个封建国家 中华文明的源泉
公元前 221 年	秦国统一中国 开始封建社会	秦国征服整个已知中华世界 帝国制结束了封建制度
公元前 202-公元 220 年	汉朝，中国盛世 确立儒学	汉族中华世界帝国 秦汉儒化法家政体
960-1279 年	宋代，分裂的中国 软弱，失败，受到羞辱	宋代-中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古代最盛世-中华文明最高峰
1271-1368 年	“我们的”大元朝	汉族被征服和奴役
1644-1911 年	“我们的”大清朝	汉族被征服和奴役
1840 - 1949 年	百年国耻，屈辱世纪 混乱的历史低点	充满实验和进步的世纪 中国被迫结束中华秩序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跃退

*根据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对比观点是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大陆异议观点。

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虽然历史修撰、解释与教学仍然受到彻底而广泛的官方控制，充满了误导和歪曲，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和悔悟的前官员们，开始整理和重修中国历史。有人甚至公开呼吁中国的学生“不要相信中国(官定)历史教科书中的每一个字”。异见者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重新解读中共

[36] C. Yan 2013；X.Feng 2015；David 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2015。

党史，其努力已经取得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本书就引用了他们的新著述。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 57 位历史学家还联合出版了一本《两岸新编近代史》，虽然未挑战中共的官方叙事，但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纠正和启示[37]

对中国历史的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必须仔细遵循并小心躲避中共的审查制度，例如由多家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在 2012-2015 年间就发行了 17 种的《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就颇具修正风格，但还是谨慎服从着官方的审查。相对坦诚和独立探讨的非官方历史著述，迄今在中国常常遭到指责或被禁，尤其是习近平 2012 年执政以后。北京《炎黄春秋》杂志颇为另类，从 1991 年开始到它在 2016 年被中共强行接管阉割前，出版了许多措辞小心、不无自我控制的文章，经常大胆揭露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内幕与真相。"共识网"是另一个少有的例外。它从 2009 年开始到 2016 年"主动关闭"为止，也发表过相当可观的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胆文字。与国外越来越多的人员和货物往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各种规避中共网络检查(所谓"防火长城")的手段，即"翻墙"访问非中国网站的 VPN 方法，使得非官方重写中国历史有了明显增长，尽管是很有限也很不系统。那些地下出版物式的手稿、文章和评论，经由电子邮件、短信和社交媒体(主要是微博、QQ 和微信)在互联网上与不断加强的审查制度斗智斗勇，虽然不断被删被封，但还是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在 2010 年代，官方媒体自己报导说，许多中国大学的老师们经常在课堂上质疑和嘲笑官方编辑的历史叙事[38]。来自台湾、亲历战争的军人郝伯村，在 2015 年参观了北京一个关于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重要展览后，认为该展览"99%都是

---

[37] Y. Shen 2013, V1, 1; X. Feng 2013- 5-7; Z. Liu 3-14-2015; Standen 2012; Shih & Chang 2011, 280-97; Wang & Huang 2016。

[38]关于互联网和中国社会，参阅 G. Yang 2009；Lagerkvist 2010。关于中国防火墙以及"翻墙"，参阅 chinachinagfw.org，program-think.blogspot.com；Z. Qin 2015；PRC MIIT 2017;Y. Li 2014; Bei 2015; Z. T. Li 2016; Editors 2014, 1,4。

假历史”[39]。

初起：先秦的中华世界

一个一元化的中华秩序历史叙事，从二千多年前的汉帝国时开始成为正统。这种历史叙事把官方认可的政治理想，投射到过去的历史上。从古代的宫廷史学家，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教科书(以及很多非官方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定中华历史从黄帝统一天下时开始，就一直大体是在一个一元化的中央集权政体之下。中华历史最好的时光，就是那些强大的世界帝国秩序下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中国的二十几个主要朝代，在救平和统一整个已知世界之后，几乎都会出现一两个“黄金时代”即所谓的“盛世”。但很遗憾，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华悠久历史上三个真正的黄金时期，都是整个已知世界在政治上分立、社会多元化，亦即中华世界帝国秩序缺失或者十分弱化的时期：其一是秦帝国于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华世界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其二是宋代(10-13 世纪)；其三是十九世纪末中华秩序崩溃以来的时代。本书稍后将会详细讨论宋代和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政治历史。在这里，首先检视先秦时代的多民族、多国家的世界政治秩序，作为探讨中华秩序的初起条件。

在秦帝国之前，中华世界是一个政治分立的封建社会。一个父权制君主政体周，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征服并取代了可能类似的殷商政权，成为许多封建国家名义上的共主：即周王或周天子。在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当时的中华世界—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中国本土(China Proper)—主要包括黄河和长江流域，实行封建制，与罗马帝国以后直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和直到十九世纪的日本的封建制相似。中华的封建制，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秦王国内部，首先被郡县制取代，随后在公元前三世

[39] W. Li 2015。

纪末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郡县制所取代。封建制后来有过复辟，但到汉帝国和西晋帝国之后，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系统在中华世界里大体消退了。当欧洲世界在公元五世纪进入长期的封建制时，中华世界的封建制却已经被帝国政体彻底地取而代之。帝国统治者与编户齐民个人之间的中间级层由此被打碎。拥有土地的贵族虽然存在，但很少能持续几代以上。因为财产上的长子继承制被限制乃至成为非法，皇帝还可以随时剥夺任何人的土地和财产。庄园领主式的军阀地方自治也许有可能在偏远地区存在并发展，特别是当帝国的中央皇权削弱时。当然，为了适应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教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历史叙事错误地坚持认为，中国从秦朝到清朝都是封建社会[40]。

先秦的中华世界秩序类似于一个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封建王国、公国、侯国，以及其他各种世袭统治者们各自拥有土地。他们内部自治，并与外部各国通过贸易、外交和战争彼此互动，在这一点上与公元前五世纪修昔底德(Thucydides)笔下描述的古希腊世界没有太大的不同。然而不同的是，中华世界的宗教信仰是自然神崇拜和不同层次的祖先崇拜。它们深深扎根于农耕定居社会，并被分散的小农经济所塑造，形成一个稳定的、神圣化了的父系宗族权威，并和家长式政治权威共存；中华世界里的宗教生活，于是基本上为宗族和政治权力所控制，不具备自治组织和独立权威。这和古希腊与古罗马世界大不相同，尤其是在后来的基督教世界里，宗教创立了发达而持久的神权组织和权威，可以反对甚至取代宗族和国家的权力[41]。

根据比较可靠的考古和档案证据，先秦时代始于公元前八世纪，它有两个阶段：即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722-公元前 470/403)和战国时期(公元前 470/403-公元前 221)。本书具

---

[40] Kan 2007, 9-13, 53-92; Takao 2007； Zhang 1944, 33-36; X. Xu 2008; Z. Yi 2014; Ma 1996; *历史研究所* 2012，III-IV。

[41] X. Yan et al, 2011*;* Johnston, 1995; Z. Wang 1994, 434–38; Mikalson 1998。

体定义先秦时代始于公元前 665 年，那一年齐桓公在齐国即位并拜管仲为相，开启了春秋五霸(或者七霸)中首次的齐国称霸。先秦时代结束于公元前 241 年，当楚国、赵国、魏国和韩国最后一次联合抗秦的战争宣告失败，打开了秦国在随后二十年里征服六国并统一中华世界的大门。

在公元前七世纪初先秦时代的开端，中华世界的中心(中原/中土或中国本土)共有超过 120 个国家。它们都从周王室那里获取名义上的合法性，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互相争斗。随着周打败殷商，周王室本身也分为两个城邦即宗周和成周。这些互相竞争的国家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执政风格、意识形态、领导人物、国际战略、法律体系、经济政策和技术，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结果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的国力、财富和成功。当战国时期开始，即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华世界里还剩下二十多个国家。它们进一步征战合并成七个独立国家，最终只剩下地处中华世界边缘的秦王国。秦是一个古老而偏远的封建国家，它通过由法家思想指导的大胆而激烈的内部改革(变法)，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对内，秦采用户籍制度和连坐制度，严格控制其人民及其迁徙；大规模雇用了外来移民与人才。对外，秦精于贿赂和宣传，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对外扩张战争，极大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它巧妙运用了地理地貌，通过野蛮的武力和狡诈的外交最终征服了整个已知中华世界[42]。

其实，从公元前七世纪的齐国称霸开始，许多国家都试过类似秦国的变法以自强和扩张，并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各自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秦国的改革更具极权主义特征，并在其改革肇始者毫不意外地被处死后持续进行。秦国的最终崛起在政治上、制度上、社会文化上乃至语言文字上都终结了先秦时代。秦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也是秦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以权术高超但残暴专制而名声昭著的秦始皇(公元前 247-公元

---

[42] D. Zhao 2006。

前 210 年在位)，把整个已知的中华世界统一成为一个政治单元。秦国的力量来源于它按照法家统治术，通过严峻而有效的极权主义社会政治控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内部总动员。从商鞅在公元前第四世纪的法家变法开始，后来又得到法家权术大师李斯的辅助，秦国利用了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野心勃勃的人才，最终成为农业军事强国。然而，秦国的胜利和征服是人为的，充满了随机因素，并不一定是所谓的历史必然[43]。

秦国对中华世界的统一成为影响至今的中华政治遗产。世界帝国的统治者拥有独尊的天子、皇帝或龙的称号。封建制基本上被废除；长子继承制度被消减为主要是继承贵族头衔而已，从而使帝国成功消除了与之进行竞争的根基深厚的大土地庄园。工商业被国家垄断和压制。由皇帝任命各级官员的郡县制建立(后来结合科举制度而有所改进)，并控制了一个由帝国选定的精英统治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一个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力混为一体的政府，而皇帝垄断所有的权力，成为专制统治者。除了世袭的皇室家族的干政，皇帝与宦官、高级官僚、将军们之间混沌而血腥的宫廷权力政治，以及绝望的公开叛乱之外，在整个已知世界里没有任何有效的竞争性政治力量。皇帝高踞于所有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之上。秦帝国摧毁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代之以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的、极权主义的世界帝国秩序。几个世纪以后，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欧洲世界从世界帝国政体转变为一个封建战国体系，而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华世界则早已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战国时代的辉煌与和平

先秦时代是中华历史和文化的定型期。在一个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体系中，激烈竞争的各族各国人民，在中华世界创造了历史上最具创新性的时代(另外两个是宋代和十九世

[43] Hui，2005。

纪后期以来)，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基础。直到二十世纪之前，中华世界再也未出现过先秦的所谓百家争鸣现象。在文化成就上，先秦时代显然可以与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奠定了西方文明基础)的黄金时期相媲美。书面中文和中华世界里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都是在先秦时期创造出来。在接下来二千三百年中，在“世界政府”主导下的中华世界再没有新的重要的本土思想出现。几乎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进口的(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和现代科学)，或者仅仅是先秦百家思想的一些分枝发展，如朱熹和王阳明的著述[44]。

战国时代彼此竞争的政治力量、充满活力和富裕的商业阶级、国际空间、以及没有一个世界性的统一神权，为先秦知识分子们百花齐放的思想提供了关键的营养和保障。李悝(公元前455-公元前 395)、商鞅(公元前 390-公元前 338)、荀子(公元前 313-公元前 238)、韩非(公元前 280-公元前 233)和李斯(公元前 280？ -公元前 208)，创立并实践了法家学派，其社会政治思想和政策深刻影响后世。儒家或孔教社会政治思想也在此时出现，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和孟子(公元前 372-公元前289)是儒家两大代表学者。荀子被认为既是法家也是儒家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为汉帝国及其继承者们发展的儒家与法家在中华政治中的共生与聚合提供了理论连结：荀子认为，治国之道可以是王道，即以人为本，基于道德实现王权之下的等级制度；也可以是霸道，即基于武力实现霸权之下的等级制度[45]。法家主张采用严格的为帝王所操纵的法规，实行专制统治，而不是现在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常常故意误解的法治(rule of law)。法家的理想最多也只是建立法制(legal system)和依法治国(rule by law)而已，因为立法者、法官和执法者都是君主，而君主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即所谓“王

[44] Zhang 1944, 108-37, 167-201。
[45] Knoblock 1988-94; X. Yan 2008,135-65。

在法上”。至于儒学，后来简直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与法家一起构成中华世界政治的本质和表象。本书将在下一章进一步分析法家和儒家。

从先秦时代的现有记录可以看出，中华世界里生活在多国体系下的人们，发展和倡导了二十多个(被比喻成百家)不同的、经常互相对立、彼此辩论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学派。除了儒家和法家，其他思想也非常丰富多彩、精细发达和影响深远。由于后来中华世界的帝国统治者的有意毁弃，许多先秦思想仅幸存一些碎片。这些思想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观念和心灵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全球性影响。下面所列的是其中一些主要的学派和著作[46]。

道家或者道教，由哲学家老子和庄子创立，后来演变成一个重要的哲学体系，也是中国唯一本土产生的宗教。这个独特的宗教把追求永生的欲望与过好现世的世俗生活相结合。它影响了中国的神秘主义、中医、炼金炼丹术、天文天象学、美食、建筑与城市规划、文学与民俗文学艺术。它后来出现包括气功在内的其他分支。道家实际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以墨翟的名字命名的墨家，则主张兼爱、国际和平、平等和精英统治。它强调社群主义、功利主义、个人的纪律和修养，它推进工程技术、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与治理和经济相关的财务管理等技能的训练。因此，在秦汉帝国之后，墨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排斥和压制。

杨朱学派在先秦思想界曾经是显学，甚至是一个名列前茅的学派。但在秦汉之后，它比墨家消失的更加彻底。它主张个人主义，强调生命和享乐的价值，还有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道德规范。今天我们只有通过儒家文献里批判它时而引述的少数片段了解杨朱学派。

阴阳家(阴阳自然学派)以邹衍为代表，开创了以阴阳五行

---

[46]关于先秦百家的英文专著，可参阅 Kohn 2004；Watson，2003；Emerson 1996；Fung 1948; Hsiao 1979。

学说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这一学派后来影响到汉帝国统治者们的修正儒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并被吸收进道教，及帝国官僚和宫廷学者从事的炼丹实验、中医、天文观测和地理探索。

名家(逻辑学派)以公孙龙和惠施为代表，是中国版的诡辩与辩证法。它产生了一些最著名的演说家和辩论家。

纵横家(外交学派)面对秦国的崛起，研究和应用了各种现实主义的战略策略，包括"制衡"(balance of power，维持力量均势)或者"扈从"(bandwagoning，加入联盟，搭强国便车)政策。它发展出种种外交技巧，在先秦中华世界里创立、拆解、重组和管理复杂多变的国际联盟。纵横家据说是由鬼谷子(王诩)创立，他的弟子苏秦和张仪，无疑都能列入中国、也许世界历史上最好的演说家、辩手、战术家、阴谋家和外交家。他们的活动使得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充满高风险、高戏剧性的博弈。

农家主张农业的重要性。先秦时代的中华世界确实发展了令人惊讶的高水平农业生产力。当时开发的很多农业基本技术和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还在中国广泛使用。

兵家包括许多有影响力的战略家、军人。其中孙子及其《孙子兵法》被广泛重视和引用。

在先秦时代，还有许多其他创造者、作家、政治家与教师，他们塑造和影响了中华文化。其中一位是著名诗人和失意政治家屈原(公元前 340-公元前 278)，其作品和人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中国学者的定量分析表明，先秦时代也是中国人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峰期[47]。毫不夸张的说，先秦时代一直主宰中华文明史和东亚文明史至今。

与后来中国的官方历史叙事正相反，尽管有着战国之名，先秦时代的中华世界，相比于之后世界帝国秩序下大一统的中华世界，实际上更为辉煌而令人钦佩，是一个治理得更好、也更和平的世界。在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政治秩序下，战国时代的

---

[47] J. Dong 2014。

人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个性、流动性、选择和繁荣，而秦帝国以后的中华秩序下很少再见。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人们的民权(civil rights)，接近处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下的近代早期欧洲人民的民权[48]。尽管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确实征伐多年，但在这五个世纪中的战争频率其实远不如后来的其他时期。只有宋代的澶渊时期(11-12 世纪)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更为和平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该时代因战争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明显低于后来的帝国战争、内战和叛乱。先秦时代的战争大部分是区域性的、重复性的、短暂的、破坏性不那么大的低强度战争，实际上推动了以效率导向的社会政治变革，即学者们认为的“战争驱动的合理化”。属于典型的目标有限的国际冲突，而不是全面战争。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是公元前 260 年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秦军据说坑杀处决了 40 万名赵国战俘。然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被史家严重夸大了[49]。

秦帝国以后，中华世界进入了世界帝国秩序，不仅战争频率增加了，战争的强度、长度、范围、死亡人数及破坏度都扩大了。随着中华世界帝国秩序在元、明、清帝国时期更为完善深入，中华世界里的战争变得更多、更残暴，破坏也更剧烈。与战国时代不同，世界帝国秩序下的战争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全赢或者全输的全面战争，属于相当典型的更具破坏性的内战。如蒙古族、女真族、党项族、汉族统治者之间以及满族、汉族、准噶尔统治者之间的许多战争，其实已经迹近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政治集团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大屠杀，基本上只是为了成为整个已知世界的唯一统治者。另外，那些通常是出于绝望的武装叛乱(或称起义)，例如太平军叛乱(即“太平天国”1851-64)，在几年里就导致难以想像的七千万甚至一亿人丧生(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50]。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48] Hui 2008，6-20。

[49] D. Zhao 2006, 18-20; Jin and Xie 1998。

[50] Ge & Cao 2001.

威权主义政治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因此战争频率近似战国时代，但是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依旧令人难以置信(参见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

表 1.2. 中华世界历史上的战争频率

时代	战争总数	战争频率	战争可能性 (100)
总计(公元前 685 -1989 年)	3,765	1.408 /年	100
早期时代(前 16 世纪-前 685 年)	信息过于粗略不详		
先秦(前 685-241 年)	538	1.212 /年	86
秦汉世界帝国(前 242-公元 219 年)	431	0.934 /年	66
中华世界第一次大分立(220-581 年, 三国、晋、南北朝)	605	1.587 /年	113
第二秦汉世界帝国(隋唐 581-904)	284	0.879 /年	62
中华世界第二次大分立(904-1279)	624	1.664 /年	118
五代十六国 (904-959)	73	1.304 /年	93
辽、北宋、夏 (960-1127)	256	1.533 /年	118
(澶渊条约时代 1005-1124)	83	0.702 /年	50
金、南宋、蒙古(1128-1279)	295	1.953 /年	139
第三秦汉世界帝国	1,251	1.955 /年	139
元(1271-1367)	244	2.542 /年	181
明(1368-1643)	579	2.105 /年	150
清(1644-1911)	427	1.596 /年	113
现代 i	72	1.221 /年	87
中华民国(1912-1948)	49	1.324 /年	94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9)	45	1.125 /年	80

注： 基于中国军事史学家收集的数据库(Editing Group <1985> 2003)。每个条目可能是一次外部战争、内战、叛乱或起义。该套资料是笔者所见最完整的可用资料，但有许多缺憾。它经常把多年的战争或叛乱算作一场战斗；有时又将多年战争或叛乱中的一个重大战役视为单独条目，尤其是在隋唐时代这个问题特别严重。比如说，非常具有破坏性和影响全国的黄巢叛乱(875-884)曾经几渡黄河和长江，洗劫了帝国首都长安，仅被视为一次战争/战斗；而一些小的地方性叛乱(如宋江起义)也作为一个战争项目。

i. 基于一组不同的数据库，包括外部战争、内战以及重大暴力冲突和运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战乱数量相对较少，然而，由于使用了现代武器却非常致命。根据一项研究，在中华民国时代(1912-49)，至少有 2249 万人死于非自然原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 40 年(1949-89 年)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更是多达 4,500 到 6,024 万人之多(Xinhua 8-4-2015; Rummel 1991; J. Yang 2008)。

战国时代既不是战乱频繁，也没有更多破坏和杀戮的事实，提供了一个被帝国统治者及其修史者所遗忘或排斥的重要历史

经验。在三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那个政治分立、多国相互竞争的封建时代，具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繁荣。对于汉族中国人、以及欧亚大陆东部诸多其他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方文明的成形期。如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所感叹的，整个中华历史上“再也没有这么杰出辉煌”的时代了[51]。

因此，关于威斯特伐里亚式的世界秩序在中华世界是否可行、是否可取及其是否可以持久，先秦时代是一个强大的支持案例。它被破坏、终结说明了这种世界秩序的可逆性。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坚持认为，先秦时代的终结是历史的进步，秦统一了整个中原有助于扩展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但事后看来，先秦时代的结束是一个悲剧：一个超级大国扩张成为世界帝国，并统一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后，激烈的国际竞争未能永续，黄金时代也就消失。先秦时代如果可以持续，假以时日，完全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为中华世界带来法理上的民族国家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启蒙运动式的文化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

[51] R. Huang 2007, 17。

第二章. 秦汉政体与中华世界帝国

本章探讨中华秩序即天下世界帝国在中华世界的建立和发展。中华秩序的基础是一个包裹着儒学的法家政体，即秦汉帝国政体为代表的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的性质，使它注定要去统一和统治(无论实际上还是假装地)可以触及的整个已知世界。从公元前 3 世纪后期到公元 19 世纪中叶，除了一些重要的间隔和中断如宋代(10－13 世纪)外，中华秩序一直统治着欧亚大陆东部的主要地区。中华秩序首先是由秦帝国(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所创立，然后由两个汉帝国(公元前 202－公元 9 和 25－220)予以复辟重建，并加以强化、合法化和内化。隋唐帝国(581－907)进一步改进、内化，并完善了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在其彻底性、刚性和力量上都在元、明、清三大帝国(1279－1911)时期达至顶点。

中华秩序是人为设计和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立有赖于使用优势武力去坚持不懈地推动，注重欺骗隐瞒的权术诡计以及各种侥幸的机会。它也和中华世界特定的生态地理、人口变化和技术状况密切相关。中华秩序是依赖前工业化时代的技术，就可以企及的人类政治治理的一个颇为先进的成就。它对各族统治精英都极具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瘾，由此在中华政治史上获得了超稳定的地位。历经王朝更替，中华秩序被强大的体制、观念、精英们长期的有意选择、路径依赖等综合力量所维系，最后成为一种颇为理想的、甚至“自然”和“必然”的世界秩序。

经久不衰、不断重复的实践(即便只是装腔作势的虚假的世界统一)，经由帝国官方垄断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地发酵，中华秩序深刻地内化到中国人的脑海里，成为高度合法的、理想的、乃至唯一的世界秩序观念。只有挟替代新思想的外来力量，如 19 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的扩张至东亚，才可能震撼乃至打破中华秩序在中华世界和中国人心中的统治地位。但直到如今，中华秩序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大中华区(和海外华人中)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迷人的文化规范、倍受珍惜的传统、流行的世界观和顶级的政治价值[1]。

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

在政治上，中华秩序的基础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儒化法家的秦汉专制政体，即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政体的中国版。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通常被理解为这样一个独裁政体：一个比较软化的、不太彻底也不太一律的极权主义版本。它有一些有限的，但既不可靠也不安全的社会政治的多元化；通常依靠一个弱化而拼凑成型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动员去统治和追求国家的目标(但远不及极权主义的群众动员来的广泛而强烈)。威权主义往往通过其政治治理绩效(提供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成绩来寻求其执政的合法性。它的领袖们有一些非正式的、定义模糊不清但仍可以大致估测的个人权力限制。它往往是由一小群统治者实行集体

[1] Kan 2007:1-254。中国大陆学者吴思把秦汉政体贬为从秦帝国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封建主义”、“官家主义”政体(S. Wu 7-22-2014); 另一位中国学者张帆贬之为永恒的“帝王观念”(F. Zhang 2004)。史学家周良霄批评秦汉政体为暴虐的“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但还是认为其主导下的“大一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L. Zhou 1999, 205-282)。一般的中国历史学者更是常常会将中华世界秩序与民族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等概念混淆起来，很少有人质疑其可行性和可取性(M. Jiang 2014) 。在台湾，领军级学者朱云汉的著作依然展现了对中华秩序的向往和赞誉(Chu 2015)。不过，据笔者的田野观察，对于 1980 年代民主化运动后长大的台湾年轻人来说，中华秩序乃至中华身份本身的吸引力似乎已经不再。这也许表明，一旦秦汉政体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中华秩序观念也就失去了其诱人魔力。

统治，在政府和军队里，都有一些相对独立自主的专业职业生涯和升迁路径，有着不透明、不稳定但有一定意义的分权和对权力的制约。威权主义意味着难以预测的恐惧和暴力，以及广泛的宣传鼓动；国家控制着经济和资源，以驯服除了少数统治精英之外的所有群体和个人。在人类历史上，强硬或严酷的威权主义曾经出现在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1930 年代-1945 年)和毛泽东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软性威权主义广泛存在于今天的许多非民主国家中[2]。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通常是指一个强制性的一元化政体，消除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多元性和内部竞争。它强力推行某个意识形态，鼓吹一个似乎可及的乌托邦理想，和对人性及社会的某种整体观念。极权主义政治下的社会和谐，常常是强制的和谐，其社团及个人处于原子化状态，必须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去强力组织。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往往是一个富于魅力、或者有着传奇神秘力量的个人。独裁者受到很少的约束，依靠残暴的武力、广泛的恐怖、有效的宣传灌输、最佳的人身和精神控制技术去统治。极权主义的治理有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国家机器垄断、控制了几乎一切经济活动和资源，用来驯服包括精英层在内的所有群体和个人。近来的历史中，极权主义政体表现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前苏联集团里的各个斯大林主义政权，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权主义今天仍然存在于奉行主体思想(주체)即金日成主义的朝鲜[3]。

从司法和规范性角度来看，民主制度下的宪政法治(rule of law)关于个人的言行，“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而对于政府的言行，则“凡是没有许可的都是禁止的”。威权主义统治恰好把这个逻辑反过来，对个人而言，“凡是没有许可的都是禁止的”，而对政府而言则“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

---

[2] Linz 2000; Ezrow & Frantz 2011。

[3]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56; Linz and Stepan 1996; Kołakowski 1999, 1–8, 77–84, and 1978, 525–766,1044–1139; S. Hu 1941。

极权主义统治比威权主义更甚，除了很少的不确定的“被许可的”个人权利外，“一切没有禁止的都是必须的”[4]。

许多历史学家已经仔细解剖过一些极权主义政体，从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前 3 世纪后期统一了中华世界并建立了中华秩序的秦帝国政体，也符合极权主义政体的定义。它的统治者是一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世袭专制暴君，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去建立一个集中的终极权威，从而试图直接控制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里的任何人与任何事[5]。然而，最为生动也鲜明精妙的极权主义社会肖像，可能还是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以及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预言小说《美丽新世界》[6]。

曾经最先为极权主义命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政治家阿门多拉(Giovanni Amendola)，后来被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黑衫军所谋杀。而墨索里尼本人就曾对极权主义有过一段经典描述：“一切都包括在国家之内，没有什么是在国家之外，没有什么能反对国家”[7]。极权主义政体其实代价高昂，常受限于国家机器的能力而在实践中大打折扣。技术上的限制、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简单的人口大小和地理上的距离，都会影响其实际功效。在 20 世纪里，极权主义是一个突出的政体形式，曾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及其在各大洲的诸多效仿者广为推行，至今仍然可见。虽然工业革命前的技术就可以使极权主义运作起来；但是具备了新的技术和良好伪装(如反犹太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甚至反殖民主义)后的极权主义政体，则变得更加可行，更有吸引力，功能会更为强大。极权主义是一个深深根植于人类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许多国家许多不同时代，都曾有过不同程度和不

---

[4] Andenæs and Fairgrieve 2000, 256; White 1939，122。

[5] Conquest 2001。

[6] Orwell (1945 and 1949)；Huxley 1932。

[7] Pipes 1993: 243。

同结局的实践。本书关于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极权主义政体曾广泛存在，而不仅仅是 20 世纪才有的狂热激进现象。作为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制度，极权主义在总体上是次优化的、不可取的、甚至是脆弱的；但是它有其可行性，可以形成非常强大的国家力量，尤其是短期勃发的国家军事力量，并对雄心勃勃的统治精英们有着天然的、巨大的吸引力[8]。

极权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和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创立极权主义政权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些可怕的“外部和内部的敌人”。有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可信也可怕的敌人，才能解释和维护极权主义的高度权力集中并使之合法化。极权主义政治的如下一些特征，也就随之顺理成章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动员群众和榨取各种资源以及管制各种信息；要求人民完全顺从并消除任何反对和批评声音；把整个社会都原子碎散化，使得国家机器成为唯一的国内组织机构；使用野蛮的武力和苛刻的独裁，以及无休无止地牺牲人权和生命。极权主义国家视需要与否，会使用种种宣传、欺骗、阴谋和随意随机地清洗，培养仇恨和分裂，从而制造和维持一些可信可怕的敌人，建立一个充满恐怖和畏惧的类似永久战争的环境。这类制造出来的敌人的现代例子包括：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前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阶级敌人”和“西方帝国主义”。为了创建和维持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作为有用的敌人的补充或替代，独裁者们还会发明一些模糊却迷人、令人无休止地痴狂但又看来可信、简单却又宏大的理想或者使命。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许多雄心勃勃的人都使用过种种美丽的主义和口号，去夺取国家政权并集权独裁。常见的例子包括，执行神的旨意、或者遵循某种科学世界观、或某个领导者的梦想；净化和提升某个种族；统一祖国乃至整个世界；复兴

[8] Buchheim 1972;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56; Arendt 1951; Pauley 2008; Pipes 1993: 244-45。

某个文明或者报复过去的仇恨；获取得更多的生活空间；或者干脆去创造一个人间天堂[9]。

在中华世界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于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来说最好的敌人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些外部敌人。因为很容易就能鉴别那些不是“我们/中华”的“他者/外夷”，并号召与之战斗、杀戮乃至征服他们。要么这些落后的外夷蛮人会威胁到我们，要么这些非我族类正在浪费完全可以为我们更有效更有价值地使用的土地和资源。因此，一个极权主义政体，在国内必定仇视异见者、差异性和多样性，并采取独裁和暴政；在国外则必定具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因为与任何有意义的国际比较与国际竞争共存，都会令极权主义政权感到不安全。如果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比较虚弱，则它可能紧密控制自己的人民，防止外来影响，构建一个假装的国际优势乃至领导地位；如果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比较强大(甚至仅仅是自我感觉良好)，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出击，以寻求国际影响力，控制乃至征服整个已知世界。如果必要的话，这种对外扩张会分阶段进行，并常常以和平和正义之名进行。因为极权主义可以极端地榨取和利用所有资源(包括人民生命)，往往具有超过其竞争对手的优势。如果极权主义政权和非极权主义国家同时拥有类似的技术能力，则极权主义政权的竞争优势将更为明显。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落后、不文明、不人道、更无情的极权主义势力，往往戏剧性地、“出乎意料地”打败乃至征服非极权或比较少极权的的竞争对手。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因此必定是或必须成为一个世界政府，通过统治和收服整个已知世界，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

秦政体：中华极权主义

在充满国际竞争和创新的先秦时代，法家统治制度于公

[9] Wolf, 2007; 44。

元前 4 世纪以后在中华世界里的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创立。这种统治制度后来在秦王国的广泛、持久而成功的军事和外交实践所推动下，成为整个中华世界的政治秩序。法家思想注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它看上去是一个干脆、迅速、高效而简洁的建立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力的方法，通过无情地使用武力和谋略，强制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条令，而不是通过间接统治和权力下放，依赖那些道德准则、说教和社会交往规范的封建式或者家族式的政治结构。法家通常被称为权术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最高理想境界是君主的所谓依法治国(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即"由法治国"rule of law)，因为君王永远在法律之上。它主张将政权集中于最高统治者手中，鼓吹粗暴地使用武力与诡计，用苛刻的帝国法律支配除了最高统治者外的每一个人。法家不坚持绝对的道德观念，无所顾忌而又务实，对人的欲望和弱点进行恶意操纵，只要是可以实现国家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亦即一种厚黑邪恶但"现实"有效的统治权术。这些思想后来因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论述而流行于西方并知名于世。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等人的经典政府类型学来划分，法家的秦政体应该属于世袭暴君型。这类暴君统治者除了"自己的利益"和"绝对权力"外，不再在意任何其他东西；他超出法律限制之上，并使用任何无论多么残酷的手段去反对和镇压任何人和每个人[10]。

秦王国征服整个中华世界，就是极权主义统治取得"全世界"胜利的一个历史案例。这是诸多历史力量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精明能干的秦国领袖们集中、持续的努力。对于不相干的历史读者来说，秦国的胜利似乎只是地理、人口和各战国之间互动等因素的一个必然产物。对极权主义和世界统一的支持者们来说，秦的世界秩序代表着人类政治制度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对怀旧的中华沙文主义者们来说，秦帝国代表着

[10] Machiavelli 1532; Plato 380 BCE, XIII; Aristotle 350 BCE, X, 219–20; Locke 1690, XVIII, 110–14。

力量和征服的史诗般成功。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就在其 2004 年的电影《英雄》里，满是仰慕地美化秦之征服天下。然而，根据我们对于先秦中华世界历史的重新解读，秦统一中华世界，其实意味着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一个辉煌时代的悲剧性终结。对今天观察中国及其崛起的人们来说，秦世界秩序是中国政治传统与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和北京今天的政策偏好与追求[11]。

在秦帝国之前和之后的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类似的对整个已知世界的征服自然也并不少见。马其顿曾征服了希腊世界以及以东更广大的地区，蒙古帝国曾占领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一个很有意思但颇为捉摸不定的问题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一旦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之后，会怎样？这个世界帝国会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秦始皇的帝国以及成吉思汗的帝国那样很快分崩离析而垮台吗？还是像传说中中华世界的商朝(公元前 17－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王朝(公元前 11－公元前 8 世纪)，以及地中海世界的西罗马帝国(公元前 27－公元 476)那样，逐步衰败和蜕变成封建式或者联邦式的国际体系，然后瓦解和消失？世界帝国有可能长久地统一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吗？地理、人口、技术水平无疑对一个世界帝国的命运有着关键性影响。更重要的或许是要看该世界帝国有多么威权或多么极权，以及它的世界统治有多彻底和多有效。恰如秦帝国所昭示的，那些极权主义世界帝国，在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后的历史命运非常不确定，往往也很不值得羡慕。

秦“天下”：一个世界帝国秩序

在中华世界里，秦国几个世纪里不断的壮大和扩张，最终导致了各个封建邦国的灭亡。统一后的秦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有一个管理整个已知世界(天下)的世界政府。帝国的制

[11] Hui 2005, 63-107, 216-23; Z. Wang 2002。

度是自上而下委任所有官员，惟上司旨意是从，并以皇帝的喜好来最终定夺。原本拥有土地的世袭贵族阶级，被郡县制下单一官僚统治阶级所取代。这个新的统治阶层，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威和力量，践行法家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使用武力与权术诡计。秦，带着中华世界里的人们踏上一条世界帝国、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由中央集权统一管理太阳下的每一个人，即所谓天下一统[12]。

中华世界的“天下”概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公元前 8 世纪之前。意即整个已知的世界，应该统一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即天子之下，并由天子为整个世界提供政治秩序和治理的稳定性与合法性[13]。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最佳描述，也许是来自《诗经》(据说由孔子编辑过的中国第一本古诗集)的两句著名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在封建分立的先秦中华世界里，这样的诗意理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作为诸多封建国家“共主”的周天子名义上的主导地位也逐渐下降消失；周王室自身只成了一个小领主, 其生存必须依赖其他强大的各个争战国家的善意和支持。公元前 249 年，秦王国干脆废黜并吞并了微不足道的周王国。

这个前所未有的秦世界帝国，是秦国自商鞅于公元前 359 年开始的划时代的法家变法改革后，实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极权主义法家世界帝国政体的最高使命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在争战诸国中，商鞅变法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彻底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先秦中华世界里，封建君主们都有同样的求生存之需求，也都受到类似的赢得国际竞争之欲望所推动。他们采取类似的法家路线，尝试了各种内部变法和外部联盟，以加强统治、增强军事力量。变法迅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强化了邦国的实力并成功实现了对外扩张和称霸。例如管仲在齐国(公元前 7 世纪早期)、李悝在魏国(公元前 5 世纪后期)、吴起

---

12 Levenson 1959, 112; Burbank and Cooper 2010, 43–52 。

13 Watson 1967; Levenson 1964, 113。

在魏国和楚国(公元前 4 世纪早期)、邹忌在齐国(公元前 4 世纪中期)、申不害在韩国(公元前 4 世纪中叶)。不过这些改革都没有秦的改革贯彻来的彻底和极权。更重要的是这些变法都未能持久，因而也没有产生持续的效果。各国的统治者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受秦国不时的贿赂、离间破坏和误导外交的影响，而常常放弃改革。尽管商鞅本人的下场悲惨，秦国还是坚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商鞅变法，直到其最后开花结果：在对其不满的秦国新君于公元前 338 年上台后，商鞅沦为了一个逃犯，但是却无法逃脱他为秦国创立的强有力的户口制度和连坐系统：他的全家都被迅速地公开处决，而他本人则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14]。

商鞅式政权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宏大事业：把一个地处边陲、落后而弱小的秦国，变成超级大国和霸主，进而消灭六国，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我们从后人记述的文字冷酷而粗率的《商君书》中，可以看到这个强有力的威权/极权政体所信奉的关键法则：使用各种残酷的武力、诡计(包括发展秘密线人)，诱发出人们的贪婪和恐惧，以碾碎、征服、剥夺和操纵民众，同时摧毁和销蚀所有的社会政治组织(除了帝国等级制度本身)和道德伦理(除了对帝国的忠诚)；以故意剥夺、压制、虐待甚至奴役人民的方式，发展、动员和集中所有资源，以无限扩大国家力量，尤其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利用各种资源聘请专家人才，包括积极招募和收编外国人甚至对手；不惜以金钱收买腐蚀、使用诈术离间、甚至谋杀手段，无情摧毁所有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这个愚民、牧民的法家政治手册骇人而有效，被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秦晖称之为“与人民为敌”。荀子，特别是他的弟子韩非的著述，进一步丰富了这种用来巩固权力、征服及统治整个世界的权术。荀子的另一个弟子李斯，后来成为秦国的宫廷顾问及丞相，更是无情地执行这些法家学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5]。

---

[14] Zhang 1944, 207； Sima 2nd century BCE, V5, V68。

[15] Shang 4th century BCE; Xun 3rd century BCE; Han 3rd century BCE; Sima 2nd

一个构建良好和精心管理的法家政体，会产生和集中一股异乎寻常的国家能力，实现对人力和其他资源的极权式控制和调用。它把人民基本上当成工蜂，集中调拨“全世界范围”的一切资源，从而可以成就一些宏大的帝国事业，包括打赢一场总体战争，彻底征服整个已知世界，修筑宏伟的长城、秦始皇陵及其现在闻名于世的兵马俑、和传说中的阿房宫。一个极权主义法家政权，必需要寻求统治住每一个人，方能繁盛。它必需籍由无休止的控制和扩张，汲取其合法性和力量，直至达到现实世界的尽头或者耗尽其自身的动能。一个秦式的法家专制国家，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只要出现任何不受其控制的有意义的比较和竞争，就很难觉得满足、安全与和平；它于是就有了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注定使命，即所谓天下一统之天命(Mandate of Heaven)。秦国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历史工具，是中华世界里这个强大的法家极权主义内在逻辑的物化。

在公元前 221 年灭掉各国，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后，秦始皇还想永保他前所未有的世界帝国，并传之其子孙后代。他诏令今后的皇帝将按辈份排序命名，以他作为第一世即始皇帝。他还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去统一标准化马车道路系统和计量单位；规范了书面文字语言；焚烧了非秦国以及各种“无用”的书籍以控制信息，并处死异议学者们，即所谓焚书坑儒；没收了所有私人武器回炉后，在首都咸阳铸造成巨型铜钟和塑像；屠戮或拘留战国时代各国的旧贵族和富商们；推倒大多数各国以前的城墙；通过军事征服去进一步扩张其世界帝国；并寻求不老药以求长生。秦始皇为了追求神明的祝福和天命，还举行盛大隆重的自然主义信仰仪式：登泰山祭拜天地(封禅)，把自己神化起来[16]。

century BCE, V87。

[16] Zhang 1944, 209-23。封禅始于先秦时代，是受道教影响的半宗教仪式，即君主登临高峰如泰山顶去祭祀天地，获得天命和天地神明之祝福。前 218 年后成为中华传统。此后泰山封禅不断，规模不一，直至 1790 年满清帝国的最后一次(山东泰安岱庙石碑和石刻)。

然而，秦的极权主义统治未能持久，也未能内化。秦的世界帝国秩序非常短暂(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高度依赖军事戒严般中央集权统治的秦王朝，在开国皇帝秦始皇于公元前 210 年突然去世后，腐败的官僚们和内廷宦官们，立刻陷入了为了皇位和权力的内斗、暴力和混乱之中。使用工业革命前的技术，依靠严酷法令和暴虐武力统治这么多族群人民的极权主义政权，被证明是难以承受的昂贵实践。一场短暂但剧烈、具有难以想像的血腥和破坏性的叛乱与内战，彻底地从肉体上消灭了有数百年历史的秦国王室和大多数的秦国统治精英家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华天下世界帝国秩序，以一场对其统治者和治下人民都是全面灾难的破坏杀戮而告终。这个惨烈有力的历史教训，在后来的中国却被大体遗忘，或者有意遮掩。

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

公元前三世纪后期的中华世界，众多具有不同禀赋、才能、资源、运气，及抱负的领袖们在帝国崩溃之后的混乱里，为重建秩序而互相争夺。也许这场世界大乱，其实是在不自觉地回答秦帝国的覆亡所带来的两个难题：是秦式的极权主义法家帝国统治制度太过强暴、弊端太多而未能持久？还是这种中央集权的世界帝国制度本身，就有致命缺陷而无法持久？

在这个过程中，富有军事才能的猛将和悲剧英雄项羽(公元前 232－公元前 202)崛起，并自封为楚霸王(楚原来是先秦时代有 800 年历史的一个封建国家)。他试图通过强制重建一个王中王(他自己)之下的封建诸侯国家体系，以恢复先秦时的准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封建国际关系世界秩序。项羽成功地运用秦式的武力战术，在战场上剿灭了许多想当天下统治者的野心家们，短暂地平定了秦帝国以后的中华世界。但是他没有彻底遵循法家政体的内在逻辑，而成为统一整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君主。他分封他的各个盟友(经常也是他的竞争对手)去各自建立一些自治的独立王国，希望用一套君子协议式的行为道德规范，

重建一个新的先秦式"美好过去"的世界秩序。而他新的楚王国和楚领导的国际联军部队就作为国际警察和规则执行者。一个封建邦联式少些暴政的政治秩序，于是被设计为统治秦帝国以后中华世界的方案。

不过，中华世界国际关系里的楚国霸权非常短命。也是来自原楚国的起义军同僚，被项羽封为汉国国王的刘邦，采用了相同的秦式法家权术，并贯彻始终法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很快就推翻了项羽，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最终又统一了整个中华世界。戏剧性的楚汉之争以及刘邦的胜利，证明了秦式法家路数在权力斗争中的优越性。项羽既失去了他的世界也失去了他的生命，成为中华文化中最为持久的传奇人物之一。这个民俗故事里广为人知的悲剧英雄之命运，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那个永远失去了的先秦世界。

汉帝国恢复了秦式的统一整个已知世界的世界帝国统治，但很快就同样面临了那个推翻秦帝国的挑战：一个极权主义势力征服了整个世界，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也就不再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或者一个宏大的目标；那么这个有效也有用但是无情而脆弱的法家极权主义政体应该如何持续下去，长久地统治整个世界呢？考察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领袖们是如何创造性地应对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他们干脆制造出一些永恒的敌人，比如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或者创造一个无穷无尽的宏伟目标，比如种族纯洁和共产主义天堂。当然，这些现代的极权主义政权往往未能很久，更未能真正成功地征服整个已知世界。

经过长期多次的流血战争、彻底巩固其政权后，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希望能够避免秦帝国的不幸结局。秦式法家极权主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征服世界的功效，但也表明了它治理天下的不足。嬴氏家族，一个统治了秦国和秦帝国 600 多年的煌煌成功王族，在它完成史无前例的使命，统一整个已知世界的伟大事业后仅仅几年内，其家族十多万人口，就和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一起被彻底消灭。嬴姓在中国从此绝迹。这些史实是

非常令人惊悚也给人启迪的。秦的惨烈崩溃，揭示了或者有着百年历史的秦式法家政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或者持续了十余年的秦式天下一统的世界帝国是一个可怕的政治秩序，亦或这两者对帝国的每个人尤其是统治精英们，都危害深重。

汉帝国尝试了各种政策措施，比起秦始皇来要少了许多急促匆忙和严酷暴虐。这其中包括重建一个分封异姓王制度(但是很快就通过内战和阴谋而予以取消)；建立皇室家族封建主义的分封刘姓王制度(但是一些刘姓王很快又反叛觊觎帝位，于是帝国只好通过更多的战争和谋杀去削弱、架空各个刘姓王)；用所谓"黄老之道"的道教治国理念去弱化中央政权、减少税收负担、采用消极应付式治理态度。汉帝国还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些重要帝制传统，即中央政府直接垄断那些获利丰厚的采矿、造币、贩盐行业以及其他一些手工业。国家对需求刚性，具有稳定高利的盐业的垄断后来居然一直延续了2000 多年，直到 2010 年代[17]。部分由于这些试验和创新措施，部分由于整个社会自秦统一中华世界战争以来，已经损耗疲惫至极，不堪折腾了，部分由于汉帝国朝廷上有着连续几代不太暴虐、比较有能力的统治者，总之，新的汉世界帝国秩序存活下来。但是，关于世界政府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汉世界帝国的统治者们，他们为此已经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经历了好几轮血腥的皇家内斗、宫廷政变、武装叛乱、小规模的内战以及外部敌手匈奴的崛起与挑战[18]。

在中华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但探讨很不足的现象，即一个强大的秦汉式世界帝国，在欧亚大陆东部崛起并实现"世界统一"之后，似乎总会有一个新的强大外部敌手很快出现。鉴于中华世界的生态地理，生活在广袤而条件严酷的亚洲北部草原(Asian Steppes)上的各个游牧民族和部族，通常被中原或

---

[17] 1949 年以后，中国的中央计划统治曾经一度控制了包括 1,450 种商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CCP Central History 2008, 12-1, 17-1)。在 2010 年，中国大陆依然是国家垄断盐业，其利润率高达 578%(B. Liu 2014)。

[18] Ban 1st century BCE, V24; F. Zhang 2001, 82–91; Zhang 1944, 260–79。

中土农耕国家的统治者们视为既无价值也无意义的化外野蛮人。的确，要征服和统治这些分散、流动的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去课他们的税，在技术上十分困难，经济上也得不偿失。这些通常没有组织起来(或仅仅是部落大小)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通过与中原的贸易而得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如布料、金属、盐、谷物和茶叶。他们也偶尔抢劫中原的边疆地区(通常是为严峻的气候环境变化所迫)。这个古老的往来模式虽然并不总是互惠互利，但是可持续。在先秦时代，这些“化外之地”里被忽略的游牧民族，很少对中原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因为它们既无能力、也无必要大规模地武装组织起来侵扰中原。他们中的一些，如被中原蔑称为犬戎的部族，也曾偶尔卷入和参与中原的重要政治和军事事件[19]。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帝国的中华秩序改变了原有的往来生态系统，致使这些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开始大规模的武力侵扰，从而损害了中原边界地区的安全。一方面，这些游牧民成为中原世界帝国新的“有用的敌人”即所谓“野蛮人”，在与帝国垄断的贸易中遭受剥削和虐待，直至被禁止边界贸易。另一方面，他们被迫要大规模地组织并武装起来，以应对强大的世界帝国军队，这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在中原边境地带与地方卫戍军人的小冲突。极权主义政治下需要制造外部敌人的逻辑，在中华秩序下得到了光大，几乎必然地将那些不受控制、或无法控制、但可以忽视的游牧部落倒逼成强大的外部敌人。游牧民族一旦组织起来，无论能持续多久，在中华历史上都多次给中原以灾难性的打击，甚至征服中原。中原也不得不发动昂贵的、超出本土的远征行动，因而轻易耗空帝国的国库。中原也会采用绥靖政策，如开通贸易，乃至打造一个朝贡贿赂制度，在名义上甚至实质上建立一个封建邦联体系，统合这些游牧民族[20]。正如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论述过，这些通常

---

[19] F. Li 2006,215-349。

[20] 当然，如果一个世界帝国能够完全征服全世界，不让一个人不受其统治，则这些外来“野蛮人”的侵扰可能就会消失。但是，由于前述的技术和成本问题，在人类历

被官方史家摈弃和忽视的中原与北亚及中亚各民族的长期边境交往互动，实际上是推动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扩展变迁的一大重要引擎[21]。

在长达 54 年的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141－公元前 87 年)，汉帝国终于找到了解决世界帝国治理难题的一个长期办法：用经过修改并简单化的先秦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去补充和加强秦式法家世界帝国秩序。早几十年，儒家学者如叔孙通就已经说服了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利用儒家父权礼仪形式和符号为政治服务；而学者贾谊也早已雄辩地在《过秦论》中，阐述了用人道精神去软化秦式政体的必要和可行。根据幕僚和官员们 10 多年的建议，儒家学者兼官僚董仲舒在公元前 134 年，总结并呈献给汉武帝一个著名条陈：“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亦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22]。

董仲舒通过综合地控制人民及其思想去统治天下的思想，除了来自他对儒家理想的修正主义理解，还包含有古典《易经》中所记述的许多先秦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的浓厚成分。董仲舒使用“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将秦汉世界帝国合理化。就像世界只能有一个天堂，天空只能有一个太阳，人世间只有一个正道，一家只能有一个父亲一样，一个世袭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就应该统治天下(整个已知世界)。一个一统天下的皇帝作为天子，从其神圣不容挑战的天命那里得到权力与合法性。上天(自然宗教信仰的大自然或上帝)和人类生活在根本上彼此相连、是一致而又同步的整体。被董仲舒用儒学包裹起来的法家秦汉政体于是被证明为不只是人为的，而且是天定的自然规律。而天与地(农业社会里的两个关键自然因素)则是全能神明的象征。这一政体的

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世界帝国能真正征服和控制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也许今天低价而高效的现代科技，可能会令一个真正完整的世界帝国变得可行，甚至还具有相当不错的成本效益。

[21] Barfield1989，1-163；Lattimore 1940。

[22] Sima 2nd century BCE, V99, V121。

目的被理想化为天赋的、在一个正当有序(犹如一个农业社会父系家庭)的社会政治秩序下的稳定和安宁、(有等级的)平等与正义、繁荣及安全。这些观念、价值和理想被经典地简述为“天下一统”、“大一统”或“大同”或“天下为公”(来自《礼记.礼运》)。大同概念后来被从黄宗羲(1610-95)到康有为(1858-1927)的中华精英们，借去描述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秩序(“善治”)。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作为其政党的座右铭，而中华民国政府则把“大同”一语供奉起来并写入其国歌。毛泽东还把共产主义普及化和庸俗化为农业社会里悠久千年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康有为的大同观念。毛此举虽然令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不快，但却吸引了许多中国民众[23]。

于是，一个天下统治者只要遵循这种修改过的儒学所阐明的天道，就具有神圣天命(Mandate of Heaven)，替天(大自然亦即上帝)统治整个世界，不受挑战也不受质疑。如果统治者一旦迷失而不行天道，他就有失去天命的危险并出现谶纬警示，如自然灾害(洪水、干旱、蝗虫、地震)、彗星或其它超自然现象的出现、或者会有民众叛乱，来警告、唤醒他，让他忏悔罪己并自我纠正。不然，他的天命则可能会被别人(一个新的真命天子)夺走。汉武帝采纳的这一弥久不断的帝王意识形态，在 20 世纪初被简写为迄今广为人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以彰显其实质[24]。

这样，先秦的帝王“天命”观念和道家的“人与天一”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一个依据祖先崇拜和自然主义信仰悠久传统的新意识形态，去论证一个包裹了儒家观念的中央集权、法家独裁、世袭政体理应长久地统治天下即整个已知世界的神圣性[25]。汉武帝还很积极地登泰山去祭祀天地，从而神化他的天下一统

---

[23] Ban, 1st century BCE, V56; Kang1902; Y. Zhang 2009。关于大同理想政治化的检讨批判，可参见 G. Liu 1986, 33-36, 200-01。

[24] Yi 1916。

[25]《尚书》14;《庄子》20; Smith 2013, 5。

之天命。巫术的运用对构建这个新型政体也起了作用[26]。依据天命去统治世界，此后一直是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的道义门面，为各个皇帝引用并刻在帝国传世玉玺之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亦即所谓“替天行道”口号。2000 多年后，毛泽东试图以类似的方式去僭用物理学和宇宙学理论，来证明和宣传他的政治权力和野心，是基于某种整个宇宙的“终结真理”，即毛泽东的同样神圣的民命观(受命于民 Mandate of the People)口号:“为人民服务”[27]。

儒家和法家的聚合

就此，到公元前 2 世纪后期，汉帝国设法构建了一个涂上了儒学色彩的秦汉法家政体，以及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天下)的世界帝国秩序即中华秩序。这个天下一统之天命，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官方建构和灌输的中华“文化主义”或“帝国普世主义”或“儒家-法家国家”。这是一个等级制、专制独裁的制度，最终是个武力统治制度。它最好的理想化结果就是所谓依法统治或依法治国(rule by law)，但经常都是统治者随意志统治即人治(rule of man by will)，远非法治(rule of law)。它基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和诡计，但是又装饰了儒家的家庭式人文主义礼仪和价值观。汉武帝本人就一面神化供奉儒家关于忠诚孝悌的理念，一面将秘密线人制度合法化，并鼓励奖赏人们去举报家庭成员，延续秦国法家政治家商鞅 200 多年前创始的这种控制人民和增加税收的统治术[28]。

这种儒化法家或曰儒表法里(Confucian-Legalism)专制政体，大致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种暴政政体(tyranny)的综合。它有其一定的内在制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些需要

---

[26] L. Cai 2014；关于天下观念中的宇宙观元素，可参阅 Kan 2007, 181-216。
[27] Y. Cheng 2006, 109-49。关于毛氏民命观之进一步分析，参见本书第六章。
[28] Lewis& Hsieh 2011; Levenson 1959, 109–20; Crossley 1999, 36-9; D. Zhao, 2006: 22; Hui 2008; Ban 1st century BCE, V24。

遵守的成文法规和章法。儒学本身也在发展，并沿着哲学史家冯友兰所观察到的"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方向扩展，成为一个聚合法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它主张模仿理想化的农耕父系家长制大家庭而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强调集权统治，每个人基于其位置而有固定的权利和义务、礼仪规则、职责与人文伦理，推崇这种建立在等级秩序上的社会和谐。它鄙视并阻碍商业逐利、创新和个性，重视并提倡秩序、传统、礼仪、等级、仁慈的独裁统治，以及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的统一。这些政治儒学主张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孔子、孟子和荀子当年提出的观念；在董仲舒以及后来的朱熹和王阳明重新诠释并扩展后影响深远。这些不断演变的儒家思想在成为皇家意识形态后，长期塑造了中华政治，构成了大一统的天下世界观的标准框。它对邻国如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编写也有过重大影响[29]。

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以儒学(儒家、儒教或孔教)闻名于世。它其实是一个儒化法家思想，以秦式的极权主义法家专制制度为其硬核，而以修改过的儒学政治理念作为其外表，并掺和了其他先秦观念和礼仪，尤其是道家和自然宗教信仰的许多元素。孔子一生都是不得志的教师和学者，在去世几百年后却被加上许多皇家头衔，甚至封王而神圣化了，他的后人也因此得到许多特权、荣誉和财产。儒家被供奉成历代帝国的准国教，甚至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宗教式信仰。然而，作为一个信仰体系，或者如韦伯(Max Weber)所认为的一个"世界性宗教"，儒教与大多数其他宗教还是非常不同。它主要是个政治理念，而不是像其他宗教那样，首先侧重于通过神迹说服、信念和遵从宗教仪式去解说生前和生后的人生意义问题，再进而获取社会政治权力。经过不断的重新诠释、复苏和重建之后，儒学也确实接近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大众世俗信仰系统。这个国家宗教或皇家意识形态具有灵活动态的神学特征，一直以来都是中华

---

[29] Aristotle 350 BCE, 219–20；Fung 1948, 38-48, 143-54, 191-217, 266-328；Z. Qiao 2013。

统治者们近乎完美的威权主义(或软性极权主义)统治手段，极大地巩固和强化了秦汉政体及其世界帝国秩序即中华秩序[30]。

其实，统治者们从根本上赖以执政的“黑暗”帝王术大师是法家学者，但他们并不会被公开宣示出来。中华秩序必然导致蒙昧主义的兴起，随之法家经典著作被进一步深藏起来，仅供统治精英们学习。法家思想是两千多年来中华秩序的真正政治游戏。在汉帝国三个皇帝(武帝、孝昭帝、宣帝，公元前140-公元前 49)跨度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下，儒表法里的秦汉政体获得了深深的可操作性和合法性。这是一个装饰精巧华丽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权，或曰法家帝国主义的“以品行为基础的政治秩序”[31]。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化法家思想下的秦汉政体，在实践中可以因具体实际统治者的不同个性和政策取向，而呈现出不同的统治特点：从极权主义专制独裁到软性极权主义或严酷威权主义，再到软性威权主义甚至是开明的软性威权主义。只要还有不受其控制的外部竞争和比较与之共存，一个秦汉政体是注定会深感不安和不满，因而它注定要努力成为一个世界秩序。这些儒化法家思想，后来被内化成中华世界的文化认知传统，把一个本质上等级分层的统一世界秩序设想为唯一的政治理念，从而理想化和美化了一个倾向于普世霸权的单一帝国[32]。

儒化法家制度在政策实践中打磨掉了秦式极权主义政体的粗厉棱角，在意识形态上，更支持威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通过将帝制国家拟人化为父系家庭制度，并借用上天(即上帝或大自然)意志授予的神力来降低其统治成本。在功能上，秦汉政体是一个具有前现代(pre-modern)组织结构的政体，其政治治理、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缺乏分化独立与互动

---

[30] Y. Tang 2011；S. Li 1998; Zhang 1944, 108–37；Weber 1915；A. Sun，2013，25-44；Levenson 1965, 67; Pines 2012, 11, 22–23。

[31] 荀子是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作为基础去建立儒化法家意识形态的早期代表(C. Zhou 2014, 116-35)。

[32] Fairbank and Reischauer 1958; Ford 2010, 39-58, 184, 226。

[33]。通过仿效人类最重要、最基本、最稳定的组织结构家庭，儒家关于权威、等级、和谐与继承的种种规则、隐喻和规范，淡化了极权主义政治机制，使得汉帝国版本的法家政体比秦帝国版本的法家政权更稳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为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们所接受。精英们在这个体系里可以适时稳定地逐步获得他们的地位、资历，以及依品行而定的安全性和既得利益。儒家伦理提倡受政治权力控制的个人的人文价值“正心、修身、齐家”，加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即使只是一些论调辞藻，也修饰了以君主为中心的极权主义政治的目标与价值。儒家学者的思想和对形而上学、宇宙观及社会公德道义的探讨得以继续发展，后来产生了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此外，儒学的一些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如中庸、和谐与公平观念、重视教育、重世俗生活和自我修养等等，也促进了地方社区的自治与社会批判，对过于专制暴虐的帝国统治者也能在思想上甚至政治上有所反抗[34]。

中华秩序的巩固和扩展

一个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帝国体系，即使与儒家有着看起来完美的聚合，也只能做非常有限的自我调整与自我纠错。它的主要逻辑、冲动、风格、偏好和表现，与任何生物体或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一样，都被如同物理性质的其组织结构体系以及如同化学构成的其内在逻辑规范所限定。基于秦汉政体的中华秩序在中华世界里确实带来过令人印象深刻的稳定和统一，以及有时长达几十年的和平，这在官方史书里常常过誉为“盛世”。显然，一个“世界范围”的人才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会促成文化艺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一个语言文化纽带也可以促使经济在数量上颇为可观的增长；父系家庭的伦理需求还会刺激人口的大幅增加。但是，如同本书第四章将要详细揭示的，中华

[33] F. Wang 1998, 76-77。
[34] G. Wu 2012。

秩序无法逃脱由其秦汉政体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厄运，这种厄运又被其世界规模的挑战和缺乏选择所强化和激化。从比较的眼光和整体角度看来，中华秩序的历史记录是非常次优化的(suboptimal)，表现为政治上的专制暴政、经济上的长期停滞、科学技术发展上的缺乏进步、精神追求上的迟滞低落、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巨大贬值、民众生活水平的低劣和下降，以及经常的周期性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和巨大社会破坏。

一个秦汉式世界帝国统治者，必须以巨大的代价不断扩张，以求征服其未能控制的外部世界，或者将外部世界远远隔离开，或者干脆假装外部世界不重要甚至不存在。当汉帝国强大或自觉强大以及确实有理由对外用兵打击外部敌人的时候，它很快就成了一个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汉武帝本人就发动了许多昂贵的对外扩张战争，反对中原周围的“野蛮人”，有时只是为了惩罚遥远的不尊重天朝的游牧民族和部落。由于几代皇帝的这种努力，汉帝国的领土得到了大幅扩张(尽管常常是暂时的)，超出了中原/中土，进入今天的朝鲜半岛、华南地区和印度支那北部、华北和蒙古以及中亚地区。汉帝国画出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原(中国本土)的基本地图。不过，持续的军费和其他皇家浪费，耗尽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并成为导致汉帝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汉世界帝国的中华秩序持续了一个世纪，由于皇帝王莽拙劣的财政和礼仪改革失败，在皇室内斗的烈焰里趋于崩溃。王莽是汉帝国的皇亲，他僭越篡夺了刘氏的皇位，自立为帝并将汉朝国号改为新朝(8-23)。随后大规模的叛乱爆发。经过又一场残酷的“世界性”内战之后，一个刘氏汉室远亲的后代在公元 25 年重建了汉帝国，史称后汉或者东汉帝国。东汉是一个进一步精细化的儒化法家秦汉政体。又过了一个多世纪，东汉帝国由于不断的宫廷政变和内讧、极其无能腐败的统治和宦官干政、大规模叛乱以及各地军阀豪强的崛起而没落。在它于 220 年正式灭亡前的至少 40 年里，东汉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分

裂的世界。许多国家政权互相争战，而汉朝天子成了一个被各个军阀劫持的傀儡[35]。

刘氏的两个汉帝国的秦汉政体统治依然有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没有完全绝迹的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下成长起来的地方贵族豪门势力、频繁的军阀政治、世袭家族的垄断权力、皇室的无能和内斗，以及人格扭曲的宦官蛮横专权。然而，两汉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整个已知世界里，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以秦汉政体为基础的中华秩序，提供了相当长的世界统一(尽管有时只是名义上的)与帝国和平。对中国人而言，中华秩序由此作为一个可行可慕的世界秩序，获得了经过实践考验的声誉和合法性。此后官方垄断的历史编撰和教学，强有力地把中华秩序下汉帝国的经历加以美化和内化，使之成为中华精英与普通百姓共有的唯一正宗的政治传统、规范、价值和理想。汉帝国也给了大多数中华人口其族名即汉族和语言文字之名即汉语、汉字。

中华秩序的复兴与东西方大分野

与欧亚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在公元 3 世纪的危机中一分为二大致同时，欧亚大陆东部的秦汉天下帝国也终结了。中华世界进入三国分立时代，出现了持续不到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三极体系：魏(汉帝国政权的直接继承者)、蜀(由汉帝国皇族一个远亲的后代所创立)和吴。当地中海世界里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秩序进一步衰败，并在公元 4-5 世纪最终崩溃之时，中华世界里巩固其新生的分立政体的努力却失败了。司马家族夺取了三国中最强大的魏国政权，并建立了晋帝国，随后用武力灭掉蜀吴两国，短暂地统一了整个中原。晋帝国重建了一个类似于早期西汉帝国的皇族封建分封制度。但晋世界帝国仅仅存在了 20 年就很快在政变、叛乱和内战的灾难中崩解。晋皇室

[35] Fan 445, V6-9。

逃到南方，与各地军阀以及入侵的非汉族政权一起分裂割据了中原。中华世界如同罗马世界一样，又失去了中央集权统治。

在两个多世纪里(316-589)，几个有时甚至十几个国家在中华世界相互竞争。这就是史称为南北朝和十六国的时代。所有这些小型秦汉帝国(由汉族或者很快汉化的异族领袖统治)，都试图(或者至少摆出努力的姿态)为恢复秦汉世界帝国的世界秩序而逐鹿中原，统一天下，从而为他们的许多是古怪而野蛮的暴君统治获取合法性。为了生存他们被迫不断而绝望地进行生死存亡的搏斗，直到因此耗尽气力。这些国家大多只存在了区区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根本无法使非天下一统的新世界秩序稳定下来，更不用说合法化和内化了。唯一一个存活时间超过一个世纪的国家是东晋王朝(317-420)。它是短命的晋世界帝国在南方的延续，自称是汉族文明的真正唯一的继承人和守护者，也最积极用武力恢复中华世界秩序(尝试并失败过若干次)[36]。

秦汉帝国采用郡县制，帝国的官僚任命制度取代了封建政治制度。与之相关，秦汉帝国也开始限制和削弱长子继承制度。长子只继承父亲的封号和头衔(如果有头衔)，但所有的子女按法律都有权分割财产，尤其是土地。这样，经过几代人后，秦汉式统治者就能很快减少乃至消除贵族甚至皇族成员的任何一种大土地庄园。由此，皇帝被确保是无可匹敌的“全世界”最大的财产和土地所有者。他垄断了所有的矿山、水路和所有无主与未开垦的土地，并经常用任何借口或者干脆无须借口，就没收任何人的财产和土地。在汉帝国之后的世界政治分立环境里，拥有大土地的豪强和地方军阀之政治势力有所抬头。但是在西晋帝国各个皇子们之间的混乱内战之后，封建领主的政治力量还是终于被打垮摧毁了。帝国任命的政府职位及其相关的财产包括授予或购买的土地，特别是与官职相连的大规模的腐败收入，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积聚财富和权力的途径，

[36] Y. Chen 1995; Z. Wang 2013。

而这在根本上又依赖于皇帝阴晴不定的一时好恶。据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华帝制时代官员们的各种官位带来的制度化的或随机的、半合法或非法的、隐晦或公开的"灰色"、"黑色"或者"额外"收入以及贿赂，一般是他们的帝国薪金收入的十几到几百倍，使得他们可以暴富和极度奢侈。于是在中华政治里，废除长子继承制，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获得自治能力的大土地世袭贵族力量去制约、平衡和挑战皇权。中华世界因此缺失了政治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论及的"现代民主的一个决定性先决条件"，其社会政治制度"既鼓励叛乱、又严重限制了叛乱能够带来什么结果"[37]。

罗马帝国之后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保持了以封建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分立局面，最终从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缓慢地发展到法理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但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长达四个世纪的非天下世界秩序经验，却未能凝结出一个合法的事实上或者法理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去替代秦汉世界帝国的天下秩序。分裂的中华世界最后再次结束于秦汉世界帝国的重生，即隋唐帝国的建立。北朝周帝国的隋国公(后来的隋王)，从他的外孙手中篡夺皇位成立了隋帝国(581-618)。隋帝国然后用武力吞并了南朝的陈帝国，从而在 589 年统一了整个中原。隋帝国的第二位统治者隋炀帝，被他的叛军将领夺走了皇冠和头颅。隋的将军之一唐国公赢得了一场激烈而短暂的内战，夺得帝位创建了唐帝国(618-907)。一个新的秦汉式帝国再次统一了整个中原并复兴了中华秩序。唐帝国证明了秦汉政体的长处。它确实实现了几十年的帝国富裕和安宁，虽然那主要只是统治精英们才享受得到的富足。汉族因此后来也被称为唐人，世界上许多华人聚居地今天仍被称为唐人街。隋唐帝国不仅使中华秩序得以深刻的合法化和内化，而且还通过一些创新的措施改进了中华秩序，并使之成为中华政治文化传统与观念的精髓，直到今天。

[37] Jian 1984,24-31; J. Wang 2000, 97-98, 133, 138, 229-30; T. Li 1962, 11-16, 103-06; Han 1963, 2-94; Hong 2014; Moore 1966, 417, 217。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为什么与中华世界相反，罗马帝国以后的地中海-欧洲世界再也没有回到世界帝国秩序？世界帝国秩序对各种独裁者和政治强人很自然地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欧亚大陆西部也的确有过多次，有些还是非常认真的重建世界统一政府的尝试：从拜占庭的皇帝们、一些教皇、查理曼大帝以及其他的神圣罗马皇帝、欧洲的不少王公们、伊斯兰武士、拿破仑.波拿巴、阿道夫.希特勒以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等等。尽管有这些重建世界帝国的努力，但地中海-欧洲世界一直保持着许多主权单位在政治上互相竞争的分立局面。这就是欧亚大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第一次大分野”(Great East-West Divergence)。这个罗马帝国之后与汉帝国之后的两条不同的人类文明路径，就是 18 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之间更大的分野的起源。世界范围的政治分裂，创立和维持了一个持久而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各国在政治、战争、税收、产权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竞争和试验，从而赋予欧洲千年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主宰地位[38]。

关于六世纪后，东西方大分野原因的完整而详尽的论述并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不过，要给一个简捷的答案，似乎应该分析中华世界和地中海-欧洲世界各自不同的内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传统与观念。尽管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许多重要差异。如本书第一章所概述的，两者在生态地理先决条件和社会经济禀赋上有巨大差异。两个世界帝国各自内部不同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渊源与传统，以及它们不同的内部结构和不同程度的内部一体化与统一程度，看来都影响到它们截然不同的持久生命力和重复可能性。首先，由于封建主义和外部入侵，罗马后的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不断地交织互动。此外，与秦汉帝国不同，罗马帝国本身就包含着以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国与城邦国家传统，保留着一些特殊的制度设置和传统规范，比如四君共治

[38] Scheidel, 2010; Pomeranz 2000; Hoffman 2015; R. Wong 1997。

(Tetrarchy)和双子帝国(dual-empires)，以及有时确实对某一特定皇帝的产生和合法性有真正影响力的选帝程序。在中华世界里，崇拜天地与祖先的自然宗教信仰受国家控制。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则有着自主自立、高度神学理论化而精心制作并往往人格化了的悠久传统；其宗教中心和组织也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力量的，比如希腊人的德尔菲神殿(Delfi)和罗马人的最高祭司院(Pontifical College)与预言占卜院(College of Augur)。稍后的基督教教会和教皇国，独立性与政治权力则更加明显。比如早在公元 390 年，基督教会就直接挑战了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Theodosius)，迫使他在萨洛尼卡大屠杀(Massacre of Thessalonica)之后忏悔，并相应地修改有关法律[39]。

至此，中华秩序在六世纪末的中华世界里全面复辟。而罗马世界帝国秩序在五世纪后再也未能复活。各个主权政体之间的国际关系竞争，尤其是后来与入侵的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世界性"竞争，使得各种重大调整、适应与创新既是必需也有了可能。于是罗马帝国之后的地中海-欧洲世界，延续和恢复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许多制度、文化和科技。在意大利北部和西欧，许多互相竞争的城邦国家，将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固定化并合法化。各个相对安全的主权国家不断壮大起来，同时不得不都在国内国外(甚至在精神层面上)与各种权力竞争者持久地共存、比较和竞争。尽管有过一些雄心勃勃的有才华的强大统治者们，试图重建罗马世界帝国，罗马帝国之后的地中海-欧洲世界的各族人民，还是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有着许多相互竞争的封建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汉帝国以后的中华世界的各族人民，则多次回到基本上相近的世界帝国秩序，即秦汉式单一中央集权帝国政治制度，或曰反覆再现的中华秩序。这就是塑造了欧亚大陆以及欧亚大陆之外人类文明命运的东西方大分野的根本原因[40]。

---

[39] Hallam1880; Williams and Friell 1994。
[40] Wickham 2010; Pirenne 1936; North and Thomas 1973; Tilly1990; Tabacco1990;

中华秩序的演变和升华

作为“第二秦汉帝国”的隋唐帝国名义上持续了三个世纪，但作为一个有效的世界帝国它只维持了不到二百年。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因拥有两个共约 70 年的盛世而被广为赞誉：即贞观-永徽之治(627-56)和开元盛世(712-55)。在这几十年黄金时期里，唐朝的政治被广泛认为是中华帝制政治史上的最佳政权之一(甚至唯一)。此时的唐帝国统治者们表现了较少的极权主义而更多儒家倾向，接近于一个开明的威权主义独裁统治。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化的帝国官僚体系，有效地维护了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法家理想得到了一定的遵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自先秦时期以来最宽松的缓和。宗教、种族、生活方式和性别上的许多差异，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包容。唐帝国还有过中华历史上唯一的真正女皇帝武则天。她直接统治了“全世界”几十年(还干脆把唐帝国的国名更改为周)。唐帝国经济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水准，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点：全盛时期的人均粮食产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高点(大约 725 公斤)，仅次于宋代。唐代建筑、美术、音乐、文学尤其是无与伦比的唐诗，都被史家认为是属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佳之列[41]。

唐帝国也步汉帝国后尘，对外四处扩张；向西击败了突厥部落，向东北消灭了高句丽王国并征服了几乎全部朝鲜半岛，在周边地区打击了吐蕃(藏族)、回鹘(维吾尔)族和契丹族，并与遥远的民族包括阿拉伯帝国有着互利的往来。受到同样的秦汉政体内在逻辑的驱使，唐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去征服或制服(即使只是名义上的)所有已知的对手和竞争者。唐统治者们于是全方位地深入地扩张到了中华世界的周边地区。在其鼎盛期，唐建成了一个版图比秦汉帝国更大的世界帝国。唐帝国

Kantorowicz1957; Spruyt 1994。

[41] Cao 1989, Zheng & Huang 1989。

继承了汉帝国的羁縻政策，即一种邦联式封建制度，名义上统治中原之外的各个非汉族政权。被羁縻的那些地方的独裁政权享有自治和自主权。这一制度为后世的秦汉式统治者们各有变通地大致沿用下来。751 年，唐帝国的远征军在怛罗斯(位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上的塔拉斯河畔)战役中，被阿拉伯帝国打败，由此决定了唐帝国扩张的地理极限[42]。

唐帝国的许多统治者曾用过“天可汗”(*Tengri Qaghan*)的称号，自我凌驾于中华世界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各个国家政权之上。当唐势力衰微时，一些非汉族的统治者也用过这个名号。对于遥远的但已知却又无法接触和收服的国家，如波斯、拜占庭帝国、阿拔斯哈里发阿拉伯帝国尤其是附近的吐蕃(西藏)、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以及日本，唐朝采用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政策有效地阻挡外来影响，至少在帝国史书里假装这些外部比较和外部竞争既不相干也不重要。这些政策和做法包括各种操纵性的外交手段、馈赠财宝和女人绥靖媾和、禁止百姓去外国、傲慢地忘记和忽视来自外国的不敬甚至冒犯言行、有控制地去融合外国人(款待乃至雇用来访的外国人)，甚至单方面煞有介事地授予外国统治者空头爵位和名号，以示天下一统[43]。

在这样与外部世界的来往过程中特别是当晚唐国力下降时，吐蕃藏人、突厥人、回鹘人和契丹人都曾多次反叛并入侵，给中原带来灾祸，并数次攻陷和洗劫了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和洛阳。事实上，自命为世界天下一统的唐帝国一直不断地与远近的许多外国有着活跃的军事、商业和文化上的往来互动包括战争。也许与中华秩序崇拜者的直觉正好相反，唐代中华秩序实际上的不完全性和不完整性，其实恰恰正是唐初为期数十年之久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辉煌的一大根源[44]。

---

[42] Gong 2006; Beckwith 2009, 145-54。

[43] 有趣的是，同時期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国(750-1258)似乎也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帝国秩序(M. Huang 2011, 133-42)。

[44] L. Fu 1989; G. Zhang 1995, 2008。

中华世界的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和许多非汉民族，由于战争所驱动的迁徙，以及种族和民族之间的通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现了巨大的融汇混合。隋唐统治者们本身就有很浓的非汉族(主要是蒙古语族和突厥族)血统和文化遗产。学者如陈寅恪甚至认为唐皇室开国者的血统实际上是突厥族多于汉族。在唐世界帝国秩序下，种族和民族的的混合与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许多完全不同的民族都融入汉族并消失了。中华秩序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和制度上得到了巩固，在人口上和基因上也得到世界帝国有意或无意创制的主导民族(汉族或唐人)之支撑。汉族是个不断扩大、且很有弹性的分类标签，本身就是依靠一个集中的帝国皇权和同一种书面汉字维系而成。秦汉式世界帝国通过用武力强加的政治统一，与随之而来的儒化法家意识形态，有力地压制和消弭了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分歧。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权，又经常利用这些尚存的民族族群之分巩固自己的统治。帝国给予各族的精英们在皇帝面前或多或少一视同仁的平等地位。只要忠于皇权和采用汉语言文化，唐帝国可以任命非汉族人担任高级将领和官员，包括来自周边地区的突厥族和回鹘族人，甚至延及来自远方的韩国人和日本人。例如一位著名的日本访客阿倍仲麻吕(阿倍仲麿或晁衡)，就成为唐帝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一些非汉族的精英在晚唐时期还成了地区性的世袭统治者。发动划时代的安史之乱(755－763)从而开启唐帝国漫长衰落的安禄山与史思明，就是两位这样的突厥族大将兼封疆大吏。为了平定这一叛乱，唐帝国还不得不转而重用回鹘族的力量[45]。

更为重要的是，隋唐帝国制定了后世沿用的一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改进了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使之成为工业化前时代里任何专制政权可以梦想到的几近完善的统治制度。延续了秦汉帝国的皇帝拥有所有土地的传统，隋唐帝国继承并强化了

---

[45] J .Zhang 2003，Y. Chen 1997 3-9；Liu 10th century V199; Ouyang 11th century, V200; Sima 11th century, V198。

北魏孝文帝在公元 485 年开始的周期性均田政策和邻里连坐系统，组织农民并稳定税收基础，同时抑制了具有政治挑战性的大土地庄园并控制人口迁徙。周期均田的政策在 8 世纪唐帝国的权威衰落后，就不再成为一个全国(全世界)的政策。但是许多后来的帝制统治者们时不时地会重新拾起类似的土地再分配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在土改运动中(1950-53 年)，用暴力全面实行了一个所谓“革命性的”均田政策(详情参见本书第六章)。唐帝国也延续了秦汉帝国对厚利行业如采冶铜铁、盐的产销、铸币以及陶瓷制作的国家垄断，同时继续系统地抑制被认为是政治上对皇权有挑战性的私人工商业[46]。

隋唐统治者们还完成了帝国官僚体制的正规化和制度化，巩固了皇帝以及内廷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通过创设一个互相牵制约束的帝国三省六部官僚制度及其专业职能部门，皇帝在结构上削弱和减少了宰相与高级将领的权力。这个制度由隋帝国首创，后由唐帝国的长期实践而得以合法化和内化。它将帝国的制定政策法规、监督审批、行政任免这三大权力分开，而皇帝(以及常常包括宦官的内廷)则高踞其上，以其诏令统治一切，并可以否决任何政府部门的任何决定。这个官僚系统似乎有些类似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皇帝，而不是宪法，高踞于一切法令和监督之上绝对地统治所有的三权。这个隋唐官僚制度后来被宋朝进一步地改良，成为中华秩序下为威权或者极权政体服务的近乎完美的既专业又顺从的统治制度[47]。

也许隋唐帝国对秦汉政体最著名的改进，也是强化中华秩序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创设了科举制度。大约在 605 年，隋帝国开创了一个新方式选拔任命帝国官员，即整个中华世界里所有合格的男人都可以参加的公开定期的科举考试。这一新方法代替了传统的基于家族血统或家庭关系的世袭性任命制度、

[46] Gen 1980, 338-78; R. Huang 1997, 96-98。
[47] K. Li 2006。

汉帝国设立的由帝国官员和当地士绅操办的拔贡推举制度、有抱负之才干人士自荐，以及无章可循的帝国随机的发现和考选。唐帝国将科举制度大为常规化，形成了颇受赞誉的所谓中国的"精英/能人/贤人治国"(meritocracy)制度。加上后来宋朝的进一步改良措施，例如用当堂考试与匿名改卷，消除滋生腐败的官方推荐背书，并允许所有的平民参加考试，科举制度此后塑造了 1000 多年里整个中华世界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尤其是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科举制度为后世所有的中华世界帝国政府以及许多小型帝国和争战王国、割据军阀，甚至叛乱领袖们所采用。直到 1905 年，满清帝国才终止这个制度。一些周边朝贡国家如韩国和越南也使用过科举制度。越南到 1919 年成为最后一个废止科举制度的国家[48]。

在其 1300 年的漫长生涯里，科举考试每一年到数年一次地持续举行。有时还会有额外的特别考期，以及偶尔由于战争或其他危机而取消考期。它主要是笔试加最高层次的口试。另外还有被认为在社会地位上稍逊一筹的以武术表演为主的武举考试。所有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艺人以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弃民贱民家庭出身的除外)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些朝代还把商人和手工业者排除在外。科举制度经过几个层次的考试选拔，产生一批固定数额、按考试成绩排名的候选人，供帝国政府任命为不同级别的文官和军官。经过多年的潜心学习备考，加上好运气，一个考生可以在大约 10 年里逐次通过大致三级的考试，即乡试(地方考试)、会试(省级考试)和殿试(国家/世界级考试)，最后取得最高级别的资格即进士。进士当中排名第一的谓之状元，他的名字通常会刻上专门的石碑永久昭示。在等级森严的天下一统的中华世界，科举考试基本上成了社会有序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考试不过关的通常会成为地方教师和士绅家族首领，但一般都会继续参加考试直到通过或者老死。只有对科举考试彻底失望完全灰心的读书人才会放弃，转而成

[48] P. Ho 1997; Twitchett 1976。

为僧侣、隐士作家、艺术家乃至叛乱分子[49]。

科举制度一直被中国官方和许多史家誉为中国人的一个重大发明创造，是造纸、指南针、活字印刷和火药之外的中国为人类贡献的所谓“第五大发明”；它不仅成为中华政治治理方式的一大基石，也塑造了整个中华文明和东亚文明并具有全球性影响，比如惠及世界各地的现代公务员考试和教育入学与排班考试。日本在八世纪几乎全盘照抄隋唐文化的时候，第一个引进了科举制度。然而有趣的是，日本在十世纪又第一个停止使用科举制度，也许表明科举制度与日本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容，因而无用[50]。

具体而言，科举制度从两个方面关键性地支持了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并对中国人的经济、文化、心理和个性至今都有着深远的综合影响。首先，科举考试使得帝国统治者能够定期和公开地从整个世界范围挑选人才，获得能干也听话的官员们协助治理广袤的世界帝国。这些被仔细挑剔的温顺而受过教育的精英，得以通过所谓的精英治国模式，在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社会政治与经济等级系统里发展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科举制度以一个极权一致的方式，通过无休止的耗尽心血的考试竞争，迫使和诱使有雄心有才华的人都去攀爬那个唯一而狭窄但确实能改变命运的阶梯，以此把他们套住，使之无暇他顾从而浪费掉他们的生命，甘被奴役。否则，在一个单一严控、非常压抑而又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数能干而雄心勃勃的人，很容易就会成为动摇中央集权帝制的不稳定因素，他们会很自然地去发展新的离经叛道的言行，甚至干脆成为叛逆。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最佳皇帝”的唐太宗(626-49 在位)，就曾兴高采烈地公开自诩，科举制度令“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51]！因此，中华世界历代的帝制统治者们，包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大力使用科举制度或其变种，就不足为奇了。科举制

[49] X. Zhang 1993。
[50] H. Liu 2004, 16; Editorial Board 2004, V2, 17–21; H. Liu 2006, 136-42。
[51] Wang 11th century, V1.

度反映了秦汉法家重视农耕社会的传统，也体现了儒家人士当皇帝能臣的追求：拥有土地的帝国官僚成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精英模范；任何成功的富人都不得不去购置土地，使其后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由此就不断地耗散了工商业资本与利润，并窒息了政治上对帝制具有天然挑战性的商人阶级。

科举制度是基于理应公开和公平的竞争原则，建立一个看起来任人唯贤的精英或能人统治，因此成为具有高度社会吸引力，易于为人们接受，变成维护帝国社会分层和政治等级制度的手段。然而在实践中，帝国统治者们为了维护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用儒化法家的意识形态去严格控制科举考试。从隋朝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者们都极力管控科举考试(以及后来的那些变种即公务员考试)的程序尤其是考试内容。直到 20 世纪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都是汉帝国时官方选定尊奉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加上朝廷审定批准的经典诠释和历史记录、经过选择的古文和诗词、以及书法和论文写作能力。到 12 世纪，朱熹把这些经典编释为九本书，即著名的《四书五经》。只有简短的太平军政权(1851-61)曾经在其科举考试中使用过改编的中文版基督教圣经。(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学校考试尤其是升入大学的“高考”，虽然包括了数学、理化和外语，其历史和时政等内容，还是必须严格遵守北京的统一规定；至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更是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答题的写作风格则仅限于固定的文言古文，到 14 世纪后更是成为死板的八股文。科举考试测试很少的地理知识，几乎不涉及数学和经济学，也不包括其他的科学方法和知识。书法和修辞艺术之外，展示个人创造力的空间几乎为零。科举制度由此提供了一个极好又简单易行的方法，以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尤其是全世界(不仅仅是全国)的教育课程，从而极为有利于推广灌输官方版的历史叙事、道德规范和关于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理念。虽然科举制度极大地帮助了秦汉政体去维护中华秩序，但却通过阻碍和封杀在知识上、认识论上和技术上的

探索与试验，从而系统地全面地扼制了整个中华世界。因此，科举制度关键性地阻滞和破坏了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代人，而是整个已知世界长达千年的科学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事业[52]。

从第二次大分立到终极型中华秩序

公元 755 年以后的唐世界帝国，特别是其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805-905)，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时代。皇帝被边缘化，经常被绑架，甚至被作恶宦官或叛逆将领又或两者合伙谋杀。帝国的大片区域都被群雄并起的军阀和叛乱割据自治；他们经常通过请求、贿赂或者干脆用勒索的方式，让皇帝赐与帝国任命状获得其统治合法性。曾经被收服的周边地区的非汉族部族频繁地入侵洗劫中原。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暴力、饥饿和疾病。一个大规模的绝望的叛乱在 859 年爆发(黄巢叛乱)，破坏性极大，导致唐王朝 50 年后崩溃。辉煌的盛唐，帝制中华历史上最好的盛世之一，变成了中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大和最富丽堂皇的都市，包括曾有百万居民的首都长安都毁灭殆尽。与第一秦汉世界帝国在公元 2 世纪末到 3 世纪初的崩溃带来的后果类似，第二秦汉世界帝国隋唐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全世界"多达五分之三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几十年中非自然丧生。唐朝的总人口从大约 1 亿人下降到 4000 万。食人肉求生和在"世界范围"无休止地打内战时以人肉供应军需，成为当时的常见现象[53]。

许多迅速汉化了的周边非汉民族，在中原的中心地带即黄河流域稳固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中华世界政治上四分五裂，失去了中央集权的中华秩序长达近四个世纪，形成了中华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立(859/905-1279)。唐帝国以后的第二次大分立比汉帝国以后的第一次大分立为时要长，并具有一些显著而重要的不同之处。第二次大分立的头一个世纪的前 50 年，

---

[52] Reilly 2004; Miyazaki 1981。

[53] B. Li 2015；Sima 11th century V238-65; Ge 2006。

是唐帝国极其痛苦的缓慢凋亡；其后 50 年是五代十国共 14 个皇帝轮流为了生存，或为了继承唐的天命统治整个中原而殊死混战。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分立时期的主要部分是中华世界里一个法理上的政治大分立期。自从先秦时代以来，一个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首次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并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长期共存的帝国和王国有：辽、宋、夏、回鹘、大理、吐蕃(西藏)、高丽(朝鲜)、交趾(越南)、金(取代了辽)。最后蒙古力量在 13 世纪崛起，逐步取代了金、夏、宋并最终征服了各国，从而结束了中华世界的第二次大分立。

这个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时期，以共存各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宋帝国(主要是汉族民族国家)的名字命名为宋代(960-1279)。宋代不仅代表着脱离秦汉天下中华秩序的划时代变化，也是中华文明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黄金时期。中华世界里的各族人民在一个新世界秩序下，获得了持久的和平与巨大的繁荣；在政治治理、经济发展、生活水准、技术创新、艺术甚至王朝执政的寿命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创造了 19 世纪后期之前空前绝后的成就。宋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中华帝制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然而，随后的秦汉式帝国精英们以及再后来的汉族民族主义精英们，一直通过垄断的官方历史叙事和政治宣传，至今都在贬低、歪曲和摒弃宋代。颇受欢迎并一度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大陆历史教师袁腾飞，曾尖锐地质疑过不少官方的历史叙事，但也还是常常贩卖一些官方历史叙事中贬斥宋代的耸人听闻的故事[54]。

有意去试图为研究中国及其历史做一些贡献，本书第三章将详细探讨宋代及其在政体上和世界秩序上的宏大新实验、其杰出的成就、令人遗憾的结束、以及其意义深远但是被长期误读并舍弃的教训。唐帝国之后的欧亚大陆东部的各族人民在宋代作了一个重大转向，比欧洲人早 600 年就合法化了一个

---

[54] Yuan 2012, 130。

“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关于更好未来的希望。然而，或许还是先前造成秦汉世界帝国和隋唐世界帝国可行甚至不可避免的那些生态地理、人口与文化观念上的原因，秦汉天下秩序在中华世界还是复辟了。因为宋代的共存国家依然都是些秦汉政体，这一政体的强大内在逻辑是必须要建立世界帝国秩序，成为恢复中华秩序的深层制度性推动力。宋帝国本身是一个温和的秦汉政体，接近开明威权主义政权。但它还是一直梦想着世界统一，并且为此努力，从而导致其悲剧性的灭亡。

秦汉世界帝国的再次复辟，是由宋帝国的一些致命但原本可以避免的重大失误，加上残忍但成功的强大蒙古骑兵的军事胜利所共同造成的。蒙古帝国对中华世界的征服，最终决定了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民族随后七个世纪的命运。中华秩序的这次复辟尤为强势，迎来了一个严酷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专制集权的世界政府统治下的终极型中华秩序。第三次也是最后一回的秦汉式世界帝国中华秩序，包括三个相继的帝国王朝：元、明、清(1271-1911)。非汉族的入侵者兼征服者，即“野蛮”游牧民族蒙古人和满洲人，分别建立了其中的两个帝国。三个帝国的国名都不同于前，不再是来自地名，而是人为的特意设计。它们基本上都建都于今天的北京，也基本上都是极权主义专制统治[55]。

在 13 世纪后期，通过一些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蒙古人在整个中华世界恢复了中华秩序后，汉民族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被一个非汉民族完全征服。秦汉天下的民族大熔炉被翻了个身，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在这个蒙古中华世界里被奴役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蒙古帝国对宋人和汉族中华文化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是如此之剧烈和惨酷，以至于后来一些汉族学者如明末的钱谦益认为宋帝国灭亡后，真正的中华古典文明也随之湮灭了，即所谓“崖山之后，再无

[55] L. Zhou 1999:260-82。

中华”[56]。17 世纪的汉族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宋帝国的灭亡和先秦时代的结束是对中华文明的两次大毁灭。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在 2010 年甚至认为，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干脆就是“不同的人种”，在道德、文化乃至体质上都衰落、腐败和软弱了；犹如矿物的物理和化学改变，虽然还是同样的碳原子，但“钻石已经变成了石墨”[57]。在比以前的中华世界帝国版图都要大的蒙元世界帝国里，汉族中国人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也失去了他们的民族地位。欧亚大陆东部许多非汉民族和国家，在“蒙古中华秩序”下的处境，比在“汉族中华秩序”下更为不堪：它们常常遭到文化上甚至肉体上被灭绝的命运。夏、辽、金诸民族国家的精英、大部份的民众、历史记录、语言文字都被蒙古统治者统统抹除了[58]。

与以前曾经征服和统治中原部分地区然后迅速汉化的游牧民族入侵者不同，蒙古统治者征服了整个中华世界。他们采用了秦汉式儒化法家世界帝国秩序的精髓，同时保留了许多的蒙古和中亚的制度、规范和文化。蒙元统治者们基本上拒绝使用汉语，保持了自己的信仰体系(萨满教，后来与喇嘛派佛教混合)。他们因此对中原的各族人民表现得更像征服者而不是统治者。蒙元帝国主要依靠汉族人民提供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它同时精心分化和削弱甚至从政府里排除多数汉族人口。不过，作为中华秩序超出民族界限的对统治精英的明显吸引力和政治持久力的证明，蒙元继续了秦汉唐宋的基本政策，如儒化法家的中央集权之皇权、中央政府的专业化官僚结构、以及帝国对工商业与教育以及历史编撰的垄断控制。也许是出于蒙古统治者们对汉族和汉文化的蔑视，蒙元帝国只在它的后半期才不定期地举办过科举考试。人民被分为四个世袭等级(蒙古、其他非汉族、北方汉族、南方汉族)和大约二十个职业种姓(士兵、

---

[56] Qian 17th century, V2; Zhou and Gu 1993 年, 序言。崖山是宋在 1279 年抵抗蒙古人的最后一战。关于蒙古入侵的历史性“大破坏”, 参见 Brooks 2010。

[57] H. Zhang 2010, 33-35。

[58] Saunders 2001。

农民、手工业者、僧人、道士、基督教牧师、穆斯林、学者、商人等等)。在蒙元中华秩序之下，秦汉皇权的专制程度大为强化，把人民甚至很多的统治精英均当成了奴隶[59]。

在中原之外，蒙元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和宗教归顺等手段，继续了唐式的封建-邦联制度，统治欧亚大陆东部的许多民族和国家，包括第一次把难以入侵的青藏高原纳入统一的中华秩序。蒙元帝国的扩张包括几次试图入侵日本，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遭到的唯一外部入侵。元朝以蒙古大汗的名义(只是名义上)，统领一直扩展到东欧、南亚和中东的蒙古世界里其他三个蒙古帝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整个蒙古世界比之前和之后的中华世界版图都要大许多。然而，对蒙元帝国(及其继承者明、清帝国)来说，实际有意义的整个已知世界，基本上依然是同一个中华帝国，即中原/中土(中国本土)及其周边地区。那个庞大的蒙古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持久的统一单元(unit)，尽管蒙古征服确实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部分之间建立了陆上交通线。后来流传甚广的 13 世纪后期威尼斯行商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天方夜谭多少说明了这一点[60]。

元代末年大规模的叛乱怒潮推出了明帝国(1368-1644)。明帝国恢复了汉民族政权，但从来没有成功地控制曾经被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和蒙元帝国“统一”过的整个已知中华世界。它的版图在其鼎盛时大致与 15 个世纪前的汉帝国相同，约有 400 万平方公里。而蒙元帝国和后来的满清帝国，鼎盛时的领土分别达到 1,200 万平方公里和 1,300 万平方公里。相对而言，明世界帝国是版图最小的一个中华世界，其实际统治的版图占整个已知中华世界面积之比例，比它之前和之后的中华世界帝国都要小许多。几乎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威胁和入侵，明帝国还不得不与它一直未能完全消灭的、逃亡的蒙

---

[59] Pine 2012，37；Q. Xiao，1985；L. Zhou 1999，267-73。

[60] Langlois 1981; Allsen 2004。马可波罗描绘的元帝国初期那难以置信的繁荣可能实际上是反映了此前的宋代的成就。关于马书的真伪问题，可参阅 Wood 1998。

元帝国残余势力即北元斗争；后来崛起的满洲民族还联合了蒙古力量，最终入侵并征服了整个明帝国。尽管为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所驱使，但是明帝国未能真正统治整个已知世界，明统治者只好依靠对自己的人民更加严密和严酷的控制，并借助旧时汉唐的羁縻政策控制周边地区。它沿袭对远方的朝鲜、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大名和商人，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制度，实行一个名义上的"统治"体系。但实际上，朝贡体系主要是明帝国的一个装模作样、甚至自欺欺人的政策，让统治者可以假设"外面"世界里不受其控制的国际比较和国际竞争都不重要甚至不存在，天下已经一统。因此，朝贡体系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体系[61]。

对内，明世界帝国是严酷而苛刻的。明朝皇帝们大多可以归入中华历史上最专制、最残暴和最无能的统治者。虽然是一个汉族政权，明帝国却继承了许多蒙元帝国的价值观、规范、制度和政策。明帝国的皇帝们不像宋朝的汉族天子，倒更像外族征服者，如蒙元皇帝一样去虐待自己的人民甚至皇家成员和大臣们。帝国官员们的地位和权利急遽下降。宋帝国很少刑罚，几乎从不处死大臣；明朝皇帝(往往只是其代理人即宦官)经常滥用专制暴力，为了一些极为无聊琐碎的异议，感觉被冒犯，就会当着众人剥光大臣衣服，然后将他们鞭笞至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大规模屠杀了 35,000 个统治精英以及他们的全部家眷，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帮助他建立其帝国的功臣高官和大将。用来控制人民头脑的儒家说教和控制人民身体的法家酷刑与处决都被推到了极致。明朝把科举考试进一步僵化空洞化，规定所有的考题必须来自朝廷批准的九种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所有的文章必须用八股文来写。它还强固男尊女卑，把女子缠足变成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的中华旧文化的一部分，从身体上摧残和禁锢妇女。明帝国的对后世更有影响力的统治术，也许是创建和依赖一整套多头而广泛的秘密警察系统，即

[61] Y. Yu 1967; D. Kang, 2010,54-81; Smith 2013, 10-1; Lee 2016; Wang and Gao 2008; Z. Ge 2015; Perdue 2015。

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互相监控的各个秘密警察系统只对皇帝负责(其实经常只是由宦官节制)，使用残忍随意的暴力和秘密线人去统治人民。明帝国还实行了广泛的出版控制(违反者常常会被全家抄斩)。秘密警察和出版控制这两大创新手段，成为中华秩序下秦汉政体历经考验的传统，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许多中外学者们都认为，腐败、虚伪、残暴与无能是明朝官场的标志，比中华历史上大多数的朝代都更加恶劣也更加司空见惯[62]。

中华秩序与秦汉政体本身都在明帝国时进一步僵化到一个自我封闭的极致状态。明帝国突然终止了由穆斯林宦官郑和率领的帝国组织的七下西洋航海活动(1405-33)，随即就全面地实施了严格的海禁政策。郑和充满传说故事的帆船队航行到南海和印度洋(最远抵达今天的索马里)，比哥伦布航海至美洲早了几十年。但是与哥伦布的航海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不同，起因至今不明、但费用显然不菲的郑和航海，几乎没有对中华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遑论改变世界。明帝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郑和航海，并销毁了所有资料，焚毁其远洋船只，应该是试图把不受其控制的外部真实世界隔离、隐藏起来。然而，中外贸易甚至是严禁的海上外贸在明代仍然继续着。欧洲人和东南亚人为明朝的统治精英们带来了西班牙掠自美洲的白银、各种新作物种子、西方的奢侈品和武器，比如时钟和火炮。明帝国沿袭了帝国政权(宋代除外)常见的禁止国际移民的政策，但是更加严厉。私自出国后从海外归来的人一经发现，通常会被处死。经过特许的外国人只能到指定的地区访问、居住和做生意；他们通常被禁止离开明帝国，于是就成了不归路上的旅客，包括老死在北京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和学者利玛窦(Matteo Ricci)。不过，葡萄牙人在 1557 年从明朝官员那里租赁了荒僻的澳门，开始了欧洲人在中华世界的第一个定居地(澳门在 19 世纪中期变成一个完全的葡萄牙殖民地)。荷兰人在明代后

---

[62] L. Zhou 1999, 271–75; Brooks 2005 & 2010, 1–2, 22–23; T. Wang 1992, 20–21, 184; Ding 1949, 5–145; Tsai 1995; Wu 2001, 2003; Hong 2014。

期则占据了台湾直到清初(1624-62)[63]。

海禁政策实际上是蒙元帝国的发明，但被明帝国以及其后的满清帝国全面持久地实施了几百年。该政策主要是中华秩序统治者们合乎逻辑的渴望，即把自己未能控制、无法控制、但是逐渐已知的外部世界强制隔离开。不像以前的秦汉世界帝国，到元明清时候，这些未能控制或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尤其是统治精英们所知晓。海禁政策也是为了防止国内人民，主要是那些难以控制的商人、船主、水手寻找财富、积蓄力量、进而可能挑战帝国统治者。其他的动因也许包括消灭海上流动的政治流亡者和叛匪、防止帝国通货白银的外流、垄断国际贸易，以及禁止外来移民和对外移民。当欧洲人大举航海，开始海外贸易、移民和殖民统治之时，中国人被他们的统治者完全地锁闭在国内。海禁对中华经济、科技、人口的灾难性影响，若说是罄竹难书恐怕也不过分。然而在政治上，海禁政策反而增加了它据称是要解决的问题。严厉的禁止国际贸易和移民，反而导致了更多的走私、海盗、逃犯、以及公开的劫掠和叛乱，成为困扰明帝国多年的严重的国家与地区安全问题。这些罪犯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逃亡反叛的明人，但是被错误地称为"倭寇"，怪罪到不受控制的和无法控制的外国人(日本人)身上。事实上，日本南部一些岛屿的大名领主和武士浪人，只是时而为明朝的走私商人和海盗们提供了庇护和协助而已。最后，在 17 世纪，志在天下一统，力量和运气却都极为不逮的明帝国，不出所料地拒绝了协商，与新兴的满洲政权和西北部的李自成叛乱政权共存于同一个中华世界的机会，于是付出了自己彻底灭亡的终极代价[64]。

在帝国暴政统治和严密的外部隔离下，明代的中华世界停滞不前，充满惊人的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人民(包括精英阶层)的生命和尊严的完全漠视。手握前所未有的集中权

[63] Fang 1953, V3, 173–78; Z. Cao 2005; Leading Group 2005; Dreyer 2006; Cronin 1984; Wang & Gao 2008。

[64] An 2008; So 1975, 15-19; C. Xiao 2012。

力的皇帝们却经常完全不理政务，任由太监和秘密警察处置国事，只顾自己的个人享乐、纵欲，往往沉溺于一些近乎疯癫的癖好。在明帝国 267 年历史里，皇帝们居然总共有 121 年之久从不会见任何大臣。有的皇帝干脆连续 20 年一直隐居深宫之内，不见臣工。当时处在事实上(后来法律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之下的欧洲人，基于对中华天朝帝国的虚幻而不实的了解和向往，掀起了一股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文化狂热，并将其作为推动改革和进步的一个另类灵感，促发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政治变革。而中华世界的人民却饱受日益荒唐、昂贵的明朝中华秩序下不断恶化的统治之苦。明代末期，由于中央政府逐渐失控，明帝国里许多地方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城市化。但这一社会经济发展“既未触发韦伯式(Weberian)城市自治也未带来哈贝马斯式(Habermasian)市民社会”，却造成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发现的，持久而“独特的城乡矛盾”，在中国持续至今。可以预见到的、特别血腥的民众叛乱于是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同样毁灭一切、屠戮无度的镇压：二者互动之下，便利了满洲民族入侵并最终取代这最后一个汉族中华帝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中华世界和汉民族悲惨地损失了总人口的 40％(超过 8000 万人死亡)，进入了满清帝国(1644-1911)：一个强化和完善了的极权主义中华秩序[65]。

满清世界帝国

满洲(Manchu)民族或满族，是中华世界外围地区(今天中国的东北地区)的一个小民族，17 世纪初时大约只有 100 万人(到 2012 年也才有 1,100 万人)。在它于 17－18 世纪崛起的时候，满洲民族有过一些中华帝制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勤奋的统治者。它的联盟外交手段高超精湛，精心组织的八旗军国制度下的铁骑能征善战。满洲公开反叛明帝国后就持续地大

---

[65] T. Yuan 2012, 148；Landes 2003；R. Huang 1981；Fei 2010；S. Fan 2003; J. Ge 2006。

胆进攻扩张，采用了蒙古式的灭绝性大屠杀手段，平定了许多反叛和抵抗，终于征服了整个中华世界。与蒙古族结盟后，满族至关重要地收买招纳了汉族的大量精英，很快就征服了土地比它大几十倍，人口比它多一百多倍的中原/中土或曰中国本土(明末的汉族人口有大约两亿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专制政权，满族统治了整个中华世界的许多民族达 200 多年，其版图最大的时候超过了蒙元帝国(不包括蒙元名义上统治的中亚以西的蒙古诸汗国)，是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个中华世界。通过血腥的军事行动和有效的一套政策，满清的秦汉世界帝国向西扩张并统治了新疆、西藏和中亚的广阔土地[66]。

通过有选择地汉化和继承秦汉唐明的统治方式，满清帝国在连续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1662-1796)统治的所谓康雍乾盛世时，把中华秩序推至历史顶峰。在那个时期，中华秩序统治着欧亚大陆东部和中部的整个已知世界。这个时期的满清帝国大致上享有和平，虽然内部的各种武装叛乱一直不断，包括绵延多年的汉族反叛，以及帝国在中华世界西北部的多次平叛和扩张战争。满清帝国政府在几十年里中央财政盈余可观，中华世界的总人口到 19 世纪初达到了 4 亿的历史高峰。满清多民族帝国的疆域版图，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要求的基础。官方史书中过于夸张和备受赞扬的康雍乾盛世，后来一直是许多汉族中国人怀旧和骄傲的一大源泉。颇具讽刺意味且十分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如今赞扬怀念“我们的”满清盛世的汉民族主义者们的祖先，其实当年是被满清统治者任意宰杀和全面奴役的被征服民族。这一奇特的功利主义历史解读之荒唐，犹如今天的印度人，把大英帝国(其国王曾经被加冕为“印度皇帝”)视为“我们的”。从 1990 年代开始，中国一直极为流行大量美化、神化满清统治者们的天方夜谭，如作家二月河的畅销小说(康雍乾皇帝三部曲)、如无数的戏说清宫生活的影视作品，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敏感而又

[66] Statistical Bureau 2013; Elliott 2001; Sun and Li 2005; Ge and Cao 2000; J. Ge 2009; Perdue 2005; Rawski 1996。

十分必要的历史政治化倾向，即公然赞誉“我们的”极权主义满清世界帝国，煞费苦心地重构和模糊汉族被满族征服，并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外来”满清中华世界帝国的史实，同时捍卫现代汉民族主义的目标，去统治满清帝国统治过的中原之外所有的广袤土地(占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面积的一半以上)。美国和日本一些清史学家不同意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的此类官方叙事，则肇始了所谓“新清史”学派[67]。

与蒙元帝国统治者一样，满清统治者抵制了全面汉化，禁止汉族和满蒙联合统治种族之间通婚(尤其是禁止汉族男人娶满族、蒙古族女人，虽然满蒙族权贵包括皇帝都有过许多汉族妃妾)。清帝国延续了妇女缠足，但是却禁止满蒙统治民族的妇女缠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化法家思想和明代开始的内容严格、控制形式十分僵化的科举制度都延续了下来。满清帝国还使用了极端残酷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屠杀手段强制薙发易服，迫使汉族文化逐步靠近乃至同化为满族文化[68]。

满清帝国继承了蒙元帝国对汉族人的全面性歧视。所有的满族人享有国家津贴、确保拥有政府与军队中的职位，成为史家所称之“职业种姓”统治阶级。满清中华秩序，把满族征服的整个中华世界分为内地(中原/中土)与周边地域区别对待，分而治之。满清帝国继续了唐代和明代的封建邦联体制，用细化的行政措施和宗教纽带统治周边地域的各个民族。具体而言，满清有效地操纵利用了喇嘛佛教里各派系的矛盾，从而至少在名义上统治了整个西藏和蒙古。明帝国在边远地区，如云南的羁縻政策被改土归流，从地方自治改为直接任命(虽然依然常常世袭)的地方统治体系，从而进一步集中了帝国权力。对朝

[67] Liu et al, 2012；关于“新清史”学派, 参阅 Dunnell et al 2004; 关于北京不愿重写清史，参阅 W. Dang 2012; Ding & Elliott 2013; 关于新清史的积极意义, 参阅 Yao 2015; 关于中华民国学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对新清史学派的批判性回应, 参见 J. Wang 2014; 更严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的谴责, 参阅 Z. Lee 2105。

[68] Meng 1936。

鲜和越南等地的朝贡制度，以及严格的对外海禁政策也被满清所延续。而在最重要的中原/中土，满清帝国则是沿袭了元明式秦汉专制政体的统治，并进一步精细化。由此，满清皇帝们成为具有复合多重角色的世界统治者；他们僭取了汉族的中华天子头衔，统治主要居住在中原的人口之大多数即汉族人民；同时使用大可汗(汗中之汗)的名义，统治内部自治的蒙古族各汗王和后来征服的中亚穆斯林部族；对西藏人而言，满清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的佛教神王。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满清皇帝于是成为学者所称的整个已知世界的"多面多体帝国"里所有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和仲裁者。这个满清版秦汉世界帝国有效地使用了已知的各种各样的帝国统治手段。清朝皇帝精心周到地扮演着一个儒化法家的父系统治者角色，将满清世界帝国建成了中华秩序的一个终极巅峰[69]。

满清世界帝国的统治者们比明帝国和蒙元帝国的统治者们要勤奋、专注，具备高效的执政能力。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在中华世界里少数民族的身分，于是十分警惕和提防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从第三个皇帝康熙起，满清统治者都学会了使用汉语，相当精通汉语文学和中华古文献。使用熟悉的秦汉政体和同样的汉语，满清帝国通过税收、征兵和科举制度，有效地利用了被征服被奴役的汉族所提供的大量人才和资源。一开始，满清帝国巧妙地自称是明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和保护人(明朝确实是稍早时被攻占北京的汉族叛乱力量李自成所推翻)。然而实际上，满清却在肉体上把数以万计的朱氏明朝皇族成员几乎赶尽杀绝。在强制汉人满洲化的时候，清廷允许所谓的"十大例外"，给汉族精英留了一些面子与时间去适应和融入满族文化。一些清朝皇帝如康熙和乾隆还是汉族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爱好者与收集者。唐代和明代臭名昭著的宦官干政与专权在清代基本被控制住。满清帝国还减轻和简化税收与征兵制度，其中

---

[69] Rhoads 2000, 289–91; Elliot 2001, 2004; Liu & Liu 2010; Yao 2015.38; Peterson 2002; Jiang and Zhang 2010; Crossley 1999, 133-34; Burbank and Cooper 2010, 207–16; (F. Liu 2015。

最重要的改革是取消传统的人头税，而代之以统一的土地税，即所谓“摊丁入亩”[70]。

满清世界帝国于是成功地将汉族及其他被征服民族的精英收编为帝国的仆人和打手。对于许多有才干而又雄心勃勃的汉族精英来说，满清帝国是一个值得为之效力献身的彻底的秦汉政体，一个真正的中华世界帝国。从洪承畴、吴三桂、年羹尧、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大量的汉族精英关键性地帮助了满清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还多次挽救了清朝的统治。满清帝国有着一个总体上努力勤政而且小心仔细的法家统治者，辛苦地维持着其少数族群的有效统治；有一个精心设计运作的官僚体系协助；再加上一个精心构建的儒家思想门面有效地安抚人心。在这个庞大的世界帝国里，满、藏、蒙、东突厥(维吾尔)和汉(按此顺序排列)五种语言文字被官方确定为“五体清文”，作为统一的帝国官方语言。由于汉族占了满清世界帝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科举制度继续使用文言文，汉语继续成为整个满清世界帝国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尽管一直都深藏着许多民族不满情绪和分裂独立的政治欲望，汉族基本上是被满族统治者在“皆为大清子民”的标签下，上下都装糊涂地把种族和民族界限遮掩过去，因而安定下来[71]。

满清中华秩序下加强了的秦汉政体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大大强化和系统化了明代的文字狱传统。满清关押和处决了许多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著述被认为是批判性的、持异议、未经允许或者有讥讽内容。朝廷认为是不合适的私人笔记和私下聊天内容，或者一些随意的信函文字，都可能会令作者受到严厉惩罚，包括本人以及整个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被处死。私自修撰、刻印或者传播未经官方认可的历史书籍，尤其会给作者全家及其有过来往的所有人带来严惩。清帝国政府还试图对当代和古代的所有文字出版物都仔细检查、删削、改写或干

[70] Rowe 2009, 22, 43–44, 96。

[71] Palace Museum 1794); Rawski 1998, 60, 117–18; L. Fu 1978。

脆烧掉。如同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满清在 18 世纪以编辑《四库全书》的名义，对中华文化的大毁灭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无出其右[72]。

严格控制百姓及其思想、强制推行满族文化和身分同化，以及严厉的文字狱，这些满清世界帝国的标志性政策，经过几代人后大获成功。那些强制灌输的理念和规范，包括以前被认为是野蛮的满族发型和着装，后来都被深深地内化成为汉族人心目中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汉族人其实极少能攀爬到二流仆人之上，汉族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满清帝国驯化成统治系统里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事实上，对许多汉族知识分子而言，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的美妙与吸引力的最好体现，就是这个外族统治下的满清世界帝国。一个满清式的井井有条的中华秩序，对帝国精英们而言确实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秩序；是任何贵族与专制统治者的理想政治秩序。在整个满清时代，异见抗议乃至公开叛乱恰如预见地一直不断，但是它们很难有意义地去撼动和改变这个世界帝国。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介入，这个自闭的中华秩序的终极形态似乎会真的永存不衰。不过 19 世纪中叶后，外来力量还是打破了中华秩序。满清帝国与中华秩序一起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痛苦崩溃，整个中华世界由此迎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时代[73]。

---

[72] X. Jin 2010; Z. Zhou 2010; Palace Museum 1934; Guy 1987; F. Zhang 2001, 411–17。
[73] Crossley 1999, 359–60; Perdue 2005, 42, 127; Huang 2011。

第三章. 被遗弃的宋代大转折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在中华世界里，历史修撰与解读事实上具有国家宗教的功能，而被倾向于挣脱外在限制和内心约束的专制统治者们所控制。审查、扭曲和篡改历史记录以及垄断历史的解读和教学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一个常见而有效的治国之道。官方(和许多非官方但为官方认可)的历史书籍汗牛充栋，整齐划一地描绘了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整个已知世界里，从秦到清两千年来一个个连续王朝的循环更替和周期性兴衰，重复着一个大致同样的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但实际上，中华世界的政治史远非如此一维单调，而是多样的、动态的。当中央一统的世界帝国缺席时，便会阶段性出现事实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更重要的是，在中华世界里还出现过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法理上的国际关系历史，即处在澶渊之盟-相当于中华版威斯特法伐利亚条约-之下的宋代(960-1279)。这一世界秩序不仅创造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机遇。但它不幸被摧毁，其深刻经验教训至今也是大半被曲解和遗弃。

本章探讨宋代的“中华秩序之停顿”，它极有意义然而长期被忽视。彼时的中华世界处在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关世界秩序下。我们对先秦历史和宋代历史的重新解读，显示了天下体系中华秩序的力量与诱人之处，及其弱点与可怕之处。如同所有的人造组织制度一样，中华秩序及其相对的非天下或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都可能会因为人为的努力、生态地理和人口因素、经济技术状态和动能、以及一些幸运或不幸的纯粹的偶

然因素，而成功或败亡。

宋朝：一个非同寻常的秦汉式帝国

唐世界帝国在九世纪后期的解体，带来了汉世界帝国之后中华世界的第二次大分裂。唐帝国的垮台是个极其惨痛的过程：作为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人群，唐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消失了。十个短命的国家为了再次统一中原或中土(Centralia)这个天命而拼搏了半个世纪，造成一些史上最血腥也最无意义的战争和破坏。其中北周帝国的政权在 959 年被它的一个大将赵匡胤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而篡夺。赵随后以他曾任节度使时的驻地宋州的地名而命名其新帝国为宋，类似于几个世纪前隋帝国的开国方式。宋帝国很快在不到二十年内就清除了中原的其他政权，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秦汉式帝国去统治整个中原即中国本土，但是不包括燕云十六州(又名幽燕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已于稍早前的 937 年，被后晋帝国(唐帝国后几个短命政权之一，由突厥族统治)割让给崛起的契丹族统治的辽帝国[1]。

汉族人传统上就居住在总面积大约为 46,000 平方英里的燕云十六州。该地区自先秦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原(中国本土)北端重要的战略要地，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和山西省以及北京和天津。该地区从一开始就成为宋帝国与其北方邻国之间一个关键性的争执，也是一个持久的伤疤，不断地提醒着汉族统治精英们，他们是如何令人不堪地没有实现天下一统的中华秩序。燕云十六州大约是阿尔萨斯-洛林帝国领土(Imperial Territory of Alsace-Lorraine)的十倍大，同样深深地浸透了民族情感和征战鲜血。它在塑造宋代中华世界国际关系上的作用比阿尔萨斯-洛林引发的法国与德国的长期争斗对西欧国际关系的影响还要大。它是宋帝国与强大的辽帝国和后来的金帝国之间不断斗

---

[1] Tuo 14th century, V1–5; Mote 1998。

争的一大原因。事实上，要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从而统一整个中原/中土(乃至整个已知世界)是宋帝国作为秦汉政体的传统梦想，也是它无法逃避的天下一统之天命，而后来直接导致了它似乎命中注定的毁灭[2]。

宋帝国的版图比其他的汉族统治的世界帝国如秦汉、隋唐和明都小，更不用说非汉族统治的蒙元与满清了。它一直都不是整个中华世界里唯一的政权，甚至也不是中原里唯一的政权，因此无法也确实没有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但与之前或之后的许多类似的不完整的中华世界帝国不同，宋帝国很快接受了现实，无论是多么的勉强和不情愿。它做出重大的妥协，事实上放弃了为世界统一而战的使命，基本遵守了中华世界里分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并正式地予以合法化。宋帝国由此成为已知世界里诸多共存国家中的一员，虽然还是常常自认或自诩为至少是多国中的世界中心。因此，先秦的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在中华世界里复兴，并且通过澶渊之盟得到了文字和法理的正式确认。

欧亚大陆东部这一深刻的历史转折有着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口最多也最富有的国家即宋帝国的内部因素。反过来，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又极大地允许、塑造和维持了宋帝国内部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宋史专家邓广铭所称的在整个两千多年中华古代文明史上“既空前绝后也无与伦比的”物质成就与文化精神进步的“最高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新的独特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都逐渐消减，被宋帝国深深内含的秦汉政体逻辑，以及建立中华秩序的天下一统之天命所抵销和颠覆。儒化法家思想虽然有所松动和妥协，但还是在宋帝国里一直稳固地得到实施和宣教，还逐步酝酿滋长，并最终铸成宋统治者们本可以避免的生死攸关的人为大错。雄心勃勃而又十分活跃的皇帝宋神宗(1067-85 年在位)尤想通过“富国强兵”的变法去武力扩张

---

[2] Höpel 2012；Y. Wang 2011, 39–40, 69–70。

宋帝国，以仿效汉唐皇帝们成为能够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中华秩序下的更加真实更加强大的秦汉式君主。然而，他的烦杂而昂贵的变法活动实际上开启了澶渊之盟下宋帝国的动摇、离析并最终崩毁的进程。到了宋徽宗年间(1100-26 年)，帝国野心和虚荣心与遏制不住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冲突互相交织，导致了宋帝国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士大夫政治的异化，从而消弱了帝国的决策能力和智慧。源起北亚草原的女真族金帝国和蒙古族帝国受气候和人口变化的强大驱使而相继往南扩张，与宋帝国连续的决策错误相互作用，由此结束了古典中华文明历史，迎来了中华秩序在后续的元明清世界帝国里的终极复辟[3]。

宋代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些秦汉式儒化法家的专制统治者。但是他们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很少有独裁暴政，非常罕见也很了不起。这也许是因为受到当时已经存在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的制约和影响。有些宋代皇帝还近似威权主义开明君主，实行着一种接近社团主义贵族政治(corporatist aristocracy)的统治方式。宋帝国政治上比较注重国内，更加儒家化并偏重孟子的人本主义理念，强调国内的安宁和帝国的福祉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整个已知世界。宋朝的统治者们在现实中基本放弃了天下一统的野心。他们在国内外政策上更倾向于妥协，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常常还是故作姿态，以天下唯一的天子自居。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容忍了忠于皇权前提下的多元化以及各党派之间关于政策和改革的辩论和异议，基本遵守了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规矩，主要通过内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去获得权力与财富而不是通过税收无度和军事扩张与征服去追求帝国野心和荣光。与其他秦汉式统治者一样，宋帝国继续使用了一些传统的帝制治国手段，如改进后更加公平也对平民们更加开放的科举制度。宋代官僚体系大为扩展和强化并且更为专业化，从而得以大体上整合社会精英。宋帝国继续了官修历史的传统，

---

[3] G. Deng 2008, 2; Ye 1996; C. Fang2016; F. Zhang 2001, 257–62。

但是对私人修纂历史、文学艺术乃至政论的写作和出版都相当宽容。国家与社会关系里的新实践与新特点都有发展，统治精英和地方士绅都积极地参与并常常影响了国家政策[4]。

宋帝国有个仁政哲学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5]。作为最终的决策者，皇帝保留制定规则和法律的权力。但是皇帝的诏书御旨都必须要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由文人构成的内阁大臣们管理所有国事包括军事。职业军官们是定期轮换，并只有在战时才能在文官监督下被授权去指挥特定的军队。宋帝国的开国皇帝就设下规则，不对大臣、顾问、文人(包括私人历史作家和教师)以及给皇帝上奏章提建议甚至批评意见的人使用死刑。从而使官员、绅士、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其中的异议者，都大体排除在法家治国的致命屠刀之外。宋帝国的精英们所能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通常也就是撤职、降职、国内流放和监禁。宋帝国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很不寻常的秦汉政体，使得宋代政治在质量上罕见地比任何一个中华帝制政权都要更加宽松和人性化，与其后的元、明、清三大帝国相比更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有宋 300 多年里，只有极少数高官曾被政府处死，例如中国民俗文学中最著名的爱国英雄岳飞。据考证，宋代没有后来中华世界里无处不在的，在皇帝乃至上司和官员面前下跪的仪式。在宋代，受过教育、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为文官的精英们享受着整个中华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骄傲、声誉、权利和保护[6]。

宋帝国精心设计一套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制度，旨在防止有人模仿宋朝的开国皇帝发动自千年前汉帝国以来就很常见的军事政变。这也许还旨在避免再现已经困扰了中华世界许多世

---

[4] Editors 12th century; Hymes and Schirokauer 1993; Bossler 1998。

[5]仁是儒家的中心价值和理想，指适当、仁慈、遵守天道、自我修养与自省自持、无私甚至利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其体现即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格言，源出《论语. 颜渊篇 12》。“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约，参见 Li 12th Century, V221.

[6] Li 12th century, V18; Tuo 14th century, V1–5; Z. Wang 2007; G.Wu 1-4-2016; Y. Yu 2004。

纪，尤其是自晚唐以来愈演愈烈的地方军阀割据。宋朝对军队实行的文官控制是如此的有效和严密，以至于它的对外作战能力很可能因此受损。宋帝国还把征兵制改成了募兵制，经常招募士兵只是为了供养和安抚那些不断出现的无地或者失地的农民。因此它所维持的不断增长的庞大军队，并不一定是为了作战目的。阻禁军国主义、限制尚武精神、控制和约束将军们、将兵与将分开隔离乃至疏远，都明显地有助于维护帝国的国内和平与稳定。但宋帝国也由此缺乏将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充分融合与默契，很难培养出训练良好、随时待命的野战军，尤其缺乏能在平坦的华北平原上打长期大规模战役的骑兵。宋帝国也许想凭借其对外交和贿赂交易手段的强烈偏好和精通技巧，与想法大体一致的国家或者比较弱的竞争对手，和平地解决任何国际争端。但是，它那臃肿、昂贵、指挥不善的庞大军队，即便有着当时最佳的步兵装备，仍然是无力对抗志在征服，而非在解决纠纷的女真金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强大骑兵[7]。

对军人的有效控制和总体上相对开明的治理使得宋帝国在三个世纪里从未有过严重的内部挑战危及其统治。宋帝国没有什么暴君独裁，没有邪恶的宦官专权、可怕的军阀割据或军事政变，也没有大规模的内部叛乱。这一切都是整个中华世界世袭专制统治史上罕见的成就。然而，这个被学者黄仁宇称之为“大胆试验”的开明的特殊帝国，还是被其秦汉政体内在的强大逻辑所驱使而力图号令和统治天下即整个已知世界。因为“没有统一”的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一直是外国辽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宋帝国深感其连中原都无法统一的缺憾与自卑。由于军事上自我约束后武力有限，于是外交手段就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当 12 世纪初辽帝国内部的女真族崛起，并建立起强大的金帝国，从而使得辽国国力大伤时，就似乎给了宋帝国一个诱人的机会。一般说来还是相当明智的宋帝国决策者们“不

---

[7] Z. Wang 1983, chap. 6。宋的“马政失误”和缺乏足够的骑兵可能是宋军事上败于游牧骑兵的一大直接原因(X. Zhang 2012, 55-60)。 Li, V3; Editors 1992, V6。

得不"背弃盟友辽国，去与未知的对手金国做一个极具诱惑力但也冒高风险的交易，希望能借此"收复"全部的燕云十六州，从而至少能完成统一整个中原的天下一统之天命。这一决定是基于秦汉政体的本性，也彰显了中华秩序的强大逻辑力量，完全不难想像。但是历史很快就证明，这个决定是宋帝国为自己铸成的致命大错[8]。

宋代的中华世界

在唐帝国之后的政治大分立中，中华世界有几个国家在十世纪共存于一个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之下。这个秩序在宋帝国与辽帝国通过 1005 年的澶渊之盟相互承认平等存在之后，得到了一个正式和成文的合法化。与中华历史上此前和此后的许多条约和联盟不同，澶渊之盟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以永久性和平共处为目标而签订的，被前所未有地遵守了超过一个世纪。中华世界里的各族人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意识地也事实上成功背离了中华秩序的传统长达近三个世纪。

宋帝国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379)。宋帝国于 1127 年败于入侵的金帝国，只好逃离其失陷的首都开封(今天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境内)，迁都到临安(今天长江以南的浙江省杭州)，史称南宋。宋帝国是一个汉民族国家，继承了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传统制度文化，统一了绝大部分的中原。它是当时整个中华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整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宋帝国的统治者们虽然缺乏斗志，同时大概也缺乏在军事上征服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能力，但还是一再试图用武力或者金钱去从辽帝国"收复"燕云十六州，以便完成其中华秩序的宿命(至少也要统一整个中原)。此外，它还针对其他周边的"野蛮"国家如夏使

[8] R. Huang, 1997, 154。

用过武力去夺取土地和荣耀。

辽帝国(916-1218)为北亚一个部分汉化的游牧民族契丹族所创建。类似宋帝国，辽国也有两个阶段：辽帝国(916-1125)被反叛的女真族金帝国推翻后，其皇室的一部向西辗转逃到今天的中亚地区，安置下来建政，史称西辽(1132 年至 1218 年)。经过多年的武力扩张，辽帝国成为当时中华世界版图最大的国家，囊括了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大部分地区，包括北京与天津。其人口包括大量的汉族和许多其他民族。辽帝国有着自己的文化，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一种变体汉字)，拥有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如任何一个强壮的帝国，尤其是一个采纳了儒化法家文化的帝国一样，辽国不断寻求扩张因此多次入侵更加富裕的宋国。不过，辽的扩张到 11 世纪初也达到了其力量的极限。

在当时的中华世界里与宋国和辽国共存并竞争的国家，还有党项族所创立和统治的夏或西夏帝国(1038-1227)，位于今天的中国西北地区。党项族源自唐代的吐谷浑王国，是蒙古拓跋鲜卑的后裔。西夏社会文化也部分汉化了，但仍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和使用变体汉字的本族语言。其人口包括大量汉族人。在多次成功地击退宋国和辽国的入侵之后，西夏与宋、辽都签订了条约，一起形成了中华世界里的三极国际关系体系。它后来与取代辽帝国的金帝国以及南宋继续了这一个三极国际关系，直到蒙古帝国的崛起。

辽宋夏是三个明显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三个各自独立的秦汉式帝国政体。它们在外部建立和维持了一个成文的合法化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系统。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断的战争、外交、贸易、结盟，但大都接受了平等共存的基本原则。它们的联盟及其三极国际关系在性质、范围和寿命各方面都是整个中华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相比八百年前的事实上的三极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即三国时代，宋代三极国际关系有着质的不同：它是一个远为稳定持久的法理上的正式的国际关系体系。不过，辽、宋、夏三个帝国的内部都

是类似的秦汉政体，都是人治(rule of man)的专制统治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制度。于是它们谨慎可嘉的外交政策，在国内都缺乏制度化的理性判断和稳定机制的可持续支撑。三国内部都有的、根深蒂固的中华秩序观念，也就注定了辽-宋-夏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的最终厄运。尤其是宋帝国没有能自觉地维护它们所享有的新型国际政治和新世界秩序从而得以和平共存，反而自以为是，为了一时收益而去破坏这个新秩序。在 12 世纪初，这个国际关系系统因为“世界范围”的力量之重新分布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即一个新力量金帝国的崛起而首次崩溃。它在震荡调整后又设法恢复为一个新的金宋夏三极体系，依然是一个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法理上的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一个世纪后，该世界秩序因为大致同样的地缘政治原因而又告崩溃，再也未能在中华世界复苏。最终被 13 世纪初崛起的蒙古世界帝国的大征服所灭绝[9]。

金帝国(1115-1234)是由辽帝国统治下居住在满洲(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女真族所创建的。女真人在辽国的北部起兵反叛后，通过跨渤海联系的秘密外交，绕过在陆上隔开金宋的辽国，与宋帝国签订了一个权宜联盟，即 1120 年的海上之盟。金的目的是由此来拆散辽宋联盟和辽夏联盟。金随后迅速推翻了辽帝国并将其残余势力驱赶到遥远的中华世界的极西角落。而成为西辽。不久金又入侵并击败其新盟友北宋，虏走了宋朝两位皇帝，给汉民族一个充满羞辱的惨痛打击。宋帝国被迫放弃几乎一半领土给予金帝国，并逃向南方继续为南宋。夏帝国却在金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中与金结为盟友而幸存下来。金帝国很快汉化，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新的多极化国际关系里成为霸主。金帝国与仍然是整个中华世界里最富裕的南宋以及西夏都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又共存了一个世纪，继续着互相之间的战争、贸易、外交、结盟以及阴谋离间等等常见的国际行为。中华世界里的四大国金、南宋、夏及西辽后来都全部

---

[9] T. Wu 2009。

被 13 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灭国。蒙古人用空头支票成功地引诱南宋与金帝国绝交，也诱使夏、金绝交，结果给宋、金、夏都带来了灭顶之灾[10]。蒙古人用武力征服了整个中华世界，开启了中华秩序的终极形态。

在 10-13 世纪的中华世界里，在中原之外的周边地区还有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如白族统治的大理国(937-1254)、越南的交趾王朝(968-1407)、韩半岛上的高丽王国(918-1392)、位处今天中国新疆地区的高昌回鹘王国(856-1335)、还有青藏高原上当时分裂的吐蕃各部落政权和在今天中国西南山区里更加分散的被帝国史学家们称为“蛮夷”的民族部落自治群体。这些独立自治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与辽、宋、金几大国建立过盟邦或者朝贡关系。与宋代中华世界里的其他主要成员一样，这些小国大多被蒙古帝国后来一一吞并。更远一些，日本、南印度支那、马来半岛以及远至中东的许多国家都与中华世界尤其是宋帝国有着往来和贸易。中华世界还成为自 11 世纪开始的全球货币(白银)大循环的一部分[11]。这段三个世纪之长的中华历史被史家传统地称为宋代，本书因为约定俗成的缘故也使用这个称呼，虽然实际上欧亚大陆东部的这个时代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称之为辽、宋、夏、金和许多其他国家共存的中华世界国际关系史。

澶渊体系：欧亚大陆东部的新世界秩序

从秦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丰富多彩的中华世界历史里，如同地中海-欧洲世界历史里一样，从来就不乏各种主权国家、独立政权乃至交战各方之间的停战协议、协定、和平条约以及结盟。然而，中华世界里，此类协定和条约的绝大部分都是些权宜之计或者战术运作。从公元前三世纪，极其精明的秦帝国曾不断使用各种诱人的空头支票、诡计与背信弃义的伎

---

[10] Tuo 1345 <1975 >。

[11] Tuo 14^{th} century V246-55; Von Glahn 1996。

俩，虽然臭名昭著，却极为成功地建成秦世界帝国后，这些协定和条约不绝如缕，但通常都是短期行为，极为脆弱，大多根本就是阴谋诡计。签订的双方互视为平等，明确规定和平、贸易、尊重与友谊条款的条约则更为罕见。最持久也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例外，就是辽帝国与宋帝国在 1005 年签订的澶渊之盟。它为欧亚大陆东部带来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在澶渊之盟之前，唐帝国与吐蕃帝国之间也曾有过特殊的国际关系。在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和七个和平协定之后，力量削弱的唐帝国和实力下降的吐蕃帝国在 821-22 年正式签订了长庆唐蕃会盟。唐朝皇帝与吐蕃王成为舅甥关系，双方厘清了边界，开放来往与贸易，并约定互相永远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该条约在长安和拉萨被分别刻成石碑矗立，维持了两国之间几十年的和平共处，直到它们各自的灭亡[12]。

到 11 世纪初，经过一轮又一轮为了土地、财富、安全、声誉和野心的战争冲突，中华世界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宋帝国与辽帝国虽然未能餍足，但都已精疲力尽。这两个帝国都受其内部类似的秦汉政体及天下逻辑的驱使，而有意无意地要去建立一个集权统一的中华秩序。它们还都为了其各自眼前的特定需求去征服和扩张：辽帝国需要从由宋帝国统治的中华世界的南部地区不断获取需要的商品尤其是丝绸、茶叶和铁制工具。宋帝国则希望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从辽帝国统治的中华世界的北部地区获取需要的商品主要是民用和军需的马匹。最后，在 1005 年 1 月，由宋帝国真宗皇帝和辽帝国皇太后及其年幼的儿子圣宗皇帝各自御驾亲征，直接指挥的又一场战争在隆冬季节陷入胶着状态。宋帝国于是与辽帝国互换了两份大体一致的皇帝誓书即澶渊誓书，由此订立了一个宋辽和约。由当时主战场所在地澶州(今天河南省濮阳市)及其附近的河流的古名澶渊而得名，史称澶渊之盟[13]。

[12] Beckwith 1987, 165–67; Y. Wang 1980, 94–104.
[13] X. Zhang 2007。

克服了双方内部相当剧烈的反对声音，两个帝国的皇帝誓书达成了如下共识：(1)接受双方现有的边界，放弃针对对方的所有领土和其他要求。宋帝国得以保留它通过以前的战争获得的燕云十六州中的三州。(2)承诺永久的和平、兄弟般的相爱和忠诚。(3)用熟悉的家庭和兄弟称谓承认两国彼此的平等地位。两个皇帝里年纪大的宋真宗成为辽圣宗的长兄，而辽帝国的萧太后则成为宋真宗的叔母。(4)双方不得互相招降纳叛，也不得收留对方的逃犯。(5)宋帝国以后每年给予辽帝国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按时价总值约为三十万两白银(一两白银大约是 31.2 克或 1.1 盎司；一匹绢大约 13 米，北宋时价大约是一两白银)。(6)两国漫长的边界区域将非军事化并开放口岸，设立边境交易市场。(7)两个皇帝庄严宣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只，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14]。双方发誓，如背弃盟约，则神明与上天将共讨之，其统治也将不再，这一毒誓后来还真的应验了。

两个帝国随后撤军并将边境地区非军事化并于当年晚些时候开始执行该条约。宋帝国支付了款项，双方交换了外交代表团、礼品和分别称为“北朝”(辽)和“南朝”(宋)的国书函件。两国还各自改变了一些原先侮辱对方的地名和公文辞令。两国皇帝在对方生日或忌日时互换使节致贺或者吊丧。在此后 120 年里，它们交换过 380 多次外交使节互访，互相通报各自的重大事件和，如辽国与朝鲜(高丽)的战争，宋国皇帝祭泰山等等。双边贸易蓬勃发展，为两国都带来了大量的新财政税收。至少在边境地区，基于国民身份的政治忠诚取代了种族或文化忠诚，跨国境人口迁移甚至是“双重国籍”现象也得以产生。记录表明，宋帝国还曾为辽帝国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提供过援助。虽然两国间的争执甚至冲突时而还是发生，但是都通过外

[14] Li 12th century, V58；Muo 2012。

交手段、言语文字攻防、以及政策调整而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当宋帝国与西夏帝国忙于激战之际，辽帝国曾于 1044 年一度迫使宋帝国增加岁币到五十万两白银。总之，在中华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两个天子互相承认，各自统治同一个中华世界里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更了不起的是，这个类似于威斯特法尼亚体系，非中华传统的世界秩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尽管在执行中有过一些调整，但基本原则一直得到了忠实的遵循。这一极不寻常的和平一直持续了 120 年，直到 1125 年，宋帝国的统治者们背叛了澶渊条约。于是，就像他们当初的结盟誓言所说的那样，给辽和北宋旋即都带来了可怕的灭亡[15]。

澶渊之盟的双边协议后来被宋、夏以及辽、夏模仿去管理它们之间的国际关系。一个中华世界"全世界性"的威斯特法利亚式多边秩序于是形成。在 1044 年，经过多年劳民伤财、精疲力尽的边境战争，宋帝国和西夏帝国达成类似于澶渊之盟的和平条约即庆历和议。该条约规定相对弱小的西夏作为宋帝国的朝贡国，但保留其完全的事实独立；宋帝国每年则向西夏支付二十万两白银。宋夏关系虽然没有辽宋关系那么平等，但还是维护了两国之间几十年的和平。到 1119 年，经过多次入侵和反入侵战争之后，在辽帝国的国际调解下，宋和夏又恢复他们的和平条约。西夏再次接受其名义上朝贡宋帝国的地位，直到七年后北宋被金帝国摧毁。其后的南宋不再与西夏领土相连。西夏与辽帝国一直保持了类似(通常更密切)的关系，北宋还不时地颇有成效地通过三角外交去离间辽国和西夏。西夏后来又与辽帝国的继承者金帝国建交结盟。领土大为缩小的宋帝国即南宋后来也通过一系列的条约与金帝国建立了澶渊之盟式的和平共存国际关系：1125 年的海上之盟、1141 年的绍兴和议、1164 年的隆兴和议、及 1208 年的嘉定和议。这些条约受双方国力地位、战绩与内政的影响，调整着两国关系，而在

[15] Standen 2007; G. Wu, 8-7-2015; Tao 1988。

名义上逐渐不平等(南宋皇帝最后称呼金国君主伯父)，宋每年付金的款项也逐渐提高，从四十万，五十万到最后的六十万两白银。但是它们基本上都继承了澶渊之盟的精神[16]。

基本上，辽、宋、夏诸帝国都遵守了它们之间的盟约。然而后来，北宋帝国被从辽国“收复”全部燕云十六州的可能性所迷惑，从而做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决定。它在 1120 年与崛起的金帝国秘密结成海上之盟(1125 年生效)，包含了与澶渊之盟几乎相同的条款和支付款项。这一举动实际上背弃了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并在短短两年内，导致辽帝国和北宋两国的先后毁灭。一个世纪以后，当金帝国正与其北面崛起的蒙古帝国为了生存而苦战之际，南宋在 1214 年停止支付给金帝国的岁币，实际上是撕毁了宋金之间的和平条约。到 1232 年，宋帝国再一次犯了相同的致命错误，接受了蒙古帝国使节诱人的结盟提议，幻想借助新崛起的野蛮游牧民族力量，去对金国复仇，收复以前北宋的领土，从而成为中原/中土的真正天子。尽管金帝国恳求过宋帝国，一起集体防御抵抗强大的(得到被征服的汉人和女真人协助的)蒙古铁骑；尽管宋帝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回顾了 110 年前的历史教训，向皇帝进谏，反对背弃金国而结盟蒙古。但都无济于事。两年之后，金帝国灭亡。宋帝国失去了战略缓冲和盟友却所获无几，只能为了生存而与蒙古帝国展开了一场长达 45 年(1235-79)的残酷而无望的殊死战争，是历史上抵抗蒙古帝国的各国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最终，宋帝国战败，成为整个欧亚大陆上最后一个被蒙古帝国征服的大国。汉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族全部征服，澶渊世界秩序也从欧亚大陆东部由此消亡。

澶渊之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中华版

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几个国

[16] Tuo 14th century, V486; Bielenstein 2005, 623; Fu 1978。

际条约在 1648 年结束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创立了“第一个伟大的欧洲或世界宪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生存了下来并逐渐演化，构成了今天全球性世界秩序和国际法的基础。在澶渊之盟订立的时候，它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不过是又一个带赔款的和平条约而已。但是它竟变成一个早了 643 年的中华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如前所述，澶渊之盟相互承认辽帝国和宋帝国作为和平共处的主权国家，把外交往来(包括每年以及临时的互访和互换国书)、比较富裕的宋国给予辽国的款项和礼物、以及双边贸易都合法化成为一个持久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两国还因此实现了边境地区的非军事化。澶渊之盟的基本精神后来还被复制到更多的双边条约中，形成了类似于欧洲的多边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功能，管理着中华世界里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从制度结构上改革了中华秩序：两个或者更多的天子大致平等地分别统治他们在同一个已知世界里各自的部分。一个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合法化的新世界秩序[17]。

澶渊之盟本身并没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样的全面和精细，不是一个多边条约，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宣传推广成为一个各国充分接受的“世界条约”。它是匆忙订立的，充满了家庭式称谓。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相比，明显地缺乏严谨的法律形式和法理语言。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同，澶渊之盟根本没有提及社会与宗教的多元和自由，没有保障如不来梅(Bremen)那样的城邦小国的生存，也缺乏保护国际商业往来和保证如莱茵河那样的国际航运线路畅通的条款。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其实是将在欧洲-地中海世界已经事实上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国际关系现实编成法典，而中华世界不像地中海-欧洲世界，之前没有过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澶渊之盟从来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所以没有机会得到社会上和文化上的接纳和内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又有三百多年发展、历经许多均势平衡(balance of power)和权力斗争(仅仅在 20 世纪就经历

---

[17] Gross 1948, 20-41; Mote 1999, 70–1, 115–24; X. Zhang 2007; Tao 1988; Twichett and Franke 1994, 108–10。

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不同的霸主国家充当过该体系的领导和维护警察、以及若干重要的调整与努力使之合法化(如维也纳会议和联合国)，才获得其现在看似不可动摇的合法性。澶渊之盟试图创造一个违背之前传统的新世界秩序实践，但是却十分缺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得以增强、改进和扩展的历史渊源和基础条件[18]。

澶渊之盟作为一个停战条约，本身并不是非常罕见。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中华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或带赔款或不带赔偿的和约。但是，看似不起眼的澶渊之盟基于其创新的国家间关系原则，居然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法理上的新国际体系：即各个主权国家平等共存，或曰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而不再有一个中央集权的世界政府。尽管它们在书面上都没有明确地提到主权国家，但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澶渊之盟都划时代地在法律上和观念上用国际关系取代了世界帝国。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变化。即使是在先秦时代(事实上而非法理上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华历史上的多次政治大分立时期，直到 19 世纪末之前，中华世界里再也没有过第二个法理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体系作为其世界秩序[19]。

实践中，澶渊之盟为宋帝国和辽帝国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甚至传统上饱受战祸的边境地区也是如此。宋帝国还由此赚得了巨大的财政盈余。对于崇拜天下一统世界帝国的人来说，每年付给辽国的三十万到五十万两白银，可能听起来令人为宋帝国感到羞愧。然而这笔钱只相当于宋国每年为了供养安抚失地失业农民的浩大军费的 0.5-1%，或者宋国每年总财政预算的 0.2-0.7%，或者当时打一场中型战争费用的 1-1.3% 而已。再者，宋国支付的岁币的大多数，又被辽国用来购买宋国的出口物资，支持了宋朝经济和关税收入。它还可以被看作是对宋辽之间长年的贸易不平衡的一个补偿性支付案例。宋真

---

[18] Croxton 2013。

[19] Jiang 1964, 54。

宗当时实际上已经准备接受十倍大的付款，认为那也是值得的。对于持久的和平及由此而剧减的军费来说，这笔岁币其实是很合算的投资[20]。

非常有趣的是宋辽双方的澶渊之盟版本，及双方各自有关执行的后续文件记录中的具体措辞(主要是一些不同的形容词)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微妙的不同揭示了双方(尤其是儒家文化色彩更浓的宋帝国)在国内维护其帝国统治者作为天下(独一)世界皇帝之尊严的门面需要。宋帝国与西夏和金国的类似条约里，这种文字上的微言大义更是明显。比如，宋帝国给西夏的付款在宋国文献里写成有些居高临下的“赐”，而给辽国和金国的付款则记载为比较平和的“输”。把国际关系描写成家庭内部关系的玩弄辞藻也是发人深省。在摧毁北宋之后，迅速汉化的金帝国自视为中华世界里的真正天子或者澶渊体系下的国际霸主，把人口更为稠密更加富裕的南宋视为一个低一等的进贡国。而南宋文献则尽量忽略金帝国的此类言行。在貌似开明的宋朝皇帝和统治精英们的心灵深处，依然有一股强烈的需要，要去包装和美化他们高度理性务实，但不合传统的政策。虽然无意也无力去征服和集中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但是在自己的臣民眼里，保持住秦汉政体统治天下的天命，以及作为整个中华世界唯一天子的尊严形象，总是至关重要。

中华秩序的强大传统，在宋代的非天下与非中华世界秩序下，依然存在并不断地发酵。不能统治一个完整和真正的秦汉式世界帝国，令比较自省、雄心勃勃、假装拥有唯一天子身份的宋帝国皇帝们倍感缺憾，内心痛苦。他们觉得，除了举兵征服整个已知世界外，必须有一些印证符合天子身份的行为和仪式。宋帝国对官员、精英和民众们异乎寻常的温和仁政的善治，也许就是平息批评和纾解不满所必要的一种回报。此外，宋帝国还大张旗鼓地从事昂贵的封禅仪式(登泰山祭天地)。宋朝反复不已、令人精疲力尽的党争，也大多集中在如何加强国

[20] Tuo fourteenth century, V313–372, V7; Muo 2012。

力和军力，以便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像一个真正的天子一样行事。最严重的是，已经内化的中华秩序观念促使宋朝统治者们为了统一中原/中土(即便还不是整个已知世界)的幻想，反复铸成破坏澶渊体系的大错。无论宋帝国是如何开明、如何善治，其秦汉式政体的本质，还是被从未真正消散的天下一统的天命观所引诱、推动和左右，导致了宋朝黄金时代的毁灭，古典中华文明的毁灭，以及汉民族的毁灭。

事后看来，澶渊之盟是中华世界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是中华秩序的一个替代。但是这个转折没有能持续下去。澶渊之盟开启了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的一个历史新时期，如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亚大陆西部一样，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长期和平与伟大繁荣。这两大新世界秩序后来都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次挑战，有时甚至是压倒性、摧毁性的。与比较幸运的欧洲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同，中华世界各族人民的澶渊体系由于种种原因而短命。它因本书前述的中华世界特有的生态地理、人口、历史特点而大受限制，既残缺又脆弱。不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着千余年事实上的先例和实践，澶渊之盟没有多少先例可循，也缺少有力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其合法性和实际持久力因此都易于瓦解。最重要的是，中华世界里深入而持久的秦汉政体传统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支持并促使中华秩序的复辟，不利于维持一个长久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体系。多边的“世界性”的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国家主权的平等，同时也赋予各国宗教多元化和人民的选择和迁徙权利，确定了荷兰的新重商主义共和国的独立，并逐渐奠定了全世界国际法的基础。而澶渊体系是一个狭窄的，主要是双边的条约体系，无关国内政治。它被摧毁之后，在法律上、实践中、思想上甚至语言上都很容易被入侵的征服者泯灭殆尽。欧洲人不断改善其法理上的持久弥远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一步扩展为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而中华世界的各族人民，却被一个强加的蒙古中华秩序密封成又一个世界帝国，再也没有竞争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促使科学技术和

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直到 19 世纪中叶。

中华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间的这个大分野，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自 13 世纪后期以来不同的发展轨道和成绩，解释了所谓“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这个概念:只有欧洲人(及其延续北美人)开始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与扩张、社会政治的自由化及其全球霸主地位。而关于所谓“中国困惑”(China puzzles)的重要答案，就在于经久不衰的中华秩序。它是解释中华世界在宋代以后何以持久衰落和停滞的关键[21]。

中国人心目中的澶渊体系

由于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即中华秩序或世界一统的天命-顽固地存在，澶渊体系在宋代没有能内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宋帝国的精英们，甚至那些开明的知识份子，仍然把中华秩序当作一个最高政治价值和理想境界。著名诗人和开明知识分子陆游在 1209 年写的最后一首诗《示儿》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而像韩侂胄(1152-1207)这样的政治家，则会利用中华秩序统一大业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力，但以灾难告终[22]。南宋领袖们特别容易多次忘记历史教训，愚蠢而致命地一再破坏澶渊体系，因为他们认为，在入侵的金帝国和蒙古帝国面前屈辱地“失去了”大片中原，比起北宋仅仅是“失去”燕云诸州来说，是更加难以容忍的巨大耻辱。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末以来尤其是晚清以降，汉族民族主义者奋起反抗满族统治者和入侵的外国帝国主义，澶渊体系于是更被汉族的历史叙事所排斥和贬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和主流历史学家们都十分贬低澶渊之盟尤其是其

[21] Jones 1981; Landes 2003; Pomeranz 2001; Frank 2001, 180–2。“中国困惑”或者“中国难题”是指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Finlay 2000, 265-303)和为什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停滞那么长时间(Y. Lin, 2012, 591-96)。
[22] Tuo 14th century, V233.

作用和影响，乃至贬低整个宋代。宋帝国被视为一个无能也无意统一整个中原/中土国家的中央政府；澶渊之盟被解读为一个内战双方之间的权宜性临时停战协定，而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事件。宋帝国被认为是中华世界的中心，传承和捍卫汉族国家和秦汉唐之政治正统。然而，宋帝国又被描述为怯懦无能甚至通敌叛国，因为它忽略了其建立中华秩序的天命；无法与之前的秦汉隋唐帝国齐名，更无法与之后的元明清诸帝国媲美。宋帝国的外交政策记录通常被斥责为软弱、可惜、无法挽回的失败、甚至可耻。即便是在海外，华人学者也常常如此认为。史学家黄仁宇理所当然地赞美和肯定了宋代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看起来，(宋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宋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有许多创新，"达到历史最高峰"，但是，他同时嘲讽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无能的朝代。被尊为史学大家的钱穆高度赞赏了宋代的成就，但还是有些莫名其妙地断言宋帝国"始终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23]。

不去思考宋帝国背叛和破坏威斯特伐利亚式澶渊体系这一失误及其败亡的因果关系，汉族的中国历史学界普遍错误地谴责澶渊体系本身，视之为宋帝国和古典中华文明灭亡的原因，真是令人费解。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的地位，在今天的中国历史修纂和教学中，宋代的中华世界不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被诡辩、误读成一个分裂的单一民族国家，无法处理若干地方族群政权，只是唐和元两个伟大帝国之间的一个过渡期。宋代日益明显闻名的伟大成就，被机巧地隐藏和包装为"宋元时期科学文化的辉煌成就"。虽然非传统和非官方的中国历史学家现在已经开始挑战官方灌输的不实历史，甚至承认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但还是会谴责宋帝国没有武力"统一国家"并戏剧化渲染宋朝统治者们因为其"软弱"和"胆小"外交政策而

[23] Z. Yuan 2010, 67-70; R. Huang 1997, 127-28, 207; Chien 1939, 523。

遭受的屈辱和灾难[24]。

制定和支持澶渊之盟(及类似条约)的宋代人物，通常被认为和虚构成诡谲、不可理喻的恶人或小人，在精神上和体格上都软弱无能，缺乏个人勇气和军事才能。而批评和反对澶渊体系的人，则通常被美化和虚构为汉民族的英雄乃至超级英雄，他们勇敢、忠诚、爱国、道德高尚，甚至成为半人半神的崇拜对象。他们的失败被归咎于邪恶腐败的其他官员和昏庸无能的皇帝。当今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民间英雄，就是一些被虚构的宋帝国时期反辽抗金的将领：从北宋的杨家将群体到南宋的岳飞以及岳家军。杨和岳受民间欢迎的程度，固然反映了澶渊体系国际关系中人们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更可能是由于统治者的推动和鼓励。杨业将军(？ -986)在他逝世几十年后才首次受到文人们的赞扬，关于他家族的故事则在 12 世纪后才成为民间传奇。岳飞将军(1103-42)的传奇始于他被处死 20 年后南宋帝国予以“平反昭雪”之时，并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其专门的寺庙供人崇拜的半人半神。在 21 世纪，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已经更加注重事实，不再完全接受官方关于宋代英雄与恶棍的简化标签和黑白分明的夸张形象，推动对宋代历史的不同看法。但是关于宋帝国的外交政策，看法依然是大同小异。只有一小部分中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开始注意到澶渊之盟的真实意义[25]。这一状况，反过来很好地说明了中华秩序作为一个持久的高度内化了的世界秩序，在中国人心目中影响力的强度和深度。即使是宋朝皇帝们当年也是忍不住，时不时地被其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所支配，被中华秩序天下一统的目标所诱惑，要假装是整个已知世界的唯一最高统治者，从而背弃至关重要的澶渊体系，并因此注定了自己的厄运。秦汉式世界帝国许多世纪以来而形成的中华文化，确实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塑造了中华统治者和精英们的外交偏好与政策选择，因此也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历史命运。

[24] X. Zhang 2007; Editorial Board 2004, V2, 50–82; T. Yuan 2012, 130。

[25] X. Cai 2007; Gong 2008; P. Xiong 2009

锦绣辉煌的宋代：澶渊体系下的中华世界

因为宋帝国内部有一个非正统的“社团主义精英政治”结构、弱化的儒化法家威权主义世袭政治、自觉的问题预防机构和政策，以及-作为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外部的新世界秩序澶渊体系，即成文的、合法化了的先秦或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从而给宋帝国带来了低成本的、确保无虞的国际和平、贸易、比较和竞争，故宋代的中华世界变成了如著名的中国知识份子陈寅恪所说的 20 世纪之前中华文明的“最高峰”。陈和另一位中国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宋代是中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是中华“瑰宝”、“最令人羡慕”和“最有价值”的时代，达到了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则认为宋代是中华文化和学术“最有成就的时代”，超越了前面的汉唐和随后的元明清各代。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断言宋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的黄金时期，其成就前所未有、无与伦比；是工业革命前全世界的科技顶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则把宋代认定为中华历史上新的“现代”时期，具有公民社会、促进贸易的资本主义、内部安宁、文化“复兴”，以及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平等的国与国关系”的创造性的澶渊国际体系[26]。

澶渊国际体系下的宋帝国享受了中华历史上为期最长的和平时光，如本书第一章之表 1.2 所显示的，其发生外部和内部战争冲突的频率比中华世界的历史平均数低了近 50%。如果南宋统治者没有忘记历史教训，不和蒙古帝国缔结那个充满诱惑性的联盟，去消灭当年让北宋蒙羞的金帝国，也不随后盲目攻击新盟友蒙古帝国，试图“收复”失去的中原，蒙古人对宋帝国的最后胜利，可能会推迟甚至避免，整个中华世界(乃至全球)的历史可能也会由此而大为不同。中华世界里的各族人

[26] Chen 1943, 245; Chen 1960s; Deng 1943; Wang 1926; X. Song 1997; Needham 1954, V1; Naito 1922, V8; Miyazaki 1978, V9–12.

民可能早已发展演进，离弃了秦汉式世界帝国专制政府，发展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启动科学、工业革命、以及完全的市场经济，从而彻底摆脱中华秩序下的长期停滞。

宋朝的皇帝们比通常的中华君主们表现得要较少专制、也较少杀气，而更像一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王公。据说他们甚至用诗歌、礼物与绘画，和臣下争风吃醋，分享和争取交际花名妓的青睐，而不是用传统的杀头办法[27]。皇帝和朝廷官员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一个农耕父系社会里统治的父亲和他的男性后代的关系，也即是儒家所推崇的仁政制度结构。比较宽松的社会和文化控制、较低的税收、将失地失业农民编为军人供养起来的政策、稳固的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受到良好保护的由功能专业化精英主持的官僚体系、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外交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合起来发挥作用，基本上控制甚至消除了中华帝制政治史上一些最恶劣的顽症：宦官专权、宫廷政变、地方军阀割据，以及无穷无尽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宋帝国的仁政精英政治，包括不杀大臣和政治异见者的“先帝家法”，以及对社会政治问题的预防性措施和政策，已经被有些史家认定是中华历代王朝中一些最优越的制度。宋帝国基本依法治国，因而有比较稳定一贯的政府，是中华世界从秦帝国到清帝国所有主要王朝里，唯一一个既不是被内部叛乱也不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国家。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认为，宋帝国甚少宦官干政，基本没有军阀割据，也少对精英和士绅的压迫，在中华历史上很稀有。宋朝的皇帝们还属于中华历史上最为节俭甚至“贫穷”的统治者之列。他们只有很少的后宫、相对简单的宫殿、以及很不奢侈的皇家陵墓。大多数的中华皇帝们通常一加冕即位就开始建造极度豪华的陵寝，有时耗时几十年直到他们死亡之日；宋代皇帝们在活着的时候都不建自己的帝陵，死后七个月内则必须入葬，因此他们的坟墓都相当简朴。而实

---

[27] 如宋徽宗和李师师的传说故事(Zhang 13th century)。

际上宋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在 19 世纪末之前是中华历史上最高的，远远高于那些领土和人口都要比宋帝国大得多的朝代[28]。

确实，宋帝国的治理，因开明、良好的结构和制度和以法治国(rule by law)的威权主义统治而知名，从其治理的效率、国内的安宁(甚至社会的自由)、各政治集团的平稳共存、政府的节俭与国祚来判断，大约是中华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中国研究皇权的史学家周良霄把宋代政治称之为“地主士绅的民主”制度。宋代的女性明显享有较高的，甚至是中华历史上无出其右的社会与法律地位。同一个赵氏家族的宋帝国皇室统治了共计 319 年，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华世界进入帝制政治以后，寿命最长的一个执政皇族。它的臣民(包括中华历史上有名的文天祥)大都直到最后一刻仍然还是忠心耿耿[29]。

尽管拥有一个理想化的儒化法家政体，宋帝国仍然是一个秦汉式专制政权，对普通民众的人权和民权有着常见的压迫和剥夺。虽然统治者们有被自己制定的法规所限制的故事，但宋帝国并非一个法律至上的法治(rule of law)国家。主观、武断、非理性的统治和官员腐败尽管不是那么恶劣致命，但在宋帝国的各个层次上仍然司空见惯。有限的问责制度和并不完全公开自由的政治辩论，限制了政策创新。宋帝国的统治与对外政策由此都有严重的缺陷和僵化，以及巨大的失误。宋朝有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待遇优渥的官僚体系，以及形同福利国家用公款供养安抚民众的庞大但战斗力虚弱的庞大军队，带来了经常性的财政赤字。纸币的发明和使用也不时导致通货膨胀。宋帝国在和平时期保持着多达 120 万人的常备军，军费开支有时甚至会达到帝国财政总预算的 65%-80%，意味着大约每十户民众需要供养一名士兵，难以持续。而这支庞大的军队，因为严格的文官控制和不具备尚武精神，至多只有防御性的作战能

---

[28] P. Liu 2012, 1–16; F. Zhang 2001, 220–42; Q. Zhang 2001; Y. Yu 2004; T. Yuan 2012,111。

[29] L. Zhou 1999, 259; Ebrey 1993; Bernhardt 1999。

力。宋的外交政策务实、审慎而合理，但与深深植根于其秦汉政体、高度合情合法的天下一统之天命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亟需调和的矛盾。睿智开明的宋帝国统治者们，不得不玩弄一些命中注定的装腔作势的把戏。他们一方面假装是整个已知世界里唯一的天子，一方面务实地与其他天子在国际关系中共存往来，导致了易于铸成大错的有害的虚伪风气。澶渊体系缓解了宋帝国的秦汉政体，但是远未能消除这种政体与国际竞争、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活动、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间在结构上和文化上的紧张和矛盾。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与生活其中的秦汉政体之间的根本性的不相容和表里不一(incompatibility and duplicity)，不仅大大提高了宋帝国的统治成本(例如庞大的但效果不佳的军费)，也注定了宋帝国对澶渊体系根深蒂固的轻视、厌恶和最终(连续两次！)的背弃。这些背弃造成了宋帝国政权和汉民族国家的可怕灭亡，以及一个最佳的中华帝制统治的悲剧性消失[30]。

颇具讽刺但是逻辑上不难预见的是，在宋代晚期，相对开放但又深深地表里不一的学者们将占统治地位的儒化法家意识形态进一步僵化，与道教和佛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理学(或称新儒家)，其集大成者是士大夫学者朱熹(1130-1200)。后来，在蒙元帝国尤其是明清帝国，这个学派成为日益严格的社会和精神控制的有效工具。科举考试变成只测试经过朱熹狭隘诠释的几本儒家经典著作。不能成为真正的全天下唯一天子的缺憾，以及北宋帝国几位口碑不差的皇帝的悲剧性下场，激发并强化了延续至今的汉族精英和民众的忠君传统。最初是作为时髦文化的妇女缠足，开始蔓延到大众阶层，后来被明清帝国政府接手，成为压迫控制妇女的工具。基于儒化法家之上的中华秩序理想，在宋帝国覆灭后进一步稳固和僵化。

---

30 Ye 2006, 7–8, 10–12; Muo 2012; F. Zhang 2001, 224–26。关于北宋的壮丽及其悲剧性失败和宋徽宗令人悲伤的结局，参阅 Ebrey and Bickford 2006 和 Ebrey 2014。

宋代：中华古典文明的顶峰

帝制时代最佳的统治与长期的内外和平安定，毫不意外地为宋人带来了 20 世纪之前中华历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经济。宋代的繁荣比中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盛世都长得多。澶渊体系下宋帝国的人口在一个世纪里增长了三倍，于 1110 年越过唐代人口数量，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一亿人。北宋覆亡后，版图小了很多的南宋人口在 1200 年又达到一亿，形成中华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庞大汉族人口。整个中华世界(宋、辽/金、夏、大理等)的总人口多达一亿一千万到一亿两千万，占当时人类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一。宋帝国的先后首都开封和临安分别拥有过 180 万和 120 万居民，都是当时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日本留学生、东南亚商人和犹太定居者都曾永久性地居住在宋帝国的首都和港口城市[31]。

这个庞大的人口同时还享有中华历史上罕见的高生活水平。作为农耕社会的主要财富指标，宋帝国的人均粮食年产量估计为 728 公斤，是从先秦到今天的整个中华历史上的最高峰：秦汉帝国时代人均粮食年产量估计为 505 公斤，隋唐帝国的一个短暂时期为 725 公斤，明代降为 591 公斤，清代为 360-390 公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只有 207-435 公斤。一个比较经济史研究将宋帝国称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和贸易大国，而随后的明清帝国则“转为内向，放弃了国际贸易和在经济发展上的领先地位”[32]。

虽然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宋帝国重商并且是中华历史上唯一的鼓励工商业的王朝。由此带来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采矿业、繁荣的商贸、以及无与伦比的对外贸易。宋帝国的

---

[31] J. Ge 2006; S. Wu 2000, V3。始于宋代的在华定居的犹太人社群直到 1850 年其最后一个拉比(Ribbi)逝去无继承人，才完全同化于汉人中消失(Q. Yan 2002; X. Xin 2003)。

[32] G. Cao 1989; Zheng and Huang 1989; China News Agency 7-9-2009; Powelson 1994。

年财政收入(税收)是 19 世纪末之前中华历史上最高的，而它的税率却是各个帝制政权里最低的之一。宋帝国年财政收入最多的一年可达到一亿二千六百万两白银，比两个世纪以后版图要大许多的明帝国的最高年财政收入还要多十倍。即使是后来版图大为减少的南宋(其疆土只有以前北宋的三分之二)，其年度财政收入还是要比明帝国多六倍。更了不起的是，宋帝国庞大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业税，而不是传统的通过日益加重的对农民的剥夺。宋朝的工商税稳步而惊人地增长，占到其财政收入的 35%-70%，而传统的农业税和人头税则大致保持不变，这标志着大规模的非农业经济的繁荣。只有到 19 世纪末，中华世界里工商税收入才再次超过农业税和人头税的收入。英国学者关于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定量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以前，中华世界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两千多年里基本上是停滞不变，只在宋代有可见的增长：年增长率虽然只有很低的 0.06%，但是已经是远远高于当时所有其他非欧洲地区经济体的增长率。在公元 1000 年，宋帝国首都开封的一般劳工的年均收入可以购买的粮食按 2009 年的粮食价格折算起来，大约是 3,200 美元，与 2010 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同[33]。

从一开始，宋帝国就沿着海岸线开放了许多港口城市(最有名的是广州和泉州)，并派遣帝国使者去国外邀请外国投资者和商人。宋代社会是空前地对外开放。宋帝国还很务实地把许多朝贡关系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贸易关系。宋代的外贸因此蓬勃发展，对外(东南亚)的移民定居也大规模地展开。中华世界里和中华世界外共约五十个国家和宋帝国交易多达 300 多种商品。外贸关税有时占到宋帝国非常庞大的财政收入的 10%之巨，成为一项重要的税源，既代替了在政治上社会上受到责难的增税，也好过增印更多的纸币从而减少了通货膨胀[34]。

[33] Ye 1990; Maddison 2001, 图 1-4, 表 B-21 和 B-22; Q. Liu 2015。

[34] Hansen 2000; Waley-Cohen 2000, 38–41, 52; Tuo 14th century, V126–39; F. Jian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宋代的成就在中华历史上是真正地无与伦比。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称之为中华历史上的科技黄金期。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直接将宋代称为中华科技复兴时期，有着大量多产而有价值的科学家。事实上，在 20 世纪前中华世界的所谓"四大发明"中的两个(火药和活字印刷)发生在宋代，而另一个(先秦时代传下来的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得到实际使用。宋代还有着许多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包括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石油、机械设备和对人体进行医学解剖。宋代大量开采并使用了煤炭。首都开封的一百多万居民据记载以煤(而不是传统的木柴、禾草或木炭)为主要燃料，令人振奋地暗示着一个燃煤工业化的临近。而煤炭和冶铁等行业里的"工业革命"还要到几个世纪后，才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英格兰发生。2016 年中国的新华社报导了一处宋代建造的城市下水道工程至今仍然比同一城市刚刚建成的现代系统还更有用处。总体看来，宋代是中华科技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顶峰，因为整个中华世界"公元 13 世纪以后就基本不再有任何创新了"[35]。

以理学的创立为代表，宋代的中华世界里有许多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和布道者，发展和整合了各种信仰和哲学学说。它被中国史学家称为自战国时代以来"又一个活跃的百家争鸣时代"。私人修史得到了允许，文学作品蓬勃涌现，绘画音乐艺术兴旺发达，产生了一些最优秀和最重要的历史书籍、诗歌、绘画、书法、雕塑和陶瓷作品。在中华美术史上，宋代占据着一个顶峰位置。今天中国的一些艺术史家还认为中国书画艺术水平在宋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此后就趋于停滞和衰败。非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功利主义、仁政甚至民粹主义也有发展。不像中华文明的前一个高峰即早期的盛唐帝国(当时的艺人工匠和歌舞娱乐仍然受到社会隔离、限制乃至鄙视)，"宋朝没有什么

2009; Q. Ye 2006, 89–105.

[35] Needleham 1954, V1; Gernct 1962 & 1996, part 5; Hartwell 1962, 153–62; Xinhua 7-13-2016; J. Dong 2014, 29–36。

禁忌，皇帝和艺人与市井民众同乐”。在庞大的城市富裕阶层的需求和资助与推动下，著名的大足石刻(主要是在宋代完成)与其他时代的中华世界里的石刻差异显著：有创意的石刻大多描绘了世俗生活、民间和流行的通俗故事，而不仅仅是宗教题材，反映了颇为资产阶级的市民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与其他的中华古代石刻壁画的作者工匠基本都是默默无名不同，宋代石刻的艺术家和雕刻工人通常都刻下了自己的姓名，反映了当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著作权和版权等相当资本主义的观念[36]。

如果考虑到整个中华世界里其它国家同时也享受到的和平、繁荣和进步，则宋代的辉煌成就和灿烂记录是更加令人惊叹不已。无论后世的中华历史学家们是如何不情愿和不公平地曲笔记载它们，这些国家都有着明确的稳定维持的领土边界和平等的主权。贸易、外交当然还有战争将这个体系维持了几代人的时间。长期积累起来的中原知识与技术被扩散到整个中华世界的各个角落；非汉族、非中华世界甚至非亚洲的技术与文化也同时深深影响了中原[37]。

值得关注的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历史在 11 到 13 世纪似乎展现了许多相似之处，揭示了人类文明宏大合流的可能。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欧洲世界里，在一个分立不统一的世界政治秩序下，各个封建国家开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法律和政治社会变革，逐步使得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趋于稳固和合法化，随后迎来了现代的欧洲。某些意义重大的一些理念和规范-限制政府权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等等-通过各国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博弈而得以设立，并广泛影响后世。以下的一系列法律文件或国际条约，就历史性地反映了欧亚大陆西部的变革和新规范：1037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康拉德二世谕令》(*Edict of Conrad II*)、1100 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Coronation Charter*)、1183 年的

---

[36] Zhu 12th century; Li 1270; N. Wu 1994; Y. Han 2014; L. Zhou 1999, 259; H. Wu 2012; Editors 2008; Y. Jiang 2014; D. Cao, 1987, 36-63; L. Liu 2006, 126; CCTV 2015。
[37] P. Xiong 2009。

神圣罗马皇帝巴巴罗萨和伦巴第联盟之间订立的《康斯坦斯和约》(*Peace of Constance*)、1215 年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等等[38]。在欧亚大陆东部，也处在一个分立不统一的世界政治秩序下，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和经济发展，也在整个中华世界尤其是宋帝国里发生，预示着离开中华秩序乃至秦汉政体的伟大变革。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宋帝国挟其巅峰水准的中华文明成就，“已经走到了现代世界的门口”，昭示着“现代社会的曙光”即资本主义经济、启蒙开明的统治治理、高度城市化(宋帝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20-30%)的社会、文化复兴与繁荣、以及科技革命等等的到来。然而，中华世界里史诗般的进步潮流，不幸被蒙古帝国的征服所打断，并扭转和倒退回去[39]。

蒙古帝国(后来还有明清帝国)的“世界性”军事征服和大规模屠杀，复辟并强化了中华秩序，摧毁了伟大的宋代转变。也许除了极少的蒙古征服者、明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外，这个历史变化对欧亚大陆东部中华世界里各族各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其可悲的结果。澶渊体系，中华世界比欧洲人早了六个世纪的法理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因此未能真正稳固下来，更不用说合法化、深刻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形态。它是通向更加美好世界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但是中华世界的人们，却没有(或者不可能)坚持到底，真正完成这个转折。

---

[38] 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文件和条约，参阅 Cabrillo & Puchades-Navarro 2013: 50; McNeal & Thatcher 1905; Cannon 1909; Comyn 1923: 138-140; Vincent 2012 。

[39] G. Wu 2014。

第四章. 评议中华秩序

通过分析中华秩序、评议其特性与历史记录，本章将总结对 20 世纪之前中华政治历史的修正性重新解读。从公元前三世纪后期至公元 19 世纪后期，除了一些暂停和中断，尤其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宋代，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华世界里各族人民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一个大致相同的世界秩序即中华秩序(the China Order)之下。中华秩序是儒化法家的秦汉政体的自然和合乎逻辑的目标，也是它天下一统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所在：由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也是唯一的政治单位)，来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天下)，建立世界帝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华人学者如赵汀阳、张启雄、黄枝连、王庆新、刘仲敬等论及过中华秩序，将它分别描述为“天下体系”、“中国世界秩序”、“东亚世界秩序”、“礼仪制度下的天朝体系”、“中国的天下秩序”、“朝贡制度”或者“华夏制度”[1]。外国学者如费正清、曼可、白鲁洵则更早就使用过类似的词汇去讨论中华秩序[2]。在笔者看来，中华秩序具有持久的有中华特色的前现代性(premodernity)，它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但常常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一个没有制度分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综合体之上的世界政治秩序[3]。

---

[1] T. Zhao 2005; C.Chang 2010,106-46; Huang 1994; Q. Wang 2011; F. Zhang 2010, 33-62; *Chinese social science news*, 9-27-2014。非主流学者刘氏的描述较为到位, 但可能是虑于出版审查，依然是颇为晦涩和模糊(Z. Liu 2014)。

[2] Fairbank 1942,1973; Mancall 1984; Pye 1992 & 1993, 107-33。

[3] F. Wang 1998b, 76-77, 105-15。

中华秩序有着颇具说服力的宇宙论观点(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和对农业社会父权制实践(一家只有一个父亲)的论证和神圣化。于是整个世界只能由一个天子来统治一切，也即成书于汉帝国时代的《礼记》中的著名论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共存平行的其他国家以及国家间的比较和竞争都被认为是过渡性的、不受欢迎的、违反天道因而也是违反人道的，故无法接受。尽管天命可能会从一个统治家族转移到另一个统治家族，王朝因此可能会更替，世界可能会暂时分裂，政权可能会一时分立；但是只要宇宙不变，则中华秩序的基本原则就永远不变。于是，在 19 世纪后期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一直都是一个世界现象，要么是由一个唯一的天子之下的中央集权世界政府统治的“统一世界”，要么组织为一个过渡性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体系，其中有多个天子渴望重新统一世界并且为之拼搏不已。民族、族群、宗教甚至种族的界限区别都被稀释和弱化了。世界帝国对欧亚大陆东部的各民族人民依照它们的远近差异、统治它们的成本高低，以及它们接受中华文化(主要是儒化法家观念及其载体文言文)的程度，实行划分排列、采用不同治理方式。回顾其历史，中华秩序既不是“特别的仁慈”，也非“特别的暴力”，时常只是存在于想像憧憬中或者虚张声势中[4]。

在中华秩序下，由秦汉政体统治的中华世界于是被自然地理的原因和政治选择，而与外部现实世界隔离分开。当外部世界的存在变得愈加难以否认的时候，主动做出自我隔绝的政治决定就变得尤其重要。虽然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常常自我孤立，实践中的中华世界并不总是符合所谓“孤立主义”的僵化分析模式[5]。它事实上也经常对外开放，与世界其他地区有许多重要的长期的交流来往。但是外部世界必须被认为(或者被臆想为)是处于同一个天子的统治之下，或者被认定(或者臆断为)干脆

[4] S. Zhao 2015; Perdue 2015。

[5] Hansen 2000; Waley-Cohen 2000。

就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不对秦汉世界帝国造成挑战和竞争。在概念上，中华秩序是所谓的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的一种世界性体现，与欧洲政治学家波普(Karl Popper)分析过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相反。与俄罗斯帝国等其它封闭社会相比，中华秩序世界帝国表现出一种“吸收型帝国”的特征。它不仅征服和控制各个国家与民族，而且迫使它们同化和消弭。如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观察到的，所有人都是或者应该是“(汉族)中国人的雏形材料”或者“尚未成为(汉族)中国人”的落后野蛮之人；假以时日，他们都会通过文化压力或者被武力强迫而“成为(汉族)中国人”[6]。

中华秩序的天下意识形态或曰大一统思想，最初是由秦帝国对整个中原或中土(Centralia)即中国本土(China Proper)的征服而成功地付诸实践。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秩序，中华秩序崩溃过多次；但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从未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心里消失。汉帝国和隋唐帝国都复辟、改进和完善了中华秩序。在宋代三个世纪的离经叛道的社团主义威权政治与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之实验被武力摧毁后，元明清三大帝国先后重建并维持了中华秩序，并趋向极致。明末清初的非正统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曾简洁地的总结过中华历史，认为两大巨变先后两次“结束”了中华文明并将中华人民封死在无尽的厄运中：公元前三世纪秦朝的天下统一和公元 13 世纪蒙古人对宋朝世界的毁灭(“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

中华秩序的世界统一理想，两千年来影响乃至塑造了几乎所有的中华统治者的政治和政策偏好。满清帝国尤其是其 18 世纪所谓的盛世，在很多方面都集中体现了中华秩序。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叙事与未来愿景、以及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参考框架来说，中华秩序都是一条熟悉而深入的“路径依赖”

[6] Popper 1945, V1, 49-50, 152-3, 178; Lattimore 1940, xlix, 56-57, 165, 300-01, 336, 409, 514。

(path of dependence)，及持久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近乎完整的“世界国家”的一个持久案例，中华秩序的经验对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思辨，尤其是关于政治全球化的可行性和可取性应该是极有启迪和说服力的[7]。

中华秩序的主要特征

中华秩序的基础是奉行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秦汉政体。秦汉政体在其内部，实行专制甚至暴政统治。在外部，除非它能征服、整合并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从而享有对所有人民的唯一主权，一个秦汉政体是很难安心满意的；它必须假设那些它无法统治的人们都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设法将他们与自己统治下的人民隔绝开。总之，只要有其它的平等主权政体与之共存、人民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乃至国家、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比较和竞争，这个秦汉式世界帝国就会遑遑不可终日，无法和平稳定；人们也难以安居乐业。于是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总是指向天下一统的天命，引导其外交政策走向(或者假装)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即中华秩序。这个中华秩序的关键性特征，包括其总体性、普世性、等级层次、多重性、控制欲、虚伪欺骗和表里不一、有效性以及持久性[8]。

总体性(totality)

如前所述，中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修正过的儒化法家政治意识形态(掺入了道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论)，要求模仿父系家庭组建国家政权，并依照不变的天道(大自然之道或神明之道)统治人民。由此，中华秩序下统治者和精英们的天命是将整个

---

[7] J. Wang 2000, 77,82-83; G. Wang 2006; Talbott 2008。

[8] Kissinger 2014, 4-9; Pines 2012, 21-39; 中国史学家周良霄描述了“中华帝国专制主义”的如下五个特征：大一统、高度集权奴隶式的父权统治、严格控制人民、反对工商业、以及全面的文化暴政(L.Zhou 1999, 304-52)。

世界(全天下)的所有人都统一到一个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如同所有的生命之光都来自唯一的太阳，所有的政治权力和司法判决都必须来自唯一的天子。所有人的生命财产，都由负有天命的皇帝任意处置，常常实际上由帝国官员乃至宦官们以皇帝的名义随时予取予夺。天子不仅征集和控制天下的财政收入，他也是不容置疑的中华世界里最大的财主和最终的地主。所有财产尤其是田产房地产，通常都直接或最终由皇帝以天下(全世界)之名义而拥有(所谓“公天下”)，但帝国体系的本质则是中国历史学者范文澜和易中天所说的“家天下”。最高统治者对所有财产和所有人都有无限的所有权和处置权，通过帝国法令去任意没收和重新分配任何财产都是常态。从秦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帝国/国家对厚利产业(从采矿、铸币、盐业、瓷器、酒精到后来的烟草)，以及重要的商业活动(如外贸和银行业务)的垄断是中华秩序的一大主要支柱。皇帝拥有着世界帝国，控制一切资源，随自己的意志而统治，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和反对。一元主义(monism)必须根除多元化(pluralism)[9]。

中华秩序的政治经济总体性，必然延伸到教育和文化精神领域。科举考试制度严格控制着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悠久的崇拜天地的自然宗教(通常与道教相关连)和崇拜祖先的世俗信仰(通常与儒学相关连)都被皇权征服和框定下来。事实上，如外国学者所观察的，中华本土的宗教信仰体系常常被消减、压迫，只剩对民间传说中财神的大肆流行和崇拜。自秦帝国以来所有的秦汉式统治者，都试图控制和整合那些外来的、教义精细严密、也更加自主、在政治上对秦汉政体不驯顺甚至具有挑战性的宗教信仰：佛教、伊斯兰教、较小的摩尼教、景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又名拜火教)-它们在同一个唐帝国时代都曾因皇家赞助而兴盛，又因帝国屠杀而衰败。后来，强大而异己的罗马天主教(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基督教新教各派和摩门教也同样地分别在明清帝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类似命

---

[9] Fan 1965, 206-36; Lin 1983, 11-30; Wittfogel 1957; Fan 1953, 46-59; Yi 2007, 204-14; Woodside 1991, 31–67。

运：从政府宽容甚至赞助，到控制和整合，到迫害乃至被根除。在受命于天的统治者面前，帝国自认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和公道的。以此之名，中华世界的官廷史学家和学者们常常从规范上、功能上乃至宗教和宇宙论上阐述、合理化并赞美中华秩序下政治主权的总体性和唯一性。中华秩序之下的中华世界，的确呈现着一种波普所论述过"不宽容者全面进攻"的强烈倾向[10]。

普世性(universality)

负有实行中央集权社会政治统一的天道理想，中华秩序是一种命定要统一整个已知世界的普世通用的政治秩序，即便只是名义上的假装的世界统一。用一些中国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大一统一直都是中华政治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准则，也是所有"中国统治者的神圣使命"。据信是诸葛亮作于公元 282 年的《后出师表》曾首次提出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该说法后来成为已神圣化的中华政治之道德规范。中华秩序的普世性还在于，无论汉族与否，任何民族的统治者只要能设法征服整个已知世界，并采纳使用同样的儒化法家秦汉政体，都可以成为中原乃至整个中华世界的天子。此即中华秩序之下的灵活变通的所谓"华夷之辩"。所以由非汉族"蛮夷"统治中国的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很容易就引用源自先秦的古代思想"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和汉族精英们的务实自保观念"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从而成为合法的中华天子[11]。

中华秩序普世性，在近代遭遇了一个有趣的深刻扭曲-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统治精英们对于来自西方的"蛮夷"，以及西方化的日本帝国怀有深深的疑虑和恐惧：这些强大的外来力量，不仅要接管统治整个中原乃至整个中华世界，而且会

---

[10] von Glahn 2004; Sima 11th century, V246; Wang 1940; L. Yu 2012; Bays 2011; J. Wang 2000, 340-43; Kissinger 2011, 5-32; Popper 1945, 226。

[11] L. Zhou 1999, 308; Y. Liu 2008; 雍正《大义觉迷录》(Yang 1944, 8-25); Hao 1260。

从根本上取代中华精英们唯一理解并珍爱的治理之道：即儒化法家的秦汉政体。这些新的征服者们，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他们在组织和技术各方面都先进太多；而相比之下，如郭嵩焘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绝望地看出，中原才是真正的野蛮或半野蛮，非常无能和落后。面对这样的挑战-不仅要灭绝一个王朝，而且可能要灭绝整个中华秩序，根除秦汉统治，亦即李鸿章称之为“三千余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张之洞等人明智而一厢情愿地号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用西方的技术去保存中华的精萃。还有些人选择了从汉帝国至清帝国都一直实践过的“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两种应对方式，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延续，至今依旧是首选的对外应对方案。在传统的中华历史里，包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历史叙事中，中华秩序的天下大一统的普世性，常常被拿来作为判断、赞誉乃至美化历史人物、政策和事件的最高标准，高于民族主义、善政、阶级利益与和平繁荣。相反，国际上共存平等国家间的比较和竞争，被认为是过渡性的、反自然和反天道的，因而是不可取的[12]。

然而，中华秩序的普世性在中华世界的历史上常常不是现实，而多为理想憧憬或者干脆假装如此。例如，满清帝国就曾绘制展示过宏伟壮观的“万国来朝”的想像图卷，供统治者和精英们自娱自乐。自秦帝国以来，中华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2,100 年的 66%)在名义上是统一的，但一个真正有效的中央集权世界帝国政府的统治时间至多也只有一半时间(2,100 年的 57%)。从历史记录比较可靠的公元前 841 年开始计算，到 1895 年日本战胜满清帝国从而终于彻底打破那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华秩序为止，有效的中华世界大一统的历史最多也就占总长度的 45%。以此衡量，大多数秦汉式帝国的统治者们都未能建成真正的中华秩序，因而是失败的领袖，更不用说用其他真正意义重大的标准如生命安全、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经济

---

[12] Guo 1879, 439, 444-45; Li 1901; Zhang 1898; F.C. Wang, 1998; Q. Ji 2008。

和文化的发展来衡量他们了[13]。当然，中华秩序无论是个有效的实际存在还只是个空洞的崇高理想，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人们心灵都有着本质上大体一致的影响，因为那些没有建成中华秩序但视之为最高使命的秦汉式统治者们，同样徒劳耗费自己与民众的生命、资源和时间。

中华秩序的普世性与它的总体性直接相关。中华世界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一个单一的统治结构，一套儒化法家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是一个普世的世界体系，因为它从根本上就无法容忍其他国家政权与之平等地比较和竞争。在其内部逻辑里，如果外部存在竞争对手和可替代力量，对这个儒化法家政体必然构成不友好、甚至令其无法安居生存的状态。结果是，这个秦汉政体的统治者要做出艰难的、不情愿的改变以求适应，尤其要在内部妥协、减少极权、变得更加宽松和包容(例如宋帝国)；或者建设军事上无用但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屏障如长城去加强中原的地理隔绝，排除掉那些不受统治或无法统治的人；或者像元明清帝国的统治者一样，干脆采取海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臣民与那些未知也不受控制的外人交往。因此，一个秦汉式帝国在它设法用武力、同化、或阴谋诡计，去征服整个已知世界之前，是无法长享和平的；或者它会精疲力尽，到达国力的极限，而不得不停息下来，假装此外再无有价值的(遑论更不相容的或更高级的)其他文明国家存在。于是，一个秦汉式统治者注定要把其人民闭锁起来，或者为了争当整个已知世界的唯一天子而拼搏至死(有时确实是如此)。追求中华秩序成为秦汉政体一个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使命，一个秦汉式统治者不可避免的命运，也常常是其悲惨甚至致命的诅咒。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确实很少有中华统治者能够逃避这种命运，或放弃追求中华秩序这个天命。

等级层次(hierarchy)

---

[13] Perdue 2015; X. Li 2014, 118-25。

中华秩序严格而僵化地将各民族、各群体和每个人都分出层次等级。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上一层，每个层次都有自己固定的角色、权利和职责。只有通过自然的年龄增长、帝国法令与任命，才能改变个人的等级。只有推翻特定的统治者，才能打乱、改变整个等级排序。如同异见学者戴震(1724-87)所揭示的，这种自上而下，出于控制和统治目的的社会等级体系，依靠残酷的武力和一套内化的僵化仪式来维持。像在一个扩大的父系家庭一样，个人作为儿子的权利和义务从道义上和文化上被合理化并固定，永不改变，直到他自己成为父亲和祖父。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中，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或权利，只有相对的自治和平等。天下没有人不受关系的约束，尤其没有人不受唯一的天子之统治。只有上级(最终是天子)可以随时、随意通过一个旨意提升或贬黜任何一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或者干脆从肉体上消灭他乃至其整个家族。既有的政治竞争，被扭曲为官员之间的互相背叛、坑害和角斗，以便从上级那里获得好处。然而很多时候，被神化的皇帝自己也并不自由，他受制于仪式和传统规则，受到皇室牵制，被内庭后妃尤其是宦官的阴谋所操纵；纵横交错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对皇权也有一定制约：帝国的统治精英们为了既得利益，时而会努力维护自认为“正确的”儒化法家统治方式，甚至为此冒犯皇帝[14]。

官僚层级的权力和生存全都掌握在上司(最终是皇帝)之手，于是制造出“官本位”这种深入人心的社会分层和文化规范，以及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所说的“官本主义”传统。中华秩序下的秦汉式政治由此产生了比一般宗教更为强大的“权力拜物教”或曰“权力崇拜”。即使在 21 世纪的中国，精英们和民众仍然顽强表现出有千年历史的人生理想，即所谓的“皇帝梦”和“将相梦”。在科举制度基础上，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僚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构成秦汉政体精心打造出的精英管理阶级，在

[14] X. Fei 2005; J. Wang 2000, 298-311。

社会政治和经济上帮助中华秩序实行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的统治治理。退休的帝国官员、想做官的地方人士(主要来自受过教育和拥有财富的家庭)，则构成地方自治的士绅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更进一步，废除了士绅阶级掌握的县以下的地方自治权，在其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官僚体系上。叠加起中央、省、地、县、乡镇、村社各个层次，使得其统治机构更加臃肿，成本更为昂贵[15]。

多重性(dualities)

中华秩序在实践中大体上分为两大区域：中原/中土或中国本土(其大多数人口属于汉族)，以及有许多非汉族民族居住的周边地区。在中原之外，治理的高昂交通成本、递减的资源、地理和其他地方条件的变化，都必然地限制了秦汉政体统治的力度和范围。于是，中华秩序往往有一个明确的二元性，有两种或多种统治方式。在核心的中原采取直接的帝国统治以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与人力；在中原之外的其他天下属地-包含地理上和族群上的偏远地区，则采用封建邦联(feudal or confederation)式间接统治结构。顺从的遥远的地方贵族们，则被纳入羁縻体系；一些附属国则进入一个具有不对称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朝贡体系。那些帝国没有统治到的地区，只要它们对中原的秦汉政体的影响是微不足道或者无关紧要，帝国可以干脆忽略；帝国还可以与远方强大的外国展开平等的外交乃至贸易往来，只要天子能在国内维持住其世界帝国天下一统的面子即可。

对于中华世界的人民尤其是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来说，中华秩序下他们的人身权利与自由全部都赋予了专制的皇帝。在

[15] K. Yu 2013,52-61; Y. Xu 2006; Dan 2009; X. Xu 2012; S. Fang 2013; H. Zhang 2015; 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Wang 1948。2010 年代中国一个典型的县政府就拥有 90 个“标准机构”、16 个“群众组织”、35 个“政府供养”的单位和 55 个“其他机构和办公室”，仅“主要干部”就有 200 多名(Nie & Gu 2016)。

19 世纪之前，对外移民，甚至只是从人口稠密的中原移往帝国控制力较弱的地广人稀的周边地区，都是基本上被禁止的。不在乎禁令的移民被当作奸诈的弃民，禁止返乡；敢于回来的移民一旦被抓获，即使是在比较开放、比较国际化、外国人也比较容易访问中原的唐帝国，也可能面临斩首处罚。除了汉、唐、明帝国初期的极少几次外，帝国统治者们几乎从不组织和赞助海外和陆上的考察、探险和远航。皇帝们从不支持任何他们不能控制的海外移民和殖民地活动。整个中华历史上唯一已知的独立海外华人殖民地，是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岛上，由来自中原的汉族“非法”移民所创建的兰芳共和国(兰芳大统制 1777-1884)。它从未被中原的秦汉式统治者们承认过，更不用说得到任何支持。当然，今天有些中国作家会演绎甚至编造一些兰芳领袖们是“爱国”的中国人，专注于在海外“弘扬中华文明”的故事。外国人也被禁止移入中原。那些来访的外国人(通常是得到特别批准或是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例如著名的明代耶稣会牧师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清代的耶稣会牧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则被禁止离开中原，终老在帝都北京。明朝晚期，菲律宾的荷兰总督为了镇压某次叛乱，屠杀了两万名汉族后裔居民。他随后向广东和福建的明代官员提出善后以及经济赔偿。一年后，来自明帝国皇帝的答复抵达菲律宾：既不谴责也不要求赔偿，明帝国反而送给荷兰总督两万两白银(每杀一个汉族菲律宾人一两)，以“奖励”该总督正确地“惩罚”了那些汉族“叛徒”弃民[16]。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秩序在中国人心灵里创造另一种扭曲的双重性，中国人变成一个暴君艳羡心理与奴隶宿命论的复合体，并在文化上内化、道德上合理化。中国史学家已经论及这种“皇帝意识形态”或者“天朝心态”，以及对权力与暴力的实用主义崇拜。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曾总结道:“宿命论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心理习惯，也是有意识的儒家

[16] Luo 1961; Reid 2008, 74–75; A. Huang 2009; Yunos 2011; Zhang & Zhang 2003; Yuan 2012, 174。

传统的一部分”；“宿命主义是个人力量和满足的一个重要来源，也解释了中国人灵魂的平静”。一位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总结道：中国的“自然哲学”就是一种宿命论，所谓“生死在天，富贵由命”。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中国人特别是有才干和有抱负的人来说，人生的选择和价值取向，要么不择手段地努力成为全能的独裁暴君，要么就争当一个忠心耿耿、无情无义的首席奴隶，不管心里其实是怎样的惶恐和欺瞒。一个鲜明的例证就是中国共产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对于不够强大的人来说，一种随波逐流的“顺生”哲学便深入人心，得到广泛实践。所有人都享有同样公民权利的观念只是一种会致命的异端邪说。因此，一些中国学者在 2013 年感叹道，在一个暴政专制政体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人格和素质”，从秦帝国以来，尤其是在宋帝国覆亡后“经受了不断的退化和腐败”，到元明清时期已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了；如果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人的人格和素质)也就没有任何根本性变革和改良的希望”[17]。

控制欲(control)

中华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必须高度依赖对人民和他们头脑的集中而垂直的控制。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写道：中华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秩序在整个文明里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一位研究当今秦汉政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欧洲学者发现:“控制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本质。...它控制，因为它必须这样做”[18]。秦汉式统治需求并发展了广泛而有效的各种治国方法，严格控制人们及其行为和移动：残忍地使用暴力，包括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酷刑和公开处决，实行国家对意识形态和历史修纂与教

[17] F. Zhang 2004, 228-32; Xing 2015; Lin 1936, 189; L. Li 2013; W. Gao 2003; Z. Zhang 2006; H. Zhang 2013, 73-77。

[18] Schwartz 1996, 114; Ringen 2016, 5, 15。

学的垄断；维持久经考验也至关重要的户口(户籍)和保甲(居民集体连坐)制度，压制甚至消灭大土地庄园贵族，以及任何独立于皇权的财富；利用科举制度；广泛的秘密警察及国内谍报网络；使用被皇帝集中垄断的"世界性"财富去引诱和犒赏忠诚者和举报线人。为了帝国的控制，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包括后裔和死后名声)、权利或规则是皇权不能动的。所有的私人财产可以随时被帝国全部没收。不仅是不顺从的行为，任何简单的观念分歧，甚至只是稍微不恰当、不讨喜的语言，都可能给带来九族灭门抄斩。如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说，中华秩序下的统治就是一个专制暴政，"其原则就是恐惧"。当然，因为技术、运作成本、各种人为的因素以及帝国官僚机构固有的低效和腐败，一个秦汉式帝国的控制权在实践中也会受到阻碍，其有效性和广度与深度事实上常常受到限制。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天高皇帝远[19]。

中华秩序下全面控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秦汉式帝国除了是整个世界最终的地主，传统上也垄断了重要的工业和利润丰厚的商业，从而控制那些可能与帝国竞争，乃至抵抗帝国政权的社会力量与资源。对外贸易(甚至内部的跨区域商业)也被边缘化、压迫和挤榨。从秦汉帝国开始，朝廷一般都拥有并经营矿业和铸币、铜铁采冶、制盐和贩盐、瓷器甚至丝绸行业。粮食市场，特别是跨地区粮食市场，基本上是国家的调拨和运输，如明清时期向北方供应帝国政府和军队的漕运。成功的商人们被迫或者被诱去耗散其资本，去购买土地和官衔，从而成为依赖皇室的土豪权贵，而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在明代，商人们通常需要支付 40%或更多的利润贿赂官员和皇帝才能生存。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徽商和晋商，基本上都是皇权的代理人：皇粮运输(漕运)的特许商、国家特许的盐业、以及有官府特许关系的钱庄票行。即使是特别鼓励私营工商业活动的宋帝国，依然竭力垄断盐业，扰乱市

[19] F. Wang 2005, 32-60; Montesquieu 1777, 175。

场。因此，秦汉式国家尽可能多地榨取农民和商人，把全世界的财富尽可能本质上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以支付帝国治理和其他非投资性花费。尽管中华世界曾经出现过许多超大型城市和重要的商业繁荣时期，但是在帝国的严密控制下，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启蒙运动，基本上都没有任何机会产生[20]。

虚伪欺骗和表里不一(hypocrisy and duplicity)

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基于两种看似相反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组合，加上其结构上与观念上的多重性，从而导致了中华的政治、社会文化中充斥着大量虚伪性和欺骗性。无情而高深莫测的法家，虽然残酷、崇奉暴力和狡诈诡计，但得到人性化柔性的儒家价值和口号的补充和修饰，二者合力产生了低成本而高效的集权专制统治。而大规模的操纵玩弄、极度的虚伪、表里不一与故弄玄虚也是必然的结果。儒家的人本主义价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完全反过来的世界帝国政治秩序之“天下定于一”，在同一本帝国经典(《孟子》)里似乎无缝连结，并行不悖。

当然，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类群体和政府治理，其统治者的官方言辞与实际行动之间总是会有一些不一致之处，在领导与民众之间也难免会有信息不对称。但是中华秩序下的秦汉政体，在其法家内核与儒家外形之间，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逻辑上和规范价值上的紧张冲突。它的世界性总体性特征排除个人的选择和自主权，从而与一个不受其控制的现实(帝国治外，“另类”的他人大有人在)常常互相矛盾。它僵硬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对虚伪、造假、欺骗及自欺都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需求和包容，甚至已经制度化。一个秦汉政体在体制规范上排斥务实精神、灵活性和妥协这些关键因素，因而难

[20] Z. Li 1997; J. Wang 2000, 223-265; Neal & Williamson 2014。

以实施良好而有活力的外交和国内治理；迫于实际统治之需，帝国上下只好几乎一贯地名不符实，言行不一地尽量灵活应付和务实办事。欧洲学者李克曼(Simon Leys)曾尖锐地评论说，极少有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在道义上和观念上如此全面地鼓励高度功利性的表里不一、装腔作势与故弄玄虚。海外华人社会学家周雪光甚至将名实脱节和表里不一称为中华世界里三大“帝国治理逻辑”中的两个[21]。

秦汉式统治者们把家庭式的人文情感标榜为其执政伦理，但却发明并频繁使用无数诡计、愚民牧民、大规模屠杀和一些人类历史上极不人道的酷刑和处决手段，如公开凌迟。官方推广的“二十四孝”，基本上都是不理性的社会、人身和精神控制，却假装是道德模范，导致了公然的欺骗，并因为不人道而令人厌恶。中华秩序下的官方话语充满了儒家人文主义的迷人口号，但实际行为却依赖狡猾诡诈和残酷武力的法家现实主义，二者的表里不一既令人咋舌又根深蒂固。在 21 世纪，一些中国学者如吴思将这种政治特征概括为由来已久的所谓“潜规则”至上的陋习。2010 年，一位中国学者认为，战国时代的《孙子兵法》，因描述如何使用各种谋略、去不择手段地打赢战争的饱受赞誉，实则总结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政治文化精髓，即所谓“斗争哲学”和“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22]。

广泛存在的表里不一和合理化了的虚伪欺骗，早已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揭示、贬斥或者赞誉，认为这种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是由中华秩序所塑造和哺育。明代异见学者李贽(1527-1602)就公开指斥过：中华统治者和精英们倾向于“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满场是假”。在英国受过教育的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1854-1921)在 1898 年感叹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马来西亚出生、受过西方教育的翻译家辜鸿铭(1857-1928)在他被大量引用的英文论文里，

[21] Leys 2013, 285-432; X. Zhou, 2014。

[22] Yi 2007, 151-53; Brook et al 2008; R. Li 2006; Wu 2001; 關於美國社會一些類似潛規則的“生活智慧”, 參閱 Greene 1998; L. Li 2010, xiv, 4。

认为“中国精神”有独特的“深度”和“广度”、类似孩童般的“简单”、“机巧而顺服”，服从“帝王神圣权利”统治下的集权等级制度，“极为冷漠务实，而不自省反思”。作为一个精通外文靠翻译引介为生的外籍华人，辜以一个大汉族主义狂热分子，并迹近为种族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如保留满清发型服饰、为纳妾辩护。他用现代语言巧妙构建的诸多例证比喻，恰恰反映了中华秩序下精致的表里不一与装腔作势的古老文化传统；他还试图论证这些文化传统是精英阶层的首选生活方式，是可以用来改善世界的处方[23]。稍后，留学西方的作家林语堂也用英文写道："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人的思想都深具劣根性；他们强调为了仅仅活命的“生存价值”而对权利、理想和真理冷漠；缺乏分析能力、科学观点和简单的逻辑思维，从而使得中国人的日常“活动降低到消化系统和其他简单的生理需要水平”；他们“缺乏社会心智”从而阻碍了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社会服务的发展[24]。八十多年后，中国大陆学者秦晖指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讨论一些虚假的问题”，用空话和欺骗来误导人民[25]。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学如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中华秩序下社会上和文化里都普遍存在的虚伪造假和诡计欺骗。曹雪芹《红楼梦》里的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就反映了中华秩序下这一文化特征的后果。中华民国时期的学者傅斯年曾将

[23] Li 1590; Yan 1895; Ku 1915, i-iv, 2-38,112。辜鸿铭的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曾长期受到批判和冷遇，但最近在“复兴中华文明”中获得认可；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也首次于 1998 年在中国(海南)出了中文版。依靠其西方教育和关系，特别是其英语能力谋生的辜，本身过着一个双重人格式的生活：他同时拥有两个妻子、欣赏女性裹小脚、在满清帝国崩溃后还长期保留满族发辫。到了 1920 年代，辜鼓吹一个新的“神圣使命”，即主张靠崛起的日本去抵抗西化和重新整合和复兴自蒙元以来在中国自身已经失去的“中华文明之精神”，因为日本人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中国人”(Ku 1924, 274-82)。

[24] Lin 1935: 42-75, 49, 53, 81, 86-91 & 169。林语堂用进口的思想和方法相当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也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甚至颇为赞许)，但与辜鸿铭不同，林自己过的基本上是美国或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25] Qin 1-19-2015。

中国文化形容为腐蚀人性的"中国灰水"。而台湾作家柏杨则有个著名的比喻，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大酱缸"[26]。

有效性(efficacy)

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的有形和无形成本都相当高昂。其有形成本包括沉重的税收、征兵与徭役负担；帝国官僚体系的普遍低效、无能和腐败；周期性的大规模破坏，大量人口的非自然死亡；以及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叛乱。其无形成本则包括压制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发展，以及无所不在的虚伪和造假。但是中华秩序确实也达到了人类政治组织的一个高峰，能够为一个广袤的世界提供相当有效力的秩序和集中化治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认为，对于统治精英们来说，中华秩序的官僚群体相对较小，还能够带来延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和平。其实费氏此论不确：帝国任命而付薪的官员只是庞大世界帝国政府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地方收入所供养的胥吏衙役，通常都不计入帝国官僚行列。而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些数不清的地方小吏、仆役和官员跟班掠夺无度，必然造成比文字记载更多、更昂贵的治理成本，也使政府难以将税收变成金融投资，增长其收入。帝国无数次的旨在减税减负的改革，结果都变成各种巧立名目的杂税丛生，反而使人民负担更重。广泛存在的帮会组织和秘密社团，如明清时期的各种江湖会党，表明了中华秩序在提供财产权保护、维护社会秩序和寻求司法公正各方面效率其实低下。然而，统治精英们对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全面接受，从而出现像明帝国那样的情况：虽然有着一些史上最糟糕、最懒惰皇帝的可怕统治，但官僚体系似乎像自动驾驶仪一般维持运转几十年之久。对他们而言，这个前现代的统治制度也许就是一个理想的、有效的、近乎完美的体系，确保他们能够有序而稳定地获得并长享整个已知世界的权力、声

[26] Fu 1919; Bo 1992。

誉和财富[27]。

中华秩序下秦汉政体的一个显著的力量，是它在文化与民族上的同化能力。中华世界里无数的不同文化、语言、民族甚至种族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帝国用武力强制、以及世界统一的儒家理想规范的强大社会化力量所消灭、合并或同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国的犹太人。有别于在全球各地千年不坠地顽强维护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其他犹太人群体，宋帝国时生活在中华世界的数量可观的犹太人社会，到明清时代渐渐和平地同化，消失在不断被重塑的汉族人巨大的混合基因池里。中华世界里的穆斯林是一个更大的族群，因为朝圣行为而始终与在中华世界之外的伊斯兰发源地保持联系。他们为秦汉式统治者们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并对中华文明有过很大的影响。然而他们有力地抵制了汉化或中原文化的同化。回族(汉族穆斯林)和各个非汉族穆斯林民族(主要在今天的新疆)，不仅设法生存了下来，而且保持住了自己的宗教文化，证明了中华秩序的文化同化能力是有限的。从历史上直到今天，穆斯林各族人民为抗拒秦汉政体无休止的血腥压迫，甚至种族灭绝而进行的反抗，是极为惨烈、极为昂贵的[28]。

持久性(longevity)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秩序在文化上深深内化，积累了坚实的合法性，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耐久力与后劲。它从多次崩溃中复活，甚至在漫长的宋代停顿之后也能复辟重建。中华秩序的耐久力和合法性在每次复兴重现后似乎都有所增长，并在18 世纪后期统治欧亚大陆东部广大土地上许多民族的满清世界帝国的“盛世”时达到巅峰。尽管史家已经证明那个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其实是充满了停滞、暴政、不公正、贫穷、苦难

[27] Fairbank 1983, 36–38; Wang 1973; X. Zhou 2014; Y. Yu 2006 & 2016。

[28] Goldstein 1999; J. Yan 2002; Pan 2004; X. Xiao 2007; Forbes 1986; Israeli 2002, 7, 60–66, 291–95。

和饥饿驱使的人食人现象。因为具有一个勤政、认真而精明的儒化法家的秦汉政体管理着整个已知世界，看起来中华世界的历史(至少是官修历史)似乎就此终结了。于是专制的乾隆皇帝(1736-95 年在位)，在无知地拒绝当时真正的世界强国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的同时，不无自得地自诩为所谓“十全老人”。剩下的唯一不确定的问题，就是皇位继承和所谓王朝周期了，这是残酷的权力斗争，决定谁究竟会成为胜利的赢家，即下一个真命天子继续天下一统的天命。富于持久性的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可能是一个探讨甚少的极佳案例，可以印证西方政治学家们近年来热议的一个政治逻辑，即一个腐败而糟糕的政权却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特定的胜利者和遴选者(selectorate)之联盟，长期生存下去，还后劲十足[29]。

在中华秩序下，只有极少的中国人曾经写过一些涉及非秦汉政体的异议文字，其中能够逃过皇帝们的焚书烈焰而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关于非天下世界秩序的议论文字则更为罕见。在明清两大世界帝国交替的战乱年代，出现了一些非传统甚至反传统、但被边缘化和压制的具有启蒙思想的汉族思想家。他们批判地审视了秦汉政体并提出了替代选择的设想。黄宗羲(1610-95)认为，秦汉帝制违反了“原始”自然规律和道德,“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1630-1704)则简洁明了地总结说“自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王夫之(1619-92)重温了先秦时代的个人权利和地方自治，呼吁“不以天下私一人”。顾炎武(1613-82)沿用孟子的传统观点，像启蒙思想家一样质疑中华秩序，认为人民的生活、福祉和权利而不是统治者的家族统治才应该是政治的中心，呼吁实行一种改良的先秦封建式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从而达到“众治”(迹近民主)而不是一人统治。然而，顾氏的著名论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却被从清朝皇帝到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统治者和他们的宫廷学者们篡改为

---

[29] Spence 1979; Yao1982; Kuhn 1992; 乾隆《御制十全记》1792; Morrow et al. 200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和世界的名义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支持某一政权[30]。只有在 1890 年代的清朝末年，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下，康有为(1858-1927)才开始主张“当以列国并列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出现摒弃中华秩序而接受多国共存世界秩序的观念。后来，康的学生和助手，影响巨大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梁启超(1873-1929)推广了“中华民族”这一词汇，鼓吹中国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益，并呼吁用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自由、科学和民主去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31]。

因此，尽管通过王朝更迭的极其昂贵的方式不断地复制与复兴(以及采用一些一时性的政策调整)，中华秩序碍难从内部自我革新。中国史学家王家范认为，中华世界里本土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批判，甚至是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那样最具革命性的敏锐见解，都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分析的深度、逻辑和眼光相提并论，更不用说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地中海-欧洲世界里的伟大思想家和政治与法律学者，从弗朗西斯·培根、大卫·休谟、约翰·洛克、马丁·路德、孟德斯鸠到让-雅克·卢梭，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华世界帝国里。对中华秩序下的各族人民来说，外部因素和影响就成了创新、变革和进步的主要(往往甚至是唯一的)源泉[32]。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论述的对于“市场经济大转型”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框架或“生产组织”(productive organization)，在中华秩序之下几乎不可能出现。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Friedrich Hegel)曾分析说，中国被锁在了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之外，即使那里的皇帝也不是自由的；只有外来人士也许可以帮助改变中国人的悲惨命运，使他们不会永远地“把自己卖为奴隶去吃奴隶制的苦面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

[3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17th century; 唐甄《潜书》1705；王夫之《读通鉴论》1691；顾炎武《日知录》和《顾亭林诗文集》17th century。

[31] Kang 1898, 62; Liang 1929。

[32] J. Wang 2000, 282-91; Elman 2009。

Smith)在 20 世纪前夕总结他的第一手观察时写道："中国永远不能从内部(自己)改革。…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被接受进入各国的国际家庭，而是不受限制的货物和观念的对外自由贸易"以及"从外部来的某种(推动)力量"[33]。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以来，外来影响的确给中华统治精英们带来了许多干扰烦恼、颠覆破坏，对普通人民来说则常常意味着流血和灾难。因为秦汉式统治者们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员民众去拼命抵抗那些不受欢迎的外来影响。实际上，这些外来影响大多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良的强大力量，但常常是陌生的和异己的，突然出现时，自然而然地会激起一些本土的民族主义本能的反感和对抗情绪，而秦汉式政体统治精英们几乎总是自私和邪恶地煽动、操纵和利用这些情绪，维护他们只有在中华秩序下才能最大化的特权。

中华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比较

人类在地球上的几个平行世界里，各自生活、演化了许久。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之前，这些平行世界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来往。这其中，两个独特的世界，即分布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华世界和地中海-欧洲世界，分别发展为所谓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西边，地中海-欧洲世界在政治上从长期的分立，演变为罗马相对短暂的世界帝国统治即罗马秩序(*Pax Romana*)，其后又是长达千年的政治分立，然后在 17 世纪正式在法理上进入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在东边，中华世界也大约在同时从长期的分立发展到秦汉世界帝国，随之而来的是反复多次的统一与分立，最终进入不可动摇的、由单一政府主导的中华秩序世界统一的复兴，直到 19 世纪，中华世界帝国在被不断扩张的地中海-欧洲世界撞击而粉碎。作为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中华秩序与罗马秩序不同的是，前者有

[33] Polanyi 1944; Dwight and Hawthorne 1899, 101, 138; Smith 1894, 324-26。

着强大的持久后劲，以及非凡的復辟能力。

地中海世界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意大利的一些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在罗马帝国时期，它实现了一个由单一世界帝国主宰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也曾经出现十分短暂的统一世界的尝试，即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征服大军。罗马秩序始于公元前一世纪末，其后达到顶峰，统一整个罗马人的已知世界，其版图西起不列颠群岛，东到中亚和北印度，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北达波罗的海。罗马秩序统治了这片巨大而充满活力的地区，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多元、多种族、多语言的众多人口达数世纪之久。然而，罗马世界里的各族人民，特别是意大利半岛上的拉丁各部落和拥有特权、经常生事的罗马城公民们，继续保留他们多元的、封建式的、受法律保护的各地独特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传统与文化观念。宗教势力以及大地主、富商和雇佣军将领们都大致保持了他们对于帝国政治权力的自主独立性。就算是强大的罗马军团，也从来没有完全摧毁征服过整个已知世界里的所有对抗力量，如高卢人、日耳曼人、撒克逊人、波斯人或小亚细亚各地的统治者。这些反对力量几乎一直在挑战、渗透并削弱着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们也从来就没有像秦汉皇帝们那样，完全地控制或统一整个已知世界。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地中海-欧洲世界的一些重要的生态地理、人口和历史特点，导致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5 世纪崩溃后，罗马世界秩序再也未能完全复活。

罗马世界帝国被长达一千多年的事实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关系所取代，然后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系统在法理上正式确立。罗马世界的各族人民和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知识、法律规范、艺术和语言等等，在欧洲、中东和北非生存、发展。后来，这个不断演化的西方世界通过火与血的扩张过程，征服了许多其他人类文明并殖民于其他平行世界：美洲、南亚和东南亚、整个非洲和大洋洲。到19 世纪末，植根于希腊-罗马-欧洲的世界秩序。即经过多次战争与革命所塑造和强化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终于统治了真

正的整个世界，即全地球。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8 和 1937/9-45)和一次冷战(1947-91)的炼狱之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进一步发展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成为全人类的世界政治制度[34]。

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成员是多样性、各自拥有独立平等的主权，故这一秩序并不保证所有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都实行同样的的社会政治理念和价值规范。在进入 21 世纪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制度和规范，在全球 200 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实施的程度大不相同。而各个国家在政治治理、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各方面自然也差异很大，使得它们看起来属于许多不同的世界：从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到专制独裁政体以及政教合一国家，从极度富裕到赤贫、甚至失败崩溃的国家，应有尽有。各国之间的力量分布与平衡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只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原理得到遵守和维护，这个世界秩序就依然完好无损。外交、贸易、移民、冲突、偶尔的战争，甚至大国霸权的兴衰交替，都在维护着这个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并促成和维持极为重要的各国间的比较、合作与竞争。同时，外部的国际政治比较和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并强化各国内部的政治比较和竞争。目前，由全球即日运输和瞬间通讯联络所驱动的全球化，正在深刻地重塑人类文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前景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种族、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全球精英群体，导致全球价值规范的出现，可能意味者一些巨大的新动力和新动机，而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16 个世纪(法理而言则是五个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多项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急需处理，而这现实需要又与进步说法相契合，故此国际社会可能在政治发展上越来越接近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甚至是单一的世界政府。

[34] Blanning 2008; Ikenberry 2011。

中华世界是从欧亚大陆东部的许多古老文明演变而来，主要源于先秦时期的中原/中土(Centralia)或中国本土(China Proper)。公元前三世纪，中华世界比地中海世界稍早些实现统一，秦汉世界帝国以及中华秩序也建立起来。就像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一样，秦汉帝国也自然地寻求帝国扩张，征服并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然后陷于惨烈的崩溃。与罗马帝国极为不同的是，秦汉帝国经过一些相对短暂的分裂或事实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时期后，得以复辟、延续和改进。宋代，那颇有前途、法律上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澶渊国际关系体系破灭之后，中华秩序再次更加强劲地复兴。元明清三大帝国统治(或者至少假装统治)了整个已知世界，直到 19 世纪末，中华世界被强行并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西方全球秩序为止。

在中华秩序下，整个世界天下一统，严格地、通常十分残酷、但有效地推行了一套基本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两千多年里，无论其种族、民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在中华秩序下几乎所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都是同一套儒化法家思想。社会政治等级和分层、治理方式、意识形态和资源分配等各方面的中央集权、单一性、总体性和一致性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实施。只有因为地理和距离因素、不同统治者的能力和理念而采取封建-邦联式羁縻统治方式，或者采取更加虚有其表的朝贡体系，才可能会减缓、扭曲甚至阻止世界帝国在欧亚大陆东部各地区强加的同化压力。世界帝国外部的比较和竞争都必须被粉碎、控制、隔离或者视而不见。政治上的平等伙伴和反对派都是不被允许的，民众基本上没有移民或者外逃的可能。因此，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结构上和观念上鼓励国际比较、竞争、贸易、战争、移民和殖民、求异和创新不同，中华秩序全面地贬抑商业，阻碍甚至禁止外贸和移民，几百年如一日地压制、甚至泯灭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化与创新。

若干因素决定了中华秩序在中华世界的巨大持久后劲和异乎寻常的复兴能力：生态地理(地形和地理位置)、人口(一

个相对同质同文的农耕汉族作为大多数人口，对应少数游牧部落)、历史(封建制度、私有产权和法律传统的削弱乃至缺失)、文化(国家政权垄断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历史修撰)、某些重要领袖的人格特质和愿景等随机因素、以及在关键时刻的一些纯粹运气和意外(如项羽的失败和蒙古人的成功)等等。统一的帝国意识形态-表里不一却高度互补的儒化法家(儒表法里)，更是至关重要。政治语言的扭曲，一开始是专制统治者有意操纵推行，但后来高度内化于民众的心灵中，而这影响深远：唯一的专制统治者被模模糊糊地等同于政权(state)、等同于国家(country)、民族(nation)和世界(天下)，再等同于天道、天意(大自然或上帝)。于是，人民是为了中华秩序而生、而劳、而死，而不是反之。在汉语中，政权和国都写成国家(国和家 country-family)，而天下一词则含混不清地意味着整个国家以及世界范围的政治制度。秦汉式政体的极端实用主义(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导致压倒性暴力与所谓"辉煌的欺骗"之间持久而有效的结合，于是形成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在 1922 年所写的，"异乎寻常的无知与异乎寻常的罪恶，彼此结成一个强大且灾难性的联盟"。技术性的新措施和改进方法，例如户口制度和科举考试，也是意义深远。此外，中华秩序实践中的整体性和普世性，也排除了替代制度、比较选择和退出逃逸的可能，历经许多世纪，就有力地形成了持久的合法性、不可动摇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高度内化的文化认同。中华秩序之下自然而然地会发生频繁而暴烈的社会抵抗和叛乱；但这些叛乱被精英和民众所共有的思想心智深刻塑造并严密束缚着，无法在制度上有什么创新或革命性成果。正如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早已总结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世界)统一持续到现在，如果英格兰、法国、德国之类的单独政治实体没有出现，那么欧洲就会像今天的中国一样"[35]。

---

[35] Chesterton 1922, 4; Hung, 2011; Pye 1993, 130。

完美而昂贵的专制统治

贵族统治甚至专制统治不一定必须是世袭的，比如神圣罗马皇帝、许多其他专制政权包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需要"选举"。然而，世袭的专制统治，往往比不世袭的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对世袭和非世袭的专制统治精英而言，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尽管有其种种高昂的代价，仍是一个理想的、接近完美的统治制度。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华秩序的天下一统之天命，不断地推动着中华世界里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精英去建设、重建和维护这个单一的秦汉世界帝国体系。中华秩序及其基础的秦汉政体，已经由历史证明能够不断地自我维持，并持续久远。这是一种可预测的、有效的统治方式。只要它那不可根治的官僚腐败、不可避免的非理性专制、时常出现的无能甚至是疯狂的皇帝、不断的叛乱，以及常有的外部入侵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则这一统治制度几乎可以"自动"运转数年乃至数十年。即使一个特定的王朝崩溃了，人们也可以预见：随着新皇帝和新统治群体的出现、"世界"人口的大幅减少、以及可能的更大的版图(尤其是当新皇帝是外来征服者，从而为新的世界帝国带来更多的土地時)，中华秩序将会复辟，一切重新开始。臣民们愉快地服务于新的统治者，即使他来自外来族群，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很少会成为法律或者道德问题，而令中华精英们过于烦恼。历史曾反复证明：大量的汉族人曾帮助过蒙古人毁灭汉民族国家宋帝国；帮助过满洲人消灭汉民族国家明帝国；帮助过日本侵略军打击汉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最有名的案例应该是冯道(882-954)：他曾在包括辽帝国在内的五个连续朝廷内做高官，服务于相互竞争的、不同民族，分属八个皇室的十个皇帝，同时还享有相当不错的政绩口碑[36]。

在中华秩序下，中央集权的政府得以大量汲取、利用整个已知世界的财富，严格控制和大规模地集中动员和征用各种

---

[36] Fairbank 1973; Pye 1992; G. Wang 2006; Jin and Liu 2011; Xu 954,16-17; Ouyang 1053, V42。

人力物力，基本上毋需考虑、甚至可以完全不顾人民的权利、福祉乃至死活，从而变得超级富强有力。作为单一政治实体，面积广阔的中华世界确实在许多世纪里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于是秦汉统治者们可以相当迅速地完成一些规模宏大、奇幻昂贵、甚至难以置信的建设项目或者炫耀性工程，如开凿大运河(或可包括当今中国的高速铁路网)、建设庞大的都市和豪华宫殿、兴建无数的如同城市一般巨大的帝王陵墓和各种纪念工程、修建长城(在军事上其实毫无用处)、以及资助内陆和海上探险考察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徒劳无益)。统治精英们很容易就通过合法手段，或者更常见地通过贪污腐败和寻租行为，使他们的个人和家庭的权力和财富最大化。从来都是占人口比例极少数(一般不超过 1%；即便是在官僚人数极度膨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超过 3%)的特权统治精英们，享受着整个已知世界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和好处。例如，在 201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到总人口 3%的官员们仅仅在公费餐饮、公费旅行与专用车辆上，据说就花费了全国财政收入的 11%，而他们的薪酬、福利和大量腐败收入尚未计算在内[37]。

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下的统治精英们，可以拥有当时技术和人类想像力所能达到的、各种独占而铺张无度的奢侈享受，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和娱乐服务，包括一些奇异精致(往往营养与医疗价值均很可疑)的昂贵美食和神奇滋补品、耗费巨大(并不一定舒适)的精致花园和住所、极为精美(常常只具装饰和炫耀功能)的手工艺品、社会精英通常都有的众多妻妾、夸张过份的奴婢伺候服务，以及来自远方的异国贡品和商品。中国美食是世界上口味最丰富、样式最多、最精致的饮食之一。但这其实颇为讽刺地反映了中华秩序下食品长期短缺的历史事实，所造成的人们对于进食行为的普遍痴迷(参阅本章以下几

[37] Maddison 2007; G. Yuan 2007; L. Xu 2013。

节)、在饮食上无节制地追求豪华、摆谱和新奇[38]。这些豪华生活与奢侈品，通常有害于那些纵欲精英们的身心健康，也不能产生有收益的社会投资，遑论推动经济技术创新、形成市场化的大规模生产。不过，中华秩序下精英们的奢侈任性的生活方式，还是吸引各种各样的人趋之若鹜。17-18 世纪日本的一些统治者，就曾试图在日本世界里也建构一个类似的日本版中华秩序[39]。

虽然就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立场来说，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统治方式，；但它作为一种前现代的(premodern)社会政治制度，其实有着其深刻的结构性缺陷。它从根本上缺乏有效的政治和行政问责制度(accountability)从而在政府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带来持续的低效、广泛的不公正、以及无可救药的腐败和寻租(rent-seeking)行为。这也是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曾经分析过的所谓“自然国家”：它垄断一切，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系统地压制和扭曲竞争，从而扼制创新和效率。互相矛盾但又互补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确实给专制皇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个人权力和可操作空间。但将一切权力都高度地集中于一人之手，没有制度性和意识形态的法治(rule of law)框架，就不可避免地将整个世界置于难以预测的个人意志之下，并且面对非常危险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权力继承问题。该制度缺失的另一个关键性机制，是它难以和平而有效的自我纠正。要获得有限的新思想和新政策，唯一途径就是极不确定而代价常常十分昂贵的，由死亡、暗杀、政变或者叛乱导致的统治者的替换[40]。

中华秩序因此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必定迈向周期性、不可测的、“全世界”的政治停摆、崩溃和重启。僵化腐败的统治

---

[38]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红楼梦》里描述的烹制茄子的食谱(Cao <1791> 2008, 547-59) 。关于当代中国的一些极端而昂贵的“美食”(如活猴脑和流产的人胎儿), 可参阅 Liao 2002 V1, 9-11。

[39] J. Wang 2000, 234-38; Toby 1991; Arano 1987.

[40] Feng 3-13-2014; Hong 2014; North et al 2009,41-45。

必然会带来极为痛苦和代价高昂的王朝更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增长、经济停滞不前，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力学逻辑，注定摧毁每一个强大的秦汉式世界帝国。而中华秩序的重启与复兴，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动荡和破坏，即所谓天下大乱，只有通过巨大的、难以想像的大规模人口死亡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学者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关于一个封闭社会里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发展，从而会带来大规模死亡的噩梦般论断，在中华世界里曾多次应验。中华世界里的各族人民由于中华世界帝国的崩溃，或者统治者的重大失误，确实经历过多次的大量人口削减。19 世纪里一场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军运动，在十年内就消灭了近一亿人口，占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泽东时代的一场人为大饥荒，在四个和平年间(1958-62)就造成了三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人的死亡，占到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41]。

其实，中华秩序之下的秦汉政体的精英阶层也是深受其害。中华秩序下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都以帝王的个人暴政为特征。平均每隔 12 年就会以高昂的代价、经常是血腥的动荡方式更换最高统治者。一位中国史学家总结说，这些专制帝王大多都是“腐败、虐待狂、愚蠢，或未成年、有病、无能的”。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在上司面前，精英们几无人格尊严和个人安全。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恐惧中，害怕各种叛乱与阴谋,以及上司(最终是皇帝)那些司空见惯但又难以预测的愠怒。皇帝一时的脾气就能剥夺任何一个精英的一切，甚至包括他整个家族成员的性命。更糟的是，在中华秩序下，基本上没有地方可以避难，躲过皇帝的一时不悦所带来的雷霆惩罚。等到君主气消后，所谓平反昭雪对已经被砍掉脑袋或者一生被毁的人来说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有详细记录可寻的明清帝国时期，内阁大臣们往往把每一次例行上朝，都看作是可能会被皇

---

[41] 数字参见: Spence 1990, 165–93 and 1996; Pan 2000; Jin 1993; Ding 1991; R. Li 1999, 76–85; J. Yang 2008; Dik.tter 2011, xi, 169; Manning and Wernheuer 2012。

帝羞辱处决的时刻。无视臣下生命财产的帝国专制统治，还常常被人格扭曲的宦官暴政和秘密警察推至极端。统治精英们享受放纵和奢侈，对他们的下属行使专制权力；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根本上缺乏尊严、自由、公平和安全。对人数更多的中低层官员来说，顶级精英们的奢侈和权力毋宁说是诱人幻影而已。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对下属和民众专横霸道，另一方面又被上司无休止且不人道也无自尊地奴役着，这样的生活恐怕难以有什么真正的愉悦可言，甚至会令有良心和良知者人格分裂。明朝知识分子袁宏道收辑的 17 世纪中华世界里中低级官员、文员的私人信件，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些人可怜可鄙的生活[42]。

而皇帝自己，也得为理想的秦汉式政体暨中华秩序付出高昂代价。他们的日常生活僵化死板、令人疲惫不堪，而且也不安全；有些皇帝为了逃避巨大压力而寻求放纵损害健康。中华秩序之下的皇帝是最令人羡慕但也是“最不幸”的人：他们被注定“在人生中只做两件事：夺取和保住皇位”。根据比较可靠的数据计算，尽管拥有当时最好的营养供给和医疗条件，从秦帝国到清帝国的 209 位皇帝的平均寿命也只有 39 岁，比普通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还要短 10 到 18 年。中华历史上各个帝国或政权的 611 位统治者中，有多达 44%的死于非命，如被暗杀或被处决。大约四分之一的皇帝们患有神经或心理疾病。中华历史上充满了皇室内部的暴虐行为和谋杀故事，以及彻头彻尾的偏执狂和疯子帝王形象。许多曾经强大的世界统治者及其人口众多的皇族(经常多达数万乃至十多万人)，在他们的王朝崩溃时常常会从肉体上被彻底消灭[43]。

不相兼容与长期停滞

秦汉式世界帝国之上的中华秩序在制度结构上和思想观念上，既与独立思考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也与以个人决策为

---

[42] L. Zhou 1999, 200; Yuan 17th century。

[43] H. Zhang 2012, 1; H. Zhang 2007; Bo 1979。

基础的市场经济、基于人权的公民社会和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社会不相兼容。如果没有外部的挑战、竞争和替代，中华秩序会持续复制下去，通过代价昂贵的血腥的周期性更换统治者和大规模消减人口去重建和复辟，令一个伟大的文明和许多伟大的民族都似遭天谴般地坠入无休止的停滞、专制暴政和大规模死亡的循环之中。它系统地剥夺民众的人权、财产权利乃至生命安全，维持一个次优化的生活水准，给整个已知世界都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而长久的停滞落后。这些都是中华世界里各族人民为一个高度统一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以及极少数统治精英的极度放纵奢侈，而承担的巨大代价。一方面是科技和经济的停滞，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世界一统的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中华秩序因此不可避免地充满持久的社会紧张、政治混乱和人道主义灾难。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学者似乎也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并非常隐晦地指出，中国社会的长期国际"孤立"及其"随之而来的落后"和长期的政治大一统不无关系[44]。

因此，中华秩序是欧亚大陆东部走上长期停滞、物质与观念均极度贫困的特定历史道路的一个决定性的系统因素。中国的一些史学家如杨师群也已经意识到，中国一直落后和贫穷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是如中国共产党官方宣称的只是缺乏先进技术，即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论，而是中国长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里的"坏基因"。这些坏基因似乎还继续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北京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 2015 年公开表示"今天中国 60%至 99%的人仍然没有把自己当人"，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个人尊严和思想市场，也没有思维和表达的自由[45]。当然，如果把中华世界里所有的问题只归罪于中华秩序这一个原因，可能会是过于简单的单一因果关系还原论(reductionist)之误。但从长远和宏观上看，这个世界性的结构因素应该是个关键。

---

[44] 例如 F. Wang 2006。

[45] S. Yang 2012, i–ii; W. Zhang 2015。

事实上，用比较研究的眼光来看，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帝国似乎在不同的种族、文化和历史背景下都会造成长期的社会经济停滞，比如中美洲文明、印加文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上的垄断损害效率和创新[46]；政治上的垄断带来腐败和无能；观念上的垄断则毁掉人们的思维。而在世界范围内，在上述三个领域里的全面垄断则是最糟糕的局面。

如本书所显示的，与中国的官方历史叙事相反，中华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有三：一、秦帝国统一中华世界之前的几个世纪；二、中华世界里各族人民背离中华秩序近三个世纪的宋代；三、19 世纪晚期中国被迫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关系以来的一百多年。通常被忽视和鄙夷的、被视为天下“大乱”时期的三国和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代(184/220-589)，在经济、文化和技术各方面根本就不是一团黑暗。这个时期类似战国时代，同样具备政治分权和竞争，封建主义和文化多样性得以复活，不仅留下极为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如著名的三国故事和魏晋风骨，还如中国史学家易中天认为的，奠定了随后隋唐帝国早期文化成就的基础。中华世界分裂期间常见的混乱和生命财产的损失，其实应该是中华秩序造成的后果，而不应该成为支持重建中华秩序的理由。这些破坏与屠杀是中华秩序所制造、积累并放大的社会不公、无能统治、经济技术停滞、财政赤字和种种失衡(主要是人口-资源失衡)的必然的周期性的大爆发。除宋代之外，官方史书所称赞的汉初、唐初、明初以及清初的所谓盛世的出现，其实是当时还处在事实上的非天下世界秩序之下的结果，中原与中华世界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国家，依然还有着良性的外部竞争、互动和交流。那些伟大的世界帝国在它们终于设法强行摧毁或者排除了外部竞争对手，巩固其完整而密闭的中华秩序后，就都迅速地衰落了[47]。

传统上中华秩序备受称赞的一个重大优点，是它消除了

---

[46] 有关垄断负面作用的理论，参阅 Stigler 2008。

[47] R. Huang 1997, 74; Yi 2007, 103-04; G. Zhang 1995 & 2008。

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借以发动战争的原因和能力。关于政治秩序与世界和平的类似看法，今天在世界各地仍有不少共鸣。有些学者就假设，一个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政治集权，会带来更多的和平和进一步减少战争死亡人数，因此帝国霸权式的世界政治秩序，会在总体上大幅度地减少战争。美国一位畅销历史书作者就宣称:“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实现和平”[48]。然而，中华秩序之世界政府独特的长期实践，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记录:与先秦和宋代的国际关系非天下制度相比，天下一统的政治制度没有促进和平，也没有减少破坏。它只是将竞争激烈但是大多限于解决争端的国际竞争和战争(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澶渊体系等国际关系体系的法律框架下，尤其如此)，转变为杀戮无度和更具有破坏性的内战和叛乱。虽然世界帝国统治者可能会比较容易集中“全世界”的力量去镇压叛乱而生存下去，但这些内战和叛乱，基本上是缺少限制也没有底线的，可谓是绝望的、生死拼搏的全面战争。所以，随着中华秩序的巩固和走向巅峰，中华世界里的战争和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其实都大为增加(图 4.1)。1850-64 年的一次太平军叛乱就造成了一亿人丧生，超过了 20 世纪世界各国所有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以总人口死亡率计算,在 20 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十次战争中，至少有五次发生在秦帝国以后的中华世界。中国在 1946-76 年三十年间死于内战、清洗和大屠杀的人，要比中国在 1840-1945 年这百年间死于所有对外战争的人还要多[49]。

当论及中华秩序对战争可能性和结果的影响时，也许更具悲剧性。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战争在历史上可能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副作用，如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进步，使得人类最终在总体上更加安全、也更加富裕[50]。而在中华秩序下进行的越来越多、日益残酷的全面内战式战争，

[48] Elias 1994, 183-438; Gat 2006, 401-42; Morris 2014, 18。

[49] Ge and Cao 2001; Pinker 2011, 图 5-3。

[50] Gat 2006, 445-673; Morris 2014,3-26 。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血腥地消减了本来就无法自我维持的庞大人口而已，周期性地重复决定谁是胜利地统治整个天下的真命天子。千百年间，与军事有关的技术、观念、组织或管理各方面的创新都是微乎其微。这些残酷战争没有建立有意义的海外殖民地，也没有获取多少有实际利益的土地和新资源。从秦帝国到清帝国，人民主要的居住地中原即中国本土，其基本面积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非汉族世界帝国如蒙元和满清带来的中原之外的广袤土地如满洲(东北)、新疆和西藏，也是直到近几十年才变得有利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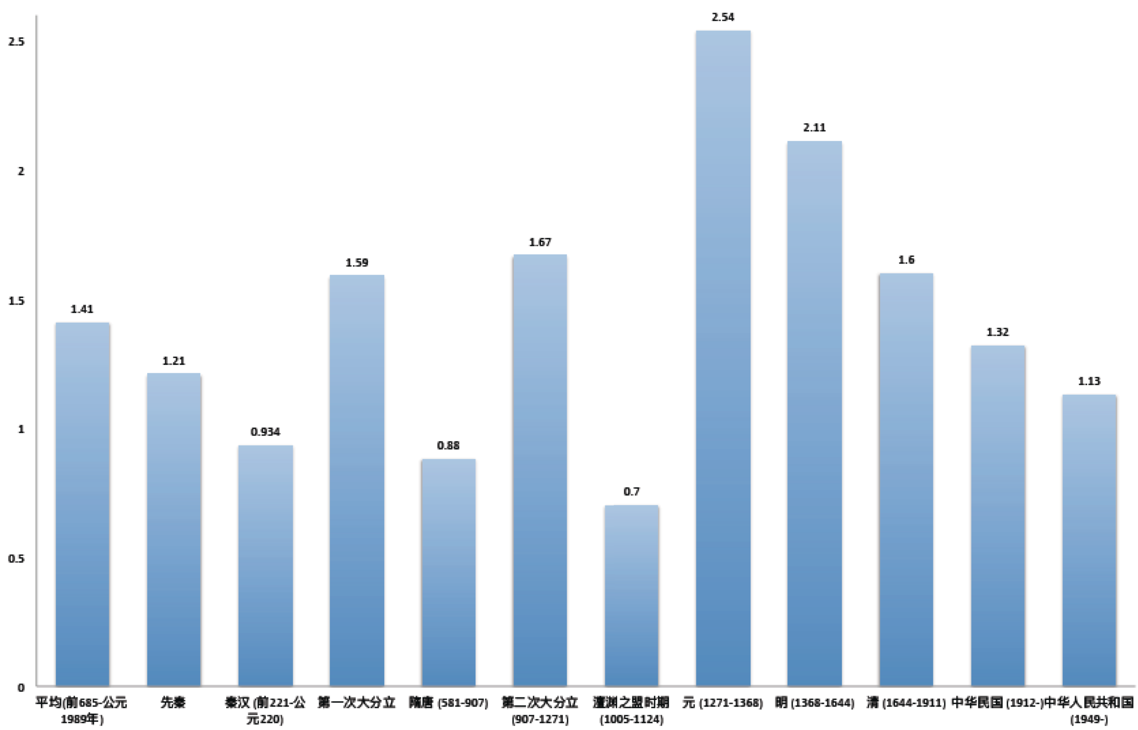


图 4.1。中华世界历代的战争频率。(来源：本书第一章之表 1.2)

在中华秩序下的秦汉政体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压缩成皇帝和精英阶层对民众的完全统治。先秦重要的法家政治家管仲在经典的《管子》一书(几个世纪后，由汉帝国的官员学者所编撰)，简明扼要地宣称了儒化法家的一项重要驭民术：在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要限制、减少，甚至剥夺人权、民权以及民众多余的财富。君王暨官僚们要像放养牲畜一样地

对待百姓、巧妙迎合和操纵、善加利用；如有必要，则予以压榨和屠戮。本书第二章还介绍过另一位先秦法家政治家商鞅关于愚民牧民的一整套冷酷而直白的理论。用海外华人哲学家牟中三的话来说，中华秩序和秦汉政体都是低劣的用来“管治人民的方式”而不是更优越的“为了人民的政治方式”。皇帝任命官员们的头衔，常常明确展示了为帝国蓄殖并牧养人民的意图，如“州牧”或“太守”之类。儒家的粉饰性学说将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加以软化，百姓被描绘成君王的永不成熟的孩子，需要被帝国拥有、关照、控制、灌输和驱使。因此官员们会被称为“父母官”，对他的称赞语则是“爱民如子”。基于灌输，中华秩序下的人民也常常相信皇帝及其官僚们保育和喂养了人民，而不是反之。这种因果颠倒的信仰强大而持久，首先出现在儒家经典如《大学》和《孟子》中，后来被重复了无数次。在今天中国的官方新闻报导中仍然经常引用。像畜牧业一样，秦汉政体建立中华秩序的一大前提，就是要维持、养育和增长其人口，而不是让人们的生活充实丰富，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更多地实现他们的潜力。中华秩序的确可以相当成功地，有时连续几十年大幅度增加其治下的人口，然而民众们都只被“赐予”农业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仅供维持其生存和繁衍。保持民众穷弱而无法独立，还被当作是治国安邦的要义；帝国必须将民间的能者、富者都招安网罗和控制起来，否则就要像剪羊毛乃至宰杀肥羊和“枪打出头鸟”一样地将他们削弱或消灭。一些当代中国学者认为，那些牧羊犬一样替皇帝看管百姓的官员们，更像是轮换看管羊群的饿犬甚至野狼，不可避免也不可阻挡地不断鱼肉百姓，形成制度性的贪婪、腐败、与盘剥[51]。

秦汉式政体是为了统治者而统治人民的，类似于许多其他启蒙运动之前的政治制度。这些前现代政治制度不是首先为了保障民众的秩序、安全和公平正义等等需要去行使公众认可的公权力，而是异化背离了民众所需，把帝国的威权和无止境

[51] Guanzi, V1; Mu 1991; Pan 1983; M. Zhang 2006; Yi 2007, 163-93; Hong 2014。

的汲取资源本身变成了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治理所需的手段于是取代了政治原本的目的。不像罗马帝国之后的地中海-欧洲世界里事实上和后来法律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中华秩序消除了国际竞争和比较、排除了人们的选择和移民；限制了贸易、对外交流以及探索；并制造了一种剥夺竞争精神和探索冒险的自我孤立状态。它阻止了先秦文化的复兴、摒弃了宋代的历史教训，也排除了本土起源的启蒙运动之可能。在这种被巩固了的非自由(illiberal)社会政治秩序下，政治民主、人权保护以及法治(rule of law)也就不可能在中华世界里产生并得到繁盛。欧洲政治理论家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过一个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即"为什么一个人要服从另外一个人"，对此，中华秩序下唯一许可的答案就是：因为帝国肩负有统一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天命，这是不可争议，也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天子统治下实现"天下为公"和"大同"与"和谐"。然而谁都知道这些是虚幻的旗号[52]。

也许更不幸的是，不仅破坏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停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步，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还系统性地阻碍和惩罚(通常意味着肉体消灭)几乎所有的独立思考、探索发现、试验与实验。它限制并阉割了教育，压制甚至熄灭了新思想新技术的火花，因此窒息了在所有领域里的科技发明和创新，从而避免对传统和政治现状有任何影响。这使得中华世界的技术进步微乎其微，导致经济效率十分低下，从根本上阻碍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从宋代到 20 世纪的超过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华人，在哲学、科学、技术、医学等等每一个领域，居然未能有任何创新和贡献。在任何一个像样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关于技术方面的展示，尤其是从秦帝国(特别是宋代以后)到清帝国使用过的农具，都生动地揭示中华秩序下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各个朝代和各个皇帝先后登场，但是"没有留下文艺复兴，没有

---

[52] Berlin 1952, 6。

带来启蒙运动，没有开启工业革命”[5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亚大陆西部在一个事实上尤其后来法律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之下，开始了启蒙运动、科学和工业革命、宗教和政治改革、以及地理大发现和扩张。当宋代的各种创新到 14 世纪的元帝国中期终于被耗尽后，中华世界里再无什么原创思想和科技创新，形成了所谓的“中国谜”或“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能如此长久地几无创新、没有进步。本书分析的这些制度结构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华世界只能出现没有技术进步所支持的经济扩张，即所谓“仅有数量增长而质量停滞”[54]。一组中国学者 2014 年发表了他们关于公元前 3000 年到 2012 年人类科技发展史的量化研究，其结论如下[55]：

> 中华世界有史以来的主要技术创新占人类主要技术创新总数(1,235)的 5.8%;而美国占 34.9%，西欧占 31.2%，中东占 8%，南亚占 3%。中华世界有史以来的科学发现(5 项贡献)占人类科学发现总数(515)不到 1%；而西欧占 65.5%，美国占 18.2%，中东占 4.5%，南亚占 3.2%。
>
> 与欧洲-地中海世界不同，中华世界里的科学工作一直都是零星的，从未成为系统化趋势或学派。中华世界里的科技创新与发明一直低于欧洲-地中海世界。
>
> 宋代之后不久的公元 1300 年以降，中华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科技创新与发明。

致命的西西弗斯与无尽的炼狱

早在 18 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已经注意到中国有着无出其右的贫困、不人道的低生活水准，以及长期的经济停滞，因为中国藐视国际商业，而灾难性的人

---

[53] X. Yang 1999, 77-113; Schäfer2012; Wang 1997, 59-66; Rao 2009, 176-267; X. Gu 2015, 13; R. Huang 1982; Y. Zhao 2014, 47。争鸣的英文学界也有认为中华帝制可以创新和动态演变的不同看法，见 Mungello 2013, 2-5。

[54] Landes 1998; Finlay 2000, 265-303; Sun 2010, 86-91。

[55] J. Dong 2014, 29-36。

口增长又耗尽了劳动者的微薄盈余、阻碍了变革和创新，农业经济早已达到极限[56]。中华秩序下秦汉式世界帝国的大众百姓生活，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次优化的生存状态，坏起来简直就是悲惨世界。主要由于新引进的农作物和耕地面积向湖泽和山地的扩大，农业生产仍有缓慢增长。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背负着持续增加的沉重税负(估计为收入的 30%-50%，有时甚至高达 70%)，加上频繁的征兵与各种徭役，基本上就令他们失去了全部的剩余。他们因此被牢牢地钉死在土地上，为了基本生计而无休止地艰辛劳作，没有资金也没有时间去从事其他行业，或者改进农业技术。相比之下，中世纪(12 世纪)英格兰的农民通常只缴纳收入的 10%-30%作为税赋，同时可以把 20%的收入积累为原始资本[57]。两千多年里，只有宋代是个例外。宋代的庞大工业商业收入和对外贸易，使得统治者可以把税负保持在中华历史上最低的水平。中国的农民通常是只要有一次坏收成就会走向饥馑、破产、行乞、劫盗、人相食、死亡或绝望的叛乱。一位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几乎每年都有过饥荒”；而在中华秩序下“世界性”的大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从公元一世纪的 69 次，二世纪的 171 次，到 14 世纪的 391 次和 16 世纪的 504 次。一位日本籍台湾作家的计算显示：从公元前 205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饥荒造成的(不包括战争或叛乱诱发的)大规模人食人现象，在中华世界里平均每十八年就发生过一次[58]。疾病、文盲、蒙昧、愚民政策、广泛的虐待妇女和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

作为富裕指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在中华世界里一直很缓慢，到宋代(12 世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后，就基本陷于停滞，再无提高。然后人均 GDP 还一直下降，直到 20 世纪后期。从汉代到清代的劳工收入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是漫长的停滞，甚至一路下滑(在宋代略有提高)。劳工的人均

---

[56] Smith 1776, 73-97。

[57] J. Wang 2000, 177-78, 184, 226。

[58] Deng 1937, 1, 61; H. Huang 2005。

年收入从公元 27 年到 1107 年只增加了 37.5%(从 1,440 到 1,980 升粮食)，然后到 18 和 19 世纪急遽下降了 84.8%(不到 300 升粮食)。宋代后中国的 GDP 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在 1820 年代至少理论上还是令人咋舌的全世界 GDP 的 32%)，但宋代后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停顿了数个世纪，而在那段时间内，欧洲的人均 GDP 增长却是突飞猛进。中国学者的研究估计，18-19 世纪一个英国劳工创造的利润，比当时的一个中国劳工要高 120 倍；大英帝国的人口只有满清帝国的二十分之一，但年度财政收入比清帝国要多六倍[59]。备受滥誉的所谓康熙盛世(1662-1723)实际上是一个康熙萧条期，到处可见不公正、可怕的官场腐败、赤贫和匮乏；每三年就有一次致命的洪灾和饥荒；甚至在最为发达和富庶的苏南地区，也不乏饥荒造成的人相食现象。在满清帝国的所谓“盛世”，中国的恩格尔系数(Engle Coefficient，收入中用于食物的部分)居然也高达 75%-80%，而 59%就意味着赤贫[60]。

人均粮食产量是一个关键的经济指标，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华历史上可能是比较可靠的纵向评估尺度。现代医学认为，要维持人类生存，一个婴儿每日最低的热量摄入需要 1,000 大卡，活跃的成年人则需要 3,000 大卡；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热量摄入应该为 2,200 大卡。一公斤加工过的谷物大约含有 3,500 大卡的热量[61]。考虑到食品加工和储存过程中必定有的损失、难免的浪费、养殖业饲料的弹性需求、以及其他如酿酒之类的大量非食用消费，一个社会需要有超过 400 公斤的人均谷物年产量才能生存。中国的人均谷物年产量从秦汉时代的 524 公斤，缓慢地增长到宋代的 729 公斤后就停滞下来；然后就是一路下降到明代中叶的 595 公斤和清代的 390 公斤，

[59] Liu and Zhao 1988, 874-85; Maddison 2007, 29, 44; Z. Huang 2013。
[60] J. Wang 2011; Hong 2014。
[61] Zelman 2013; World Watch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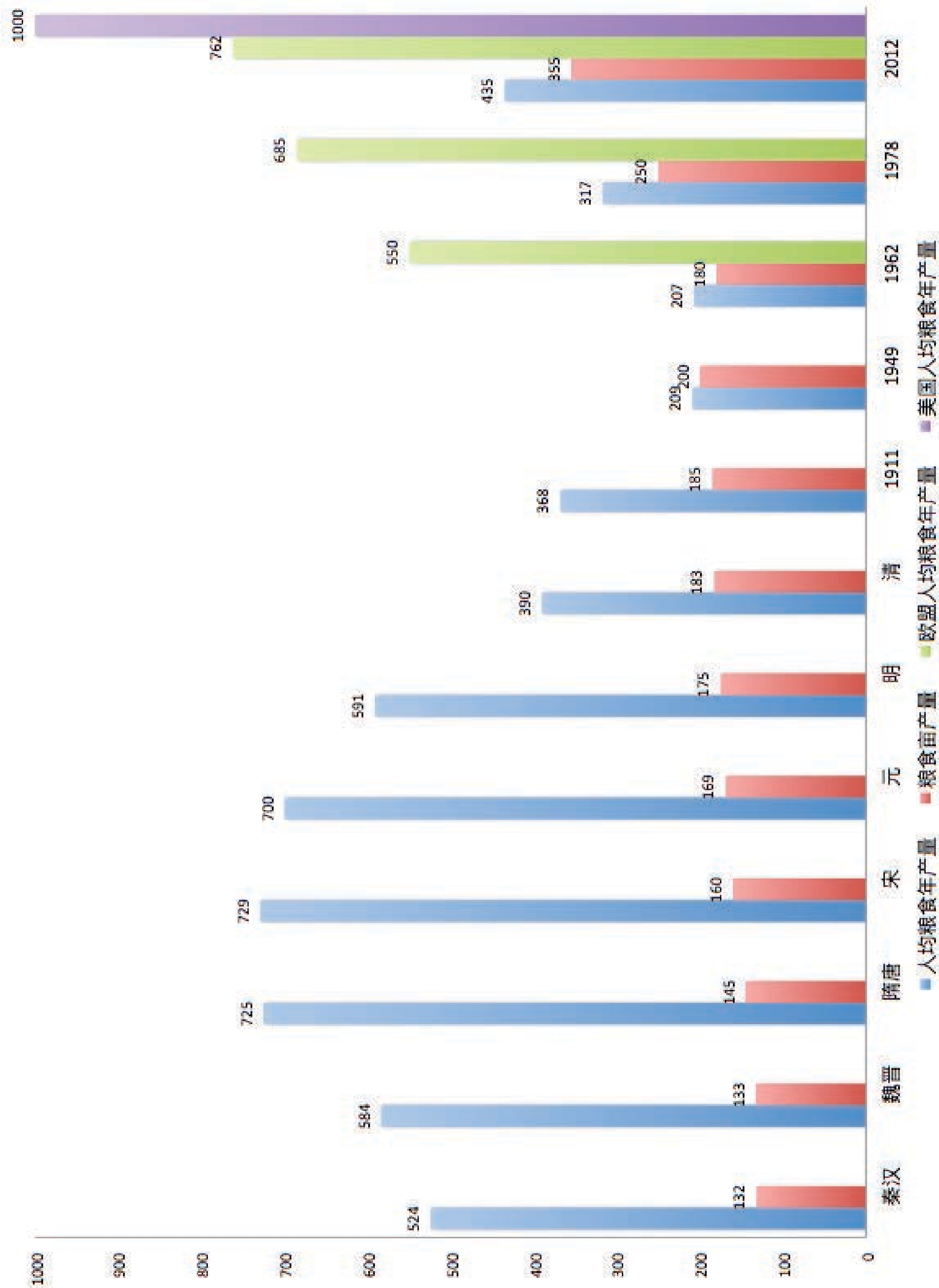


图 4.2。人均粮食年产量和粮食亩产量(千克/公斤)。

注：粮食谷物和它们能提供的卡路里在不同的时间和国家里差别很大。这里的比较估计仅用于说明目的。基于 H. Wu 1985，G. Cao 1989, Zheng and Huang 1989，China News Agency 2009; C. He 2013; and Earth Policy Institute 2013。

直到帝制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1900 年的 365 公斤)。中国的人均粮食年产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降低到史上最低，即 1962 年的 207 公斤。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的大量进口和使用(同时造成严重的土壤退化和水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2012 年达到其历史上最高的人均粮食年产量 435 公斤。于是官方自豪地宣称，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终于“超过了维持一个体面生活水准所必需的 430 公斤”[62]，但仍然只有一千多年前宋代水准的 60%而已。

关于人均 GDP 增长的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还揭示了甚至更惊人的中华秩序下经济的长期停滞。在宋代以后，从 14 世纪到 20 世纪的 500 多年里，中国的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零。欧洲的人均 GDP 在 13 世纪时还是低于中国的。但是在其后稳步增长，经过几个世纪的复利增长差异(compounded growth differentials)，形成了令中国几乎无法逾越的领先地位：欧洲的人均 GDP 在 1913 年是中国人均 GDP 的 6.3 倍，1998 年是 5.7 倍，到 2016 年仍为 5.3 倍。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和极为微薄的剩余，主要来自种植国外引进的新作物，如玉米和薯类，以及开垦越来越高峻的丘陵山地以及易受水灾的围湖造田。但是统治精英层及其贪婪的代理人的规模和胃口都日趋庞大，很容易就将民众薄利通过日益增加的税收和贪污受贿，汲取殆尽。受儒家的父系家庭传宗接代价值观念的影响，同时劳动密集型家庭小农业所必需的人口增长，则进一步耗尽了任何剩余收入。于是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的贫困，无法积累资本。低下的人均粮食产量，加上粮食分配总体上的极不平等和帝国精英阶级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浪费，同时几乎没有国际贸易可以大量进口食品，于是就造成了一个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实：从明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甚至是大多数)中国人，世世代代一直营养不良，还经常因饥馑而大量死亡[63]。汗牛充栋的

---

[62] H. Cheng 1994, 13-16; CCTV 9-9-2009; D. Wang 2013。

[63] Maddison 2001, 图 1-4, 表 B-21 和 B-22; www.tradingeconomics.com; Y. Lin 2012,

官修史书，对人民悲惨生活的记载其实极为疏漏，常常是大而化之，几乎没有可靠的量化记录。只有唐代白居易等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给后世留下过一些哀悯民生艰辛的诗文描述，生动地揭示了甚至在最著名的“盛世”，百姓们的生活也是十分的痛苦不堪。

正如人们预料的，由帝国政府垄断的工商业效率低下。即使在更具活力的宋代，国家对马匹养殖、贸易的垄断，也未能为宋帝国骑兵提供足够的马匹去抵御入侵的游牧民族。大一统帝国能集中力量兴修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的所谓“优势”，也因为技术停滞而日益捉襟见肘。从唐代以后，被今天称为中华母亲河的黄河越来越多地决口，基本上每年都会发生灾难性洪水，造成无数人死亡并且埋葬了许多主要大城市。

中华秩序下经常发生的、绝望而剧烈的“痉挛”式叛乱和内战，更是不断造成毫无意义的大破坏。与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社会不同，秦汉唐宋的无数精美建筑和特大都市，基本上全都消失无踪。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同时期的古迹能够保留下来，与今日依然矗立的耶路撒冷老城、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罗马帝国竞技场和引水渡槽、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建筑相辉映。人们必须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才能欣赏到隋唐时期宏伟壮观的木质建筑。直到 2010 年代，在中国境内一共才发现四座建于唐代的小建筑，都是隐藏在偏远山区的小型寺庙。有组织的对古迹和环境的蓄意破坏，在中华历史上习以为常。在建立中华秩序的殊死全面战争中，焦土政策乃是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们不择手段根除敌人的惯常做法；私人财产权和法律追究传统的长期缺失，也使得暴民、盗匪乃至一般百姓为了宣泄和哄抢，经常故意地大肆破坏，从公元前 207 年秦都咸阳之焚毁到晚清圆明园的消失都是如此。中华秩序下停滞不前的秦汉式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似乎也比其他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对环境更具破坏

300-05。

性：中华世界里的自然环境在 18 世纪时，就已经比西欧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加明显地遭到了大量破坏[64]。

中华秩序的集大成之体现是在 18 世纪的满清帝国，尤其是以反智、反人权以及自我孤立为典型。它对人民身心控制的残酷和彻底都达到了顶峰；它对历史的伪造也是同样广泛而细致。法家暴力手段和儒家人文仪式口号的并用，造成了中国文化上迄今犹存的极端虚伪。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心智，带来了心胸和眼光的狭隘和道德的沦丧。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从李贽、黄宗羲到鲁迅、柏杨都久已感叹汉族中国人的所谓“低下”人格和固有的劣根性。鲁迅(1881-1936)在其 1918 年出版的《狂人日记》中，改写了俄罗斯小说家果戈理 1835 年的同名作品，断言中国历史是“写满仁义道德的...吃人历史”。权力崇拜、贿赂盛行和十足的玩世不恭，道德相对主义统治着人们的言行。在杀戮和暴力面前，原则、真理、个人与集体的身份和忠诚，包括民族、族裔、甚至种族归属，往往都是次要的和可以交易的。有中国学者总结道：在中华秩序下特别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国人的个性”似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衰败：人们往往倾向于要么是穷凶极恶的残暴奴隶主，要么是逆来顺受的无耻奴隶。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都遭到了抹杀。一位美国传教士在 19 世纪末就观察到，在改革和改善中国迫切需要的许多事情中，最关键的“只是(人的)品格和良知。其实，其实它们是同一个，因为良知就是品格”。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钱理群继续抱怨秦汉中华秩序遗传下来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了的中国人的“糟糕的国民性”，包括既可悲又可怜的主奴精神分裂症、广泛的言行不一和虚伪欺骗、玩世不恭和权力拜物教，以及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极端漠视、不屑与不恤[65]。

---

[64] Z. Huang 2010; J. Wang 2000, 165-66; J. Wang 2000, 345; Sima 2nd century BCE V7; Shangdu 2011; Elvin 2004; Marks 2011。

[65] Guy 1987; Spence 2001; Brook et al 2008; Liang 2012, 2-12; Jing 2014; Smith 1894, 320; L. Qian 2012, V2, 308-13。

中华秩序的本质，不过是为统治者和极少数的精英提供最大的权力和财富，以及最多的自满(虽然其奢糜生活其实常常是次优化，甚至有害身心健康)，同时永久性地将绝大多数人锁定为仅仅是在生存繁衍而已。它鼓励人口不断增长，然而其封闭的农业经济却仅仅是外延式(expansive)缓慢发展而不是集约式(intensive)迅速增长，从而必然造成贫穷、停滞和灾难。因为贫穷和绝望，于是中华秩序下几乎总是无休止地爆发各种叛乱和内战。整个中华世界里在中华秩序下没有叛乱和造反的日子，从未超过十年。那些血腥的叛乱并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想法、新的制度，促进社会政治进步。而真正令人悲伤的是，在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下，人民唯一的政治选择是：要么生活在一个一统世界帝国的暴政专制之下，要么生活在世界分裂与军阀争战的恐怖混乱中。中华秩序下的朝贡体系也会因为其固有的"自我衰败"倾向而注定崩溃[66]。中华各族人民定期性地付出千百万生命、许多世代积累的财富与知识，换取只对统治精英有意义的统一的中华秩序下及所谓的和平与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历史记录里关于周期性的乱世的大量记载(大多是些不无文学色彩的轶事感叹，而缺乏翔实的统计事实)，却被统治精英们精心利用，当成重建中华秩序的理由，而不是反对天下一统的论证。

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地重视和珍惜生命。但是总体上就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而言，人的生命的价值和重要性都被大为贬值，恰如今天中国媒体仍然经常引用的格言："中国人的命不值钱"。中华秩序的生存和稳定本身(本质上其实是保持统治精英的权力)，就是其固有的内在价值，超越了个体的生命，超越了正义、效率和创新的价值。中华秩序下，漠视和贬低百姓生命价值的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帝国历史里关于经常发生的灾荒死亡和战争死亡乃至大屠杀的记录，通常只有一些空洞无物、大而化之的描述，例如"尸横遍野"、"血流漂杵"、"十

[66] Sun 1956; Yi 2007, 283; F. Zhou 2011, 29-58。

室九空”之类的惊怵文字，欠缺准确的统计数字和事实。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沿袭着这个传统，很多时候瞒报、谎报或者干脆抹杀灾难、战事甚至自然死亡的人数。比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战死者统计和公布是精确到了每个人的名字，而中国战死者的大致总数迄今还是语焉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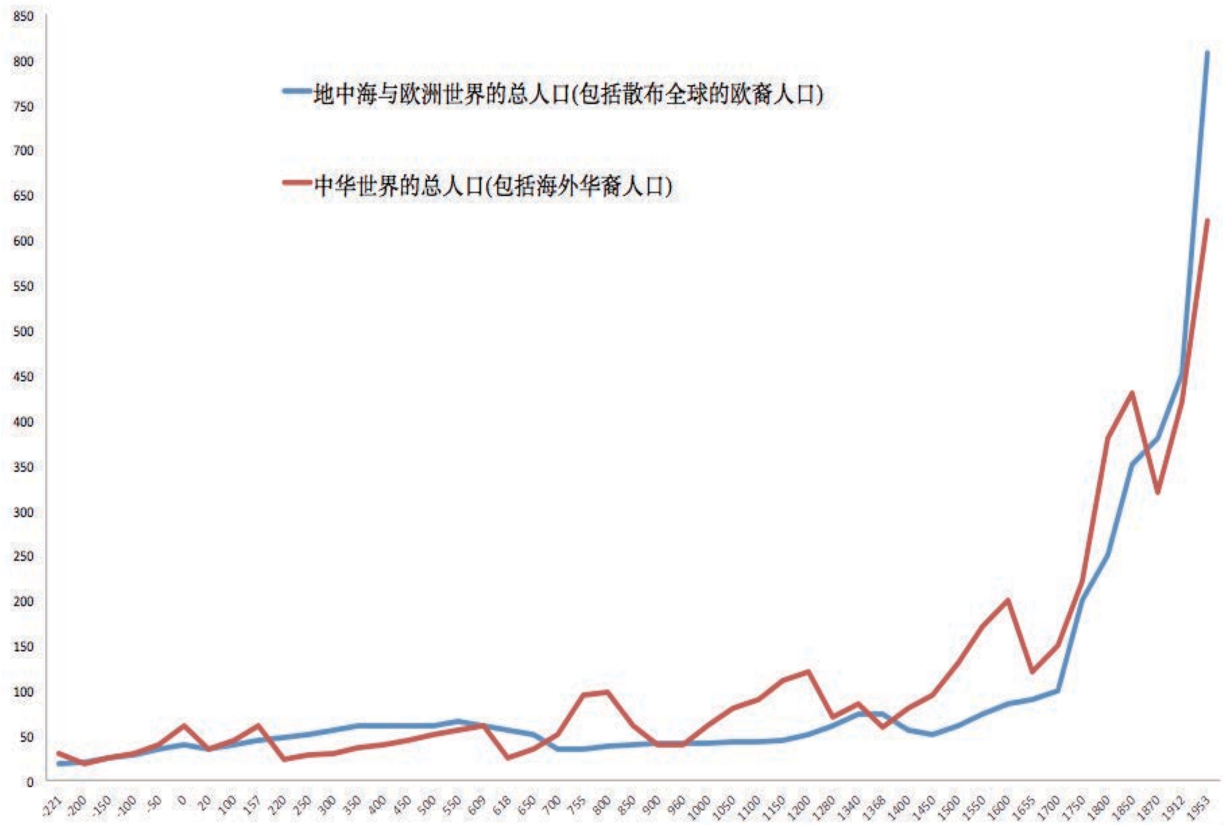


图 4.3. 中华世界与地中海-欧洲世界的人口变化(单位：百万)前 221-公元 1953 年。注：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往往不够精确，本表展示的是一个总体模式。基于 Ge 2006;《大英百科全书》;《世界人口的历史估计》Census.gov 2013; Cipolla 1972-1976。

中华秩序下的“世界”经济支撑了一个极小的统治精英集团令人艳羡的奢华生活、供养了一个毋需问责的世界帝国政府、提供了各种奢靡任性的皇家花费，以及不可避免的浩大军费。除此之外，这个经济体，只是在一个低端和不断下降的生存水准上，维持着人口的增长。这些增长的人口又不可避免地被一再发生的饥荒、洪水、流行病以及不断发生的叛乱或又王朝更

迭必定会带来大规模的屠杀所消减掉。这些使得中国人民的命运，很类似希腊神话故事里遭神谴的西西弗斯(Sisyphus)：无意义也无穷尽地受苦受累受难，只是比神话故事要更加血腥和致命。经济史家如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人类历史上促进制度变革和经济创新的一大主要力量[67]；但是在中华秩序下，人口压力却只具破坏性而已。移民和殖民遭到鄙视，乃至被斩首之刑给堵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组织制度创新的密集型经济增长或工业革命也无法发生。传统农业的扩张性经济增长于是不可避免地、迅速而反复地撞到上限，并导致周期性的灾难后果。

其他国家和文明社会很少有类似中华世界的人口历史型态：在一个停滞和下降的生活水平上，人口稳步增长；然后周期性灾难发生，打断这个趋势，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多达一半甚至更多的人口死亡。有中国作者甚至认为，在汉唐世界帝国崩溃时，人口的周期性减少高达总人口的 90%。从秦帝国到 19 世纪，就至少发生过八次主要由于中华秩序大崩溃暨大复辟所带来的人口剧减(图 4.3)。作为对照，罗马帝国之后的与中华世界大小差不多的地中海-欧洲世界，在长达 23 个世纪的同一时期里，人口也是不断增长。但除了公元八世纪的鼠疫和 14 世纪的黑死病所造成的两次人口大规模死亡外，从来没有过中华世界那种周期性的、人为的大幅度人口减少。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对统治精英们而言可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治理方式，但对人民而言，就是一种无止境的“吃苦”禁欲主义。套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句，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常常就是一个无穷无尽也无法逃避的炼狱(inferno)[68]。

垄断导致停滞

本章表明，秦汉式世界帝国即中华秩序有其强大的统治

---

[67] North 1982。

[68] Wen, 2008; J. Ge 2008。

能力和令精英们上瘾的吸引力，同时也有其重大缺陷和巨大的不可取性(undesirability)。为什么中华秩序在政治上是如此有效持久，但其社会经济记录却如此的次优化(suboptimal)，显然是个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关于稳定与变革创新、平等与效率、个人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等等政治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辩论，这一探讨至关重要。本书关于中华秩序的考察，就了解中国和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力量之本质这个目的来说，可能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要提炼出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秩序理论，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在这里笔者提议，作为一个简单的假定，中华秩序的绩效记录可以用经济学中已经相当完备的垄断(monopoly)理论来加以解释。

国家政权当然是一个固有的垄断组织，作为公共权威独家使用武力，以满足人类关于秩序与安全的政治需求。商家寻求独家控制整个市场的垄断，也试图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但还是缺乏从根本上完全消灭竞争和创新的能力。而国家垄断就不同了，它拥有从肉体上消灭异己和挑战者的终极而最有效的武力，因此可以彻底地消除竞争和异见。因此，国家垄断权力很容易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可怕的持久性灾难。一般说来，有两种方法可以缓解、调节和管控国家垄断权力的这些不可取性：首先，可以在纵向上建立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尤其是法治(rule of law)，在横向上再保障有效的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从而在内部制衡和约束国家垄断力量的使用。其次，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国际比较和竞争，从外部制约各个(无论其内部有无足够制衡)国家政权。个人与群体的信仰、价值观和文化规范，甚至统治者个人的内心信条、禁忌和约束常常也是重要的，但在似乎并不可靠。人们还经常观察到，统治者内心和国家内部的那些制衡与约束，可能还是需要外部的约束和竞争才能得以发展和生存。因此，本质上是垄断性的国家政权，就必需要有内部或外部(或两种兼有)的缓解和制衡，才能履行好其提供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重要职责，而既不会压制社会经济的创新和变革，

也不会轻易剥夺人命和人权[69]。

不幸的是，基于秦汉政体的中华秩序，消除了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比较和竞争，从而失去了对一个垄断性世界帝国的国家权力的内外约束与制衡。与其他同样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或穆斯林哈里发帝国)不同，中华秩序能够持续许多个世纪统治其支持者们认定为整个的已知世界，并且经过千年实践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唯一而应该的世界秩序。它因此在政治治理和社会经济领域，乃至人们的心理观念上都形成了一个最糟糕的全面垄断。由此，知识与信息不再增长与共享，人与人之间也缺乏极为重要的信任与协作，长期以往，无法避免地出现劣绩和停滞。如同当代中国学者郑也夫所指出的，在中华秩序下，社会秩序和政治治理其实也都非常次优化，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强大统治耗尽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使得血缘家庭之外很少有信任，于是中华社会变成了“一盘散沙”[70]。

---

[69] F. Wang 1998B, 8-18。古代中国思想家如柳宗元(773-819 年)曾经本能地意识到了国际竞争的巨大效用，参阅柳着《敌戒》。

[70] Hidalgo 2015; Y. Zheng 2001, 119。

第五章. 百年国耻与进步世纪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段约一百年的历史奠定和规范了今天的中国。到 19 世纪，满清帝国统治中华世界已近两百年，与其他秦汉式世界帝国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并同样地陷入衰败，新一轮的王朝更迭近在眼前。政治压迫、经济停滞以及人口增长等等，诸种力量已经交汇互动，积累了足以造成大爆炸的能量。然而，主要是由于欧洲人、美国人和后来日本人等非中华力量的入侵(间接影响和直接介入)，中华世界最终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与过去的王朝更迭不同，满清世界帝国的统治集团和大量人口并没有被消灭，新一个秦汉式世界帝国也没有再依样复制循环。从 1840-42 年的第一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开始，中华世界就被迫生活在扩张中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之下。与学者们描述的当时发生在许多其他亚洲帝国的情况类似，满汉各族的中华统治精英的权力、声望和观念，都一再被外人万般羞辱，无情挑战并打碎；他们不得不重新自我定位，并推行许多非自愿的改革以求生存。晚清以来的中华精英尤其是政府和官方史家们，通常都将这一百多年称之为中国的“屈辱世纪”或“百年国耻”，是整个中国历史几千年里的最低点。中国共产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习近平更是在 2014 年宣称，“从(1840)鸦片战争到(1949)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时间，是中华民族最动荡、最屈辱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人民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时期”[1]。

[1] Mishra 2012, 12-45, 242-98; Editorial Board 2004, V1; Institute of History 2011; Xi

本章之目的是重新解读这段长期被政治扭曲了的历史：对中国人民而言，1840 年代至 1940 年代这一百多年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失败和耻辱。对于秦汉式政体的统治精英及盲目跟从他们的臣民们来说，这一百年的确是个漫长的、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世纪。但是这期间的无数伟大实验和全面进步，深刻地重塑了中国的形貌。欧亚大陆东部的各族人民离开了日益虚有其表的中华世界秩序；中国理所当然地重新崛起，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2]。秦汉式政体本身和王朝轮回的厄运，都因为进口的共和主义，以及旨在实现法治与民主的种种努力而大为改观。这是极为深刻的、但迄今尚未完成的中国社会政治的大变革与大转型。通过模仿、引进和实验，中华世界的长期停滞和落后，代之以正在进行的伟大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文化和科技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飞跃性的质的进步。

即使是中华精英们在前五十年所痛切感受到的羞辱和落败，也在这个世纪结束前的 1940 年代，代之以骄傲和成功。在陌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世界秩序下挣扎求存的同时，中国明智(或幸运)地在 20 世纪上半叶“连续加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得胜一方”。年轻的共和政府(北洋政府)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其实做了相当好的外交工作，尽管后来的两个革命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坚称巴黎和会是中国的“外交失败”，从而有理由发动它们受苏联资助和指令、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叛乱和革命。凭借其日益熟练和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中华民国通过华盛顿会议(1921-22)和后来的联合国等渠道，设法修改了满清帝国时期签订的许多国际条约，“重新”控制了先后被日本和苏联占据的包括满洲(东北)、台湾和新疆在内的边疆地区，收回了清代出租的中国许多城市里的租界。中国从 1900 前后的半殖民地状态提升到 1930 年代的完全独立国家，

11-11-2014。

[2] Westad 2012。

再到 1945 年成为世界领导之一，即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3]。

类似 20 世纪里许多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的经历，深受外来影响的共和革命(1911-12)结束了满清帝国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再造了汉族中国人的民族地位和国格(nationhood and statehood)[4]。但不幸的是，对年轻的新中国而言，来自强大邻国日本尤其是前苏联的两大股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造成巨大的破坏。新生的苏联为了自身安全，以及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需要，更是在中国资助、武装甚至直接指挥了下一场大革命。国民党在 1927-28 年间通过武力夺取了中华民国政权，将中国变成一个软性威权主义国家，但是国民党很快排斥来自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莫斯科于是转而赞助并指挥在中国的第二个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中共)，发起长达十年的武装暴乱(1927-36)，在中华民国内部创建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过中共很快就濒于失败。之后，还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日本侵略。国共双方二战之后再次展开了血腥的中国内战(1946-50)。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失败并逃往台湾，后来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主政权。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同时充满耻辱和进步的漫长世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自诩为“新中国”，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跃退，在中国复辟了一个比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更为正宗的秦汉政体，亦即极权主义或硬性威权主义专制党国(party-state)，并由之复苏了对中华秩序的渴求与向往。

---

[3] Tang 2014; Qin 1-23-2012; Taylor 2009。关于 1912 -50 年间中国外交的一个第一手观察，可参阅顾维钧的长篇回忆录(Gu 1983-94, V2-6)。

[4] Bull 和 Watson 1985; Tilly 1998; Chong 2012。

中华秩序之衰败与消隐

满清世界帝国在 18 世纪扩张并控制了整个中华世界，使得中华秩序达至顶峰，形成了满清版中华文化并塑造了之后的中国。随后，满族统治的秦汉式政体就恰如预期地迅速衰败下去。中国化佛教的异端分支白莲教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在中原的腹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在整个 19 世纪，农民起义和民族/族群之间的战争不断爆发，其中包括西南(云南省)的汉族穆斯林起义、在西北几个省份造成至少两千万人丧生的多民族穆斯林起义，以及广泛分布于华北的捻军叛乱。属于中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叛乱和内战之一的太平军运动持续了十多年(1851-64/72)，几乎推翻了满清帝国。它直接波及整个中原的一半区域，并导致多达一亿人死亡，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5]。

欧洲人的到来给中华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并对中华秩序造成根本性的挑战。外来侵略和影响最终结束了整个中华秩序，并在几十年内使满清帝国从一个多民族世界帝国，变成一个由若干“半殖民地”和许多由地方/族群酋长或军阀统治的准自治政权所组成的集合体。外部力量几千年来首次改变了中国的王朝更迭模式，并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历史。经历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西方人，不仅拒绝汉化或曰中国化，而且还开始用西方文明和体制全面取代作为中华国粹的秦汉政体和儒化法家意识形态。满清世界帝国的结局，确实是令中华精英们震惊不已、又痛苦不堪的，借用当时汉族领袖李鸿章的话，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6]。

与过去统治中华世界的一些世界帝国不同，满清统治者其实很早地就对中华世界之外的世界有着相当了解。他们也许本能地已感觉到危险，但更可能的是本书先前分析过的，中华秩序下秦汉式政体的内在必然逻辑，促使满清世界帝国政府仍

---

[5] Smith 2015; Harr 1999; Han 2006; Perry 1980; Spence 1996 and 1990, 165-93。

[6] Rhoads 2000; Li 1901。

然以老一套办法予以回应。为了隔离，从而忽视那些无法控制的外部比较和竞争，清廷采用并坚持了严格的自我孤立和闭塞视听政策，极力维持其佯装的“世界性”统治。它大致延续了明帝国的海禁政策，并用那简单而有效的斩首刑罚，阻止移民外出也严限外人来华。为了朝廷的奢侈品需求，清朝通过特许商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外贸口岸从最初的四个，到 1757 年减少到只有广州(Canton)一个口岸。帝国特许的十三个洋行，垄断了清代高度受限的外贸并由此成为超级巨富。康熙皇帝(1662-1722 年在位)是巅峰版中华秩序即所谓康雍乾盛世的创始人，被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赞许为睿智能干的“大帝”。他其实预见到了西方国家将会带来的长远性威胁:“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但是这个判断，却成为满清帝国推行海禁锁国，而不是迎头努力竞争的依据，似乎麻烦是“千百年”之后的事，倒不如先得过且过。秦汉世界帝国的统治者们依然宁愿假装统治了整个已知的世界，以安定统治其臣民为要。尽管如此，清帝国还是不得不与外部世界互动，按照与其他秦汉式世界帝国同样的天朝中心优越感，根据“文化等级或地理边缘”的程度，区别对待邻近各民族国家和来访的外国人：西北地区(中亚)、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以及东南亚人。清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和宗教改宗皈依(religious conversion)，在中原外今天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西藏，建立了传统的封建-邦联式制度，扩张并稳定了中华秩序。此外，清朝继续禁止外国传教士和限制外国商人。满清统治者认为他们的世界帝国在无法穿透的围墙后面可以长治久安[7]。

到 18 世纪末，清朝已经开始衰落。这时统治满清世界帝国的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他还曾被法国思想家和学者伏尔泰想当然地幻想为一个理想的专制统治者，即所谓“哲人君主”。1793 年，当时真正的世界强国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爵士(Earl George Macartney)率皇家代表团到达中国，寻求

[7] Fang 1953, V3; J. Liang 1999; Farris 2007, 66-83; Kangxi Edict in 1719; Dunnell 2004; Spence 1990, 117-19。

与满清帝国建立对等外交和贸易关系[8]。因为是否跪拜的礼仪之争，乾隆没有面见英国使团。虽然后来他接受了英国使臣的礼物，但还是像对一个朝贡国下达谕旨般地加以回应。貌似一位居高临下、体贴亲切而威严无上的君主，乾隆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书，一开始就满是可笑的无知与傲慢：

>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他随后明令拒绝英国的建交、派驻使节、人员往来、开展贸易等要求，重申海禁以及仅在广州-澳门一处允许最低限度的外贸政策，继续禁止对外移民和外来移民。外国人除非得到特别允许，才可以到大清，但也只能作单程旅行，而不允许返回故国。天朝不需要外部世界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遥远的英吉利了。最后，乾隆的谕旨如此结束：

> "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乾隆这份令人啼笑皆非的诏书辗转翻译成英文后，其无礼和无知被冲淡、掩饰了许多[9]。然而，马戛尔尼在他的笔记和回忆录中，还是真实地记录了他观察到的满清世界帝国里惊人的停滞、专制暴政、官员和人民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广泛的赤贫、极其低下的生活质量、以及中国人的极其缺乏尊严。他由此得出结论[10]：

---

[8] Spence1990, 133; Elliott and Stearns 2009,136-39。

[9] Backhouse and Bland (<1914>2010), 331。

[10] Robbins 1908; Hsu 1995, 162。

> “中华帝国是一艘老旧而疯狂的巨型战舰。那些幸运的继承人和专注的军官们，努力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使她一直不致沉没，并且仅仅通过她的巨大体型和外表来震摄她的邻国。但是，只要有一个无能的人恰好在甲板上指挥，该船的纪律和安全就都完了。她可能也许，不会一夜就沉沦；她也许会像残骸一样漂流一段时间，然后触岸撞个粉碎；但她永远不能在旧基础上重建了”。

随着自我锁闭的中国变得更加为外人所知，天朝帝国的形像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被视为一种迅速落后于欧洲人的、没有希望的文明；中国人极度缺乏自由、机会和体面的生活条件。从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到黑格尔的欧洲思想家们都深刻分析和批判了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的令人绝望的不合理性、不良治理绩效和可怕的前景。而实行统治的满州民族也退化了，从一个征服与统治的族群，蜕化变质为被宠坏了的少数民族[11]。

为了寻求新的土地、利润和荣耀而不断扩张的欧洲列强，用工业时代的最新技术，尤其是致命的火器枪炮武装起来，他们首先经海上、然后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华世界，从根本上撼动了中华秩序的核心。清帝国试图查禁鸦片走私和缩小对外贸易逆差的严酷而笨拙的措施，激起了 1839-40 年的第一次中英战争。当时英国国内的一些反战政客，讥之为“鸦片战争”；这个颇有贬义但并不确切的名字，为后来的中国朝野采用至今。其实该战争并不主要是关于鸦片，而是要打开中国闭锁的大门。它终结了清朝的整个陈腐不堪的海禁政策。中华世界开始向外商和外国传教士开放。一支规模很小但装备精良的英国远征军，决定性地摧毁了大得多但极为无能的清军。包括皇帝在内的中国官员和外交官们都是极度地无知，仍旧把新来的外国人认为是可以照例管控和收买的野蛮人，而不是更先进的竞争对手和

[11] Spence1990, 136-38; Crossley 1990。

征服者[12]。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满清帝国的类似失败和被迫让步一再发生，往往起源于中国统治精英里占主导的保守派不断与外国人(特别是迅速涌入的基督教传教士)发生的摩擦和冲突，而且常常又因为满清政府愚昧无能却又反复无常的背信和欺诈，而酿成更多、规模也更大的灾难。许多外国势力尤其是俄罗斯和日本，推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其领土扩张、剥削和控制中国人民的野心，日益对满清帝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外国压力下分崩离析的中华秩序于是遭受了更多的打击：1856-60 年与英法的战争(中国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多次基于俄罗斯的威逼利诱而将领土割让、通过国际条约给予了外国人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1884 年的中法战争、以及最终埋葬中华秩序的 1894-95 年的清日战争(中国史称甲午战争)。先前游离于中华世界边缘的外围国家日本，在西方影响下，崛起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并且决定性地击败了庞大许多的中原帝国，开启了东亚新时代。中国人关于公民权利、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和民族国家的意识，在清帝国被日本彻底击败之后才开始真正出现。满清天子也被迫将其统治全天下(全世界)的天朝大清改名为大清帝国，“以便与欧洲各帝国为伴，即使是很不一样的同伴”，并开始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新的世界战国时代的霸主之一[13]。

外来影响力不可抗拒地将中华世界强行拉入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开始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中华世界里的各族人民都取得了史诗般的进步和无与伦比的获益。中华世界试图通过全面进口商品、工具、知识和文化，以摆脱许多世纪的停滞，实现蛙跳跨越式发展。教育得到了再造，文化得以更新，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古老的汉语被翻新改造，白话文开始取代文言文。从外国尤其是日本进口了数不清的新辞语、成语和概念，迄今不坠[14]。中国人口在

---

[12] H. Mao 1995; Lovell 2011。

[13] Spence 1990, 147-64, 199-210, 216-24; Lei 2014; G. Wang 2013, 29-30。

[14] Masini 1993; P. Hu 2011。

历史上首次基本避免了传统的王朝更迭时期的大规模减少，其数量还继续增长。但是，这些惊天动地的进步和变革也付出了绝非微不足道的代价：中国失去了包括朝鲜、越南的所有附属国家，被迫割让从西伯利亚东部、蒙古、中亚到台湾的大片领土(大约 300 万平方公里，或超过满清帝国最大时期版图的四分之一)，牺牲了无数生命，遭受了由于战败赔款、外人掳掠加上中国群众的报复性抢劫而造成的大量的财产损失。中华精英的骄傲和自尊也随之大为消减。这些毁灭性的外来打击、令人晕头转向的全面挫败、以及各种重大损失后来就构成了支撑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中的“百年国耻”主流话题的各种根据、证明和轶闻故事：中国在外来的不受欢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下，从 1840 年到 1949 年(许多人还坚持认为，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被强大的(西方)外国人不公正地欺凌和伤害[15]。

从 1861 年到 1909 年实际统治着满清帝国的慈禧太后，因为害怕失去权力，在绝望中决定借助号称有神力的、狂热而仇外的义和团。在 1900 年，她居然自杀般地下令清廷向拥有有外交关系的 11 个外国宣战。号称“八国联军”的外国联合派遣军(其实包括了大量的汉族中国人雇佣兵)匆忙去北京解救被围攻的使馆和教堂，迅速而彻底地打败、并屠杀了数量大得多的清军和义和团。美国也从菲律宾(在美西战争中夺取的新殖民地)派兵参战，是美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国人唯一的一次作战。北京在四十年里第二次被外国人占领和洗劫。满清帝国被迫签订又一项和约即《辛丑条约》，同意支付巨额赔款。清廷的中央权力急遽下降，中原许多省份的总督巡抚在战争中都宣布中立，实行所谓的“东南互保”，以避免外国的占领。这就开始了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数十年的地方军阀主义。中华秩序的划时代的最后毁灭，让许多外国势力癫狂地在中国要求领土、

[15] “国耻”一语于 1915 年为包括中华民国总统在内的中华精英就正在举行的对日本的谈判而首次使用(Z. Luo 1993, 297-319; Kaufman 2010,1-33; Callahan 2012)。关于它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使用，参阅 Z. Wang 2014。

租界、特权和影响力。中国于是濒临被瓜分为若干块殖民地的险境[16]。

西化成为生存之道

与过去被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征服不同，19 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不止一个外国力量。因此一些统治精英希望去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对外战略也许是相当有道理的[17]。在李鸿章(1823-1901)等较为开明的领导人主导下，清帝国直到其末日都一直企图拉拢、贿赂部分外国人，去制衡和对付其他的外国人。中国人为此战略损失了大量的土地、财富以及国家信用，甚至在 1904-05 年使满洲(东北)沦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激烈战场，致使当地失去了许多生命和财产。以夷制夷战略经常产生反效果，最终也未能挽救满清帝国和中华秩序。但是其长期的实践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悠久传统：各种政治力量都拥有各自的外国支持者和赞助者。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外来侵略者和征服者都是些武力强大的游牧军队，他们在社会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并不发达，遑论优越和先进。于是征服者都倾向于最后接受中原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即汉化)，继续着秦汉式政体和中华秩序。但在 19-20 世纪里，那些威胁中原的外国势力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几乎每一个方面和每一次较量当中，都比停滞许多世纪的中原强大和先进。这些外来威胁所拥有的绝对优势，使得中华精英们担忧的，不仅为一个特定的统治王朝，甚至也不仅为一个特定的统治民族的命运，而是将要失去整个中华生活方式，包括有两千年历史的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本身。他们的身份人格、价值观念、以及他们认同的整个世界的精华全都面临毁灭。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明智的汉族和满族精英在 19 世纪中期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以保卫中原

[16] Cohen 1998; D. Tang1998; Spence 1990, 231-35。
[17] F.C.Wang 1998。

乃至整个中华世界[18]。于是，满清政府和官督商人们在 1860 年代发起洋务运动，试图通过模仿和直接进口技术、人才、设备、工厂和教育以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加强军事力量[19]。这一通过进口和模仿来实现经济、特别是军事现代化的战略，一直持续至今。

然而，关于如何模仿西方以自强，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分歧，并由此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外交政策，以及中国自身的崛起。在 19 世纪后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自强路径，它们在后来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具体方案。这两种路径迄今一直在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引导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可谓是意义深远的、在天下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求生存的一场长久斗争。其中一条路径是功利主义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现代技术，去维护和遵循中国固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20]。这是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应对外部世界的主导思想，体现在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代的许多自强政策和努力中。这种路径方法的一个奇特的延伸，是干脆把已经崛起的"西方强国"日本，视为中华文化制度精髓的"真正的载体"和卫士，企图靠拉拢、整合和依赖日本，延续和振兴中华文明[21]。

另一条路径是所谓全盘西化，即把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全面地从儒化法家的秦汉式政体转变成欧美式的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制度。有些人甚至呼吁要将汉语也拉丁化，改用拼音文字。早期的西化倡导者包括王韬、薛福成、梁启超等人[22]。高级官员张树声于 1884 年在其临终奏折里总结这种方法为

---

[18]魏源在 1843 和 1852 年首先提出此论, 后来得到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的推动。

[19] Feuerwerker 1958; Pong 1994。

[20] Teng and Fairbank 1979。"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系冯桂芬首次提出(Feng <1861> 2002)。张之洞在其御准的《劝学篇》里阐释和推广了这个战略(Zhang 1898)。

[21] Ku 1924, 274-82。

[22] Feng 1935; L. Zhao 2005; Teng and Fairbank 1979, 135-46, 220-22。

“应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即采用西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实质，以便能充分利用西方的技术自强[23]。这一离经叛道，全面重塑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总方针，在 20 世纪初得到深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倡导者胡适(1891-1962)等人更进一步的阐述和推动。中华民国在其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有所前进。后来，中国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刘晓波(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多次被关押的政治犯，最后在 2009 年被关押，至 2017 年瘐死狱中)，还曾决绝地、颇有争议地把这个路径描述为“中国需要三百年的(西方)殖民化才能实现现代化”[24]。另一条稍微温和，但比中体西用想法更加全面深入的西化路径，则是模仿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成功进行的选择性西化，即福泽谕吉著名的“脱亚论”，所谓脱亚入欧，离弃亚洲(中华)传统而西化去争取富强。甲午战争(1894-95)之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来自日本的雪崩式的海量(经过日本人用汉字翻译后的)西方观念和术语，至今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25]。

由苏联创立和资助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要在中国推行一条比梁启超和胡适更激进的全盘西化道路，尽管他们遵循的是另外一种自称是普遍真理的西方意识形态。中共拒绝引进与模仿英国、法国和美国，甚至是德国或日本这些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政治制度，而是从莫斯科拿来了共产主义旗号，试图用一种激进的西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即斯大林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制度结构上和文化上全面地改造中国。其实，如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所指出的，斯大林化的马列主义，与包括中国的秦汉式政体在内的传统社会的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对照，在一些关键特征上是非常吻合的[26]。中国共产党后来实际上是借用进口的一种欧洲(俄罗斯)

[23] S. Zhang 1884。
[24] Hu 1965；X. Liu 2006。
[25] Fukuzawa 1885。
[26] Pipes 2001。

意识形态，来包装其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秦汉式政体，只是在辞藻装饰上具有一些革命性或创新性而已(本书第六章将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以后的中共，则是基本上回到了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中体西用的现代化路径，高度选择性地学习和模仿西方的部分社会政治价值与规范，这类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仍然不如当年日本的西化来得全面。

到 19 世纪末，相互矛盾冲突的外国势力在中华世界实际上形成了英法美阵营、德国-奥地利-俄罗斯阵营、以及日本之间的三角竞争局面。较小的外国势力如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扮演了较为次要的角色。一些外国势力如英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和转型更感兴趣，试图利用其提供的各种商业机会。而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和日本，则被血腥味所吸引-中华秩序崩溃后，一个垂死王朝所散发的气息，试图推行领土扩张政策，蚕食、瓜分、甚至鲸吞中国。这样一个受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下的相对收益法则(law of relative gains)支配的、充满竞争的外部环境，不仅为满清政府(以及后来的中华民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实施模仿西方而自强的新战略，或继续其以夷制夷的旧战略都有了可能。在各种外部力量的影响下，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互相竞争的社会政治力量在中国得到发展，决定了中华世界和秦汉式政体的转变与命运。

在 1899 年，美国作为新的世界经济首强，尽管还不是世界军事和政治的领袖，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毫无疑问是出于自利目的，但实际上对中国极为有利。该政策关键性地帮助了中国确保其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次年，即 1900 年，在义和团灾难之际，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再次倡议中国的“门户开放”，并说服了其他世界主要大国接受了这一原则。经过 1921-2 年的华盛顿会议的法律确定，门户开放政策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成为至少从 19 世纪后期，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一肩双挑美中两国驻对方使节时，就开始了的“美国与中国之特殊关系”的一大基石。在中国统治精英为告别中华秩序乃至秦汉式政体而艰辛努

力时，在中国为了适应充满竞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与各种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作生死周旋时，门户开放政策提供了关键性的外援[27]。

满清帝国不同寻常的崩溃

在王朝更迭周期和前所未有的外强入侵这双重压力下，满清帝国在 19 世纪后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溃败。类似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各个秦汉式世界帝国的崩溃，包括统治精英在内的中国人民再一次面临混乱、暴力和破坏。但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是，更先进、多元而互相竞争的西方列强，极大地改变了满清帝国崩溃的态势和方向。中华世界里的各族人民避免了过去许多次世界帝国崩溃都会造成的照例的大屠杀和地狱般浩劫。满清帝国还得到外国的进口武器甚至雇佣兵如常胜军(1860-64)的帮助，镇压了许多场叛乱(特别是太平军)而多延续了几十年[28]。

太平军激发了反满清的汉族民族主义，但它试图引用进口的意识形态，建立自称得到神佑的天国，其信仰是经过大肆篡改的基督教教义。由此，它极大地激怒了许多汉族和非汉族的儒化法家精英分子。太平军领袖洪秀全一心想当帝国官员，但是他参加科举考试却一再失败，于是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即耶稣基督之弟，要用一个现世的汉族基督教天国取代野蛮的满清帝国。这种非同寻常的理念，并未能取得欧洲列强或中国精英的共鸣。洪秀全也许还可能用武力创立一个新王朝，取代满清帝国并延续秦汉式政体暨中华秩序。但太平军领袖们实际上却比正陷于溃败的清朝更加腐败、暴戾和无能。欧美列强最终帮助清朝剿灭了太平军。而曾国藩率领的汉族精英阶层对摧

[27] Joseph 1928, 399–410; Spence 1990,203-04, 283, 379-88; Gu 1985 V2, 103-236; Z. Liu 2013 V2, 158-65。

[28] Wakeman 1991, 68-102; Smith 1978; Jen 1973; Platt 2012。

毁太平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的“赫然奋怒以卫吾道”的口号，以捍卫千年儒化法家传统之道为己任，成功地抵销了太平军作为汉族民族主义者的号召力。这也是秦汉式政体与中华秩序的力量超越民族主义界限的一个有力例证[29]。

在溃败的满清帝国里，多元化、颇有试验性的地方自治在从天津到广东的许多省份(尤其是沿海地区)纷纷出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长江沿岸的南通[30]。中华世界这一全新的非秦汉政治的发展，最初是由入侵的外国势力在它们获得的各个租界里强力创造出来的。当时欧美的法律与粗糙而残忍的大清刑律之间无法相容，于是欧美列强迫使满清帝国给予他们治外法权(legal extraterritoriality)。满清政府被迫特许了外国人、传教士和教民许多自治权利，尤其是出版和教育自由权。清廷和地方政府忧虑外国人的政治影响，试图沿袭旧制，隔离那些难以控制的外国人。于是他们主动在中国境内建立“仅限外国人”居住的租界，防止外国人与中国人混合。自治自立的地方性外国政权于是在中国发展起来。

第一个租界是上海政府在 1845 年租给英国人的，而最后一个租界是天津政府在 1902 年租给奥地利人的。一共有八个外国在几十年里统治过二十多个租界。美国则只是分享了两个“公共租界”。这些租界后来被中华民国政府逐步收回，到 1940 年代初期都不复存在。连同其他外国人租赁的土地和归外国人兴建管理的铁路沿线土地，这些租界确实是对中国统治精英和中国人民的重大冒犯，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令人尴尬的破坏，由此长期成为百年国耻历史叙事的一大内容。不过事实上，那些外国人统治的土地，基本上成为免护照、免签证的自由港，並向包括 1930 年代的大量欧洲犹太难民在内的所有人开放。那些用脚投票的中国人逃离中国政府管束，很快就成为租界居民的绝大多数，使得满清政府建立租界的原意完全落空。

[29] Spence 1996; Wright 1957; Pan 2000; Kuhn 1970; Luo 1937; Zeng 1854。

[30] Shao 2003。

这些租界变成了中华世界里各种新思想、新治理制度、新试验和冒险、新闻自由和新式教育的堡垒，也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被中国政府通缉迫害的各种异议人士和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租界于是重塑了整个中华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就现代化的总体方向而言，租界实际上是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有力的催化剂，至今仍有其难以估量的、有形无形的遗产与影响[31]。令中国统治者覺得不平等、不愉快甚至颇具侮辱的外国租界，当时对整个中华世界的积极作用，其实几乎是怎么夸张也都不过分的。

此外，在镇压太平军中而出现的汉族军阀地方政治力量也在稳步发展，并于 1900 年的“东南互保”中达至顶峰。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汉兵变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派和实力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以及受过外国教育或影响的新精英们互相联合起来，迅速宣布当地独立，从而促成北京满清政府的最后垮台。1912 年 2 月 12 日，在各地独立政府、尤其是袁世凯(1859-1916)领导下的北洋新军指挥官们的直接逼迫下，满清皇帝宣布退位。此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于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宣布成立，由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南北协议的一部分，孙中山在 2 月 15 日辞职，由袁世凯接任大总统。欧亚大陆东部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制度与中华秩序一起终结，虽然威权主义秦汉式政体仍然存在。

在内部治理和外部事务各方面依靠忠心能干的汉族官员，满清帝国不仅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存活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和进步。到 19 世纪末，清朝的帝国财政收入终于达到千年之前宋帝国的规模，工商税收入也自宋代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土地税和农业税，这表明由外贸、外资和本国工业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显著增长。1855 年以后外国人一直管理中国海关，他们的现代化有效管理也是一个重要原

[31] C. Jin 2004; Daxiang 2015; X. Feng 2015, 182-222。关于外国人经营的在华铁路系统的作用，可参阅 Elleman and Kotkin 2010。

因[32]。

外国势力的直接存在和影响，带来了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等欧洲风格现代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这些城市大多是由外国人作为租界主人和管理者，而负责设计和管理的。现代邮政、电报、交通运输、海运、铁路，和后来的汽车和电力服务，以及各种改革了的新学校和新课程均发展起来。通常在租界或其附近创办的、具有各种倾向的中文和英文私人报纸、期刊和出版社等等，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也蓬勃发展。一份颇具影响力且常常在政治上尖锐批评当局的民办中文报纸《申报》(即“上海日报”)，从 1872 年一直出版到 20 世纪 40 年代。基于改革派官员暨外交官薛福成的建议、并在传奇性美国外交家蒲安臣的直接推动下，华工移民美国在 1870 年代得以合法化，成为中国人移民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二十年后，在 1891 年，满清政府终于摒弃了至少是从唐帝国以来的反对移民的传统政策，给予返乡的海外华人和本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33]。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象征，中国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于 1897 年开业。清政府也于 1905 年创建了第一家国有银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六十多家商业银行纷纷开业，各自发行了以银圆为本位的纸币。直到 1935 年，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才将纸币印刷权集中归三家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清王朝灭亡之前，中国的本土资本主义就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因此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收入都有上升。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大大增加了进口粮食的供应。除了太平军起义造成的人口剧减外，中国的人口在王朝崩溃的“天下大乱”之际的 1890 年代到 1940 年代，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照例地大幅减少，而是例外地继续增长。

然而，慈禧统治下的满清政府继续不可逆转地滑向了最终崩溃。在致命的甲午战败后，在 1898 年，慈禧血腥地中止

[32] Lei 2008; Spence 1990, 203-09, 220, 284。

[33] Belfour 2013, 9-193; Gu 1983, V1, 5-22; G. Fu 2010, 87-236; Hsieh 2013。

了的戊戌变法，从而关闭了早就应该实行的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大门，中断了和平改革中国的机会[34]。只是在 1900 年再一次更为屈辱地败于外国势力之后，慈禧才开始笨拙地也极为迟缓地颁行一些颇为雄心勃勃但往往很不真诚的"新政"改革，以期拯救满清王朝。无论其动机如何，慈禧新政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实际进步：1902 年明令禁止汉族妇女缠足(该陋习历经后来中华民国政府的多次法令和宣传，又过了几十年才最终消失)。1905 年，废除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出国[35]。

1906 年，满清政府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并于 1908 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企图保证其皇帝专制制度，但也规定了帝权之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同时还保证了新闻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的一些个人权利。但是这个宪法大纲并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革命中断。此外，中央的帝国官僚行政机构也有所现代化，设立了按照专业分工的各部门。地方自治也开始萌芽。陈旧的清朝刑事法典得到了修订，消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和处决犯人的方式。现代警察和法院系统也开始发展。1910 年实行货币和财政改革，发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预算。商会、民间团体和政党纷纷出现，竞相争夺选票、发言权和影响力，他们在地方准立法机构即咨议局里尤为活跃。衰败的满清帝国看起来是要通过自我革新去创造历史和自救。中华民国后来大体上也继承和实施了清政府的这些新政。满清帝国的新政改革正式地接受了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以及民众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等原则，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破天荒；这些一百多年前由官方认可的原则，即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还没有充分实现[36]。

新政的实施大都是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所致，而不

---

[34] Liang 1899。对戊戌变法事件与梁启超不同的描述和诠释可参阅 Kwong 1984。
[35] D. Wang 1987。
[36] Spence 1990, 245-62; Y. Zhu 1996; G. Fu 2010, 64-72; Xu and Xu 2001; Xiao 1993, 61–66; G. Xiao 2007; W. Yuan 2013; J. Chang 2013。

是帝国统治者的真诚愿望。清朝统治阶层尤其是满州贵族，担心改革会使汉族精英的权力進一步增长，所以竭力抵制改革。他们试图长久地垄断政权，但是却估计错误也行动失误。清朝于 1907 年下诏建立出版的事先审查制度，开启了一直延续至 21 世纪的中国政治传统，尽管清政府很快就被迫忽视了这个制度。1909 年慈禧及光绪皇帝去世后，清廷及其九年(后来又缩短为三年到 1913 年)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计划，被 1911 年秋天的武装起义终止。清廷试图国有化四川一个私营铁路项目，引起大规模骚乱，并直接触发了武汉兵变，产生雪崩式的连锁反应。1912 年 2 月达成的妥协案，迫使六岁的宣统皇帝退位，将政权和平移交给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满清皇室和满洲统治精英们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仁慈结局:在中华历史上，他们首次避免了伴随王朝崩溃的、统治者家族被全体处决的可怕命运[37]。

中华民国：机遇、成就与失望

非主流中国历史学者刘仲敬在 2013 年写到：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时期(1912-49)，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主义政治实验室[38]。其实，中华民国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宪政实验室，也是一个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和外交政策各个方面宏大变化与实验的继续。这些实验大多数是成功的、进步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出现、巩固与神圣化。中华民国深受欧美自由、民主、宪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思潮的影响。1905 年，还在满清帝国灭亡前好几年，由流亡日本的汉族革命党人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其组织就已经效法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39]。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中华民国

[37] Rhoads 2000; Z. Liu 2013, V1, 20-135。
[38] Z. Liu 2013, 前言。
[39] Zarrow 2012; Sun 1924; Z. Liu 2013, V1, 14。

临时约法》的大致框架下，经过了 15 年的中枢虚弱、乃至南北分裂与军阀割据的威权主义统治，然后是 20 年的国民党武力夺权后实行的所谓“军政”与“训政”，即列宁主义党国的威权主义统治，到 1947 年才正式开始宪政统治。

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构成了中国充满试验和进步的伟大世纪(1840 年代-1940 年代)的后半段。与中国官方历史叙事所坚持的“百年国耻”的定论相反，这段时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相比都毫不逊色，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戏剧性事件和传奇故事、复杂曲折的历史变迁情节、各种殷殷期望和启示、伟大的牺牲与成就、深沉的悲伤、沈重的代价、不幸的失败和痛苦的失望、及其最后的悲剧性结局。所有这些，构成一部宏大而震撼人心的史诗。总的来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三十八年统治是一个伟大的开放时代；在社会与个人的自由和法治(rule of law)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和国际迁徙的自由；充满活力的观念与科学交流以及教育事业得以开展；市场蓬勃开放并且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华民国的前 16 年，即莫斯科支持的列宁主义政党国民党崛起，并用武力于 1928 年夺取政权之前的北洋政府时代，则更是如此[40]。顺带一提，作为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革命造反党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一直贬低和轻视晚清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历史价值。在两党官定的历史叙事里，都给民国的最初年代贴上“黑暗时代”的标签，将其很不准确地视为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分裂，所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41]。

在国际上，中华民国苦心努力，最终拯救了中国的独立国家地位，并且基本上保住了满清帝国的整个中原(Centralia)版图，再加上满洲(东北)、台湾、西藏、新疆甚至还有“外蒙古”。更重要的是，在被共产党用武力推翻的好几年前，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成功地将中国提升为第二次世界

[40] Mackerras 2014, 28-82; Dikotter 2008; X. Feng 2015a, 76-190, 2014a。
[41] CCP Central Party History 2002, 9-10; Tsiang 1938; Tao 1959; Ch'i 1976。

大战的五大战胜国之一，彻底消除了中华精英们在前一个世纪里可能确实遭受过的外来凌辱。中华民国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来自邻国(日本尤其前苏联)的无休止的侵略、吞并和颠覆活动，成功地告别中华秩序，並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下担任一个世界大国的角色[42]。

在 20 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发展各个方面，整个中华世界的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继续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多元化发展和进步趋势，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就。受到美国政治制度和观念，以及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华民国从一开始就志在成为以宪政为基础、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联邦民主共和国。但它的实践之路并不平坦，充满了曲折起伏，也遭受许多挫败，结果常常令人失望。但它还是成功地应付了多次军阀混战、各种各样的叛乱、以及许多不当的改革和失利包括两次迅速失败的帝制复辟(1916 年袁世凯为期 83 天的“中华帝国”，1917 年张勋主持的仅仅 11 天的清帝宣统的复辟)，并在 1947 年接近历史转折点，几乎终结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建立宪政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最终还是悲惨地失败，未能持续地将中国的秦汉式政体转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直到四十年后，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小得多的流亡政权，才在台湾建立了第一个中华民主政治。

中华民国历史的第一阶段，是从 1912 年到 1928 年的历史。袁世凯 1912 年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很快就大致统一了中原乃至整个清代中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接下来企图恢复帝制，成为新的“中华帝国”的开国皇帝，从而建立另一个秦汉式政体。这一倒行逆施很快就因举国上下反对而失败。无论其历史功过，袁在其短命的帝制复辟失败后，于当年(1916)就在国人唾骂声中病死。其原先率领的北洋军的一些高级将领，

[42] Xin 1999，V1。

接着统治了中华民国政府。这个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又称“北洋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虚弱并且不断进一步遭到削弱的威权主义中央政府。地方上多处于军阀割据的自治状态。它有着众多政党(估计有 300 个之多)和相当重要的政党政治，拥有集会和言论自由、蓬勃的私人企业、以及积极有意义也颇为成功的外交活动[43]。不幸的是，就像过去中华世界里每当王朝崩溃时，许多强人武夫就会做的那样，野心勃勃的地方领袖和军阀崛起，常常违抗中央政府甚至公开反叛，造成倒戈相向乃至混战。争夺一统天命去统治整个天下，一直是中华精英的本能，那些有武力也有雄心的领袖们更是如此。

然而，外来影响和内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都极大地约束了历史的重演。这个被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正式命名为“军阀时代”的时期，尽管表面上看似混乱不堪，其实绝非全部有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许多地方领袖们和精英阶层，都主张地方自治甚至各省独立，以建立多个中华国家。由此，中原(Centralia)的中华秩序天下一统，被一个类似战国争雄的政治秩序所取代。然而，与战国时代不同，曾经的中华世界本身此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而已，而不再是整个已知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及自身领土主权的完整，还常常要依赖外国势力的支持。中华精英其实是在为统一和统治整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小而落后的部分而斗争。他们中的大多依然是受到传统儒化法家世界观的驱动，以所谓安定与统一天下为旗号，但也经常用各种进口的各种新观念与辞藻，从美式自由主义到苏式马列主义，来装扮自己。一个稳固、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否民主，似乎依旧是大多数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然而同时，许多人也大量尝试引进一些完全不符合中华传统、乃至反秦汉式政体的思想；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严厉地抨击儒家意识形态。1913 年，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宋教仁(1882-

[43] Xie 1926; CCP Central Party History 2002, 12; Gu V1, 83-395。

1913)-他被中国历史学者易中天誉为“中华民国唯一一位理解和实践真正的共和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政治家”，赢得国会大选，即将接管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中国大有和平演变为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之势。然而，宋却在赴北京接任的前夕遭人暗杀，这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44]。

在这个不寻常的时期，国内外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史无前例的公开与自由的竞争，形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意在拯救和复兴中华的启蒙运动。始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批判性地审视了中华历史，鼓吹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甚至包括用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主义取代中国文化。其领袖多是受过外国教育或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45]。陈独秀在 1915 年就公开呼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并在 1919 年明确提出只“拥护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的口号，将民主与科学尊为唯一的新信仰。然而，各种外部力量强烈地推拉扭曲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日本攫取德国在华(山东)权益，而美国“自私”地就此妥协，令许多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对美欧民主颇为“失望”；苏联对华“无私”地放弃帝俄“一切权益”的空洞宣传和欺骗，以及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有效鼓动，尤其令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转向莫斯科。中国伟大的启蒙运动于是终结于 1919 年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五四运动。崇尚科学、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被其他进口的激进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挤压甚至取代；同时广为流行的汉民族生存危机感与“世界危机”感，也交织激发了中华中心主义的复兴：这一切都极为深刻地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就曾经信仰过各种进口的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在 1920 年时还公开主张将中国分割成 27 个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却在次年(1921)成为莫斯科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一

[44] R. Huang 1997, 241-310; Yi 2007, 270; Chen 1915 & 1919。

[45] 陈后来成为列宁主义者和中共领导，但因为抵制斯大林主义，终于被中共清洗、抛弃(C. Guo 1992; B. Tang 2011)。

个创始成员[46]。

随后的中华民国犹如“中华版的魏玛共和国”，很快从一个软弱的宪政民主政体，转变为一个威权主义的党国军事体系。到 1928 年，由苏联资助、训练和指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通过为期两年的“北伐”战争，统一了包括满洲(东北)在内的大部分中原。就在胜利之前，国民党在 1927 年年中与莫斯科断绝关系。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南京的新中华民国政府都与苏联断交，指责莫斯科直接资助共产主义颠覆势力，同时驱逐了苏联顾问并试图清洗共产党人，进而转向寻求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帮助。中华民国开始了国民党一党执政的“训政”时期，建立了蒋介石虚弱的个人独裁统治下的威权政体[47]。

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华民国进入了所谓“黄金十年”的南京时期(1928-37)。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持续而迅速的发展，大量的社会政治变化也得以展开。在外部，中华民国先前已有许多外交成果，如 1921-22 年的华盛顿会议再次确定了门户开放原则，从而阻止了外国分割和并吞中国的企图，并开始了归还中国主权如海关管理权。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继续努力，重审和修改了满清帝国与外强订立的许多条约，最终于 1943 年完全取消治外法权，抹去了这个中国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就持续遭受的耻辱。蒋介石是一位颇谙儒家经典、并在日本军校就读的汉民族主义独裁者。他也受到其最后一位妻子，美国化的蒋宋美龄以及许多受过美国教育的同僚和助手的深刻影响，并且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蒋介石政权一方面采用传统的儒化法家方略，竭力要完全统一昔日满清帝国的版图，但也不得不适应自由、人权等舶来的观念。国民党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党，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又承诺了要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它的内部是多元、分裂和分散的。当时的中国仍有着大量的外国势力存在，外国人继续享有众多特权包括直接控制租界。在

[46] D. Tang 1998; Lieberthal 1991, 119-200; G.Du 2004, 87-136, 169-80; Li & Liu 1997； Mao 1920, 2; CCP Central Document Office 1995, 11-540。

[47] J. Xu 2014。

这样一个国度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统治最多只能是软弱、有限且不完全的秦汉式政体。它的制度结构、组织人事、以及意识形态均含有大量西方的、非秦汉政治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成长，最终将影响和改变整个政权[48]。

不幸的是，中华民国被迫与政权内部的各种派系、以及许多叛乱政权和军阀势力进行不断斗争，还要对付两大邻国不断的侵略和蚕食：日本从山东、满洲和华北方面，苏联则从外蒙古、满洲和新疆方面。由莫斯科资助和指挥的中国共产党，在偏远农村地区建立的农民武装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最初被中华民国领袖们所忽视，但逐渐成为最严重的内部威胁。不过，到了 1930 年代中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击败了几乎所有地方军阀，接近真正地统一整个中国，并将共产党的游击队赶到了贫瘠的陕北地区，几乎使后者灭亡。一个新崛起的中华民国，即将全面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以及对付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日本的侵略。日本帝国在 1932 年就已经占领满洲，并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进而威胁包括北京(当时改名为北平)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然而，在 1936 年 12 月，蒋介石戏剧性地被麾下的高级将领绑架，被迫承诺停止消灭中共。此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绑架他的前军阀是中共的同情者，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Comintern)所雇用和操纵，以保护苏联免受日本帝国的威胁。中共因此迎来了命运攸关的一大历史转折，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名义下，与国民党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49]。

也许是要先发制人，阻止那势必要报复日本的历年侵略，并进而挑战东京在东亚的帝国主义野心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日本帝国于 1937 年 7 月开始全面进攻中华民国，试图迅速压服后者，进而实现其统治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梦想。一些

---

[48] JRG 2006, II; Gu 1985, V3, 355-63; 1987, V5,186, 260; R. Huang 1998; Q. Wang 2010。关于宋氏家族，参阅 Seagrave 1985 和 Gillin 1986。

[49] Jacobs 2016; Taylor 2009; Garver 1991, 145-75; Fenby 2003, 124-37; K. Yang 2006a。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则认为，国民党政府可能受到了莫斯科的蛊惑，以不明智的鲁莽方式挑衅，激起日本的进攻[50]。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可能也是基于日本版的中华秩序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即所谓的“八纮一宇”理念，用武力和强迫归顺去征服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51]。1938 年 11 月，在日本陆军占领了中原大部分主要城市之后，骄横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援引了中华秩序的思想和语言，宣布“得中原者王天下”，并敦促中华民国投降合作，以便以“古老的日本精神”和复兴的“真正中国精神”为基础，建立一个以东京为主导的“新亚洲”，取代现有的“非理性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其时仍在执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对东京要在亚洲建立日本秩序的反应，是大幅削减了美日经贸往来[52]。

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 年开始，1937 年全面展开，至 1945 年结束)严重地推迟了中华民国原定于 1937 年实行宪政统治的计划及其经济现代化努力。中华民国 1928 年以后的对日本政策基本上是灾难性的失败。中国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者近年来认为，日本之所以大举入侵中国，实际上是在莫斯科煽动和操纵下，汉族民族主义反西方(和日本)的过激行为所“诱发”和“驱使”的。不仅国民党受到苏联的渗透影响，采取了激进汉民族主义，莫斯科更是同时命令共产党执行激进的反西方汉民族主义，从而种下为苏联私利而损害和牺牲中国利益的苦果[53]。日本的军事侵略致命地重创了中华民国政府和新中国。包括国民党第二号领袖汪精卫在内的一些重要叛逃者，投身于由东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居然有超过 300 万的中国士兵成为所谓“皇协军”，与日本合作，帮助总共 120 万的侵华日军

---

[50] X. Feng 2014。

[51] Beasley 1987, 226-27, 244; Edwards 2003, 289-324。

[52] Sant et al 2010, 18; Fumimaro Konoe，“对华第二次宣言”，1938 年 11 月 3 日 (Gu 1985 V2B，573-79 & Yoshitake 1983, 80-95)。

[53] X. Feng 2014。关于 1930 年代之前的中日关系之文件，見 Wang 1934。

[54]。尽管如此，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坚持其代价昂贵的抗日战争，加入盟国阵营并“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为世界主要大国。随后，中华民国在 1947 年开始推行宪政。但是，中国共产党获得莫斯科的隐秘但至关重要的援助，迅速增强了军事力量，并再次发起颠覆性的反叛。经过三年多的激烈内战，中共成功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并在 1949 年 10 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55]。

重新评估晚清与民国时代

受西方列强所迫，中华世界在 19 世纪中后期融入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华民国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社会政治变革，并正式结束了帝制。但是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华民国的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在性格、能力、禀赋上各有不同的秦汉式统治者而已。他们各自的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和统治有效性也是各有千秋，同时还都得与舶来的共和主义、民权、人权、法治以及多党制民主等新观念斗争。中华秩序消散了，但是秦汉式政体依然存在。受欧美思想的深刻影响，“三民主义”新政治思想，和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政治改革计划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的指导方针[56]。中国在其内部开始逐渐扬弃秦汉式政体，对外，民国领袖们成功地保证了国家安全，明智而坚定地将得到更新的多民族中华民国变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世界秩序里的一个主要成员。从 1920 年代到 1943 年，中国在晚清时期被迫接受的国际条约得到了修改，所有的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也被收回。丘吉尔发誓要保全大英帝国，但还是在 1942-3 年间不情愿地做出承诺，将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54]这个“世界最大的叛国者军队”，也许说明了超民族的中华秩序观念和传统的强大力量, 使入侵的日本人能够借其天下一统之天命去统治中国(X. Wang 2005)。

[55] Mitter 2013; Z. Liu 2013, V5-7。

[56] Sun 1931, 36-48; Z. Liu 2013，V3, 224-26。

后把香港和平归还中国。列强的诸多反华法律和政策也告消弭。臭名昭著的 1882 年美国排华法案(China Exclusion Act, 1902 年成为永久性法案)也于 1943 年被马格努森法(Magnuson Act)所废除。中华民国收复了失去的满洲(东北)和台湾，在 1945 年变成一个新的全球领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7]。

在这个漫长的世纪里，中国人告别了持续千年之久的中华秩序，在外来观念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扬弃古老的秦汉式政体的艰辛努力。对中华精英而言，这一百多年确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持续耻辱体验；他们的身分认同、自信、尊严和生活方式都屡遭责难和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统治阶层不仅失去了统治权力，而且还失去了独特的意识形态。不过，如同一位中国作者在 2014 年所写，鉴于诸如义和团之乱时，中国政府曾向几乎所有外国列强宣战，并对各国使馆和教堂开火，真正的民族耻辱实际上更可能是“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统治者们的)荒谬、野蛮、傲慢和战争罪行”[58]。当然，这些“真正的耻辱”后来被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照例掩饰过去。通过稳健的努力，中国人巩固和提升了其国家地位和民族地位，到 1945 年最终迎来其国际羞辱的结束，中国在法理上和观念上都与各国平等，并且从残酷的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除了那些永远怀念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的人之外，中国人 19 世纪中叶以后经受的无论何种国际屈辱(也无论其真假)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风而飘散。蒋介石在 1943 年 1 月就满心宽慰地认为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所遭受的耻辱都已消除[59]。那些曾经导致中华秩序崩溃的同样的外国力量，此时也保障了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整个世界的重塑。

这漫长的一百多年，是中国全方位地向外学习、开展各种伟大实验、取得根本性变革和史诗般进步的世纪。告别了中

---

[57] Gu 1985, V3, 355-63, 367-79; 1987, V5,14-19; Dong and Hu 2010, 12。

[58] Gong Shi 2014。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中国网络警察删除了。

[59] Gu 1987, V5, 186。

华秩序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显著而持续的改善。通过大规模的翻译，中国全面引进了现代科学、医学和教育，从而获益无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准、知识存量和经济发展程度。中国人有了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性的科学探索和创新环境；尽管仍旧不时地受到挥之不去的秦汉式专制政治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压迫，中国人在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和艺术各方面都有了一个学术研究和创新创作的巨大井喷，这是自先秦时代以来再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外部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例如著名的西南联大在 1930-40 年代的传奇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其 179 名正副教授中，只有 23 人未曾留过学”[60]。七十年过去了，中华民国时期教育事业，它所得到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资，以及其世界水准的巨大成就，依然令人景仰，且难以匹及[61]。

中国人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心灵也有了巨大而丰富的变化。中华秩序一旦崩溃，秦汉式政体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和基础，被进口的社会政治组织制度与治理理念不断侵蚀乃至取代。共和主义、民主、个人自由和平等、言论和集会自由、人民利益高于统治者利益、民权与人权、私有财产权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等，逐渐变成基本的社会政治价值与新规范。整个中华历史上第一次，中华民国从成立起就在宪法即 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随后的 1914 年《中华民国约法》和 1923 年《中华民国宪法》里承认土地私有权，并将其作为整个私有产权制度的基础，取消了两千多年来的皇帝拥有(天下)所有土地的制度[62]。

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并定居，成为中国的史诗般变化中的催化剂。他们往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但有些人则是比较无私的奉献者，如代表国外组织在华从事传教、教育和慈善

---

[60] Israel 1999, 161。

[61] T. Li 2016 ; J. Wang 2000, 387-79; Hua 2014。

[62] S. Yang 2009, 95-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以“社会主义”名义，又消除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土地私有权宪法原则。

活动的人士。海外华人，尤其是那些大量回国定居的留学生，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推动角色：在 1953 年以前，留美的中国学生因为受到排华法案的限制，毕业后基本上都不能在美国永久居留[63]；中国留学生当时要定居其他西方国家，也是颇多限制。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自然地学成归国。还有一些外国人，主要是为了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目的而到中国，甚至抱有以种族、族裔或文化偏见为基础的、企图要奴役中国人的邪恶欲望。外来力量确实常常伴随着直言不讳、粗暴和血腥，给曾经是整个已知世界主人的中华精英确实带来痛苦和耻辱。但无论其原始动机如何，这些外国人以及归国的海外华人，共同地打破了许多旧制度和旧文化，开创了新局面，迄今都在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遭到了故意的遗忘或贬低。

在致力于推动中国变革的外国人当中，美国政治家兼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70)应该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从 1867 年到 1870 年他去世，蒲安臣担任满清政府的第一任特命全权公使，并率领中国外交使团驻访美国和欧洲。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先河，为中国签订了 19 世纪里的第一个平等的对外条约，即 1868 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通过该条约，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满清政府则将中国对外移民和留学合法化[64]。另一名直接影响中国历史的是英国外交官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他从 1863 年到 1911 年一直担任满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从 1855 年满清政府创立中国海关起，到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接管中国海关为止，他与其他五位英国人、一位美国人(也是末任总税务司)负责主管这个高效而且基本上没有腐败的(甚至可能是那一百年里唯一一个)重要政府机构。后来的历史学者认为，他

---

[63] 中国留学生从 1953 年起才依据“1953 难民救济法”可以获得在美永久居留权。

[64] Williams 1912; Spence 1990, 204, 214-15。

还深远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机构建设和规范转型[65]。

简而言之，由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所塑造定型了两千年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在这个世纪当中都深受震撼，并开始转变。当时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在 1953 年就勇敢地向中共领袖重申了那个时代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所有学术工作的最终指南，也是值得为之牺牲生命的最高价值[66]。几乎所有的中国领袖、政党和精英都不得不认同并遵守那些源自西方的价值和规范，即使有些人只是当作权宜之计而虚与委蛇。但这个大趋势的主要例外是中共，它将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本土主义的"民族复兴"，凌驾于这些新的共同价值和规范之上。然而，中共领袖毛泽东也还必须在名义上接受这些进口的新观念，虽然他大玩其擅長而迷人的文字游戏和诡辩，把所谓"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的、西方的、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和解放，与他自诩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左派的、我们的、中国式的"民主，自由和解放相对立，从而美化并推销他在斯大林主义包装下重建的秦汉政体及其价值规范[67]。

与历史上中华世界另外两个黄金时期，即先秦时代和澶渊体系下的宋代相比，处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下的晚清-中华民国时代更具活力，更加创新和开放，也更富有成果。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一时期有了前所未有(迄今也还不再有)的自由。一位中国作家在 2010 年评论说：在晚清之后，"中国唯一失去的只是肤浅的王朝尊严，以及人民并不能享受的所谓'主权'"[68]。

在这个世纪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异乎寻常地出色。国内生产总值(GDP)在 1894-1931 年期间增长了 3.52 倍；人

---

[65] Spence 1969, 93-128; Bell 1985, 168-70; Lu 1986; Brunero, 2006; C. Chang 2013, 183-90。

[66] Fung 2010; Chen 1953。

[67] 1959 年毛泽东对中共高层干部的讲话，引自 R. Lee 1999, 225, 254。毛的继承人继承并简化了毛式诡辩和巧言，代之以"中国特色"和"爱国的"(C. Su 2014)。

[68] Tuidao, 2010。

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在 1887-1902 年期间达到了 3.55%，在 1920-31 年期间更是达到了 5.62%，这都是空前的涨幅。在 1912-21 年间，主要是依靠繁荣的私人资本主义，中国经济获得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GDP 平均每年增长高达 13.8%。其次是 1927-37 年间，由年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带来的 8%-9%的年均 GDP 增长率，其中工业增长更是每年 9.3%。这与当时笼罩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形成了鲜明对照。粮食单产量和总人口在中华秩序崩溃的时期都大幅增加，这得益于进口的农业技术、化肥农药和新种子，以及蓬勃发展的外贸。尽管内战和外部入侵不断，中国人口在 1912-49 年期间得到了“也许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快的增长”。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华世界的人口在秦汉式世界帝国崩溃期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旧政权的统治精英也没有被从肉体上消灭[69]。

假以时日，这个伟大世纪的实验和进步，将预示着中国会迎来一段真正持久的繁荣盛世，超越先秦和宋代的记录，把中华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69] Qin 11-11-2012; X. Zhao 2013, 90-97; Chang 1969, 99, 112; H. Huang 2007; X. Lee 2003,1-18; Y. Zhang 2006, 83-91; Hou 2001, 575。

第六章. 大跃退与新崛起

在外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下，中华民国在满清帝国的废墟上开始了建设汉族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展示出一个既摆脱中华秩序、又扬弃秦汉政体的希望。其主要设计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提出的三民主义，呼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民主政治，民权平等和民生即社会经济发展而努力。不过，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者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基本都是秦汉式儒化法家威权主义强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算得上是极权主义军阀。孙中山深受西方影响，也颇为理想主义，但是他除了民国初年担任过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外，并没有真正统治过中国。即便是孙，后来也很快采用了传统的威权主义统治风格，开始了个人独裁。外部力量特别是前苏联广泛的侵略和颠覆，以及日本帝国的军事侵略与吞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无数的中华精英出于自愿或被诱骗，成为各种外国势力尤其是苏联和日本的代理人，使中国人民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

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在1920年代中期后，最终被政治化的、受外国操纵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诉求所劫持，阻碍和扭曲了亟需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极为精明地使用“民命”(人民赋予之使命 Mandate of the People 即僭用人民的名义)取代过去的“天命”(天赋使命 Mandate of Heaven 即僭用神明的名义)，由外国创立和资助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秦国式的极权主义国中

之国。凭借聪明诡计、粗暴武力、进口的意识形态之新辞藻、以及关键性的外援，中共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赢得了中国内战，于 1949-50 年在中国大陆结束了中华民国的统治，复辟了一个极权主义秦汉政体，给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都带来了一个大跃退(great leap backward)。三十余年昂贵而悲惨的大弯路过去后，毛泽东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致上回到了晚清和民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上，其国力也得以有一个新的大崛起[1]。

民国政治：顽固但转型中的威权主义

在国际上，后中华秩序的中华民国似乎基本满足于整合中华世界(主要是中原 Centralia)，而没有什么追求一统整个已知世界的使命感和目标。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迫使英国、特别是苏联接受的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世界秩序愿景的一部分，中国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与尊荣。它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新世界秩序的建设和管理，并为之做了有益的贡献。在国内，中华民国保持了其顽固(但常常力有不逮)的威权主义政治。由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独裁者的孙中山变得如时人梁启超所评说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孙中山改造的国民党在他去世后通过蒋介石更加威权主义的军事独裁，用武力夺取了中华民国的政权。然而，国民党的本就弱势和不完整的秦汉政体，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继续无可奈何地向现代国家转化。本书第五章概述的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政治的全面性变革的结果，已然成为中国人生活和精神的一部分，并由 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 1947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进一步地推进和合法化了。假以时日，一个持续而不断改进的执行与运作之实践将会使得中华民国在一条看似不可逆转的道路上前进，即日益

[1] 孙中山阐述三民主义见 Sun 1924；汪兆铭录孙之遗嘱见 Wang 1925。Liu 7-26-2015。

淡化秦汉式政治的色彩，增加民主化成分[2]。

但是，尽管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些中华秩序的漫长传统和强大理念仍然根深蒂固，秦汉政体对精英阶层的巨大诱惑和路径导引依然经久不衰。中华世界帝国的“失落”总是令许多中华精英们不安、不满与愤怒。苏联的挑动、宣传和许诺一段时间里相当有力地迷惑并吸引了许多人(甚至以独立思考和辛辣批判而知名的鲁迅，也曾著文称赞斯大林的苏联)。在进口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包装下，原本传统的秦汉式威权主义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酝酿、壮大并复兴。从 1920 年代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一直在挥舞着复兴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旗帜：蒋介石当年的口号是“民族复兴”，而中共现在的口号则是字数稍长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理想主义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就像孩子们第一次进到糖果店一样，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被各种各样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炫化了眼。与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们很方便观察到的、发展比较完善的西方民主政体相比，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之缓慢，很容易就会令他们深感不满和失望。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的中央政府因为来自国外的种种颠覆和侵略而疲于奔命、极为虚弱，这更是激发了那些有着政治雄心的人。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本质上仍是一个秦汉政体，但却是一个日益柔性衰弱的、转型当中的秦汉政体。即使是更威权主义的、半列宁主义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来自民众的压力越来越大，并且得到主要盟国美国的大力支持，他们要求更快更深入的社会政治改革、享有更多的人权和民权(human rights and civil rights)，以及實現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共产党-更加威权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致命挑战也在日益增強。中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通过精巧宣传，成功地将自己装扮成民主斗

[2] Gu 1987 V5, 396-446; Loke 2013, 209-26; Liang 1925; D. Tang 1998, 140-46; Lu 2005, 第 3-16 章。

[3] Lu 1932; Chiang 1934; Xi 2013。

士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还得到中华民国在五大国俱乐部里的同僚、一直意在颠覆和控制中国的邻国苏联的大力支持。

蒋介石顽固但虚弱的(在他看来大概也是“必要的”)威权主义政治，以及它与美国愿景的差异，早在 1943-44 年间就造成了中美之间严重的、代价高昂的、有时是公开的摩擦和不信任。他与华盛顿的代表史迪威将军(George Stilwell)关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治理不善、政治和军事改革、中国暨远东战场的指挥、以及对中共的态度等各个议题上都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马歇尔将军(George Marshall)在 1945-47 年间主持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外交使命，即试图调解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反叛的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出于寻求和平，和对于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甚至是无私的善意，马歇尔有效地限制和责罚了中华民国政府，特别是在关键性的满洲之战期间，而他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办法去影响和制约中共。国共双方都缺乏诚意，互不信任，充满误判错估并过度依仗武力。于是看似有希望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美国在中国扶持一个稳定有力的民主联合政府以遏制苏联的努力于是失败，颇为失望的华盛顿其实有意无意地帮助实现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使得一个更糟的政府出现在中国：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垮台了，美国把中国“丢失”给了莫斯科[4]。

由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Comintern 又称第三国际 1919-43 年)所资助、武装并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成立，并于 1927 至 1936 年间发动了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在 1937 年至 1945 年间，濒于灭亡的中共被日本的侵略所拯救：它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并誓言效忠，从而得以发展强大。中共后来赢得了重启的中国内战(1946 年 7 月-1950 年 6 月)即其官方叙事里的“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上推翻了被内部的派系分裂、传统的官场腐败和无数的背叛而致命地削

---

[4] Gu 1987, V5,422-54; Tanner 2013, 15, 76-105, 192-222; Tsou 1963: 401-493; Stoler 1989: 145-178; Jiang & Liu 2013; Bradley 2015, 133-168, 297-362。

弱和蛀蚀的中华民国政府[5]。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进口的斯大林式主义共产主义染色自身，要激进而彻底地以国际共产主义的强迫性一元论(cohesive monism)去全盘西化中国[6]。然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只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下复辟了秦汉政体而已。对中国人民而言，令人失望的威权主义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被一个更不民主、更为专制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确实是一个史诗级的巨大悲剧，是中国历史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大跃退。

中国共产党之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历史叙事通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开始描述赞扬为毛泽东率领十三名中国的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于 1921 年 7 月下旬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秘密聚会建党，他们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为拯救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开天辟地”[7]。再后来，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式微以及历史事实真相的浮现，中共的创党故事在 2010 年代被重新改写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端”，但几乎再不提及共产主义思想，或莫斯科的创建与资助之功。事实上，中共是由总部设在莫斯

[5] 作为一个秦汉政体，中华民国饱受腐败之害并不意外。不过，比较多元的社会和舆论还有西方(尤其是美国)记者的揭露当时已经开始形成有效的监督和遏制，例如学者的揭露就能令行政院长孔祥熙被迫去职(T. Yang 1998, 528-66)。中共夸大并利用了这些报导，例如被中共指为“腐败透顶”的、属于最富有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其实家产低于一般中产阶级水平，在流亡国外时还须要靠养鸡维生(L. Chen 1994, 418-24)。

[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见 Kołakowski 1978/2005；关于共产主义固有之缺陷和难免之失败，见 Brzezinski 1989; 关于 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后果，见 Courtois 1999。

[7] 关于中共之历史，坊间已有无数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著述。中文作品就有多种中共的官方自传如 CCP Central, 2 vols., 2010; 异见组织之评述如 Epoch Times 2004; 叛离的中共前高官之记述如 Guo vols. 1-3, 1969, vol. 4, 1971 ; 中共前朋友之回忆如 S. Dong 1951; 内幕人士的爆料文字如 Jin 1999 与 Smarlo 2004; 中华民国/台湾史学家之著述如 J. Wang , 3 volumes, 1974 与 Y. Chen, 2 volumes, 1998。

科的共产国际直接组织和资助的，一个设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分支机构之一；是莫斯科为了维护其新生的苏俄/苏联政权而在各个邻国秘密煽动革命运动和政治颠覆的一部分；是一个旨在策划革命的秘密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叙事中避而不谈的苏联对中共的至关重要的秘密付款，实际上在 1920 年就开始了。根据中国史学家杨奎松等人的研究，在其存在的第一年(1921-22)，中共的总预算是 17,655 银圆，其中的 16,655 银圆(约合 35,000 美元)即 94%都是通过共产国际特工从莫斯科送来的。随着中共党员从不足 100 人扩大到 1927 年的 10,000 人，这笔苏联资助款项也逐步大幅增加。已知但不完整的数据显示，从 1921 年到 1931 年，中共的每个党员平均每年从苏联得到的补贴是 50 至 70 银圆(按 1990 年计价折合为 250 至 400 美元)，相当于当时的中国人均 GDP 的 60%至 80%，这些津贴支付了中共大部分的开支。苏联极为关键的资助直接决定了中共各种活动的种类、强度及其成效，并且往往是整个党的唯一生命线。在 1920 至 1930 年代，共产国际还花费了相当于一百万美元(2012 年计价)的 58,130 两白银亦即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均 GDP 1,600 倍的资金去训练和安置每一个组织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干部和特工；据不完全估计，这些由苏联直接培训和安置的中共干部约有 1,300 名之多[8]。

其实，中共只是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众多的冒险投资项目之一。不顾俄罗斯人民承受饥荒和贫穷的巨大代价，莫斯科还花费了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多个中国"共产主义"团体，并秘密或公开地贿赂和援助冯玉祥(以及后来的盛世才)等一些"左派"军阀发动革命和叛乱，以扰乱和削弱中华民国。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在 1920 年代初用军火、资金和政治军事顾问大力支持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到 1926 年，国民党更被接纳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之一。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更加激进，它无条件甚至无原则地支持苏联，比如在 1924 年中共就全力赞成

[8] Huang & Han 2011; Y. Jin 2010, 11-12; CCP Central 2002, 40-42; Maddison 2006, 558-60; K. Yang 2011, 66-57, 72-75, 89; Feng and Shi 2014; J. Song 2003。

莫斯科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当时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签订临时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莫斯科还指示中共以“小伙伴”的身分加入国民党，一起去征服和控制中国。中共当时大致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一个备胎式代理人，而莫斯科当时主要押注在更为主流的国民党身上。中共创党的寒酸和微不足道，可以由它的建党日期记录的混乱不清而略见一斑：自从 1930 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庆祝其错误的“生日”(7 月 1 日)而非准确的 7 月 23 日，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人会去仔细记录，中共的第一次创立会议到底是在哪天举行的[9]。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其明显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由一些政治上活跃且雄心勃勃、但是非主流的青年们组成的中国革命运动，受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通常通过日文译本而引介)的激进社会政治愿景的感召，以及满清帝国崩溃之际中国精英们感受的屈辱所激发的大汉民族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苏联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之名控制的、心甘情愿的外国在华的颠覆工具，即一个外国资助和雇佣的、企图夺取政权的政治颠覆性团体。中共成员还包括了许多理想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政治投机者和失意者、冒险家乃至“红色恐怖分子”。它的许多创始人，包括在头六年担任党总书记的陈独秀(1879－1942)，后来都不可避免地与之分道扬镳[10]。

在武力统一中国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两个合作的中国革命政党、同一个共产国际的两个中国分部即国共两党，在 1927 年暴力地决裂，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拒绝了莫斯科的意愿。被国民党清洗的中共就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唯一分支了。它被莫斯科动员起来，转入地下活动，在偏远地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像中国过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一样。但是与以往的起义、叛乱和暴动不同，中共的武装斗争有着其至关重要的外国支持。类似于几十年前的太平军叛乱，中共在进口

---

[9] Liu 3-14-2015; Y. Shen 2013; CCP Central 2002, 40-42。

[10] Brown 2009; Liu 3-14-2015; Meng 2009; Smarlo 2004, 219-32。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发动了一场颇为传统的、农民基于社会和经济诉求的反叛，以财富再分配、家族复仇、夺取权力、特别是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为号召[11]。然而，不同于那遭到外国列强鄙视的奉行一个扭曲的所谓基督教的太平军，中共则是由外国势力共产国际直接组织和资助，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都系统地模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在中国内地建立起独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它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和“富农”)来动员群众和敛聚资源，并对成千上万的同志(包括毫无事实根据的所谓 AB 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进行内部清洗和大规模处决，以便“消除异己和不顺从者”。内部的暴力清洗也许对极权主义政体去控制其党员是有效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据幸存者(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官员)刘华清等人后来的回忆，这些内部残杀确实常常是“令人震惊的恐怖”和“愚蠢的自杀行为”[12]。莫斯科一直向中共支付着巨额资金，在 1928 年底每月至少有 6 万银圆之多。在苏联的资金支付渠道于 1934 年被中华民国政府军击败中共红军所切断之前，莫斯科每个月向中共支付至少 7 万多银圆(或大约 15 万美元)，这是对中共极为重要的补充：其根据地的税收、剥夺乃至肉体上消灭所有“富人”、出口钨砂等稀有矿石等等诸项收入是有限的[13]。

中国共产党因此毫不令人惊讶地采取了一种奇特的非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与立场：它首先是要保卫和推进苏联的、而非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共红军还确实由莫斯科派遣的苏籍德国军事特工李德(又名华夫即奥托·布朗 Otto Braun 1900-74)充当其最高军事指挥。在此期间，中共显然更多的是苏联在华制造暴力叛乱的颠覆工具，而不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例如，1929 年，刚刚被国民党统一的中华民国与苏联就俄罗斯

---

[11] Y. Shen 2013; Wou 1994; Y. Chen 2002 和 2012。

[12] Gong 1978, 353-54, 562-67; P. Wang 1992, 24-27; Zhong 1995,16-26; H. Q.Liu 2004, 14-17。

[13] K. Yang 2011, 83。

在满洲(东北)遗留的铁路权益的归属之争执而发生了其第一次对外战争即“中东路事件”；中共及其红军却大力呼吁中国人民“武装暴动，保卫苏联”。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指挥优势的苏联红军在这场战争中大败张学良指挥的中华民国东北军的加仑将军(瓦西里·布留赫尔 Vasily Blyukher)，曾在 1924-7 年期间担任过国民党的首席军事顾问。不过，后来升为苏军元帅的加仑还是被斯大林清洗谋杀了[14]。

经过几轮严酷的军事围剿，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军打败了中共的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被迫逃离了华南和华中山区里的主要游击根据地，曲折迂回地通过中国西南部的偏远地带，到达贫瘠的西北山区，准备最终逃亡去苏联、或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在这长达一年(1934-35)的徒步逃亡中，中共的近 10 万人力损失了 90%。中共后来把这个逃逸自我荣耀化，解读为“北上抗日”的“长征”，并使之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人人皆知的中共政治魅力和合法性的一大主要源泉，构成了其英雄主义和顽强生命力的传奇叙事。不过，据说中共诸位领导人在整个长征期间基本上都由士兵用担架抬着走。事后看来，中华民国政府犯了一个当时看似聪明的严重误判：它只力图把中共从中原的中心地带赶到苏蒙边界，希望能够借此把莫斯科拉进来与欺凌中国的日本人对抗；同时以剿匪名义，尾随中共，借机进入西南、西北各地，取代那些晚清以来形成的地方军阀豪强，以便完整地征服并控制整个中原。蒋介石的这些算计和行为，是一个秦汉式独裁政权不难理解的“正常”行为，他由此没有在完全可能的时候和地点彻底消灭掉中共力量[15]。

1935 年初，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与莫斯科的控制者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比较本土的中共派系在毛泽东带领下趁机于贵州

---

[14] Braun 1982; Y. Jin 2010, 237-50; Lensen 1974; Z. Liu 1998, 184–94; Wilson 2002, 24 and 105。

[15] KMTCentral 1935; CCP Central 2002, 229-48; Cai 1970; Xu (1936) 2006; Smarlo 2004, 295; Liu 7-26-2015。

省的遵义团结起来，从莫斯科训练和安插的领袖们及苏联顾问手里首先夺取了军权，然后夺取了党的领导权。从那之后，中共更多地成为一个中国本土的农民起义和一个追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依赖型政党，而不再主要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苏联代理人[16]。中共的本土主义性质开始超过其共产主义性质，其目标更多地变成了不惜代价用武力和诡计去夺取中国的政治权力，而不再是去推动以莫斯科为首的抽象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后者一直是中共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和使命旗号的一个关键部分，因为这样可以使之看起来具有吸引人的高深文化，也能得到丰厚的苏联援助。为了利用中国人来抵御日益增长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同时也保存中共，斯大林在 1935 年通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共表面上服从中华民国政府，以便组成一个反日统一战线。流亡中的一些中共领袖在莫斯科据此发布了《八一声明》(没有毛泽东等红军领袖们的参与)，宣布了其新立场。1936 年初中共红军到达陕北后，接近了苏蒙边境。莫斯科与改造了的中共重新建立了联系并迅速恢复了平均每月约 5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设备。其目的是让中共存活在中国本部(China Proper 即中原 Centralia)，即使只是一个偏远地区，而不是让它继续跑到中原外的边缘地区如新疆，甚至逃亡苏联或者蒙古去避难，从而保持莫斯科希望的中共在中华民国的颠覆性作用[17]。

1936 年 12 月，历史性的西安事变真正救了中国共产党。这场绑架了蒋介石的兵变是由中华民国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1901-2001 年)以停止内战和组建中国统一战线去抗击进逼的日本帝国军队为名义而发动的。据学者们研究以及他自己的陈述，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同情帮助中共的张学良实际上应该就是一个中共秘密党员。他深受莫斯科策划支持的一些中共外围组织和人士的影响，比如号称是无党派爱国者的救国会，于是巧

[16] 毛泽东早在 1927 年就阐述了这一理念(CCP Central 2002, 144)。

[17] B. Wang 2010, 131-32; K. Yang 2011, 80- 84。

妙地利用了反日情绪去援救中共，并服务于莫斯科的新需要[18]。西安事变迫使中华民国政府停止了对中共最后的致命一击，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张学良后来被软禁在台湾时，曾公开地对他的行为表示后悔。他在 1990 年被释放后，没有再重复、但也没有收回他的忏悔。中共官方一直称赞张学良为老朋友、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但他那加入了中共的兄弟(张学思)在毛泽东时代还是被迫害致死。意味深长的是，尽管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发出邀请，张学良在获得自由后还是一直拒绝返回他 1949 年就离开了的中国大陆，选择从台湾移居夏威夷，并于十年后在那里去世[19]。

日益加剧的中日冲突、特别是随后的中日全面战争(1937-45)，不仅拯救了中共，而且还使之壮大为可以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强大对手。据一些中国历史学者的新近研究，日本帝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对中国的大肆侵略，事后看来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们对苏联煽动的中国抗日运动的鲁莽而愚蠢的过度反应。日本大举侵华其实促进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致命地重创了中华民国，并最终失控，把美国卷入战争而招致日本自身的毁灭性失败。伴随着抗日战争创造的新生存空间和民族统一战线所赋予的新合法性，中共成功地复苏为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它以抗日之名，却把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基本上留给了中华民国政府。于是，与中共力量的稳步崛起几乎成直接反比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力量的不断削弱[20]。

中共首先有效地利用了民族主义事业去获得资金和武器装备。从 1937 年到 1940 年，中共的财政开支中每年有 58%-86%是来自中华民国政府的拨款。莫斯科同时一直向中共提供着重要的秘密资金援助。1937 年来自苏联的款子“是(中共)控制地区全部财政收入的 5.2 倍”。莫斯科仅仅在 1937 年 11 月就一次性支付了 150 万美元。1940 年苏联给中共的资金仍是

[18] Z. Liu 2013, V4, 610-62; K. Yang 2006A; B. Wang 2010, 131-59, 184-208。
[19] Zhang, 1956 and 1957; Fan 1978; Tang & Wang 2002。
[20] Mitter 2013; X. Feng 2014; Liu 7-26-2015; Xie 2002; Y. Chen 1986。

"当地总收入的 1.5 倍"[21]。到了 1941 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中止其对快速增长的中共及其军队的那些无法掌控的拨款资助；莫斯科在纳粹德国于 1941 年 6 月入侵苏联后，也减少了对毛泽东的秘密付款。为了应对这种"非常严酷"的金融局面，中共加大了阶级斗争和没收富人财富的力度。不可持续的 35%-44% 的超高税率迫使许多中共根据地的农民扔下土地逃亡或参加抗税暴动。过度印发纸币很快又造成自己根据地里的恶性通货膨胀。命令部队生产自己所需的食品和衣服以及开办政府工厂和作坊的努力也只有些微的帮助[22]。为了生存壮大，中共于是转而采用违法手段，包括伪造货币和产销毒品。大批农民和部队被命令在中共根据地重新引种被禁多年的罂粟，大量生产鸦片。中共还组织了秘密的贩运网络，将鸦片不断走私贩卖给中华民国和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这个利润极高的鸦片贸易开始于 1941 年，并一直持续到 1948 年。到 1943 年，面对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占领军效果甚微的堵禁措施，中共垄断秘密的鸦片产销业利润已经占到其预算收入的一半。到 1945 年，鸦片贸易惊人地贡献了中共控制地区对外贸易顺差的 96.9%。中共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长达近十年的"革命鸦片战争"，还将其成功地掩盖起来，并于 1949 年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之后再将鸦片经济彻底根除，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体制极为了不起的控制力量[23]。

毛泽东与"民命"

中共之兴起和成功夺取中国统治权，与其领袖毛泽东密不可分。毛泽东(1893-1976)来自华南的湖南省农村，是父系

[21] J. Zhang 2012; L. Xiao 2014, 73。

[22] Liu and Li 2011; Zhu 2012。

[23] Feng 3-11-2013; L. Gao 2013; Y. Chen 1990; Y. Chen 1990, 41-117; Chang and Halliday 2006, 268-74; Vladimirov 1975, 153-54; letscorp.net/archives/65083 2016; J. Xiao 2013, 399。北京支持的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在 1960-70 年代也开展了大量鸦片贸易，其后果至今一直困扰着许多国家(F. Ye 2013)。

家长制农业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正宗传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法家思想和秦汉政体的实践者：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白话汉语，雄心勃勃，对人性和人的弱点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且玩世不恭地巧妙利用。他是一个为了权力和统治而玩弄语言辞藻和诡计操纵的真正大师[24]。

在斯大林的蓄意庇护和直接栽培下，毛泽东一直是中共高层的一个重要派系的领导人。但是在研究共产党历史的学者们所描述过的"共产主义特色狗咬狗"的你死我活的内部权力斗争中，他常常被莫斯科的其他更"正宗"的弟子们所边缘化。经过遵义夺权，在天赐厚礼西安事变后，毛泽东通过许多颇不道德的运作、贿赂、哄骗、操纵、暴力甚至酷刑乃至谋杀等手段排斥、制服、消灭了其党内的竞争对手尤其是王明和张国焘等辈，到 1942-43 年终于成为中共无可争辩的最高独裁者。在 1941-45 年间，毛泽东发动了持续多年的中共党内整风运动，无情、无休止地使用进口的苏联契卡/克格勃(Chaka/KGB)的迫害、清洗、恐吓与洗脑手段(即中共词汇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或"思想改造")，并与传统的儒化法家的种种权术诡计诸如信息控制、自我批评与输诚、效忠臣服等有效地结合起来，把中共锻造成一个纪律严明的驯服工具。于是毛泽东成功地化为中共党内升起的全能全权的"红太阳"。斯大林的赞同和选择是毛泽东个人权力崛起的一大关键，而毛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尊崇服从斯大林直到他 1953 年去世。毛的一个失败的权力斗争对手张国焘后来总结说，毛"不择手段也无所顾忌"、"抛弃了所有的道德、理想和原则"把中共变成实现他个人帝王独裁野心的战车，背叛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共产主义不再相干"[25]。

---

[24] S. Xiao 1993 和 2004; J. Xiao 2013, V1。坊间已有无数的毛泽东传记。中共官方的包括 C. Jin 2003 & 2004 以及 CCP Central 1993 & 2013；中国学者的毛传记(全部在中国大陆禁止)包括 Shan 2001 和 Xin 1993；英文毛傳記包括 Wilson 1980，Z. Li 1996, Terrill 2001, Chang and Halliday 2006, Benton 2007, Cheek 2010, Karl 2010,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Walder 2015。

[25]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185-399; Wang 1974, 11-170; Q. Hu 1994, 178-298; Gao 2000; P. Hu 1999 和 2012, 9-228; G. Zhang 1966, V3, 341-47, 430。

在"爱人民"和"为人民谋幸福"以及作为"人民大救星"而"创造新中国"种种强大而迷人的承诺之下，毛泽东真正重要的目标无非就是权力与统治的"雄心壮志"[26]。为了这个目标，任何事情包括真相、道德、生命、人民生活水平、国家利益、和平、生态环境等等，都成为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正如毛泽东的著名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27]。玩世不恭的法家弄权和治理方式，为达(统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被毛泽东推到极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教条和"为人民服务"的空洞口号代替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包装。在意识形态上和出于宣传的目的，"人民"成了上帝或天的替代；毛泽东独裁的中共则成为自命的(并且用各种大棒和胡萝卜的手段竭力维护)、无限期且唯一的人民代表。他于是用"受命于民"的民命(Mandate of the People)替代过去皇帝们的"受命于天"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授予自己无限的权力和统治合法性。毛泽东在 1945 年写的一首诗里就自称"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为人民"。中国人在秦汉政体暨中华秩序下培育内化的、强大的天命传统和观念，因此借受命于人民的民命观念而复苏，成为一个极为迷人、但其实完全空洞无物的专权的合法性源泉。人民的人权和民权及财产权、自由、民主、法治都被"人民的救星"以人民的名义在实践中抹杀殆尽。对许多被灌输说服了的中国人来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28]。

摆出代表人民的姿态，并声称自己是人民的代理或者仆人而统治人民，并非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像许多其他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统治者一样，使用各种武力和诡计(而不是通过表达

---

[26]词见《东方红》，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5 年起最著名的官方颂毛歌曲。其旋律原是陕北流行的情爱民谣《芝麻油》，在 1930-40 年代还曾被另外填词，成为军事动员歌谣《骑白马》(Q. Dai 2004)。

[27] Xiong 1999, 216, 219-20; Z. Lin 2013; S. Xiao 2004, 15。

[28] Li & Tang <1945> 2005, 143; H. Yu 2011, 4。

民意的竞争性人民选举)去确保它自己是唯一的、自命的、永恒的人民代表，这实际上是在僭用和滥用民众的名义去谋取私利。中共垄断民命、实行专政的虚假和伪善，完全可以媲美甚至超过昔日垄断天命而统治天下的帝王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政府机构、法庭、军队、警察和其他附属部门，以及货币，均带着“人民”二字；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座右铭还镌刻在北京中南海共产党总部入口正门的照壁上；中共最近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习近平都继续多次地重申过毛泽东式的受命于民、“为人民服务”的民命观。这其实与秦汉世界帝国统治者们使用过的“奉天承运”旗号并无二致[29]。2015 年，沿袭在庆祝游行阅兵仪式上呼喊官方口号的传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以“人民必胜”的口号结束讲话。闻风而动的精明商人们更在 2016 年，为求牟利而竖起一幅巨型广告牌，在一轮红日从天安门后面升起的灿烂背景上，以大字写道“人民就是天，天就是党和政府”。习近平 2019 年的最新表述是：“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30]。

毛泽东和中共由此在新词汇和进口的意识形态包装下，成功地复辟了秦汉政体的专制统治制度。天命(Mandate of Heaven)被同样空洞、诱人、唬人的民命(Mandate of the People)所取代，包裹法家内核的儒家意识形态被更加流于形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替换。这个新的秦汉政体超过了它过去的帝制版本，因为它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终极真理，论证支持其无限的暴力专政，从而更加强化和推进了秦汉式政体的法家内核，获得了类似激进神权政治的若干要素。它甚至试图打破家庭结构，去原子化和充分利用每一个人，毁坏儒家的价值规范，成为一个铁杆的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政权。作为迷信权力的法家信徒，中共贬斥了过去儒化法家统治者们至少

---

[29] J. Hu 2012; Xi 2013 年。毛泽东最初提议的国名是更长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类似于平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国号(X. Chen, 2005, 87)。

[30] Blog.sina.com.cn/s/blog_44f792630100h7l0.html；习近平“2019 年新年贺词”（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31/c_1123931806.htm）。

在名义上鼓吹的对祖先、天(大自然或上帝)、生命以及来世等价值的欣赏和敬畏。为了领袖的目标，生命包括同志的生命也全都是可以牺牲的。为了战术上的优势和每时每刻的便利，广泛地保密对于一个阴谋式革命政治组织来说，也就成为至关重要。中共的内部保密教程就明言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战士，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首先必须考虑保守秘密”。执行这个严酷纪律的一个结果是，从 1920 年代开始，中共一直都试图在每打一仗之后都去打扫战场，搜集其无法运走的伤员和掉队者，然后在政委的监督下全部予以当场处决，以防止可能的“泄漏秘密”。这种做法大大减少了中共落在敌军手里的俘虏人数，使之多了一个作战优势。直到 19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时，因为美军控制了制空权并拥有火力及侦察优势，中共的打扫战场以保密的做法才告失效。在长征的绝命逃亡中(1934-35)，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袖们不断地生育孩子，但却常常命令将这些婴儿抛弃在沿途百姓家，以免耽误自己的逃生。一些中共干部还曾因为出卖他们自己的孩子为地下秘密工作筹集资金而受到赞扬[31]

像当年的秦帝国一样，这种没有底线、无所畏惧的极权主义统治制度如果拥有足够的资源，确实有可能在政治上无往而不胜。一旦缺乏资源和技术(基于其制度而缺乏经济成长和创新能力，中共的确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则用极力压榨和牺牲人们的生活品质乃至生命作为替代，亦即毛泽东主张的臭名昭著的“人海战术”作战方式与“人民战争”，或曰全民总体战略，以及像“大跃进”之类的不计代价也不惜生命的群众运动。当牺牲生命不再是个大问题，制度上的制约因素和力量都缺失，内在的道德伦理考虑和约束也不重要，那么中共就真的会变得非常强大，特别是在对付一个碰巧(或不得不)重视生命并受到各种法律、道德或宗教理念制约的对手时，就更是如此了。

拥有新的民命意识形态、苏联的秘密付款和援助、中华

[31] X. Xiao 2012; CCP Central Party History 1994, 113; Gong 1978, 406; Salisbury 1987, 151-22, 214; S. Qiu 2013。

民国政府的拨款、中央集权且纪律严明的军事化政治组织、能够高度敛聚资源和大规模动员和使用人力物力，以及非法毒品贸易带来的厚利，毛泽东的中共建立起所谓“延安精神”或称之为“延安模式”、“延安道路”的宝贵传统，使得中共能够兴起，并征服和统治全中国。这一加强版的秦汉政体不出所料地具有很高的运作效力和持久能力[32]。正如一部美化中共历史的官方纪录片所声称，延安模式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非常活跃，是影响中国国家的治理、经济计划、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甚至外交政策的基本模式。从 1945 年以来，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始终都奉“毛泽东思想”亦即汇整精致化的延安精神作为其核心[33]。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力量在今天的崛起，仍然证明着延安模式的能量与潜力。

枪杆子、诡术与诺言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主要是美国)迫使日本帝国投降，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极权主义组织中共，已经准备好要取代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秦汉式政体。办法多多的中共已经扩大到拥有 120 多万党员，割据占领了超过 100 万平方公里的大块土地作为其根据地，约占整个中原(Centralia)面积的四分之一。它统治下的人口将近 1 亿，几乎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形成了一个中华民国里强大的国中之国并巧妙地将其命名为解放区。中共培养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有 120 万人的军队(相当于虚弱分裂的中

---

[32] 研究延安精神的有影响的一些英文著述如 Selden, 1971 and 1995, 可能受到北京官方叙事和严格控制信息的限制，往往过分强调了毛派中共的理想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表象。

[33] J. Ye 2012；《中国共产党章程 》。 1943 年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改良。毛指定的继承人刘少奇在 1945 年努力使之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C. Jin 1998, 476-69, 509-15; Cheek 2010, 14-132)。毛自己在 1945 年将其思想描述为他的“香的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他的政治对手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CCP Central 2002, 399)。王和刘到 1960 年代都遭到毛的清洗。

华民国国家军队的三分之一)和一支更大的约有 260 万人的民兵武装，再加上由征召来的农民组成的庞大支前民工力量。毛泽东不仅建立了对中共尤其是对军队的个人控制，还创设了对内极其严密的信息控制和对外精巧聪明的宣传。内部的任何异议和批评意见都完全消声匿迹，不顺从者甚至像被斩首的中共党员作家王实味那样，被从肉体上消灭掉。整顿控制的党组织、活跃的秘密警察网络、以及秦汉政体传统的治国之道户口制度和邻里连坐责任制度，共同组成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完备体系，以集中地控制中共占领地区的人民[34]。

中共效仿过去的秦汉式统治者，严格控制其国中之国的人口流动、对外贸易和信息交换。它仔细筛选审查所有的外来移民，并且一般禁止移民外出。中共对内也进行严格的媒体控制，对外在中国和国外通过有效的宣传(并利用许多其占领区之外和国外的共产党人的帮助)，用心良苦地营造出一个亲民、进步甚至民主的形象，并大加利用。中共历史学家后来也认为，某些典范性的成功宣传，如斯诺(Edgar Snow)的作品，直接影响了许多美国官员和军官，包括美国国务院以及罗斯福总统与杜鲁门总统对中共的看法。因为其内部本身的多元和分歧、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以及后来美国为了言论自由、宽容和民主而施加的种种压力，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允许中共的各种出版物几乎完全自由地发行。然而，中共的控制地区却是严格禁止中华民国和外国的出版物和媒体存在，违反者会遭到监禁乃至被处死。中共系统地制造和发行了大量误导甚至伪造的、但高度有效的“权威”宣传品，用来抹黑和破坏中华民国政府。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之一陈伯达编造的，用以攻击国民党领导人的书籍，如 1946 年的《中国四大家族》和 1948 年的

---

[34] CCP Central History 2002, 396, 407; G. Fu 2007。除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职能部门之外，中共自 1927 年以来还有一个秘密的保卫部(后改名为社会部和调查部)，负责内部保卫和外部间谍及颠覆活动。 1980 年代并入国家安全部(H. Chen 1952; J. Wang 1983, 332。

《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是很好的例证[35]。

中共兴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力量就是其广泛的间谍活动。它经过多年的仔细经营，广泛渗透至中华民国政府和军队内部，甚至打入了蒋介石的核心圈子，以及许多最高将领如傅作义、胡宗南、汤恩伯、卫立煌、张治中等人的司令部。中共成功地招募了许多中华民国高官的家人和助手作为其秘密特工，包括蒋介石本人的速记员沈安娜，以及蒋的长期私人秘书和文胆陈布雷的半数儿女(八个孩子中的四个)。在整个国共内战期间，蒋的最高机密几乎全部在第一时间就泄漏给了中共。许多中华民国的官员和军官干脆变节到中共一方。例如，蒋的核心参谋刘斐中将和郭如瑰中将，就都是中共特工。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两个红色间谍决定了内战的结局”。中共有着悠久的相关传统，即使用间谍和颠覆分子有效地对付包括海外流亡者在内的各种敌人。直到 21 世纪，有些流亡海外的政治反对者仍公开声称：现在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政治流亡者里，80%以上都是中共的特工或者线人”[36]。颇具悲剧色彩的是，在毛泽东接管了国家政权后，那些勇敢无畏做出贡献的地下特工们，不少人很快就被无情抛弃和清洗。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中共海外特务们似乎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常常成为被滥用、牺牲和抛弃的无名英雄，抱恨终天[37]。相对于派系林立、纷争不断、被迫容纳异见的中华民国政府，看起来颇为理想主义但实质是极权主义的中共于是便享有了一边倒的优势。因此，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 1944 年，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就自信地决定：用武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坚决夺

[35] Editing Team 1997, 38-39, 109; Y. Sun 1994, 29; Liu and Zhang 2011, 125-30; Gu1987, V5, 422-54, 685-727; Gu 1988, V6, 16-202。关于陈作为毛的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式宣传家的职业生涯，参阅 Zeng 2012, 28-33。

[36] Xiong 1999, 1-81; H. Wu 2010, 58-61; Z. Meng 2013, 31-33; L. Xu 1997, 144-50, 203-05; wpoforum.com/viewtopic.php?fid=1&tid=70874, 2015 年 5 月 8 日。

[37] 毛在 1949 年发布了一个秘密的“16 字方针”以防奸细之名，系统地抛弃和清洗中共地下特工(G. Fu 2011; G. Mu 2012, 8-10)。一个在香港立过大功却饱受虐待的中共特工后来怀着“对极权独裁的仇恨和厌恶”逃亡欧洲(Chou 1963, 11& 92)。

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已经到了”[38]。

中共军事力量快速扩张的另一大关键，则是它大量地使用敌军战俘。后来解密的中共文件显示，它从 1931 年起就开始用暴力、灌输宣传以及贿赂去策反战俘，尤其是政府军里那些被强征来的壮丁士兵。而在 1946 年 7 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更加强了这一工作并秘密制定了“基本不释放战俘”的政策。战俘或投降的敌方士兵要么被无限期关押甚至处决，要么被迫加入中共军队或当劳工，只有“无用的”(老弱病残)战俘和一些“为了具体的宣传与统战目的”的健康战俘才会被释放。而这些完全违背了中共公开的官方政策：优待俘虏，让他们自由回家。后来，由于中共根据地基本上耗尽兵源和财政收入，即使是“无用的”战俘也都被迫羁留并工作。那些被强制招募、重新教育和重新编组的战俘们则被大量部署到中共野战军中去，在特别的监视下，攻击他们以前的战友。到 1948 年中，这些被策反的战俘(中共官方称为“解放战士”)居然占到了中共军队的大多数(70%)，到 1950 年代中期更是占到了 80%。1945 年后，被中共秘密招募和部署的数万名前日本/满洲国军官、士兵和技术人员，以及日军中的韩裔战俘，成为它打国共内战时极为有用的力量。这样一来，中共轻易地为其迅猛而有效的人海战术攻势提供了大量训练有素且低成本的军人。因此，尽管人民解放军在内战期间有超过 150 万人的重大损失，其总人数还是迅速增长，从 1946 年 7 月的 127 万增至 1950 年 6 月的 500 多万[39]。时任高级将领的王平后来回忆说，在 19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共指挥官们照例迫使刚刚被俘的美国和韩国士兵们立即就地转身，向他们的战友开火，后来更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桌上，对美国谈判代表就这些非

[38] K. Yang 1997, 519。

[39] L. Jiang 2012, 96-103; S. Zhang 2008, ch. 1; Gu 1988, V6, 472-73; L. Fu 2006; Z. Zhang 1989; Y. Chen 2011, 96-97。这一做法后来在 1970 年代末还被用于对越战争(Qin 2014)。数字见 PLA Military Science Academy 1987, 586。

法行为提出的抗议“自豪地加以嘲笑”[40]。

中共以其绝妙的编演，误导了当时的许多美国人，并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大批宣传人员和秘密特工的主导下，以“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为口号，中共及其盟友们在中国国内外的宣传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的调停及其援助(或拒绝援助)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证明了外部因素在后中华秩序时代的中原(Centralia)依然起关键性的作用。中华民国名义上的盟友苏联，对中共则提供了秘密而大量的援助。中共用凌厉的公关战赢得了关键的时间和资源，以及来自国内外(甚至包括华盛顿和伦敦)的许多支持。除了大力美化其民族主义者的资格和诉求(同时淡化其共产主义身分)，中共还专门出版了连篇累牍的、虚假甚至令人肉麻的对美国及其理想主义领袖们的赞美，仅供外部世界阅读。并作出庄严承诺，要效法美国，在中国实行多党制选举，达致民主、自由、社会经济平等、资本主义以及人权。在 1943－44 年，作为莫斯科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称美国是照耀人类的民主、科学和自由的灯塔，“温暖了所有的受苦受难者，使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仍然有希望。…从我们小时候起，就觉得美国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将“永远是友好伙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很久以前在美国所做的同样工作，它肯定会得到民主的美国人民的同情”[41]。几十年后的 1999 年，广东汕头出版了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收集了中共在 1941－49 年间的这些典型的对外公开言论。这些话语看起来就像是一份立即要实行美式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宏伟蓝图。只是，中共这些庄严承诺，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视为宣扬具颠覆性的西方普世价值，该书于是迅速被禁。

[40] P. Wang 1992, 454。
[41] Tang 1943, 4; Editorial Board 1944, 1。

到 1945 年，毛泽东更公开宣布，他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6 年，中共正式建议或者附议了以下原则。而它们也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正式接受，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和平建国纲领》[42]：

> 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 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
> 司法独立，不受政治干预。
> 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并实行县长民选。
> 军队属于国家，实行军党分立。
> 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

在当年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民心之战中，这些诺言帮助中共得分很多，但是在中共执政已届 70 年的今天，它们依然没有得到落实。对外大肆宣传了许多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兑现的承诺之余，毛泽东和中共还竭力取悦从马歇尔将军到普通美国陆军士兵的几乎每一个在华美国人。在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延安期间，美国陆军观察组得到了周到全面的精心安排，且受到影响[43]。后世史家总结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对中国的许多作为和不作为，例如许可苏联红军进入满洲/东北，失败的国共调停，轻信毛泽东的“惊世谎言”，中了周恩来蒙骗的花招等等，都大大提高了中共胜利的机率[44]。

---

[42] Mao 1945,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纲领》，1946 年 1 月。
[43] Q. Hu 2003, 89-92, 335-60, 428-40; J. Zhang，2015。
[44] Bernstein 2014, 106-15。关于在华美国外交官的理想主义和天真，见 Service

中共精明的(对内对外)双重话语术和创造性的言行不一，在程度上和效果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中华秩序下的大多数帝制统治者们。毛泽东通过机巧地操纵语言，对外推销了一个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政党形象，同时却对内积极鼓动下属们大胆复辟秦汉式政体，即所谓“造反夺权，打江山，坐天下”。例如，毛泽东发明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空洞概念，意在“一石三鸟”：既顾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从而维系了至关重要的莫斯科脐带；同时也引进了民命(Mandate of the People)的理念，利用被扭曲的中国传统天命观，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还能吸引积极推进民主的美国及其在中国的大量追随者-这些有自由派倾向的中国人，确实有理由不喜欢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既不民主，也不能快速实现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毛式诡辩理念，是出于蒙骗和宣传而发明，但既强大又成功，历来都是中共政权的一大核心原则，至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国体。毛泽东的大量民族主义言论，和他挪用古代农业社会里儒家平等主义政治理想即所谓“大同”而通俗化了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许多阶层的中国人都极富魅力，吸引了大量渴求土地财产、缺乏地位和尊重、向往平等权益的追随者[45]。

因此，除了枪杆子、间谍和外部帮助(来自苏联的直接援助、及当时苏联控制的北朝鲜，为中共在满洲即东北作战时提供关键性的避难地和后勤供应；来自美国的“反向帮助”，即华盛顿对国民党政府的牵制和削弱)，中共娴熟地使用了诸多令人着迷的革命口号和宏大许诺，也对其夺权的成功极为重要。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自由派人士)，本来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本质深有怀疑，却因为相信了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豪赌了一把。那些决定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统

1974 和 Davies 2012。一位欧洲汉学家后来发现，周恩来是一个“患强迫症的诱惑者”，“富有操天使仪态撒大谎的才能 ... 反覆而确凿地逃脱干系” (Leys 2013, 379)。

[45] Mao 1949, V4, 1,468-8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1956-2018; Qian 1998, 5-90。

治下的著名知识分子，从中共党员(或地下党员)郭沫若、茅盾、翦伯赞、聂绀弩，到较少涉及政治的巴金、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老舍、沈从文等，后来都遭到清洗、虐待、奴役或精神上的阉割。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如傅斯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钱穆、张爱玲等，也许是看透了中共，选择与中华民国政府一起到台湾或流亡海外。用 1989 年被清洗的中共高级官员鲍彤的话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出色的演员，用他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表演”把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愚弄了。因此，在蒋介石的零散而软弱的独裁专政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政府，把中国大陆输给了中国共产党[46]。

尽管如此，1940 年代中华民国的各种民意调查(最后一次调查是在 1948 年 12 月)一直表明，接受调查的人群里只有少数支持或欢迎共产党掌权，更多人则希望保持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希望国共两党能组成联合政府。这些民意调查还是在苏联持续的“邪恶外交”，同时中共一直散布谣言、收买精英人士、组织群众运动和制造流血事件而巧妙地赢得许多公关分数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历史再一次证明，粗暴的武力、不择手段的努力、聪明的诡计和外部的干涉，往往会战胜人们的偏好和知识精英们的理性思维。最后，“一百个随机事件演变成一种必然性”：中共在 1949-50 年成为内战的大赢家，并把中华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47]。中共看似不可能，同时却决定了中国命运的胜利，也许很好地说明了这样一个哲学感悟：“邪恶总是凭借其杰出的愚弄人的力量而得胜；在各个时代都会有异乎寻常的无知与异乎寻常的罪恶之间的灾难性联盟”[48]。

中国人民，占人类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他们自然而合理地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自由、更优良的政治治理，并被这

[46] Lü 2013; Y. Xie 1999, 35-36, 44-45; M. Lin 2002, 28-32; T. Bao 2013。

[47] Pepper 1999, 89-92, 199-228; Liu 8-11-2015; Y. Zheng 2007。王国维在 1910 年后期就预见到，中华民国政治的激进化“势将导致共产主义”(Z. Luo 2013)。

[48] Chesterton 1922, 4。

一希翼所驱使，又受到理想主义的急于帮助却懵懂无知的美国的过分推动，结果做出一个决定其命运的选择。如当代中国史家杨奎松和秦晖所总结的，中国人民抛弃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一个已经多元化了的、有限的软性威权主义政权，并还在进一步转型；一个已经融入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民族主义的事实上的联邦共和国。去接受一个不择手段的、硬性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政权，即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一个深谙秦汉式统治权术的政权，且属于莫斯科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青年史家刘仲敬这样评论道：中共“这个共产国际的女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孙女”生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冷战的女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孙女”[49]。

毛泽东出色地运用了他精通的法家技艺进行夺权和征服，可以媲美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开国皇帝。1949 年中共在中国内战中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就像公元前 221 年秦国的胜利一样，并不是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是各种人们的努力和错误互动聚合而产生的历史重大转折。这是有两千年历史的秦汉式政体和中国传统权术诡计的巨大胜利，是毛泽东个人的成功，也是中共从此用一党制统治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50]。毛泽东和中共创建了一个新的秦汉式政体，为他们自己赢得了一个辉煌壮观的胜利；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些有吸引力的许诺迅速消逝，他们迎来了史诗级规模的灾难与悲哀，即被后来历史学者所断言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事实上，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前，在中共的“解放区”里已经发生了对各种“阶级敌人”的大规模屠杀，以强化对农民的动员、榨取和管束。中共领导人自己承认，仅在 1947 年，就有超过 25 万“地主和富农”被处决；在晋绥地区一地，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四分之一的农民被当成各种敌人而遭到屠杀[5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毫无疑问是中共的伟大胜利，但对中国

[49] K. Yang 2014; Q. Hu 2003, 135; Z. Liu 2014, 73-79 。
[50] Westad 2003; Tanner 2015; C. Xie 2014。
[51] Bernstein 2014, 385-98; K. Yang 2009, V1, 49-99。

和中国人民来说，它很快就显现为是一场莫大灾难、一段代价高昂的历史弯路、一次划时代的大跃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新秦汉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武装反叛和大内战一样，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血洗。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一个官方统计的国共内战的死亡人数，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像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一样，从未公布过此类信息。一些记录表明，内战中得胜的中共军队似乎和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军损失的人数一样多，甚至更多。解放军正式记录了它在1945 年至 1950 年的内战中一共“消灭”了 1,066 万中华民国政府军即所谓“国军”，但没有列出其中多少是战死的[52]。2016 年，中共高层领袖栗战书在北京公开宣布说，在 1921-49 年期间，中共至少有 370 万党员成了“烈士”。中共红军的主要军事根据地所在地江西省，人口在 1920-30 年代减少了一半以上，从 4,300 万降到 2,100 万；许多县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如果不是数千万，至少也估计有数百万的中国人在国共内战中丧生，这接近甚至超过抗日战争的战死人数。一个血腥案例就发生在 1948 年：为了夺取满洲战役的一个关键阵地长春市，据中共军旅作家后来报导，中共实施了长达 105 天的“军事恐怖主义”战术，蓄意将 33 至 65 万平民饿死，最终迫使中华民国的指挥官投降。长春之役的平民死亡数字超过了 1937 年南京大屠杀的 30 万人死亡数字。类似的悲剧还发生其他地方，比如 1945-47 年解放军围攻河北省永年县两年，导致了该地多达 90%的居民丧生[53]。

中共于 1949 年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官方正式称为“新中国”，它既是与中国古老历史的一个革命性切割，也是

---

[52] Zhong 1995,99-124; Feng 1963, 21-78; Z. Wang 2013 。

[53] Z. Li 2016; R. Ding 2015; G. Fu 2005; Z. Zhang 1989, 467-511; Lang 2014; Z. Cheng 2015; Long 2009, 198-201。

官方认定的自 1840 年以来追求民族独立的中国革命之最终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54]。进口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辞汇以及与苏联集团的同盟，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不同的新颖印象。毛泽东和中共从一开始就广泛地模仿了苏联(或者说是简单地服从了莫斯科的指令)。毛式政治武库中的一些主要珍宝，例如对军队的绝对政治化控制、秘密警察和线人网络、党垄断经济和教育、重视宣传、搞阶级斗争、对民族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操纵利用等等，几乎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忠实地复制过来的；也与旧帝制时代的许多治国术如户口制度颇为无缝衔接[55]。的确，现在看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党国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秦汉政体在观念上和实践中似乎天衣无缝地颇为匹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通过模仿苏联迅速富强起来。然而据毛泽东的情报高官回忆，其实毛曾私下断言，他的政权既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苏联的复制品，他的真正目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掌管世界[56]。

一些外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其实早已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倒退本质[57]：一个转世复活或复制的秦汉式政体，一个包装和涂饰过的“新中华帝国”。毛泽东式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跃退”，恢复了一个制度上没有分化制约的前现代国家制度(pre-modern)[58]。毛泽东的极权主义统治具有法家专制的内核，外部包装却是毛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他用僵化的阶级划分和充满暴力的阶级斗争，取代了基于家庭制度的儒家意识形态；以根据“民命”(Mandate of the People)而许诺的共产主义幻境，取代了根据“天命”(Mandate of Heaven)而期冀的天下大同目标。就其彻底、广泛、不择手段的程度而言，毛泽东的专制政体臻至一个新高度，完全可以

---

[54] Editorial Board 2002, 2–4; CCP Central History 2002, 495, 502–03。
[55] Bernstein and Li 2010; Avtorkhanov 1973, 14, 31-41, 216, 315-67;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233-74, 390-412。
[56] Kong 2010; Xing 2005, 16-23。
[57] Walker 1955; Wittfogel 1964, 463-74; Teiwes 1979; Michael 1986, 175-277。
[58] Terrill 2004; Li and Liu 1997, 328; F. Wang 1998b, 93-115。

媲美其他典型的极权主义政体，如秦始皇的秦帝国、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本质上，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套涂上伪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家极权主义独裁，取代了传统儒化法家的威权主义政治。而在毛泽东逝世以来的四十年里，则演变为涂有伪共产主义色彩和伪儒家色彩的法家威权主义国家[59]。

毛泽东很早就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去促成对他的个人崇拜，“毛主席万岁”被列为公众必喊的政治口号。据中共高级官员李锐的回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领袖们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既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忠实的儒家信徒，而更多的是虔诚服膺并践行一套把唯意志论、实用主义与崇拜暴力加以“辩证”组合的统治者，为了专政这个几乎唯一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地运用秦汉式法家政治和权术[60]。毛泽东政权的“新”处可能只是在于他从未建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他统治的仅仅是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下，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已经大为转型改变了的“新中国”，远远不是整个已知世界。因此，为本书先前分析过的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所驱使，毛“被迫”要继续与现实世界里真正的强国博弈，为了生存和权力而建立梦想的中华秩序。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也不过是基于极权主义控制和动员，没完没了地开展所谓“革命”和政治运动。一位当代中国哲学家评论道：“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泽东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合纵连横'策略”[61]。

因此，毛泽东的统治是极度躁动，经常动荡不安，对人民和社会都需索无度、极为冲击震撼。他以灾难性的实验和血

---

[59] Buckley, 2014。

[60] P. Hu 2014; R. Li 1993, 142。关于毛泽东个人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可参阅他的一些没有美化修改过的文章和个人笔记(CCP Central Document Office 1995, 1-2, 64-76, 184-88, 449-94)。

[61] Deng 2014。

腥的迫害，试图改变中国人民的心智，强化国力，从而准备发动世界革命战争。毛泽东时代由此充满了不断的紧张局势、危机、失败和极为低劣的治理记录[62]。毛的极权主义统治，被他曾经的朋友储安平(在 1957 年被清洗而消失的中共学者)称之为“党天下”，从一开始就需要不间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大规模清洗和处决来维持。据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前六年，就有 43 次全国性政治运动。或反对各种敌人和异议者(包括许多以前的同志和盟友)，或推广中共政策。这使得中共的“党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中最不讲道德、也最不可信赖的”[63]。

早在 1926-27 年，毛泽东就在湖南省发动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着“有地的都是坏人”的口号经常处死地主。而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前的 1946 年，中共继续其传统实践，就在其控制区开展了土改运动，并在 1950-53 年间实行了全国性的土改，强制剥夺私有土地，予以人均分配，为此而(常常是肉体上)消灭了那些相对成功、富裕、有土地的中国农民，即所谓地主富农阶级。血腥暴力的土改运动，据估计共处死了大约 200-450 万之多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64]。然而，毛泽东几乎立即就背弃了他对为他夺取政权牺牲无数的农民的许诺，把刚刚分配给他们的私有土地又收为国有。为了控制和榨取人民，毛泽东推动其所谓“不断革命”的社会再造(social engineering)理念，仓促而竭力地推行一场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国有化运动，这就是 1954-58 年间展开的所谓农业集体化与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中共还从 1953 年就开始实行粮食和几乎所有重要商品的国家垄断和配给制度。这些举措虽然都是进口的斯大林式治

---

[62] Harris 2015; Walder 2015; Y. Xie 1999, 54–55; Y. Hua 2015。

[63] Y. Song 2015。美国斯坦福大学之胡佛研究所现收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的一些政治运动的有关档案。

[64] G. Zhang 1966, V2, 215-19。关于中国西南地区血腥土改的事例，参阅 Liao 2008; 关于中共土改的官方叙事，见 Luo 2005; 美国人对土改运动不无支持的报导有 Hinton 1966; 关于中共利用土改或翻身去“翻心”农民，见 F. Li 2010, 5-35。

国方略，也与过去的秦汉式政体的传统政策相当一致。1950 年设立(1958 年正规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制度还以空前的力度和广度恢复了秦国商鞅 2,400 年前开创的传统的帝国治国手段[65]。人民的土地和资产(即所谓“生产资料”)、基本生活用品、以及个人的迁徙，都被中共掌控的人民公社、各个“单位”和机构彻底而集中地控制。城市居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无权无力的依赖政权的属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超过总人口 80%)的农村百姓，好几代人都变得像农奴一样，直到 1980 年代初。在为人民服务的名义下，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唯一的地主和资产所有者[66]。

同时，中共在 1949-52 年间“消灭”(经常是肉体上处决)了共约 200 万的各种“土匪”和残余的中华民国政府军。然后它又在 1950-53 年间，通过镇反(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有系统地处决和监禁了大量各种“敌人”和“坏人”。毛泽东为此运动还亲自规定了必须监禁总人口的 5%和处决总人口的 0.1%的秘密而严格的指标，从而在全国处决了“至少”71 万 2,000 人(是当时五亿总人口的 0.124%)。这些被匆忙大规模屠杀的人大多是中华民国时代的精英阶层或政府雇员，他们当中的许多其实曾经大力帮助中共取得内战胜利。现在知晓的档案显示，为了取悦毛泽东，积极表现的地方官员还往往超额完成屠杀配额指标，令人难以置信。江西省政府处决了 0.16%的本省人民，福建省更是大规模杀害了其总人口的 0.26%。在较不积极的上海市和江苏省，毛泽东甚至亲自督促，并多次发电报命令“要迅速杀掉几千人或者更多”。于是最为国际化的上海也组织了许多大规模的公开处决：1951 年 4 月 30 日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一次就公开枪决了 285 名被匆忙宣判定罪的囚犯。中共还在 1951-52 年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无情地摧毁和控制了工商业界，导致了广泛的抄家没收、监禁劳改、

---

[65] 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见 Y. Chen, 1983, 209。关于中共对农民的剥削，见 Ash 2006, 959-98。户口制度见 F. Wang 2005, 44-53。

[66] Spence 1990, 576-83; Walder 1988; Friedman 1993; S. Dong 2011; Thaxton 2016。

死亡与自杀[67]。

毛泽东还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名义，迅速展开对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的心灵的极权主义改造，从而开始了论者认为“毁灭中国精英”的几十年。他首先拿电影《清宫秘史》(1950 年)和《武训传》(1951 年)开刀，继之是 1954 年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和 1955 年的反胡风运动，从而开启了此后不间断的党内权力斗争，残酷清洗掉任何敢于有异议的中共官员、包括原本忠于自己的人。其实，基于其延安整风(1942-43 年间达其顶峰)的传统，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 1947-48 年间，就为了清洗整顿队伍而发动了无情的批判和人身攻击运动[68]。除了自杀的高岗和在 1971 年神秘叛逃中身亡的林彪外，几乎所有被毛泽东清洗的受害者，在毛死后都得到了中共的“平反昭雪”。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ötter)观察说，非常明显，中共的“解放”和“革命”也没有带来多少“和平、自由和正义”，即使是在头几个蜜月年度里，也“一开始就主要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恐怖和系统性暴力的故事”[69]。

从 1957 年到毛泽东去世的 1976 年这二十年间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成为了毛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最差记录，也是其政权本质的最佳例证，同时也显示了秦汉式政体那惊人的控制力和破坏力。这些事件所展现出的暴政统治之邪恶性和致命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匹[70]。秦汉式政体受到“不

---

[67] 时任内政部长的薄一波之报告，引自 L. Xin 2008；Strauss 2002, 80-105; C. Li 2005, 41-44; K. Yang 2006, 46-62 & 2009, 191, 215-59; S. Ying 2014, 3-7。其他地方也有过类似的指令性大规模处决，如广东宝安(深圳)(Nan 2016)。 Spence 1990, 536-40。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法律制度，参见 Cohen 1968。关于中共长期以来大规模地为政治目的而使用死刑，参阅 N. Zhang 2016。

[68] X. Hu 2012; Spence 1990, 542-67; H. Li 2003, 339-86; Qian 1998, 21-47, 127-47, 245-67。当然，中国大陆今天依然有人为毛的社会和思想改造辩护，如 X. Xia 2014.

[69] van Ginneken 1976; Zhao and Liang 2008, 18; Z. Li 2011, V2, 765-856; Dikötter 2013, ix。

[70] Qiu 1997; 幸存的被清洗中共高官的故事可参阅 Xiao , Li & Gong 1998; 被清洗迫害的精英们的事例，可参阅 Pomfret 2006。

得不”建立一个中华秩序世界帝国之逻辑而激起的勃勃野心，由苏联老大哥赫鲁晓夫的“解冻”(Ottepel 即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政治变革)所引发，毛泽东在 1957 年恶意策划了一场所谓“阳谋”即“反右运动”，接着在 1959 年又来一个“反右倾运动”，竭力糟践和摧毁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良知。有 50 万到 100 万(或多达 300 万至 400 万)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按照毛亲自制定的、占全部知识分子人数 5%的指标)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被中共当作阶级(或国家或人民)敌人加以严惩和歧视虐待，包括监禁、劳改和处决。这些受害者和冤死者常常都是一些最优秀、最聪明和最勇敢的中国人。到 1980 年，除了几个人之外，还活着的十万名右派分子全部都得到了中共的“平反”[71]。

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于是只剩下了毛泽东那一个自由的头脑和一个随意的声音，巨大的失败和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幻想着他的秦汉式政权能奇迹般富强起来，进而从莫斯科手里接过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并从美国手里接过世界领导地位，竭力推进了所谓的“大跃进”运动(1958-61 年)，以其无比的仓促与狂妄、惊人的无能和愚蠢、以及残酷无情的手段去操控中国的经济活动，试图一举在钢铁和粮食产量等经济指标上赶超英国和美国。结果，荒谬的大跃进造成了持续三年以上(1958-62 年)的经济崩溃和大饥荒，导致约三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中国当时总人口的 7%)。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的非自然死亡，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毁坏不动产”的运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为饥饿驱使的人食人现象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报导[72]。

---

[71] L. Guo 2014, 3-8; 反右的有关文件可参阅 Y. Song 2015; Yao 1993; Dai 2000; Y. Xie 1999, 202-322; D. Guo 2009, 12-18。

[72] Dikötter2011，xi，169. 关于大饥荒的更多著述有 Jin 1993, 13-22; J. Yang 2008; Ding 1991; R. Li 1999 V2, 76-85; Manning and Wernheuer 2012 and X. Yu 2015. 目击者的回忆可见 Yi 2013 。有关大跃进的中共文件，可参阅 Y. Song 2013。大饥荒的代表性个案可参阅 S. Yao 2010, 48-49; Z. Zhang 2004, 42-44 和 Dong 2008。关于大量死亡和人食人的报导，参见廖 2002, V3, 240-50。在一个气候条件正常的肥沃

大跃进惨败之余，毛泽东被迫放弃了他一无所知的经济管理领域。此后，他惊惧于其不稳且受到挑战的地位，于是又用自己熟悉的伎俩玩弄阴谋，以图粉碎那些敢于削减其权力的人，并且遮掩粉饰其治国的愚蠢、无能与失败。毛狡猾地把本应该五年一次，在 1961 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拖延推迟到 1969 年(上一次是 1956 年)；并先煽风点火，设下陷阱，清除他认为威胁其权威的党内政敌。为此，毛泽东先后发动了"四清运动"(1964-66)和"文化大革命"(1966-76/7)这两场全国性的大清洗和内战式的群众性大混乱。毛泽东操纵了这些运动，为了巩固其帝王式个人权力，制造和利用一些空洞而虚伪的阶级斗争口号和革命姿态，不惜打碎和重组他担心已经失去了个人控制的政府，残忍地迫害了包括他的指定继承人刘少奇在内的数千万人[73]。除掉刘少奇后还不过两年，毛泽东的共谋者和正式宣布的继承人林彪及其家人也被清洗。他们在一个据说是失败的宫廷政变后，因逃亡的座机坠毁死在蒙古国(有学者认为他们是被毛泽东策划的阴谋所谋杀)[74]。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导致了中国人的大量非自然死亡(估计为 180 万至 730 万甚至 2,000 万)，制造了各种冤案迫害多达一亿人，给中国文化艺术和古迹都造成了浩劫和毁灭。这是尼

的"鱼米之乡"安徽省无为县，多达 20%的人口在三年的大跃进中死亡(G. Xie 2006)。因饥馑而人食人的大量证据，可参阅 J. Yang 2008 V1, 49, 99-100, 131-32, 243, 274-78, 353, 451; J. Yang 2008, V2, 879; Y.Song 2013，Z.Liang 2014, 39-44。

[73] D. Yang 1996; R. Wang 2002, 146-53; F. He 2013; L. Yan 2015, 69-72。1976 年 9 月 9 日毛去世, 但 1977 年 10 月中共才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文革有关的中共文件和相关文章, 见 Song 2006 & 2007。文革文件的中共内部收集, 见 N. Wang 1988a。关于文革的学术著述, 参阅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9; Clark 2008; N. Wang 1988。官方报导, 参阅 Xi and Jin 2006。后来被禁的官方记叙, 见 Gao and Yan1986。关于毛残酷地假借革命去清洗对手的及时而深刻的早期报导, 见 Leys 1971 。关于文革中被搅动、释放、操纵和利用的中国社会之不满情绪的简明历史，参见 Kraus 2012。中共知情人士关于毛操纵中共中央会议规则和"选举"的揭秘，见 Chi 2003, 44-51。对于毛使用各种专案组清洗两百多万干部并迫害多达一亿人，参阅 J. Huang 2014, 18-22。

[74] Gao 2008。

禄式(Nero)的疯狂暴政，伤害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如当时少有的清醒人士顾准私下记叙的，还"从体制上毁坏了整个国家的道德伦理"[75]。文革期间，许多地方报导过为仇恨所驱使的人食人现象、公开的酷刑与集体强奸。这些"有预谋的团体灭绝和反人类罪"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被官方粉饰为"仅仅属于失误"，并基本上掩盖起来[76]。

毛泽东于是成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君，他君临一切，拥有无边权力。他暴虐而血腥的统治、庸俗而自私的为人，以及狡猾和不择手段的程度，足以媲美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中华帝王；他在管理国家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愚蠢和狂妄，以及个人生活的腐败和不道德，包括极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无止境的性放纵，也不逊任何一个中华帝王[77]。毛确实是一个"最自由的"人，在一个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自由的大国里，他是唯一自由的人；不惜代价地去试验其超级自恋的所谓"有关宇宙基本秩序"的"科学终极真理"；其实不过是帝制时代中华秩序观念的回收再用而已[78]。行将就木之际，作为一个未能建立世袭王朝的无嗣皇帝(他唯一幸存的儿子是精神残障病人)，毛泽东变得更加的玩世不恭和反社会，所有言行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历史地位这个唯一目的，完全不顾其灾难性的后果[79]。毛泽东暴虐而血腥的秦汉式政体(以伪马克思主义为掩饰的多"秦"而少"汉"的统治)，在他仍然活着时，就被该政体的精英(例如林彪之子林立果)暗中描述为一部永不停止的巨大"绞肉机"，摧毁了中国、中华文化、中国人民、以及包括中共领袖们在内的统治精

---

[75] Rummel 1991, 253-63; L. Xin 2011; Y. Yu 2015; Qian 2012, V2, 311-12; Brown 2015。

[76] Zheng 1993, 39-87; Z. Deng 2000, 130; Ou 1988; Y. Wang 2006 。

[77] Li 1994。一个农民之子，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居然相信和强求极为虚幻不实的粮食单产量，或许是受了其导弹项目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博士的哄骗。作为留美回国的相当卓越的科学家，钱却公然编出一些关于土地可以随意超高产的蠢话大话，为大跃进推波助澜(R. Li *Real Records* 1999, 51-52; R. Li *Witness* 1999, 50)。

[78] Cheng 2006,128, 130; Qi 2013。

[79]毛 1959 年在高级领导层面前就对"无后"深表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R. Li 1999, 110)。

英。后来，一位中国学者干脆将毛无休止的清洗斗争，比喻为类似虐待和受虐狂(S＆M)的权力快感游戏[80]。

后毛泽东时代之中共秦汉式政体

毛泽东为了追求中华秩序的建立和个人权位，不惜令中国人民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毛自写历史的狡诈努力在他于 1976 年 9 月 9 日去世后，仅仅几周内就迅速瓦解。毛泽东清洗了所有的指定继承人，深深畏惧于政变和死后的审判，于是在临终前选择了力量软弱的华国锋作为中共的看守领袖。毛泽东关于其政治继承的最后安排，迄今没有解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长期坚称，毛泽东的遗嘱其实是要他的侄子毛远新、妻子江青乃至首席情妇张玉凤统治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历代帝王一样，毛泽东最终只能相信自己身边的家人，无论他们是多么的无能：毛泽东唯一的心智健全的儿子(毛岸英)1950 年在朝鲜半岛死于美军空袭，而他的女儿们似乎不受重视[81]。但是，满清帝国覆灭(尤其是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惨败)后，共和主义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公开的世袭统治，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个有光彩的好主意，而进口的共产主义装饰也多少限制了毛泽东搞家天下的举措。他因此不得不殚精竭虑地玩弄把戏，代价高昂、耗时费力、隐秘复杂，但最终还是失败。其花招似乎是要通过摄政王与代理人在他死后再经由“人民拥戴”去建立毛家王朝[82]。其实，毛的老竞争对手蒋介石也是使用了间接方式，通过忠诚可信的代理人严家淦，把权力循序传给他的儿子蒋经国；当然蒋经国后来决然地终止

[80] Lin 1971; Liu 5-7-2015。

[81] 香港《争鸣》杂志 2003 年 12 月部份发表的姚文元的被禁之回忆录。另见 Z. Xin 2009，2011，2012 & 2015。关于 1969 年中共高层就毛意图其妻作为其继承人的一次秘密讨论，可参阅 Qiu 2011, V2, 638-39 和 D. Wu 2004, 110-11, 224。对这些说法的反驳，可见 Yan＆Yang 2010, 25。

[82] Zarrow 2012; R. Wang 2002, 12-13, 196-97, 211-12; Z. Xin 2009, 17, 267-68, 315-88, 411-52。

了蒋家王朝并在台湾开启政治民主，远比毛那愚笨骄横的侄子和妻子更有能力也更有建树。新加坡领袖李光耀和李显龙的父子政治继承，似乎也是类似的间接过渡方式。不过，毛泽东刚一去世，他的亲信和随从就以一种传统的秦汉帝国的方式背叛了他，迅速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把他信赖的旗手妻子先秘密逮捕，然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减为无期徒刑)。江青最后在囚禁中自杀。至于毛所信任的其他摄政大员，即所谓的“四人帮”余下三人，和他的年轻侄子等一干人，也都被密捕后关进监狱里朽烂了事[83]。

毛泽东那些成效极低的项目和政策大多被废止，如同一本毛泽东传记所总结的，“整个毛的(政治经济)工程与他一起死去了”[84]。而他的名字和他的遗体则违背其意愿地被供起来去帮助维系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公开展示和朝拜前任领袖的遗体，这一共产党传统始于苏联对待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死后不葬并示众，却意味着极大的惩罚和侮辱(毛泽东本人早在 1956 年就曾写下将其遗体火化的意愿)。毛之后的邓小平，则沿用了恩格斯和周恩来等人的另一个共产党传统，不仅死后火化，还遗嘱将骨灰抛撒掉。这样，毛也成为他自己的悲剧性受害者，任由其继承者们为了政治需要而随意处置[85]。

然而，中共的秦汉式政体依然存在。其党国(官方语言称之为“党和国家”)政治从毛泽东的一人极权主义独裁专制演变成邓小平(1904-97)的最高领袖霸主式专制体制，再到一个小集团的威权主义专制政权。这个领导小集团由前任挑选任命，常常是具有红色贵族背景的男性，即拥有五到九个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领导集团通常以一个指定的“核心”人物为首，加上一些“退休的”前领袖们，以中国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像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一样统治着广袤而复

---

[83] Spence 1990, 650–52。

[84] Pantsov and Levine 2013, 8。

[85] Y. Xu 2010, V2, 767。一些异见者呼吁早日埋葬毛以结束其曝尸(J. Yu 2014)。

杂多样的中国。现今中共的领袖和高官们之间并不一定和前任有直接血缘关系，但大多是前领袖或前高官的后代，即所谓的“红二代”乃至“红三代”或“太子党”。从 1980 年代初开始，中共领导层就开始有意识地秘密栽培和提拔自己的子弟，作为所谓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接过各级领导权[86]。2012-13 年间，中共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其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从邓小平指定的江泽民-胡锦涛传给了习近平。比起中共此前 90 年里几乎总是腥风血雨的权力交替来说，这应该是一大进步。中共的党国似乎确立了一种新的权力继承方式：最高领导人的产生，由个人任命和一个不透明的内部选择机制相结合而成。只有几个人能直接决定下任领导人的人选，但大约有 400 至 500 名高级干部和各派系的权力协调人物，即所谓的推选人(selectorates)，能够参与评议。一个“政治操纵和正式机构的仪式化动员”相结合的混合方式，看起来有助于中共通过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实现统治层的新陈代谢[87]。以没有世袭皇帝的专制政权统治中国，已经成为中共秦汉式政体的一项宏大而意义深远的试验；至于其稳定性和有效性则有待进一步观察。到 2016 年，有些学者其实已经认为习近平体制正演变成一个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统治[88]。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继续着其不透明，常常触及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传统。虽然和以前相比，已经不那么血腥致命，也不再混乱不堪。这些持续不断的清洗包括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清除“四人帮”的官廷政变：据说当时被秘密逮捕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王洪文(1935-92)还曾遭到酷刑和被投毒虐待[89]；1978 年毛指定的代理人华国锋和毛的亲信、办公厅

[86] C. Li 2001 & 2009。中国还有八个装饰性的“民主党派”(Jacobs 2013, A6)。
[87] Shirk 1993, 70–82; U.S. Embassy 2014; G. Wu 2015。
[88] F. Wang 2011; M. Yang 2014; Ringen 2016。本书英文原版出版后不到半年，2018 年春，中共公开废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宪法条款，使得过去毛泽东式的个人终身独裁制度有正式复辟之虞。
[89] Qiu 2011, V2, 930-32。

主任汪东兴被清洗；邓小平指定的两名接班人胡耀邦(1987 年)和赵紫阳(1989 年因天安门事件或称“六四大屠杀”)也接连被清除[90]。邓小平主政时仍然继续使用毛式的“政治错误”罪名去清洗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此后，中共则主要使用更加不透明的腐败指控(贿赂、贪污、裙带关系、淫乱)或者只是简单的“违反纪律和规则”即“违纪”或者“违规”去清洗异己、对手和异见者：1993 年清除了杨白冰；1995 年除掉陈希同；2006 年清洗了陈良宇；2012 年打倒了薄熙来；2014 年监禁了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2015 年把郭伯雄判处无期徒刑；2017 年又清洗掉国家级领导人(原来盛传的最高领导层接班人之一)孙政才。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在毛泽东后的中国仍然继续会被清洗，虽然似乎比毛时代要略少。毛泽东在 27 年中清洗了 17 名最高级别领导人中的五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林彪)，加上五位前最高领导人在下台或者脱离中共后也遭到清算(李立三、卢福坦、王稼祥、王明、张闻天)。1976 年以后的 38 年中，中共清洗了 41 位最高层领导人中的八人(王洪文、张春桥、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周永康)，加上清算一位已死的领导人康生。

中共已经不再使用常常显得混乱失控的毛式大规模群众运动，来清洗反对派、异议干部、知识分子或任何有资源挑战自己的人。如今它基本上都是使用看似有序的反腐败行动，诉诸其党内的秘密警察机构即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使用大部分是法律外乃至非法的手段。中共中央纪委做的就是典型的秘密警察工作，它“一半的(办案)线索来自于告密和坦白交代”。在法律(和律师)介入之前，中纪委就会根据来自最高领导层的秘密指令，调查、拘留、审讯(有时辅以酷刑)并惩处官员和党员，包括令人闻之色变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

[90] 从 1989 年迄今，中共实施了严格而昂贵的的舆论、新闻和教育审查制度，在中国就天安门事件制造了一个“全民装傻健忘症(Lim 2014)。

交代问题)，这是一种无限期的秘密单独监禁[91]。纪委因此一直都是“中共内部最可怕、最有效的权力斗争武器”[92]。被清洗的官员现在一般不再被贴上反革命之类的政治标签，或者被迫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以及反党行为和思想；他们只需要接受对他们的不道德或刑事不法行为的指控。据北京知名律师陈有西的观察，大概是因为中共官员们比较了解没有法治的权力斗争之无情和司法系统由党领导的内幕，他们一旦被指控，通常都拒绝律师的帮助、干脆地接受指控和判决、放弃上诉以换取高层那不确定的宽恕或仁慈待遇，或者宁愿自杀也不愿意上庭受审判[93]。反腐常常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也易于执行，因为秦汉式政体的官场上，猖獗的腐败行为不可避免，又无所不在，一抓就准。但是中共的反腐运动已经彻底地政治化，经常被有选择地用于清除对手和挑战者、重新分配职位和寻租权，以巩固权力。

据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宣布，从 1982 年到 2012 年，一共有多达 420 万个官员因为腐败或不当行为受到“惩处”(包括一些被迅速处决和“被自杀”的官员)。但是大多数案情细节和处罚结果都没有被披露。如是，中共平均每年惩处 14 万官员[94]。这个数字在 2013 年超过了 18 万人(其中包括 6.5 万名“领导干部”，比 2012 年增加了 36%)。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 376 名第 18 届中共中央委员里，居然有 24 人(超过 6%)成为“罪犯”而被清洗。在 2016 年上半年，各级干部“受到惩罚”的数量比上年同期又猛增了 76%-233%[95]。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体下有选择性的反腐，具有强大的政治价值，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毛泽东以来，每个中共领袖都强调要坚

---

[91] 双规之外，窃听和匿名线人也是纪委可怕手段之一部分，参阅 M. Lin 2016; W. Zhou 2015; P. Li 2015; Wang 2015。

[92] He and Huang 2013; P. Zhu 2015, 11。当然，纪委官员们本身也不免因腐败而遭到清洗 (H. Feng 2015)。关于纪委的历史由来, 可参阅 L. Li 2015。

[93] Y. Chen 2016。

[94]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荣披露之数字,《京华时报》5-15-2012, A7。

[95] Xinhua 1-10-2014; Xinhua 9-11-2016; CDIC 8-25-2016。

决地清除腐败，但坚持只依赖党自上而下的秘密警察系统，谁也不去尝试那些早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反腐方法，如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媒体、公布和监督官员的个人和家庭财产，以及通过选举赋予人民政治权力。

毛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秦汉式政体的外貌和功能与以前的帝国政权基本类似，但也有其特殊之处。过去的帝国科举考试制度被替代，中共组织本身成为人们唯一的、在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向上流动的阶梯。中共党员从 1949 年的 450 万增加到 1978 年 3,700 万，再增加到 2015 年的 8,800 万。其各级分支机构覆盖了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居民区、农村乡镇、各个企业和工厂(包括外资和私营公司)、以及文化和教育机构[96]。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集权的执政党，垄断了中国的一切政治权力。它拥有武装部队、警察和秘密警察；拥有或指挥中国的媒体、教育、文化、金融各个系统和主要工业部门；拥有或控制全国所有的土地和绝大多数的中国财富。尽管如此，像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们一样，北京还是必须以无比高昂的代价与地方上的“离心”倾向作无休止的搏斗[97]。

如同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们，中共主要以忠诚与顺从为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其党员和官员。党员们被要求发誓“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98]。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精英们因此结成一个类似于秘密帮会的终身性专制集团：在中国很少有人可以主动退党而不遭受严重后果。1982 年，中共开始取消终身职务，代之以到年龄就退休的制度。然而，退休干部尤其是“离休”的高级干部继续享受全额工资、许多津贴与特权、特供物资、以及各种被创造出来的常常是终生的头衔。虽然只占中国人口的大约百分

---

[96] X. Yu 2011; CCP Organization 2015。

[97] Chung, 2016。

[98] CCP Cenntral 1982; Xinhua 1-27-2016。关于中共严格保密之传统，参阅 CCP Central History 1994。

之五到六，中共自身却成为一个控制着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每个人的“巨大红色机器”。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大约 64 万名县处级以上现任“领导干部”，自上而下任命，占中国人口的总数不到 0.5％。其中包括约 44,200 名现任地市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以及 2,200 名副省部级以上的真正“高干”。再加上数量更庞大的离退休或非现任的，县处级以上级别的干部，就构成了掌管今日中国的共产党统治精英层。这个史无前例的庞大贵族化官员群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负担，比直接供养他们的巨大财政负担还要大许多，因为官员的无数家庭成员和亲友，通常都会利用权力为自己寻租牟利[99]。

中国现行的是一种没有分化的前现代国家制度，它“七套班子”的党国体系-负责所有关键决定的中共党委、中共纪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中央、省、地市、县、乡镇各级实行垂直的全面统治。加上政府主持的群众团体，如共青团、政府工会、妇女组织以及政府控制的一些专业协会和商会，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至少五个层次上都建立起无比庞大的党国官僚机构。一个典型的县级党政机关在 2010 年代，据说就有 90 个“标准机构”、16 个“群众组织”、35 个县财政负担之单位，以及 55 个以上的“其他部门和办事机构”[100]。

中共的权力是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保障的。解放军是由全国出资、全民出人，但是却宣誓只效忠于中共的指挥。从毛泽东开始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一直都按照传统保持着对军队的严密而高度集权，而且往往是个人的直接控制。据一些解放军高级军官回忆，毛泽东曾要求，哪怕是调动和部署一个排的兵力，也要由他亲自批准；他还亲自面试和任命所有师长级以上的军官。据数名解放军高级军官相告，现在还是需要中共最

[99] Q. Ma 1989, 179; McGregor 2011, 1-33; zhihu.com/question/21197062 與 blog.sina.com.cn/s/blog_441f25da0102vey4.html，2015 年 8 月 20 日。

[100] Tieba.baidu.com/p / 3422163689，2015 年 8 月 16 日。

高领导人的直接批准才能动用和部署一个连以上的兵力[101]。

在极权社团主义(totalitarian corporatism)风格下，中共竭力把所有商业、行业、社会团体、教育、文化艺术机构以及宗教组织的领袖和精英，甚至包括一些体育和演艺明星，都整合起来，给予名利甚至权力，组成一个在现政权中具有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中国所有的教堂、寺庙和清真寺都必须在政府注册登记并被置于国家宗教管理机关的监管下；宗教人士常常成为国家支付工资的有官方级别和特权的干部；许多高级宗教职员如官方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最高领袖们，后来被发现是中共的秘密党员。自我组织的独立宗教团体是非法的，会受到起诉和迫害。中共有时还会干脆用死刑来清除那些不受控制的信仰组织领袖[102]。

与过去的许多秦汉式统治者们一样，中共十分依赖秘密警察系统。除了从中央到乡镇一级的、资金充足和装备良好的各级纪委之外，中国现在至少还有四套垂直的秘密警察和情报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广泛的秘密特工和线人网络：国家安全部(相当于前苏联的克格勃)、公安部的秘密局处(政治保卫局处和互联网管理局处即网络警察等)、解放军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情报网络、以及国家媒体如新华社和政府智库的秘密调查报导和内参制度[103]。还有一些因事而设的部门，如反法轮功的机构。窃听、网络和音频及视频监控在中国都很常见。据报

---

101 H. Zhang 2013; F. Wu 2006, 731; P. Wang, 1992, 584。

102 Z. Deng, 2011。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佛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的领导人时常会被官方讣告披露出其长期的秘密中共党员身份，例如包尔汗(cpc.people.com.cn/daohang/ n/2013/0226/c357214-20604566.html, 2013 年 2 月 26 日)。关于镇压和处决独立宗教领袖，参见 Liao 2008, V2, 48-73。

103 关于中国秘密警察的系统性学术著述很少，新近的但仍然很不充份的是 X. Guo 2012。中共很早(1920 年代)就创设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作为其秘密警察(Gong 1978，569-79)。1930 年代后期扩大为社会部、情报部和(地下)城市工作部(CCP Central History 1994, 119-25, 139, 16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放军情报网络经常在内部侦察异议和被用于权力斗争(S. Lin，2012)。有关中国的全球最发达的网络警察，参阅 X. Tao 2007。 Y.Hai 2014; X. Ma 2014。关于邓小平如何依靠内参获取信息，参见 Yin 2012 和 K. Yu 2014, 5-6, 9。

道，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们互相之间还会建立各自的秘密窃听间谍网络[104]。中共秦汉式政权的支柱还包括装备齐全、据说至少有 150 万人的第二军队即人民武装警察部队(2016 年更名为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地方公安局和派出所雇用的大约为普通警察两到四倍的所谓协警(警察助理)、以及世界上按人均计算规模最大的普通警察力量[105]。一旦有需要，中共还会命令解放军正规野战军的装甲部队镇压民众的大规模反叛，就像 1989 年他们在北京所做的那样。

中共要比以往的任何秦汉统治者都更加深入地渗透和掌控整个社会。其控制和汲取直接深入到县以下，达到了乡镇一级，直至每个农村的村庄和每个城市的社区。秦汉式政体的标志之一是社会的原子化和个人在政治上的边缘无力化，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都超过了以前的帝国时代；听命于上级的基层党组织，取代了过去县以下士绅们事实上的地方自治。普通的、秘密的、武装的各种警察部队以及协警们之外，还有一支庞大的秘密招募来的线人大军，包括知名艺术家、学者、大学生甚至高中生在内。这些有偿或自愿的秘密举报人，是活跃在每个社区的所谓“治安耳目”、治安联防队员/积极分子、或者“信息员”，包括在许多大学教室里秘密招募和安置的学生线人[106]。为了控制和操纵互联网，据报道中国有“至少 200 万”名网络警察进行即时在线审查。中共的共青团还招募了超过 1,000 万名匿名的“志愿”博客作者和跟贴者，其中包括数十万名 20 岁以下的少年。多达两百万雇用写手，包括一些在押囚犯，成了政府的“网络评论员”或“网络宣传工作者”；他们被称为“五毛党”，据说他们得到批准发布的每一帖能得人民币五毛钱(大约

---

[104] George Knowles, “Inside China’s Big Brother HQ,” *Daily Mail*, October 1, 2016。He and Huang 2013, 91–92。

[105] Wines 2009, A6; Cao 2000, 464-65。1990 年代后期，中国城市警察密度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多(Z. Li 1999)。

[106] PRC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1999, 234-52。招募知名学者和学者当线人的例子可参见 Ying and Conceison 2009 和 W. Gu 2009, C15。课堂告密者主要用于确保教师遵循党的路线。

八美分)或更多的报酬[107]。在中共宣传机构的严密而具体的指导下，这支隐秘大军每年在中国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至少发布 4.88 亿次具欺骗性和转移视线的帖子[108]。在北京市的一个区(西城区)，警方要给超过七万名的举报人和治安助理发放工资；2015 年仅仅四个月里，该区警察为线人(招募来的退休人员)所提供的 753 条“有价值的线索和提示”支付了超过 50 万元的现金奖励。所有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包括政府邀请的“外国专家”，不出所料地都会受到系统不同程度的监视和“管理”。有报导显示，警察与黑社会流氓的串通已经“根深蒂固”而“有效”，在中国和香港都存在。中共的窃听和渗透似乎也已经扩张到海外华人社区[109]。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续了秦汉式政体的总体性(totality)。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有野心、有影响力和富有的人，但凡不顺从、违抗官方、变得无法控制，或他们与被贬黜清洗的某些官员和政治派别有关系，都会因为各种理由，比如夸大甚至捏造的指控，而遭到放逐、清算、监禁甚至处决。在大多数国家里，富裕阶层都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并获得可观的政治权力，例如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6 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从 1999 年到 2008 年的十年里，入选中国最富有人名单的富豪们，有 49 人被政府逮捕过(其中 19 人被判入狱甚至死刑)，17 人被调查，七人失踪，六人“非自然”死亡，还有许多逃亡国外。据报导，中国超级富豪“被起诉、调查或被捕的比例为 17%，而

---

[107] Beech 2015, 5。共青团中央 2015 年规定要招募 1,008 万名“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占全部共青团员总数的 10%(CYL Central 2015, 8)。福建省共青团组织的任务是招募 33 万人，而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招募到 15.76 万人，包括 14-18 岁的男生 92,539 人，女生 3,870 人(CYL Fujian 2015)。

[108] King et al, 2016; Zhang 2014; T. Li 2014; L. Zhang 2010; AFP 5-15-2011; Philips 2013。关于一个城市(江西省章贡地区)极为活跃的“五毛党”和网络间谍分子，参阅 Zhanggong 2014。关于泄露的充当秘密线人和五毛党的上海大量大学生的个人信息，参见 Shanghai Government 2015。

[109] Chi 2015, A6; Brady 2003; Sun 2009; Central News 2014; Freitas 2015。

同一期間，其他普通企业家里的这一比例为 7%”。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超级亿万富翁像周正毅、袁宝璟兄弟、黄光裕、徐明、刘汉兄弟、徐翔、杨斌，不管在政治上是如何顺从中共，常常因为他们与某些被清洗的中共领导人(权力斗争的输家)有关系，就很容易被监禁、没收资产乃至处死。成功的富商(如曾成杰)曾试图成立私人银行，但此举威胁到中共至关重要的银行业垄断，因而迅速地被逮捕、秘密判决并处死[110]。在 2009-10 年间，野心勃勃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在重庆发起了一场“打黑”的群众运动，逮捕、没收和监禁了数百个当地商人和官员(其中一些被迅速处死)。薄在 2012 年戏剧性地倒台，并在 2013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那些“打黑”运动掠夺的资产估计有数千亿人民币之多，迄今既未清点，也很少归还或补偿给当事人。薄的竞争对手在广东等地也开展了类似的打黑没收活动[111]。2014 年最富有的 100 名中国人中，至少有 20 人与政府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其中一名被处决，七名被监禁，八名被调查，三名流亡国外，一名破产[112]。

因此，无论是就横向铺展之广度，还是就垂直渗入之深度，中共的秦汉式政体比过去的秦汉式帝国都更加权力无限，尤其远超晚清和中华民国，然而它远远未能统治整个已知世界。这个新秦汉政体的核心始终依靠中国传统的法家统治术，新近则试图建立一个法家理想化的“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法制(legal system)，即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王在法上”，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在王上”的法治(rule of law)。迄今，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质上还是党在法上、由个人意志决定的人治制度[113]。这个新法家秦汉政体依赖广

[110] Y. Wang 2009; *The Economist* 9-29-2012; R. Wang 2013。

[111] Tong 2011; Z. Li 2013; X. Song 2012。

[112] Sina 2014。到 2018 年, 更多的超级富豪如萧建华、叶简明、吴小晖被清算入狱。

[113]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法律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官方表述常常故意地混淆“法治”、“法制”、“依法治国”、“由法治国”等概念。其基本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方面竭力并反覆强调并强力维护其传统的党领导一切的观念与实践，另一方面又有许多要依法治国，发展法制或者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宪法大于一切的言

泛的暴力诱发的恐惧；它精巧地操纵和利用人性的弱点，虽然是中央自上而下的任命，并导致官本位特权和腐败，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贤人/能人治国和一些社会流动性，只是被严格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的外观也加以涂彩和调色，经历了不少多姿多彩、甚至是戏剧性的变化：从毛泽东自相矛盾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新民主主义”(即苏联进口的伪社会主义和伪共产主义)，到他激进的革命极权主义和大汉族种族主义(以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为口号)，再到后毛“改革”时代因长期道德崩坏、“精神空虚”和混乱堕落而导致的赤裸裸的物质主义，最近又再回归到 1949 年以前的一些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价值，主要是威权主义统治者可以信赖的儒家思想[114]。在 2010 年代，毛泽东的后继者们继续回收和再用他经典的所谓“双语”(double talk)欺骗性辞藻；胡锦涛和习近平都重复提出了一个口号，要同时维护三个相互矛盾的政治价值：党的利益至高无上、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115]。

中共之秦汉政体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渗透和控制的周全无度，是合乎其政治逻辑的。因为它需要尽可能地收集和掌控所有的力量与资源，从而在没有中华秩序的不利外部条件下生存，并进而为重建中华秩序努力。七十年来，尽管有各种挑战和不利条件，作为一个神经紧绷的秦汉式帝国，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示出其非凡的持久力和维稳能力。在 2011 年春，中共领导人“郑重宣布”：“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也就是说，中共将继续坚持其垄断的政治领导权“不动摇”，绝不改变其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统治结构和意识形态

论。两者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和不相容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党领导一切与党中央(尤其是最高领袖)在法之上的原则不仅继续载入最新的 2018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也是一贯的现实。

[114] Osnos 2014, 30–35。

[115] Hu Jintao 2007; L. Huang 2015。

[116]。

2013 年，中共进一步发布了严厉的“七不准”指令，禁止讨论和研究(哪怕是学术性的)“七类问题”：民主、普世价值、媒体独立与公民参与、新自由主义，以及关于中国和中共历史的任何“虚无主义”重新解读。中共领袖们誓言“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2017 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还颇带喜剧感地公开抨击宪政民主、权力制衡、以及司法独立等“西方”观念[117]。多亏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所提供的机会和帮助(详见本书第七章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正在迅速上升。于是中共的一党专制政体，一个列宁-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染色过的秦汉式儒化法家帝国，现在是越发毫不掩饰地露出本来面目。这个强硬的秦汉式政体看起来很难自我改变，除非是出现一个代价巨大的崩溃。国际比较与竞争仍然是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因此也是对中共党国体系的最主要威胁。于是，为了确保其生存与安全，这个秦汉式政体传统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要么整个世界必须真正地、或者至少看起来是统一在中华秩序之下，要么不受控的外部世界必须要与中国隔离分开。

次优化经济与富国强军

作为一个秦汉式政权但是却没有其必需的中华秩序来匹配，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一直要比过去的大多数中华帝国都要更艰苦地通过“自强奋斗”，去首先努力推开隔离与之比较和竞争的外部世界，然后再力图更加理想地按自己的模样去重新排序整个世界。与过去的秦汉式帝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绩表现，最多只能达到平均水准，基本上还是相当的次优化(suboptimal)。但是它相当成功地、甚至是惊人地保障了自己政权的生存，并增长其国家力量

[116] B.Wu 2011。

[117] Buckley 2013, A1; Xi 2013; Zhou 2017。

(state power)[118]。一方面，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汲取和压榨的能力，以超大且不断增长的份额去占有这个大陆型大国和占人类总数 20%的庞大人口所能提供的巨量财富。受中华秩序“吃苦”精神灌输了许多个世纪的中国人民，确实也表现出极度的勤劳、守纪、对艰苦工作和巨大牺牲的超常忍耐力。另一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大大降低、甚至暂停了其重新排序世界的革命努力，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竞争和开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关键性的技术、资本以及外部市场，于是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在毛泽东时代，失败的国民经济被汲取无度的中国政府挤压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了大规模的赤贫和非正常死亡。1955 年，中国的经济产出仍占全世界总量的 4.7%，随后就稳步下降到 1980 年的 2.5%；而日本经济的同期的份额则从 2.5%上升至 10%。中国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 1950 年代初约为日本的 20%，到 1965 年就已经降为 10%。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到 1962 年下降到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仅有 207 公斤。中国媒体后来的统计表明：1949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起眼”并多次遭受漫长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化程度低、不平衡、成本高昂；“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没有得到改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和能源效率都在下降; 而且政府掠夺性汲取的大量资源，又在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人为的经济萧条中基本上浪费殆尽[119]。尽管如此，延续秦汉政体能够集中力量完成一些特定大项目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些重工业企业，获得了一些现代军事技术包括核武器和导弹，并在国际社会上，包括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留下了其外交和经济援助的足迹。

毛泽东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致回到了晚清和中华民国的经济发展轨道上，在三十多年里取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

[118] 关于 2010 年代中国经济的一般状况，可参阅 Kroeber 2016。
[119] S. Lu 2003；Tengxun 2014。

的成就。中国从 1979 年到 2012 年的 GDP 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9.8％，成为多达 220 种工业产品的世界最大生产国。就 GDP 的规模而言，中国经济从世界第十位上升到了第二位。到 2013 年，中国还积累了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3.3 万亿美元)。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目前看上去已经与中等发达国家颇为相似[120]。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记录作一个全面评估，需要另外一本书。在这里，对中国过去尤其是近四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仅仅做四点简略而必要的分析。尽管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受到许多热评和赞扬，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其实相当平庸，基本上还只是很不理想的次优化成绩[121]。

第一，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导，一个反事实假定研究(counterfactual study)表明，如果中华民国 1949 年之后继续统治着中国大陆，那么中国经济到 2010 年应该要比现在的规模再大 42%，中国人民也不会遭受数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和一长串苦难。另一个反事实假定研究则估计，如果中华民国一直统治着中国大陆，2011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应该为 15,000 美元左右，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仿，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4,000 美元左右[122]。

其次，且不论经常遭到质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仅仅用这些官方数字来做的国际比较研究就可以明确显示，中国大陆经济在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等方面均表现不佳。无论是用传统方法还是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2013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中国的 HDI

[120] Statistical Bureau 2013a; IMF 2014。中国的 GDP 增长率在 2015 年后放缓至 6.9%以下。2014 年，其外汇储备达到近 4 万亿美元的顶峰(World Bank 2016; Li and Kim 2014)，然后在 2017 年下降到 2.99 万亿美元(Xinhua 2-6-2017)。

[121] Ringen 2016, 16-26。

[122] *The Econopmist*, 8-1-2015, 20; Q. Zhang 2011; D. Cai 2007。

分数从 1980 年到 2012 年确实有所提高，但其 HDI 的国际排名(一直低于世界平均值)反而下降，从 81/124(65%位次)降到 101/187(54%位次)；而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的 HDI 国际排名位置基本上保持不变或者有大幅提升。从 1980 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HDI 衡量一直都处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类别，属于一共四层里的第三层即所谓“人类发展中等水平”，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玻利维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为伍。以测算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部分的恩格尔系数(Engel Coefficient)来衡量，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在 2010 年代仍然很低：2011 年，中国的官方恩格尔系数为 0.38(农村为 0.43)，因为通货膨胀还比上年有所上升，与美国 19 世纪 90 年代的恩格尔系数大致相同，据说尚需 47 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才能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 0.15[123]。

第三，量化的因子分析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国家投资驱动型和出口依赖型，其资本投资的回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均是十分低效。政府资本投资项目占到中国 GDP 总量的近一半，是发达经济体该比例的两倍多，其增长占中国 GDP 年增长的 72%。即使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个比例也是过高，通常显示着重大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诸如不良贷款和浪费巨大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总体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增长有限，不断下降甚至是负增长，也表明存在着系统性、大规模的低效率和资源不当配置。依靠对金融银行业的垄断和控制，中国政府借由大量不合理、不透明的过度投资而驱动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将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推压到低于折旧率，从而在扼杀长期消费的同时也销毁了现存资本。按增量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

---

123 IMF 2014; UNDP 2013, 148-9; *The Economist* 8-13-2010。中国恩格尔系数见 Statistics Bureau 2012, 表 10；而统计局局长在中共党刊上发表了一组略微不同的数字 0.36 和 0.40(J. Ma 2012)。2010 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为 0.1(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12, 8; Pritchett and Spivack 2013, 15-19)。

Output Ratio)来估算，与其他快速增长期间的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的 GDP 增长十分低效，与印度相当或更差[124]。中国消耗每一单位能源所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世界最低之一，甚至低于公认的低效益经济体如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燃烧了世界几乎一半的煤炭，排放了世界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23%，但只贡献了世界 GDP 的大约 11%[125]。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的次优化表现，还体现在它滋长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盗版问题，因本书篇幅有限暂且不论。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的中国收入和财富之不平等已经属于世界最高之列，远远高于其东亚邻国。官方零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在 2003-13 年间介于 0.472 至 0.491 之间，远高于联合国认定的发展中国家“易引发社会动荡不稳的”0.4 警戒线。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从 1980 年的 0.3 暴升至 2014 年的 0.55(同年美国为 0.45)[126]。中国大陆学者在 2010 年就报导了非常高的基尼系数(0.61)；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014 年还得出结论，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暴涨到 2002 年的 0.55，然后在 2012 年达到更惊人的 0.73[127]。

然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并不理想、成长表现也欠佳的中国经济，却迅速地使得中国政府致富和强大起来。因为缺少自由媒体也没有民主，中国的秦汉式政府有着世界高水平的汲取和压榨能力，既不受制约也不会自我设限。中国人民可能才刚刚规避了一些经济发展路上的障碍，开始摆脱贫困。但是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来定义的中国国力的崛起

---

124 *The Economist* 1-14-2010 & 10-11-2014; OECD 2013, 280-81; M. Zhang 2013; Lahart 2014。

125 World Bank 2014; X. Wang 2013; IMF 2014; U.S. EPA 2014。

126 Sicular 2013, 1-5; Guo and Sun 2012; Kuo 2014; Swanbrow 2014; 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120/100321340647.shtml 与 news.163.com/13/0118/11/8LGH1BBF00014JB6，2015 年 1 月 26 日。

127 H. Shen 2012; Y. Xie 2014。

，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真实”[128]。在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包括来自其庞大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大量收入)占到中国 GDP 的 35.3%，而且“稳步逐年上升，近几年里占 GDP 的份额不断增大”。如果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障等专项基金，2011 年按国际标准计算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到中国 GDP 的 31.3%，其总量在过去的 20 年里每年都不断增长，从 1994 年到 2013 年翻了一番还多，增长率比 GDP 的增长快好几倍[129]。中国政府收取千余种税费，包括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上高达 47%的交易税。据估算，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 2010 年平均要缴纳多达其总收入 51.6%的各种税费，其中大部分是“隐藏”的间接税。有些贪得无厌的地方政府还借一些颇有创意的名义，如“为对日本开战做准备”，去征收未来年份的税收[130]。作为对照，2011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只占美国 GDP 的 15.4%(历史最高份额是 1945 年的 20.9%)。如果把社保基金排除在外，那么美国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仅为 9.9%[13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上限为 45%)也高于大多数国家。中国员工和雇主还要承担世界上最高的六种工资税，总计高达员工工资额的 40%至 50%(某些城市甚至达到 66%)“高于德国、韩国、日本或美国”；在有统计数字的 125 个国家中，只有 10 个国家的工资税高于中国的工资税，而中国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还只仅仅涵盖部分人口，资金更是严重短缺[132]。因此，广泛的逃税一直是中国的常态，因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调查中发现，“如果(中国的)企业都诚实地缴纳了规定的税费，那么他们中间的 80%都将会破产”[133]。

---

128 Ang 2016; Christensen 2015, 15-36。

129 PRC Ministry of Treasury 2012, 表 3.3; Xinhua 1-23-2013。

130 Xuan 2010, 24-40; opinion.china.com.cn/event_1805_1.html，5-1-2015 。

131 数字见 U. 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2014 表 2.3。

1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1 年修订;Qi 2015; Y. Fang 2013。

133 T. Zhou 2010。

在中国政府汲取的估计占 GDP 三分之二的税费收入中，中央政府获得不成比例的巨大份额：通常得到全国总税额的70%以上，再加上其庞大而不透明的“预算外”收入(来自国家垄断的银行金融业、土地出售、多种专项收费以及其他的“机动收入”)，北京 2010 年的总收入达到中国 GDP 的 47%之多。因此，为了富国强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汲取压榨型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收集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从而成为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根据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强大的国家，富裕的中央(政府)和贫穷的人民”，有着三个“必须停止”的高度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从人民向政府的财富转移、从普通企业向国家垄断企业的财富转移、通过出口补贴和资本逃逸而造成的从中国向外国的财富转移[134]。像所有的政府，特别是那些受监督不力的政府一样，中国政府积累的巨额财富往往是被浪费、滥用、误置或者干脆贪污盗窃掉。据透露，富裕的中国政府今天只承担了中国医疗保健费用的 17%，而欧盟政府则是承担了 80%，美国政府承担了 46%，泰国政府承担了 56%。更糟糕的是，对 13 亿人民来说已经是很小的政府医疗保健资金的 80%以上还只用在大约 850 万名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身上[135]。庞大而昂贵的官僚们许多完全只是为了政治控制的目的：仅仅是神秘的中纪委系统，就耗费巨额金钱雇用了大约 81 万名“纪检干部”，即每八名“党和国家”干部就配备一名纪检干部去管控他们[136]。

作为一个秦汉式政体，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除了要永保自己的权力外，还有着无法回避的建立中华秩序的使命。为此，它一直用其超额汲取的新财富，建设和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实行对内控制(即所谓“维稳”)；同时又耗费巨资

---

[134] S. Zhang 2011。

[135] Dao 2006; 关于中国医疗系统之弊病，可参阅 Blumenthal and Hsiao 2005, 1165-70 & 2015, 1281-85。

[136] C. Li 2014; S. Wang 2014。

去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巨大的现金库，以追求不断扩大的对外目标。如同一个典型的秦汉式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能够集举国之力办若干“大事”，有重点地迅速扩军和发动凌厉的外交攻势。如果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仍然有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一个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而崛起，则已经是清晰的现实。它拥有全世界第二大军事预算，军事力量迅速扩张，其预算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 20 年里都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到 2015 年，中国政府承诺要花费 1.41 万亿美元(接近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在海外发展“软实力”；“相比之下，(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的总花费按今天美元计价才只有 1,030 亿美元”，只占北京新承诺的对外花费的十分之一而已[137]。为了加强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北京花费数字不详、但应该极为浩大的资金，建造了七个大型人造岛礁。暂不考虑其真正的战略效果和成本效益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的崛起和扩张，已经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之一。中国学者秦晖认为，依靠其对中国人权和环境的“赤字消费”，北京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了“令人震撼的竞争力”[138]。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汉式政体目前依然还是没有其必需的中华秩序，但是它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金钱和枪炮去为自己建造一个。

---

[137] Shambaugh 2015。

[138] H. Qin 2016。

第七章. 天下与威斯特伐利亚之间的中华博弈

1949 年以来，如同此前的一个世纪一样，外部力量仍然是持续影响、促进乃至决定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大关键性因素[1]。中国共产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由外力所建立、拯救并助其成长壮大的。北京的官方意识形态为舶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政治合法性的两大主要支柱即民族主义诉求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及其亟需的科学技术也都是来自国外。过去三十多年更是如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也主要是由外资和外贸所推动和资助。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正在成为由西方所领导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益匪浅。然而，中共这秦汉式政体的内在逻辑，依然令其负有必须建立中华秩序的历史使命：为了政权的自身安全，“必须”不断拼搏，以求统一“天下”(整个已知世界)；尚未成功时，至少也要将不受控制的外部世界与中国本身相隔离。这个中华秩序使命与现存的世界秩序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后冷战版本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的结构及其价值规范，如民主、人权、民权、言论自由、法治(rule of law)等等，在政治上对中共的秦汉式政体具有尤为致命的威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边是中国融入现存世界秩序且获益丰厚的进程，另一边则是中共竭力要远离并试图挑战当前的世界秩序，要维护其政权。这种紧张的结构性冲突，注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 B. Zhang 2002, 4-19; Westad 2012。

不得不对内和对外都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制造许多史诗般的戏剧性搏斗，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国家力量的迅速崛起，只是使得这场在天下和威斯特伐利亚之间的中华博弈更为激烈、影响更加深远。如同资深专家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所判断的，"真正的"中国挑战不仅仅是"影响区域安全的挑战"，还是"关乎全球治理的挑战"[2]。

天下使命

正如本书已经分析过的，一个秦汉式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政体，无论其外表为何，无论其统治集团是些什么人，只要面对与之共存的其他主权国家不受控制（也无法忽略其存在），还能够和自己比较及竞争，就无法心安平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实现所谓天下一统（即便只是名义上的），是任何一个自信而强大的秦汉式政体合乎逻辑、舍我其谁的命运归属。毛泽东自诩为新秦始皇，他出于本能，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华秩序以控制整个已知世界，从而真正地维护和统治其新帝国，并达至个人权力和名望的巅峰而成为最伟大的统治者。1958 年毛曾经模仿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写道："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当时他踌躇满志，正在发动大跃进，唯一的遗憾的似乎就是整个已知世界尚未统一。一个最能显示毛和中共渴求建立旨在世界统一之中华秩序的鲜明例证，或许就是铭刻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大口号之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3]。

作为杰出的权术大师，毛泽东深谙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中善于伪装、欺骗和操纵的古老智慧。如同他在中共内部和中国国内不断地与对手博弈的目的一致，毛在外交政策中的目标也是明确不变、一以贯之：保持其执政权、维护其控制力，为了

[2] Christensen 2015, 288-89。

[3] Mao 1958/1992, 648。该标语在 1950 年取代了使用了一年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另一个口号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创造新世界”的主要目的而不择手段地应对外国人[4]。为了维护和加强这个新的秦汉式政体下，毛泽东(及其继承人)通过中共垄断一切的个人权力，寻求建立新的中华秩序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核心利益。当然，中华秩序的新名称，则因时势不同和听众的变化而不尽一致：从“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解放”到中共领袖们的最新版本“新的更公平的世界/国际秩序”。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外交官，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告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中国有三大“核心利益”并按其重要性排序如下：一、维护政治制度和国家安全；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获得可持续且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2013 年公开写到：北京要寻求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取代目前“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5]。按中国资深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的分析，在其官方词汇中，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国家安全”，即中共党国体制的安全。另一位北京资深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在 2015 年直率地写到：“只有当美国尊重并且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说服中国去同样地尊重并且不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6]。

中共的外交实践，无论是它的结盟对象、战术方法，还是它虚幻的多姿多彩的口号、言论，从 1949 年以来都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前后的不一致令人眼花缭乱，充满了颇有迷惑力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在官方叙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遵循印度和中国在 1954 年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中国的外交记录表明，它在联盟关系和国际承诺等方面，都曾经有过多次的反覆甚至完全逆转，正如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美国专家高龙江(John Garver)所总结的，这全都是基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生存”的各

[4] N. Wang 1988, 2-4。

[5] J. Li 2009； Y. Wang 2013。

[6] X. Yan 2006。他于 2014 年春对笔者重申了这个观点。J. Wang 2015。

种特定的国内政治需求。资深中国外交观察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动因就是“寻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支持”[7]。

根据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批评的多寡，数十个国家(包括以前的国际“战友”和“同志”)以及国际组织曾先后被北京指责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敌人[8]。作为一个秦汉式政体，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能够控制或征服国外之前，都在竭力掩饰其真实的外交意图，并采取渐进步骤以达目的。到目前为止，北京相当积极地援引当前世界秩序的一些规范，例如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用来破坏和抹黑当前的世界秩序[9]。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公开的官方目标，就是所谓争取和维护中国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并为之而斗争。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还充满了各种对外冲突和斗争，这十分符合学者们提出的关于专制政权的战争倾向和将外部冲突政治化的一般性模式[10]。当北京在国际体系中感到自己虚弱，需要动员他国支持时，尤其会把支持民族独立、维护各国主权、主张多极化等等作为外交口号。而在自己觉得国力强盛或者有机可乘时，则又竭力领导世界革命、引领全球化、或者推进现存世界秩序的改革和重建。这与中共在国内曾经通过“统一战线”、“民主”、“自由”和“解放”等口号动员贫民和弱势群体去帮它夺权上台，然后毁弃诺言，牢牢抓紧权力不放的致胜战略，基本上是异曲同工。

与国内的政治斗争一样，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外交中很少有道义、法律或者个人心理上的自我制约，随时都可以为了主要政治目的而摒弃其公开宣布的目标，甚至来一些 180 度的外交大转弯，转身攻击盟友，与敌人媾和合作、违反任何承诺。即便是中国的国家独立和国家主权往往也不是主要的目标，

---

[7] Richardson 2010; Garver 2016, xii; Shambaugh 2013, 56。

[8] K. Fang 2014 & 2015。

[9]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僭用和滥用民族主义口号，见 Unger 1996。

[10] De Mesquita and Siverson 1995, 841-55; De Mesquita 1999 , 791-807。

而只是维护秦汉式政体之安全和存在的手段，更不用说中国人民的利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真正目标，始终与现存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各国主权平等、人权民权、政治民主等普世性的基本规范相左。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来就是一个现存国际秩序的造反派。凡有可能，它就会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规范，寻求对当前世界政治秩序的革命性颠覆，从而确保中共领导层的安全和权力。正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在 1940 年代做出的黑暗预言：“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寻求权力。…权力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党的两个目标分别是征服整个地球，并彻底消灭任何独立思考的可能性”[11]。中共在中国国内为了夺取权力并永续其一党专政，可以用革命、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名义去损害和牺牲任何集团和任何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它在外交中也是如此，始终如一(尽管看起来有点摇摆不定)地执行一种反现存秩序的博弈型外交政策。为此它不惜舍弃甚至大量地牺牲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利益，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了。若以最大化保护中国人民及其国家与民族利益而论，迄今(2010 年代末)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整体表现，如同其内政记录一样，都极为次优化，败绩连连。然而，若以保护和加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汉式政体而论，则其外交政策至今还是相当地成功和有效。中国外交政策所包含的最终实现中华秩序的深层动因和巨大能量，真实有力，也十分持久。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增长，这些动因和能量将变得日益明显、更加巨大。

毛泽东的新中华秩序世界战争

莫斯科领导的 20 世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最初与毛

[11] Orwell, 1949, 121-22, 113。

泽东的政治需求非常契合。中共的建立及其政治胜利，均是由苏联一手制造和有力促成的历史事实，也有助于巩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基因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立即宣布了他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使中国成为反西方的苏联集团的新伙伴[12]。由此，毛泽东率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随斯大林加入并推进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秩序。这个斯大林秩序其实与中华秩序极为相似，是中国历史学者们后来所认定的一个"前现代、家庭式的世界秩序"，而不是现代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13]。中共秘密地承诺自己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指挥下的一支"方面军"。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秘书之一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中共对莫斯科"尊重和服从"的程度"远远比人们知道的要深得多"；毛甚至为了迎合莫斯科所希冀的"世界共同趋势"，考虑过要放弃书面汉字，采用拉丁字母[14]。

美国虽然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生存和崛起有过关键性贡献，但是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而非真正考虑中国人民和国家利益，竭力将美国描绘成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或民族主义方面的对手，甚至将其当成北京的死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用没收资产、开除公职、群众运动(如 1950-55 年的批判胡适)，以及流放、监禁乃至处决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参与代价巨大的对外战争等方式，竭力在中国大陆抹掉美国为首的西方思想的影响[15]。

在斯大林直接而具体的指令下，毛泽东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苏联集团支持平壤入侵韩国，并且在朝鲜半岛打了历史上中美之间的唯一一场战争，即朝鲜战争(1950-53)[16]。这场战争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冷战期间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略者，让中美关系冰封了二十多年，也令中国人民牺牲了大量生

[12] Mao 1949, 1472–73; Editors 1998; Scott 2007, 20–40。

[13] K. Yang 2009, V2, 66-77; Shen and Li 2011。

[14] Editors 1998, 12; Q. Hu 2003, 328-29。《人民日报》，1977 年 12 月 20, 1。

[15] Hooper 1986; Y. Xie 2006; Ran 2014。

[16] Whiting 1960; Z. Shen 1995, 2003 & 2013; J. Chen 1996; Hwang 2010。

命、耗费了许多资源，既毁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令中国大陆失去了许多发展机会。至今，北京仍然照例对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成本和伤亡数字保密。据学者和亲历者估计，中国在该战中一共有 40 万到 80 万(甚至 100 万)人死亡，是美军战死者人数的 10 到 16 倍(甚至 20 倍)之多[17]。几十年后，一些中国研究者们公开承认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最大的(外交)惨败”，而中国则是该战争“唯一的真正输家”：莫斯科、东京和台北被视为“真正的赢家”；华盛顿(保持了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和同盟)和首尔(维护了其独立并获得更大的领土)是“部分赢家”;平壤(失地、失败、但幸存下来)是“部分输家”；但北京却是唯一一个“为他人而战、一无所获”的大输家。中国在牺牲了大量生命与资源后，不仅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和几十年与西方的贸易，并且其主要的停战谈判要求(遣返所有中国战俘，双方以三八线划界，从朝鲜半岛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也全部落空。一些读史人不无调侃地评论说，朝鲜战争还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积极的副产品”：毛唯一健康的儿子死在朝鲜半岛，使得毛家王朝难以实现；“真正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由此)得以保存”[18]。中共高级外交官何方后来公开承认：这场对外武力干涉，被大肆宣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重大国际战事的胜利，其实是由毛泽东要当“东方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及其许多错误判断和荒唐指导所一手造成，实质是代价巨大的历史性惨败。据说毛本人很快就在内部秘密承认了参加朝鲜战争是个“重大错误”，但将责任归咎于斯大林和金日成[19]。

中国对朝鲜半岛代价极为昂贵的干预，以及它从 1950 年到 1970 年代中期对印度支那的类似举动（支援当地共产党反对法国和美国），既是中共为反西方的世界革命（一开始是莫斯科所领导，后来北京自居为革命中心)所尽的义务，也为自

---

[17] G. Cheng 2013; Chang and Halliday 2006, 372; L. Zhang 2013。中国大陆学人的批判性著述有 Z. Xin 2010; Y. Mao 2013; W. Qian 2001; Z. Wu 2013。

[18] Liu Jinfeng 2013。笔者 2002-4 和 2010 年与中国大陆史学家和分析家的访谈。

[19] F. He 2014。

身的领导积累资本[20]。这些外部冲突还为毛泽东提供了充足理由和极大方便，以动员国内群众、发动本书前述的清洗和屠杀，煽起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歇斯底里情绪，实现严格的精神控制，从而有利于他巩固其新秦汉政体的统治[21]。就像《孟子·告子下》所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秦汉式政体需要政治敌人或外部"野蛮人"的存在，才能生存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国外冒险，虽然加强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中共政权，但中国人民为此承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遭受了几十年的彻底孤立，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上都大为倒退。毛泽东加入苏联集团，替斯大林打代理人战争，甚至还伤害了中共自己的党派利益，因为美国借此介入已经基本完结了的中国内战，保护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因此"无限期地"阻止了中共彻底征服整个中国，进而完全摧毁其国内政治竞争对手的计划。这既是中共为之衔恨和尴尬的一大羞辱，也是困扰北京至今的巨大不安全感的一大来源。毛泽东加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愚蠢行径，如果有一个有意义的副作用，就是使得中华民国政府幸存至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到了相当的竞争和制约作用。不过，难以忽视的是如今北京为"统一中国"花费无数资源和精力。持续未完的中国内战，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都产生过很大的负面影响[22]。

类似以前有过的情形，即两个都想君临世界、却都不甚在意法律或道德问题的统治者，为图一时方便而彼此订立权宜合约，1950 年 2 月中苏同盟正式订立。然而该盟约订立之前就已经出现根本的分歧：由谁去领导这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集团，以及由哪个共产党按自己的形象去打造和主宰那个尚未诞生的新世界秩序。毛泽东谨慎地清洗了那些过于亲莫斯科的中共同志们，暗地里表达他对整个共产主义集团"无可争议的"领袖，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强烈不满。然而斯大林也确实从来没有

---

[20] Shen and Yang 2000; Editors 2002; K. Yang 2009, V2, 144–78; Zhai 2000。

[21] Christensen 1996; J. Chen 2000。

[22] K. Yang 2009, V2, 174-215 和 2011, 208-38。

把毛视为平等伙伴，不把中共视为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可能领袖。但是在公开场合，北京还是颇厚颜无耻地对斯大林实行个人崇拜，毛泽东本人把斯大林称之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慈父、导师、最高领袖和总司令[23]。

1953 年斯大林的去世解放了毛泽东。毛也就开始全力宣扬他不仅仅满足于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野心，企求通过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去实现其新世界秩序，即中华秩序。而苏联领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希望在核武器时代用和平竞赛而不是用武力的方式去征服全世界，他的一系列笨拙言行给了毛泽东机会：毛开始梦想继承斯大林，领导一场更"有效"且"真正"的暴力世界革命。他打着"科学"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旗号。甚至干脆用一种神秘主义的"东风压到西方"的名义，要在全世界创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统全球。而毛本人则将是伟大的新世界领袖，北京也会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中心[24]。北京与莫斯科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开展的，关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空头论战，在亲历其境的中共官员阎明复看来，不过是毛泽东为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举动而已。一位中国历史学者评论说，当毛泽东自认其统治已经稳固后，"他很快就非常忘恩负义地反对起他的莫斯科赞助人来"。而未能从莫斯科争到领袖地位和权力(也没有得到想要的核武器)，毛泽东只好自力更生，幻想用大跃进使中国"早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他就能成为共产主义集团，进而全世界的不二天子(或"人民大救星")。对毛来说，只有成为新世界帝国的始皇帝似乎才是配得上自己的伟大成就：他在 1950 年代就已经把"超越马克思"，以及将其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为"世界上第一强国"作为己任[25]。中国历史学

[23] Q. Hu 2003; K. Yang 2006, 31-34; Goncharov 1995; Z. Shen 2013; Mao 1953, 1。
[24] Chang and Halliday 2006, 331-84, 397-408, 450-60; Z. Xin 2009, 24, 97-110, 131-36; L. Qian 2012, V1, 335;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413-48。
[25] M. Yan 2015; Z. Liu 3-14-2015; Jersild 2013; R. Li *Witness Account* 1999, V2, 526-27; R. Wang 2002, 126-28。

家杨奎松认为，毛泽东“最后一次依照莫斯科的指示”是在 1953 年 7 月同意朝鲜战争停火，随后就开始抢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权，以改变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原先的“父子关系”。1957 年之后，毛泽东几乎公开地向各国共产党同志们表露野心，当时在场的朝鲜高级官员黄长烨(황장엽)明显地观察到这一点，并将其秘密地记录下来[26]。

毛泽东在 1959 年秘密地把他的雄心壮志告诉高级同僚们：“我们战胜地球, 建立强国, 一定要如此, 一定要如此。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目的一定可以达到”。即使是当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包括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已经上报到北京时，毛泽东仍然继续和高级助手们秘密分享着他的梦想：要把“对立的阶级消灭掉”，然后“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到 1967 年，毛更进一步，秘密指示他的助手戚本禹准备“一项前所未有的、为了整个人类的最终计划”，其基础则是以共产主义辞藻包装的，近两千年前张鲁倡行过的“五斗米道”农业社会平均主义。这是中华秩序下未产生制度分化的前现代社会里的一种秦汉式乌托邦政治理想[27]。

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自大狂领袖，善用权术诡计，也长于装腔作势。他其实绝对崇拜物质力量。但有趣的是，为了掩饰其根深蒂固的崇拜武力和权力的拜物教本质和其虚弱的实际力量、以及其实际上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极其无能，毛泽东及其信徒都假装笃信唯意志论，把毛泽东思想吹嘘成战无不胜的所谓“精神原子弹”。其实，他们只是无限地牺牲人命与人权以弥补实力的不足而已[28]。毛泽东很快就知晓，与那些不受他控制的真正强国相比，他的党国实际上非常虚弱无力。这个新皇帝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也只有很少的实际能力和资源。1955 年毛泽东就感叹说，只有当他的党国“终于赶上并超过美国”而成

---

[26] K. Yang 2006, 52, 118-20; Hwang 2006。

[27] Mao <1959> 1993, 524; R. Li *Witness Account* 1999 V2, 99; Qi 2013。

[28] Mao 1966, 1。

为世界头号强国时，他才能安逸放心。要在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获取原子弹就成了毛泽东的解决方案[29]。第二年，毛泽东设定了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发展目标，即到 20 世纪末“一定要超过美国”。1957 年 11 月，毛泽东更在在莫斯科首次对外宣布其“超过英国”的口号。迫于日益强烈的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渴望，毛及其同志们大胆梦想要在 15 年内超过英国，并在 20-30 年内赶上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于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 1958-59 年间，毛更进一步幻想煤钢产量等指标在两年内就超过英国，七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将中国在 10-20(或者 30)年内“变成四个美国”，或者像两个苏联那样强大，因为莫斯科当时正在鼓吹要在 20 年内“变成两个美国”[30]。

为了在整个地球上实现中华秩序这一宏伟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斯大林式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制度，不惜一切代价制造现代武器，准备打一场世界核战争。由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以及其和现存世界秩序的系统性不相容，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一直用外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幽灵去唬弄人民，为其国内动员、汲取和控制做辩护，并借此把中国人民与外部世界彻底地隔离开。在 1960-70 年代里，北京反覆公开宣称全面世界大战的必然性和迫切性，“要准备早打、大打”。到了 1980 年代中期，邓小平总算做了重新评估，认定尽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推迟一段时间，也许十年。19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2001 年的“9/11”事件后，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进一步宣称新的世界大战可能在近期内不会爆发，认为一个 20 年左右的所谓“战略机遇期”出现了，正好借机努力，埋头苦干，加强自己的实力[31]。

为了在军事力量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共中央在 1962

---

[29] Y. Zhang 2007, 8; K. Yang 2009, V2, 186-94。

[30] Mao 1956, 294;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1 日。R. Li *Witness Account* 1999, V2, 127, 166, 202-4; Mao 1958, 368。

[31] T. Jiang 2014; Peng 2013; J. Xu 2014。

年设立了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领导，居于各部委之上的秘密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其成员是包括财政和情报在内各相关部门首长。该委员会旨在举全国之力，集中所有资源，并不惜任何代价，全力发展军事硬件如核武器、导弹、卫星、战机和军舰。当时的总共八个机械工业部里有六个专门负责生产军火。这六个军工部后来又改制变成了国有的“部级”军工公司。中共的这种“举国体制”，也用在旨在赢得国际认可，不惜代价获得尽可能多奖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应付一些紧急情况，如 2015 年的股市大崩盘[32]。对于这些钦定的宏大项目来说，成本和后果完全不重要，为达目的可以不惜任何手段。中国在西昌的卫星和导弹发射，就经常因碎片残骸坠落，造成附近居民生命财产损失，但秘而不报。毛泽东还曾经臭名昭著地对其助手们秘密谈到，可以牺牲当时总共 29 亿人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打赢”一场全球核战争，从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并为世界赢得永久和平”。1957 年他更在莫斯科半公开地放言，为了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可以”牺牲三亿中国人口，其口气“吓坏了东欧的共产党同志们”[33]。

从 1950 年代后期直到他去世，毛泽东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与莫斯科进行了激烈斗争。然而，北京不仅未能夺得国际共运的王位，还因为戏剧性的中苏分裂而进一步陷入国际孤立，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站到了莫斯科一边[34]。在国际上的彻底孤立和毛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激进追求，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像饿死数千万人的大跃进那样的许多灾难。毛泽东竭力要主宰一个“真正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在 1958 年他还装腔作势地告诉其高级助手，自己领导的“真正革命”正在超越马克思和列宁的成就[35]。为此北京还耗费了大量资金和生命，向外输出其武装叛乱和游击队式革命战争

[32] S. Zhang 2005, ch. 6 & 10; D. Wang 2012; Ransom & McNeil 2012; Li & Lu 2015。
[33] Z. Zhang 2009; R. Li *Witness Account* 1999, V1, 390; Shen 2013-A，ch. 9。
[34] Y. Cheng 2015; Rosewell 2012; Z. Shen 2013。
[35] Lüthi2008; Radchenko 2010; R. Li *Witness Account* 1999, V1, 323。

的观念和方法，即所谓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这波及到几乎其所有邻国特别是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甚至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数十年里花费海量资源，收买但凡愿意给予北京一点象征性乃至虚假支持和拥护的任何一个外国政治团体或个人(甚至一些西方情报机构伪装的共产主义团体)，以及煽动和资助各国各地的各种动乱和暴力革命[36]。1961 年，毛泽东煞有介事地秘密而正式地通知他的同僚们，自己要专注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革命”。1962 年，毛的大管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向中共内部宣布“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世界革命的中心，都已经从莫斯科移到了北京”。1965 年，毛泽东的副手林彪更公开宣布，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带领全人类用“人民战争”去消灭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迈向共产主义下的永久和平[37]。

北京在冷战时期一意孤行、自以为是的煽动和领导世界革命的努力代价极大，其具体数字至今仍然秘而不宣。已知的是，在中国人民忍受着赤贫、饥荒乃至大量饿死的同时，北京向世界各地多达 110 个国家提供了大规模且经常是免费的援助[38]。北京这种出于政治考虑的对外政策也许对维护中共政权有益，而对中国人民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来说几乎是完全失败的。中国人收获的是来自各国的、延续至今的敌意、不信任甚至仇恨。中国学者如沈志华发现，尽管中国人耗费了不可思议的海量金钱和鲜血，并且在与邻国就边界分歧谈判时“几乎每一次”都放弃中国领土以换取外国对北京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短短几年里，就能极其荒谬地把其为数不多的几个盟友和同志都变成了死敌(如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或者不可靠的权宜伙伴(如北朝鲜)。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对

[36] Z. Xu 2000; K. Yang 2011, 48-49; Z. Shen 2013; K. Yang 2009, V2, 252-61。
[37] L. Qian 2012, V1, 335; K. Yang 2009, V2, 236; Lin 1965, 1。
[38] 部分数字可参阅 Tencent Review 2015.

天下一统的追求，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多么的徒劳无功[39]。

北京还迅速地破坏了它与新德里的合作伙伴关系，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敌对。为了圆其新世界秩序之梦，毛泽东确实是带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反对整个世界”[40]，从而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都造成了一个其实非常不公平的、持续至今的、低下的国际地位和可憎的国际形象。在文革期间的大规模清洗和政治大混乱中，毛泽东为了重新控制权力，再次上演其经典剧本，制造一个新的外部敌人。1969 年春，中国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上挑起与苏联的边界流血冲突，发动了与莫斯科的全面对抗。于是乎，成立还不到二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但深陷与几乎所有邻国的敌对和冲突中，还同时与美国和苏联直接对抗。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任何一个，都完全可以用其极为优越的军事力量彻底地毁灭中国[41]。

为敌所救而且致富

毛泽东为中国外交政策所做的鲁莽决策和荒唐选择，加上毛那些同样糟糕透顶的国内政策，二者相互作用下，很快就将中国和中国人民拖入了一个致命的险境：在外部面临一个或两个核超级大国的军事攻击，在内部则因荒谬无比的管理不善而濒临崩溃。此外，毛泽东竭力要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共和国中最终建立传统的家族王朝，以维护他的权力和历史地位的阴毒而绝望的努力(但他还没有一个能干也深得人心的男性后裔)，更进一步削弱和破坏了中共的领导层[42]。当然，说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是一个荒谬绝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毛是

---

[39] Z. Shen 2013 & 2014, 22-32; H. Wang 2008; Perlez 2014, A6。

[40] Scott 2007, 41。

[41] D. Li 1993; Y. Xu 2006; K. Yang 2009, V2, 216-319。

[42] 一些中国大陆学者认为，毛是“不得不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将他的权位最终交给其极不称职也不受欢迎的妻子或者同样无能和缺乏经验的侄子甚至还有他的情妇，因为他的两个兄弟在他之前死了，而他精心培养的唯一健康的儿子 1950 年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国凝固汽油弹炸死(Z. Xin 2009 & 2014 L. Wu 2006; Teng 2014)。

个疯癫的病人，或者他的政策没有维护他所创立的秦汉式政体。恰恰相反，他的决策对他个人的权力和他雄心勃勃的、建立中华秩序的野心和梦想而言，其实显得颇为合理甚至还相当精明。只是对于 20 世纪的中华各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不合理且灾难深重。毛泽东和中共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情况，而成为所谓的“历史代理人”(agent of history)，受了魔咒似地做出那些邪恶而愚蠢的选择。这也是中华秩序的传统和理念(tradition and ideation)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一个有力佐证。无论如何，像两千多年前短暂的秦帝国一样，在大跃进的惨败之后，在以“文化革命”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的致命性混乱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0 年代初期几乎面临其应得的灭亡。毛的继承人华国锋在 1978 年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濒临崩溃”，并在 1970 年代初“面临死亡”[43]。

然而，与过去中华世界里秦汉式政体的周期性兴衰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汉式政体这次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而且互相联系的广袤世界。中国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经历了伟大的进步世纪(1840 年代-1940 年代)，即使是狂躁的毛泽东再煞费苦心，也无法把中国拉回 1840 年代之前的状态。中共更是远远无法凭其力量去征服和控制整个已知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在 1940 年代阻断了东京在中国创建一个日本世界秩序的努力，不仅拯救了中国，尤其是挽救了中共。该体系又在 1949 年以后挫败了毛泽东的天下梦想。现在，它则开始挽救毛的新秦汉帝国。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遵循着力量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逻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冷战，促使北京的许多敌人们调整政策和盟友关系，前来帮助毛泽东。于是，就像 1930 年代后期的故事一样，外部因素和力量再一次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从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严厉制裁和禁运；后来莫斯科主导的共产党阵营也对中共断绝关系，加

[43] Hua 1978。

以封锁。它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痛苦，并影响了中国许多内外政策。但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下，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不能控制所有的世界贸易和国际运输与通讯，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封锁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追求，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下的自然国际竞争态势的一部份，西方主要大国如英国(基于复杂的香港问题)、法国(借此挑战、制衡美国的领导权)、日本(寻求商业利益)一直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关键性的食物、医药、技术和设备、硬通货收入，开放海上运输航道。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们也逐渐改变敌对态度，要么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共毕竟统治着占人类总数 20%的人口)，要么是为了实用目的(中国可能会帮助抗衡那更强大更具威胁性的苏联的挑战；或者可以帮助抵制华盛顿的专横)。至于美国，基于实用主义，也早在 1950 年代就细微地调整了对华政策[44]。

香港，这个由英国统治的自由港，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冷战时期联系外部世界的生命线，为中共统治者们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外汇、技术和奢侈品，居功甚伟[45]。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于 1964 年与北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戴高乐并非共产党之友；法国人可能是希望利用日益明显的中苏分裂，加强自己在冷战中的独立地位和影响力，却不一定是要挑战华盛顿的政策。毛泽东非常渴求这一重大外交突破，他甚至不坚持要巴黎断绝与台北的外交关系，或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中国政府作为建交的先决条件。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可能出于自己的秦汉式政体和中华秩序立场，闻讯就毫不妥协地主动断绝了中华民国与法国的外交关系，以示抗议。蒋后来在 1970 年代初期还同样拒绝了联合国关于两个中国的成员资格安排[46]。1970 年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许多国家

[44] S. Zhang 2002; Mitcham 2005; Tucker 2012。

[45] Schenk 2001; Dodsworth and Mihaljek 1997。

[46] PRC Foreign Ministry 1964; B. Yao 2013; Y. Wang 1990, 128, 54-55。

纷纷跟进。最重要的是，两个奉行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大师，即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渴望得到北京的帮助，以脱离越南战争的泥潭，并在冷战中压倒苏联，虽然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了解过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主持下的美国政府在 1969-70 年间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和解，时值毛泽东深忧即将到来的苏联的大举入侵[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新纪元，始于基辛格(1971 年 7 月)和尼克松(1972 年 2 月)对北京的极富戏剧性的访问[48]。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 180 度大转弯，把它的老大哥莫斯科视为其后近 20 年里的头号死敌。美国再次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迄今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对北京成功实现外交和解，很可能有助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缓和。美苏在 1972 年 5 月的峰会上签订了划时代的文件《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系基本原则》。两个超级大国公开承诺，维护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承认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有效地降低了核战争和世界大战的风险，也在实质上阻止了莫斯科主导的的共产主义世界暴力革命或北京向往的中华秩序世界暴力革命[49]。美国的带头和解，以及中共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里大力收买的政治支持。共同促成北京在 1971 年 11 月进入联合国，代替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据说毛泽东当时颇感惊讶，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胜利，完全没有准备"[50]。

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掩盖的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下，国际政治自然地充满竞争，各富国强国内部也充满了政治角力，这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重大的好处。作为一名

---

[47] Waldron 2015; K. Yang 2009, V2, 283–95; Ehrlichman1986; Walker 2012; Griffin 2014; Lüthi 2012, 378–97。

[48] Burr 2002; Nixon 1978; Kissinger 1979。

[49] Nixon 1972, in Peters and Woolley 2014.

[50] Xiong 1999, 336。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力量的一个例证，对北京满怀敌意的苏联集团的十几票仍然都支持了北京(《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 10-25-1971)。

能干的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统治者，毛泽东巧妙地招募和利用了大批同情和仰慕中国的外国人作为其帮手和代理人，给中共提供政治合法性和亟需的资源，并在西方影响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社会发展愿景各方面天然具有多样性和各种争议的西方社会，很难抵挡专制政权精心的操控安排，提供的“难得的”机会/门路(access)、慷慨的物质奖励和名誉荣耀等诱饵、特意设计展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或民族主义、社会进步、多元文化)等标语口号。许多对专制暴政和社会不公正持批评态度的西方智者，也不知不觉地被迷惑、征募(有些则是被收买或被勒索)[51]。西方社会里一些重量级人物，也将他们的政治理想、个人愿景、自我实现的冲动和人生价值，投射到看来充满了新奇、活跃但又显得恭敬从命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许多外国人还常常由于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地想要“援救中国”，而成为专制政权的“国际友人”-据说列宁早就蔑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在许多重要领域里甘当北京的辩护士和协助者[52]。他们中的许多应该是沿袭了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些来华外国人的传统，真心希望能帮助中国人民。只是这一回他们碰上了实际目的完全不同而又专制能干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于是，事与愿违地，他们常常是“被利用”远多于“起作用”，实际上给中国人民帮了许多倒忙。

就以这样一种颇为讽刺的方式，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们渡过了因推进中华秩序而造就的濒死关口，被他们一直试图推翻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所拯救[53]。作为一个典型的秦汉式帝国统治者，毛泽东个人“完全垄断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

[51] P. Xu 2012; Pantsov 和 Levine 2012。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此类案例,见 Taylor 1990。关于那些在中共操弄的宣传现场发现受骗，幻想随之破灭但还是保持了对北京的同情和沉默的西方人物，参见 Barthes 2012。

[52] Safire 1987。与中国有关的此类“白痴”，可见 BBC 2010 和 Mirsky 2010。关于 20 世纪里去“莫斯科、北京和哈瓦那的政治朝圣者”之历史，参见 Hollander 1981。有关一些法国知名知识分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参阅 Wolin 2010。

[53] Z. Liu 3-14-2015。

而周恩来则是他熟练的执行助手。毛一贯利用接见来访的外国贵宾的机会，象征性地展现并巩固他在国内至高无上的政治合法性，鉴于他治国理政的彻底失败已经越来越清楚地为人所知。而对于许多中国精英来说，重新获得中华民国在 1940 年代中期已经达至的国际大国地位，差不多就是毛泽东统治时代唯一的执政亮点[54]。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逐渐加入诸多国际组织。美国最后于 1979 年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北京。

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制度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假定所有人类成员都具有一个平等的道德权利和地位，尊重并维护所有的民族国家，因而极大地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使之强大。无论它是多么的次优化乃至恶劣，北京毕竟统治着人类总数的五分之一。而中共也终于在现实面前谦卑起来，转向去寻求作为众多主权国家之一的安全，而不再试图充当世界领导者或者革命中心。本质上就像他的那些国内项目如大跃进一样，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政策也是些代价高昂、徒劳无益、可笑的失败闹剧。中共显然无能也无力去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中华秩序：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是灾难性地低效低劣，其外交被实践证明是孤立无援、十分虚弱。为了生存，中共不得不变换轨道，作出巨大让步。作为一个一贯精明的幸存者，毛泽东被迫诉诸于"以夷制夷"的老方法，就像他所鄙视的那些晚清统治者们一样。他实际上在 1960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当然他要在表面上愚弄国内百姓，仍然假装在进行所谓世界革命战争：即使当不上真正的世界领袖，至少也要强撑着面子，当一个既反美又反苏的"第三世界"领袖[55]。

1980 年代后，北京被迫进一步背弃其意识形态和条约上的盟友莫斯科，并且抛弃其世界各地的所有革命同志们，以换

[54] Z. Xin 2009, 407-08; Q. Li 2013, 97。

[55] 有趣的是，毛的辩护士们至今仍然用他为了政权的生存而终于向西方低头的开放政策去证明他的智慧和成就(L. Deng 2004; S. Yan 2015)。毛和中共一直竭力去隐瞒、曲解其外交上失败和自我否定的尴尬局面。中国大陆史学家如杨奎松对官方的歪曲已经有谨慎但甚富启发的更正性探讨，见 K. Yang 2009, V2, 252-319。

取美国的庇护和西方的食品供应、技术、资本和市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被拯救，并由此而致富[56]。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对美贸易蓬勃发展，造成巨大贸易盈余：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 1986 年为 16 亿美元(占两国贸易总额的 21%)，跃升至 2002 年的 1,030 亿美元(占两国贸易总额的 69%)，2014 年的 3,440 亿美元(占两国贸易总额的 58%)，为美国每年对外贸易赤字总量的 50%-80%，通常大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总额[5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巨额现金收入，整个中国外贸就要处于赤字状态。这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富的主要资金来源

对外开放与韬光养晦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在较为务实、较少帝王气、也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邓小平的主导下，放弃了毛泽东发动世界革命的装腔作势和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充当第三世界领袖的企图。这时期的中共似乎满足于统治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的存在。1978 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总体名称是“开放”。北京明智地抓住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所提供的机会，回到了 19 世纪末清帝国的外交政策，亦即本书第五章所描述的“以夷制夷”和“自强运动”。如同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个被许多人誉为创新的开放政策，基本上只是对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观念和政策的回收再用；不过这次有个更加集权、更加强化、广泛垄断的国家机器，以重商主义主导，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即学者蔡欣怡和黄亚生称之为“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

---

[56] Y. Chen, 2015。从 1970 年代末到 1989 年，美国大量地将空中交通管制和许多双重用途技术送到中国，从而“完全升级了他们的各个系统”, 笔者 2000 年与涉及此项目的五角大楼和雷神(Raytheon)公司官员之访谈。

[57] 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zhs.mofcom.gov.cn/tongji.shtm，2015 年 5 月 5 日访问。

义”的发展模式[58]。近四十年来，中国通过模仿外国、外贸和引进外资，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水平[59]。作为与国际资本家们的一个巨大交换，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发明家(技术所有者)和消费者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低下的环境保护成本、以及种种财税补贴[60]。作为回报，北京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就像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下一个典型的主权国家一样，为了自己获得力量和财富而积极竞争。

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发展，都没有改变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秦汉式政体的政治本质。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一党制威权主义专制统治依然完整，在邓小平及其继承人依然奉行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61]。邓小平要求“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一百年”，直到 21 世纪中期，中共要在中国成功地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力量和财富水平。邓的继承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不断地重申和阐述了这个战略规划[62]。就政治变化而言，一位中国政治学者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还只是处在“极权主义政治的后期阶段，还没有真正进化到威权主义政治”[63]。

尽管如此，外部世界也还是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向北京提供了热情而广泛的支持和援助，试图在冷战中将中国建成为可以对付苏联的一支强大反制力量。1989 年 6 月北京血腥镇压天安门运动的惊人之举，也只造成了西方援助和支持中国政策的暂停而已，虽然该事件一直令中

[58] Pantsov and Levine 2015, 377-94; Tsai 2006; Y. Huang 2008。
[59] Moore 2002; Naughton 2006; Pettis 2013。
[60] 关于中国吸引外资的隐性成本，见 Q. Cai June 2006。
[61] 邓在 1979 年首次提出(Deng 1983, V2, 158-84)。后来这四条被写入中共党章作为“党的基本路线”(CCP Central 2007 和 2012)。
[62] Deng 1993, V2, 370-71; J. Hu 2008,4; Xi 2013。
[63] F. Li 2013。

共恐惧万分。为了结束冷战和需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投票支持华盛顿期冀的“新世界秩序”，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放弃其旧有政治体系，它也很快就被重新允许进入世界市场。不过北京确实进一步收缩了原先企图发动全球革命的野心，并作出若干让步以满足西方的要求，包括在 1999 年做出一系列重大承诺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而绕过了美国政府关于至关重要的中美贸易所附加的政治条件[64]。北京似乎完全停止了关于世界革命的所有姿态和言论，并刻意地把其战略意图和目标都隐藏起来，机巧地实行低调外交的路线。1989 年 9 月，邓小平就做出了著名的“韬光养晦”指令：“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保存自己、徐图发展”[65]。北京很成功地掩饰了它与西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分歧，悄然而稳步地在国际上开展其地缘政治和权力游戏。通过对外国商界非常小心、有高度选择性的进一步开放，北京表现出与现存国际秩序合作的更大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中精力去“和谐”地参与国际竞争，追求重商主义自强自富之目的[66]。

1990 年代初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迅速地用另一套很快就广为流传的信念，支持继续与北京的广泛合作，即美国学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描述和抨击的“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67]。该信念一厢情愿且自作多情地认为，通过日益密切和更广泛的贸易和交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改变甚至放弃其社会政治制度；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派将会具有更大的可信性和影响力，而中国人民也会在现存国际秩序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北京会由此变得更加和平，更融入现有的世界秩序体系，成为一个令人期待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从而共同维护对中国人民有利的

[64] Niu 2010, 304-14。关于中共新的内部“生存战略”，见 Dickson 2016。
[65] Leng2004, V2, 1346; Z. Jiang 2006, 202。
[66] T. Liu, 2014, 556-74。
[67] Mann 2007 and 2016。

现存世界秩序[68]。北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不择手段致富的重商主义，虽然在中国造成并积累了巨大的人权赤字和环境赤字，但也确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黄金机会，诱使贪婪的西方资本家们蜂拥而至。于是，国际关系里出现一大奇观：资本主义西方与顽固的、挂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威权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竟然展开了蓬勃爆发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69]。到 2000-01 年，当美国开始质疑这一信念的逻辑，并公开将中国视为其严重的竞争对手之际，中共又如中国学者刘仲敬所感叹的，及时地“被本 • 拉登所拯救”[70]。拉登(bin Laden)这个国际关系里其实并不罕见的异数力量适时出现：2001 年的 9/11 事件，以及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都大大改善了北京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在反恐旗号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合作关系，并延续至今。

中国梦：中华复兴与全球治理

北京在 1970 年代初的 180 度外交政策大转向，时常被列为是冷战时期最重大的国际关系变迁之一，还成为大量书籍甚至歌剧的主题[71]。对于试图揣测崛起的中国力量之本质与未来的学人们来说，仍然有两大问题亟待回答：中国是否已经变得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里，通过均势(balance of power)外交政策和自强的努力来最大化其安全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已经放弃了建立中华世界秩序的革命性目标和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鉴于本书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汉式政体只要还没有实现中华秩序，就不可避免地要感到不满意和不安全。它

[68] Zoelick 2005 ; U.S. Congress 2006 。关于反对观点，参阅 Patrick 2010。
[69] 北京一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使用各种措施甚至是赤裸裸的贿赂，招募外国商人、投资者和各种“人才”(笔者在中国的多年访谈; Freeland 2011; Stoll 2012)。
[70] Bush 2015; Z. Liu 3-14-2015。
[71] MacMillan 2008; Tudda 2012; Adams 2013。

只能要么通过扩张、征服或转化，以统治整个已知世界，要么竭力否认并忽视它无法统治的外部世界，或者把外部世界与中国人民尽量分离、隔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惊人纪录，已经表明毛泽东派为中华秩序所做的世界革命努力是个巨大失败。但是中共的政治制度依然顽固地拒绝改变。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其政权生存和安全的核心利益，从1949 年以来也确实是始终如一。因此，逻辑上可预测的是，崛起的中国力量将继续在天下和威斯特伐利亚之间博弈挣扎不已，极大的可能是要重启和继续，乃至加速其追求中华秩序的历史使命。

自从中共四十多年前为了生存而做出重大的战略让步以来，北京一直都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其继续世界革命的一套说辞，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从 1960-70 年代反帝国主义(美国和西方)的同时，也与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作斗争；到 1970-80 年代与西方联合，“首先打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 1970 年代后的支持和领导第三世界各国，反对第一世界(主要是美国和苏联)，并梦想领导一个反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到 1989 年尤其是 1990 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为争取一个新的更公平的世界秩序的的“独立”外交，以及故意低调的韬光养晦；再到 2010 年代竭力推广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和“亚洲精神”，并呼吁亚洲人自行管理亚洲事务[72]。这些口号、说辞及其相关的姿态动作，可能不过是些连毛泽东都曾自嘲过的，所谓“放空炮”的宣传，为了保住北京的面子和实行国内控制的需要：即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空洞而宏伟的愿景和意识形态高调，美化、拔高中共的无限期一党威权统治并为之辩护。但它们更明确反映了中共必须继续追求中华秩序的世界革命之宿命，无论这一追求是如何地被精心掩藏，又是如何的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也不管中共为此已经遭受过大规模的、尴尬而反复的挫折和失败。也就是说，尽管在国际上做过许多令

[72] Xiong 1999, 349-54; K. Yang 2009, V2, 297-319; Y. Xie 2009; Niu 2010, 196–258, 304–08; J. Hu 2011; Editorial Board 2011; Xi 5-20-2014。

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转向和背弃，中共统治者从未放弃他们对中华秩序这最终理想的不懈追求。中共没有超越也没有扬弃其秦汉式政体；而其威权主义秦汉式政体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注定了中共必然要为中华秩序而持续努力。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为中华秩序而奋斗的当前版本是争取“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1997 年，中共确定其目标为在中共领导下至少奋斗一百年，甚至几十代人的漫长时间，“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宏伟的目标在 2007 年和 2012 年得到再次确认和再阐发[73]。习近平在 2013 年，引用邓小平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的指示，总结说，中共要维持其一党统治几十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其复兴中华之伟业。也就是说，中共要永远统治下去，至少也要与整部中华世界历史一样漫长，因为从孔子到今天的历史也才只有 70 几代人的时间[74]。一个宏大无比的中国梦也就由此被提出，描述了一个无止境的使命：复兴中国曾经有过的权力和荣耀。更进一步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015 年末的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推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具体地说，中国梦似乎就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为(更公平更合理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体系设定方向并制定规则。…以建设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75]。到 2018 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载入中国宪法。中共的这个最新战略愿景，听起来就像是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要更好地“把地球管起来”之愿景的回声[76]。

这些年来，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宣传机器都已经被动员起来，开足马力阐述和推销中国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辩护和推广中国梦。有人提出

[73] Z. Jiang 1997; J. Hu 2007 and 2012。

[74] 习近平对中共中央的讲话(CCP Central Document 2014)。

[75] CCP Central Document 2013; Xinhua 10-13-2015, 1; H. Yu 2016。

[76] Qi 2013; R. Li *Witness Account* 1999, V2, 99。

了"不同于"且"优于"当前的"美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即掺和了一些道家理念的、以儒化法家观念为基础的华夏主义或中原/中土主义世界秩序。学者如赵汀阳直接推广所谓中国固有的"天下主义"，作为指导新崛起的中国力量的战略，宣称这个天下世界观是"完全不同于"当前主导的西方民族国家世界观，并且是与之针锋相对的。"天下"被描绘成一个单一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强调整个世界的同一性、全面性、统一性、集中性和整体性，确保秩序、和谐以及"世界利益"和"世界权利"的最大化，而非关注那些必然充满分歧和冲突的个人、团体、单位、民族国家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天下主义被誉为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更和谐的、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它将使"(我们)可以迈步向前，管理整个世界"[77]。也就是说，在全世界恢复中华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新儒家"学者如蒋庆，则鼓吹一个梦幻般优越的仁慈天子之"王道"，作为"中国治理方式"在中国和全世界推广，从而改造和取代基于社会契约、法治和个人权利等"低劣"原则的，"不道德的西方"治理方式和民主秩序。两千多年前孔子编撰的《春秋》，则被誉为人类所有政治活动的"大宪章"和"永恒法则"。一些激进的新儒家更呼吁要用天下一统的"中国普世价值"，取代基于自由民主的"西方普世价值"。留美回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建构了基于中国古代的"仁、义、礼"等智慧的一种"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去超越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价值观，从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与文明的世界"。这个中国理论据说优于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它将"德威并重"地引导中国以"更积极"的外交政策，获得"更多的成就"[78]。

一些中国历史学者重新审视了基于"朝贡制度"的中华帝国世界秩序，论述了一个东亚历史上的"中国霸权"。至于所谓

[77] Ye and Long 2013; T. Zhao 2005, i-25,123-24。
[78] Q. Jiang 2003; Zeng and Guo 2013；X. Yan 2015。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民粹主义者们，现在也都以复兴中华文明为己任，强调帝制时代的中华中心观和独特的中华"核心价值观"，公开倡导、支持中共党国不受限制的主权和权力。留美回国的外交政策研究者秦亚青，则把复兴的天下思想誉为是针对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有力批判，和正当、合理而优越的替代理念。其他人则主张，在重新引用天下观念的同时，还要更加强调汉民族主义，并积极地为秦汉天下制度的既往实践做辩护。一些中国学者干脆宣布：现在是时候了，中国理应成为命中注定的世界领袖，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重新改造，中国梦就是世界梦，因为美国已经衰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拥有君临天下之天命[79]。

作为权威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上任以来多次正式宣布："中国梦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今天的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要"通过实现中国梦，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同圆世界梦"，亦即打造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天下大同"为特色，并要纳入"美国梦、欧洲梦、非洲梦、亚太梦、拉美梦"。由此，世界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在 2017 年的《新年贺词》中如是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80]。这一番宣言与毛泽东当年的"世界人民大团结"和"把地球管起来"的口号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亦即要在一个新的更大规模基础上复兴中华秩序，以极为诱人的方式，对存在了四个多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提出

---

[79] F. Zhang 2009 和 2015; L. Xue 2011; L. Chen 2015; Y. Qin 2007; Z. Li 2002; Ni 2013, 2; Cheng and Wang 2015。

[80] S. Du 2016, 1; Xinhua 12-31-2016。习近平在《2019 年新年贺词》中重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根本性挑战。

在中国大陆重新普及和流行起来的具有各种名号的中华秩序观念，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不可避免的文明较量”即将到来，就像解放军将领刘亚洲在他的《西部论》里所描述的那样。刘的“西进”地理战略蓝图，建议中国应该努力先夺取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然后与“美利坚帝国”就世界权力而战；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还可以进口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为有效工具。一部名为《狼图腾》的畅销书则大肆美化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极端崇拜残酷暴力和狼群式捕猎者之野性精神，并将这些精神作为复兴汉、唐、元、清诸世界帝国荣光及改造世界的方法。留美回国的学者潘维等人理直气壮地鼓吹运用秦汉法家的治国手段，在世界上加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81]。还有人明确写道：中国应该重复秦帝国的成功，“以中国之道和中国之法，建立一个新的干净世界”，进而拯救整个人类，因为中国之道是优越而不可战胜的“天道”，而对应的西方之道不过是灾难性和不可取的“人道”而已。中国要为 21 世纪的世界新战国时代做准备，并去击败其他各国的呼吁也已经随之出现[82]。

与中华秩序相关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行为规范，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显著复苏：当今中国往往被描绘成正处于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搏斗中，就像过去那些为了天下一统，而非赢即输的拼搏一样。于是，为了得胜而不择手段地采用各种战略战术，也就都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了。畅销书《超限战》及其大量模仿者，就在竭力提倡无限制和不对称地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恐怖主义在内的一切手段，赢得中国势将要打的总体战。解放军高级军官刘明复的《中国梦》一书则公开呼吁中国要勇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力量，担当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领袖。海外学者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共识”早于 2013 年就已经在北京出现，即把美国视为中国最大的终极敌

[81] Y.Liu 2010; R. Jiang 2004, 378-401; W. Pan 2003。
[82] Qu 2008 和 2010; J. Wang 2004。

人。虽然任何一项认真的研究都会表明，美国最多也只对中共的秦汉式政体构成政治威胁，却显然与中国人民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没有任何重大冲突[83]。

建立中华秩序的国家主义中国梦，势将给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带来一个大跃退。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那样，中华文明真正的“最好时期”，是中华秩序要么衰弱、要么根本不存在的时期，而不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被错误而无知地、或虚伪而别有用心地美化和崇拜的那些秦汉式世界帝国。中国以及包括中共统治精英在内的中国人民，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回归到这些“最好时期”之一，即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发展轨道上，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投入巨量资金大力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即重建一个秦、汉、唐、元或清帝国，不过是要在全世界复辟以秦汉式政体为基础的中华秩序世界帝国。日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没有其秦汉式政权必需的中华秩序，但似乎已经重新拾起了毛泽东方案，解决它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之间那固有的系统性冲突：中共根本不打算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改变自身以适应世界，而是决定遵循“天命”或曰“民命”，用武力和诡计去利用、破坏现存国际秩序，借以获得更多权力，然后重新安排掌控其国际环境，最终按自己的意愿重塑整个世界秩序。如果说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曾经主导了法西斯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占了上风，并建立起极权主义政治秩序，那么，被僭用的汉族民族主义，也可以同样地在 21 世纪里把中共的国家主义中华秩序运动推向同一个结局[84]。

建立中华秩序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或民命(Mandate of the People)或时代使命(Mandate of the Era)，现在似乎即将引导崛起的中国力量。僭用儒学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到 2016 年已经在 125 个国家设立了 500 家孔子学院(仅

[83] Liu and Ren 2014; F. Wang2016。

[84] Drucker 1939。

在美国就有 109 个)，以实现其“走出去”和“大外宣”的战略目的。北京日益活跃地在非洲、东海和南海等地积极扩张权力，旨在成为一个“海上强国”[8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巡访世界各地并到处大笔撒钱，以促进其外交部长描述的“升级”外交和中国“富有远见的全球治理观”，为“新型大国关系”和“更多的中国声音”，以及“新东亚秩序”和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86]。伴随“一带一路”这跨国投资基建项目的宏伟计划付诸实施，庞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银行(BRICKS Bank)也随之诞生：中国下起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制定规则的“一盘大棋”，其强烈动机就是对抗乃至取代由美国领导的现存国际金融和贸易制度。为此，北京在三年内就承诺要花费 1.41 万亿美元，以今日美元计算是马歇尔计划总预算的十倍以上[87]。

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并了解中国梦：中华秩序的复兴将把全世界置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之下，一个（但愿是仁慈的）独裁者而非法治(rule of law)制度之下。中国梦装腔作势地要把 19 世纪以前中华世界的长期停滞和专制主义，重新包装，作为中国针对现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提出的替代方案。有些外国学者们已经看到，当前中国政府的治理和政治愿景被赞誉为和谐而优越的中国梦，从而加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可以作为世界政治里一个有效的普世模式的源头”。它激化了关于文明冲突的国际大辩论，提出“一个新的国际霸权，把中华帝制的层级统治制度更新为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北京的新国际努力尽管被勾画为一种所谓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但其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而已[88]。

然而，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已

[85] 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1-3-2016。Wang and Elliot 2014; Johnson and Luce 2015; AFP 11-8-2015。

[86] Y. Wang 2015。

[87] Y. Chen 2015; Nie 2015; F. Wang 2015b, 46-47; Pang 2016; Shambaugh 2015。

[88] F. Wang, 2006; Callahan 2008, 749-61; Dirlik, 2012。

经出现了批评和反对"中华复兴"的声音。尽管中国梦颇受许多中国精英的青睐，但一些中国学者已经认为，中华秩序不过是"一个有趣也许是过于美丽的乌托邦"。日益受到压制但仍然活跃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公开地抛弃中华秩序观念，并警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义，不过是渴望重建中华秩序的一种秦汉式威权主义政体的变异，作为一种民粹，只会像纳粹国家主义的德国和军国国家主义的日本那样，把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带入深重灾难[89]。

[89] S. Zhang 2006; F. Zhang 2010, 112; J. Xu 2011; Lai 2016。

结语: 可能的未来

复辟一个秦汉式政体以统治伟大的中国人民，并非易事。如此行事却又没有一个必备的中华世界秩序，就愈加艰难。而面对既无法否认、忽视，又比自己更为强大的众多外国竞争对手，则更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如本书所分析的，与过去的秦汉式政体的多次复辟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汉式政体还面临另外两个问题：首先，中共的专制统治一直是一个尴尬的、非世袭王朝的帝国。垄断着中国所有权力的，是被中国学者杨继绳称为“集体世袭制”之下的一个统治家族群体(即所谓的太子党或红二代)，而非一个以血缘世袭的皇帝[1]。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约翰•洛克，经典作家们早已把这样一种非血缘世袭的专制或贵族寡头政治归类为一种最糟糕的政府类型[2]。据中国学者吴稼祥估计，这种集体世袭制度的权力继承交替，稳定性最低，也很不理性[3]，还恶化了秦汉式政体固有的次优化统治记录。其次，民命(人民使命 Mandate of the People)、国家使命(Mandate of the Nation)或党的使命(Mandate of the Party)的观念，一直是今天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拼凑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核。最高领袖习近平向其高级官员们重申过这一使命：“天在看(你做什么)，我们的天就是(中共)党和人民”，并在 2019 年的《新年贺词》中

[1] J. Yang 2008,50-52。

[2] Plato 380 BCE; Aristotle 350 BCE; Locke 1690。

[3] J. Wu，2013。

宣布：“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4]。然而，这个新儒化法家国家主义的观念基础，比起传统秦汉式政体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观念，必然地更不稳定：无论怎样被压迫和受哄骗，人民并不是抽象的天，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追求各自多种多样的、个人的、不断变化、也不断增长的权利和欲望，并为之而奋斗。无限期地僭用人民的名义，于是就成为一场极为艰难的斗争，除非实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制度更会抛弃统治者们所珍视的秦汉式政体本身。无穷尽的民粹主义收买与讨好、无休止的恐吓与欺骗、水涨船高的暴力维稳，都是既昂贵又低效，还常常会起到反效果。

具讽刺意味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式汉政体结构性和根本性地渴望去重新安排和控制世界，无论代价也不惜时间，力求恢复中华秩序这个目标，在西方领导的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下，却获得两大关键性优势：其一，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人类的生命和平等，这使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被中共严格控制和牧养的 13 亿中国人口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来源。北京于是通过肆无忌惮的赤字花费，消耗中国人民的生命和人权，因而在国际上变得不成比例的强大和具有竞争力。其二，北京得益于其越来越通畅的、高度单方面还有选择性获取外国的市场、资源特别是技术的渠道。这使得一个既低效率也少创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地致富和强盛。由此，这个饱受低劣政治治理之困扰的次优化巨人，还是能够崛起强大，在国际关系里获得强劲而可怕的竞争力。

因此，尽管其明显的次优化统治和反复多次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悲剧和痛苦，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维护和加强其秦汉式政体方面还是颇有成就。它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顽强地以自身形象去最终重建其注定需要的中华秩序。一些大汉族主义中共支持者们，于是在 2016 年宣布“世界

[4]习近平 2015 年 6 月 2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CCP CDIC 2016)；习近平 2019 年新年贺词见 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31/c_1123931806.htm。

的、和平的中国世纪已经到来”[5]。那么未来究竟如何呢？基于本书关于中国力量本质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国力崛起前景的三种可能性未来：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演变，成为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秦汉式政体，一个类似于 10-13 世纪的宋帝国那样的，软性而开明的威权主义(如果还未变成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与法治国家的话)，从而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下繁荣、强盛且长治久安。为此，北京需要重新解读历史，重新确定其世界观，重新调整其战略；通过体制上、国际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充分保障，克制甚至放弃其天下世界帝国的理想。作为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遵守该社会的普世规范和价值观，中国可以良性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的游戏，并舒适地成为一个大国、强国或者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可以将世界霸主地位作为其奋斗目标甚至去取代美国作为新的世界领袖，但不再渴求一个中华秩序式的世界政治统一。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回到毛泽东的革命政权模式，乃至更甚，成为一个硬化的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权，通过谋求重新安排世界而求得生存。中华秩序的意识形态将继续复苏并主宰中国，尽管已经聪明地伪装为汉族民族主义和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毛泽东当年走过这条路，并遭致惨败。但是那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富和崛起的新财富与新技术，可能为北京提供新的信心和资源、更多的实力，它有可能以更聪明的诡计再试一次。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处理国际恐怖主义、高涨的全球化浪潮，这些紧迫的全球性议题可能是提高北京成功机率的强大动力。假以时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秩序或许会出人意料地统一整个地球，尽管它今天看起来还是如此的不可能，就像 24 个世纪以前秦国统一中华世界和 70 年前中共夺取中国大陆的故事一样。

[5] Hsiung 2016。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被两股力量所撕裂：一边是中共秦汉式统治者们追求中华秩序的本能欲望和不懈企图，另一边是已经变化并不断继续变化的中国人口构成、经济现实、以及日益西化且与国际社会息息相联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意识形态。伴随着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连连失败的政策，外部冲突乃至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或被有意发动，并导致中国国内的政治混乱甚至内战。中原政权最终可能会失去某些中华世界的边缘区域，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崩溃。无论是以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式，其结局可能会带来中华民族国家的凤凰涅槃（如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或者促使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败国家出现。

还有第四种可能的未来，不过大概只是过渡性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回头延续其在 2008-12 年之前的已经持续三十年的做法，继续隐瞒其中华秩序的战略选择，韬光养晦，不再大力抵制、攻击和取代美国并重新安排世界秩序[6]，而是务实和有选择地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西方的领导，在抵制国内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同时，也压制其精英对领导世界的渴求，小心谨慎，投机取巧，继续发展致富。中共的秦汉式政体虽然没有中华秩序，也能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同时也要忍受这一选择必然伴随的种种“屈辱”、困难、挑战和不安。

这些可能的未来中，哪一种更可能、更可行、更可取，以及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塑造北京的偏好、影响中国崛起的后果，都是些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关于中国崛起的积极探讨，已经产生了许多明智、富有洞察力的想法和丰富的学术成果[7]。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公开呼吁要超越美国 20 多年来那个充满犹豫的、对冲与接触

---

[6] . F. Wang “China’s Four-R Strategy” 2015a。据报道，解放军 2013 年就开始准备与美军进行全面竞争(J. Huang 2013)。

[7] Campbell and Andrews 2013; Lawrence J. Korb 2014，Christensen 2015; Xie and Page 2010, 479-501; Aldrich et al 2015。

(hedging-engagement)相混合的权宜之计，“认真对待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史文以及沈大伟则认为，美国为了东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应该对中国采取一些“必要的”和适应性的忍让和接纳举措。还有人提出“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威权主义发展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它现在已经足够富有，足以制定自己的规则，而不只是接受其他人的规矩。…(它)是自己的国家，但却是其他人的问题。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条件发展，而其他人则只能尽其所能地与它合作”。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则呼吁，现在是时候去“修改美国对华总战略”和政策了[8]。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追求些什么，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目标，依然是疑云重重。中共治理的低劣效率，似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否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最明显的障碍[9]。中国官方数字表明，拥有近 14 亿人口和大约 8 亿就业者的大国，目前只有大约 2,800 万人实际缴纳所得税[10]。北京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能力十分有限，反映了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其实并不高。在国外，中国企业一如既往地次优化运作，效益非常低下。据中国学者的统计，中国的“海外投资一般都不成功”。从 1990 年代中期到 2015 年，有超过两万家中国企业，在海外累计投资了 1,400 亿美元以上(仅 2014 年一年就增长 15.5%，而当年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仅为 1.7%)。但这些大量海外投资“90%以上都亏损”[11]。中国似乎已经过早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资

[8] Clark 2014; Swaine 2011; Shambaugh 2012; Kroeber 2014; Blackwill and Tellis 2015。本书英文原版出版半年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思维就似乎全面地转向对抗和遏制，并见诸实际行动：美国国会 2018 年 3 月以极为罕见的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大幅提升了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华盛顿随即与北京打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贸易战，并启动了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包括 2018 年 8 月开始对 44 个与军工有关的中国重要企业实行直接禁运。

[9] Gurtov 2013; Vandenberg et al 2015, 3, 34。

[10] D. Yang 2015。

[11] B. Fu 2015, 1。

本外逃。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也花费了巨资，除了一些近邻地区之外，北京在行使其所谓软实力方面，似乎特别虚弱无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护照之一，被各国接受的程度竟然远远低于已经没有几个国家正式承认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作为一个典型的专制统治者，中共经常周期性地竭力煽动反日情绪：黄金时段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徒手消灭无数日本人的“抗日神剧”，剧情极其愚蠢可笑，以至于 2013 年中共的媒体审查机构不得不对其略加限制。然而，当 2014 年日本政府稍微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时，六个月内就有超过一百万中国游客和购物者涌向日本，总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8%[12]。

或许更为意义深远的是，在中国国内，尽管受到镇压，但要求政治变革以直接撼动中共秦汉式政体核心的人和声音越来越多。毕竟，21 世纪确实不同于公元前 3 世纪。崛起的中国力量，负有被中华秩序传统和理念所驱使的天下使命，可能确实是像美国观察家白邦瑞所分析的那样，正在进行一场并非秘密的百年马拉松长跑，要在 21 世纪中叶以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为代价去领导和统治整个世界。然而，如学者孔诰烽所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似十分成功的崛起和奋斗，也可能只是为了一种属于过去的、庞大而落后的政治体系，宿命般地进行着漫长、昂贵、不确定而精疲力尽的拼搏[13]。

关于中华与中国、中华政治传统与中华世界秩序之理念，以及崛起的中国国家力量之本质，本书的探讨就此告一段落。以上面的简短结语为序曲，笔者将继续在另外一本书里，分析崛起的中国力量之前景、影响，以及应当如何因应、管理之。

---

[12] Reilly 2014, 197-215; Y. Liu 2013; *Chinese news* 7-25-2014。

[13] Pillsbury 2015; Hung 2015。

引用文献与著述

Adams, John, *Nixon in Chin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Opera HD Live, 2013.

AFP, "China's web spin doctors spread Beijing's message," *The Independent*, May 15, 2011.

AFP: "US Defense Chief Warns of Conflict in South China Sea," November 8, 2015.

Aldrich, John, Jie Lu & Liu Kang, "How Do Americans View the Rising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2, 2015: 203-221.

Allsen, Thomas T.,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ison, Graham, "Of Course China, Like All Great Powers, Will Ignore an International Legal Verdict," *The Diplomate*, July 11, 2016.

An Feng, *Study of Ming's haijin policy* (安峰:明代海禁政策研究), thesi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008.

Anagnost, Ann,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7.

Andenæs, Mads Tønnesson & Duncan Fairgrieve, *Judicial Review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Hague: Kluwer Law, vol. 2, 2000.

Andrade, Tonio,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Arano, Yasunori, *The 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style Chinese-barbarian order* (荒野泰典:日本型華夷秩序の形成), Tokyo: Iwanami Shoten, 1987.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NY: Harcourt (1951) 1973.

Aristotle, *Politics: A Treatise on Government,* translated by Williams Ellis, New York: Dutton, (350 BCE) 1912.

Armitage, Simon J. et al, "The Southern Route 'Out of Africa'," *Science*, 331-6016 (January 28) 2011: 453-456.

Ash, Robert F., David L. Shambaugh, Seiichirō Takagi ed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UK: Routledge, 2007

Ash, Robert, "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 *China Quarterly*, 188, 2006: 959-998.

Avtorkhanov, Abdurakhman, *The Communist Party Apparatus*, Washington, DC: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6.

Avtorkhanov, Abdurakhman,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артократии* (Proiskhozhdeniye partokratii: Origins of partocracy), two volumes, Munich, Germany: Посев (Sowing), 1973 (Chinese editio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晨曦译:苏共野史) Wuhan: Hubei Renmin, internal publication, two volumes, 1982.

Backhouse, E &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010): 331.

Bader, Jeffrey A.,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Bai, Chong-En, Chang-Tai Hsieh, and Zheng Song, "Crony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ference paper, Yale University, May 2014.

Baidu, "Data on silver Yuan's purchasing power" (银圆的购买力资料), wenku.baidu.com/view/c6b72131ee06eff9aef80772.html, accessed December 6, 2014.

Ban Gu, *Book of Han* (班固, 汉书), vol. 24,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st Century BCE) 1977.

Bang, Peter Fibiger & Dariusz Kol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 New York, NY:

Bao Tong, "Chairman Mao's democratic scam and General Secretary Xi's theoretical courage" (鲍彤:毛主席的民主骗局和习总书记的理论勇气), commentary on Radio Free Asia, December 27, 2013.

Barfield, Thomas J.,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89.

Barthes, Roland, *Travels in China*, translated by Andrew Brown, Malden, MA: Polity, 2012.

Baum, Richard, *China Watcher: 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oboken, NJ: Wiley, 2011.

BBC, *Useful Idiots*, radio documentary, episode two, August 8, 2010.

Beard, Mary, John North & Simon Price, *Religions of Rome: Volume 1-A Histor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Beasley, William G.,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ckwith, Christopher I.,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Beckwith, Christopher,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ech, Hannah, "The Other Side of the Great Firewall," *Time*, June 22, 2015: 50.

Bei Daijin, "Weibo Is Dying out," chinachange.org/2015/02/17/weibo-is-dying-out/,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5.

Belfour, Alan, *Imagining Shanghai*, Atlanta, GA: Georgia Tech, Monograph, 2013.

Bell, Stanley, "Hart of Lisburn: The Story of Sir Robert Hart," *North Irish Roots*, 1-6, 1985: 168-170.

Benson, Linda, *China since 1949*, 2nd edition, London: Routeledge, 2014.

Benton, Gregor ed.,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 volumes, London: Routeledge, 2007.

Berlin, Isaiah. *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edit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2012.

Bernhardt, Kathryn, *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rnstein, Richard, *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New York: Knopf, 2014.

Bhabha, Homi 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Bielenstein, Hans, *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 589-1276,* Leiden: Brill,

2005.

Blackwill, Robert D. &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New York: CFR, 2015.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New York: Penguin, 2008.

Blumentha, David & William Hsiao,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he Evolving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3-11 (September 15) 2005: 1165-1170; "Lessons from the East-China's Rapidly Evolving Health Care System,"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2-14 (April 2) 2015: 1281-1285.

Bo Yang, *Chronicl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kings, queens, princes and princesses* (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 Beijing: Renmin Wenxue, (1979) 2011.

Bossler, Beverly,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1998.

Bower, Bruce, "Hints of earlier human exit from Africa, Stone tools suggest a surprisingly ancient move eastward," *Science News*, January 27, 2011.

Bradley, James, *The China Mirage: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Disaster in Asia,*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mpany, 2015.

Brady, Anne-Marie,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Braun, Otto,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Brook, Timothy, Jérôme Bourgon & Gregory Blue,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Brooks, Timothy,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Brooks, Timothy,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Brown, Kerry,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ondon, UK: Anthem Press, 2009.

Brunero, Donna, *Britain's Imperial Cornerstone in China: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4-1949*,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6.

Brzezinski, Zbigniew,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 1989.

Buchheim, Hans, *Totalitarian Rule: Its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Translated by Ruth Hei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1972.

Buckley, Chris, "China Takes Aim at Western Idea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13: A1.

Buckley, Chris, "Xi Touts Communist Party as Defender of Confucius's Virtues," Sinoshpere Blogs b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4.

Bull, Hedley &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Burbank, Jane &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Burr, William ed., *The Beijing-Washington back-channel and Henry Kissinger's secret trip to China, September 1970-July 1971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66*,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2.

Bush, Georgia W., "George W. Bush on China," ontheissues.org/celeb/George_W__ Bush_ China.htm, accessed May 1, 2015.

Cabrillo, Francisco & Miguel A. Puchades-Navarro eds.,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13.

Cai Dingjian, "Why China has not become a developed country like Japan" (蔡定剑: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Guangming Net* (光明网), Beijing, March 2, 2007.

Cai Jun, "Revernce for our history" (蔡俊:敬畏我们的历史),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January 28, 2014: 5.

Cai, Liang, *Witchcraft and the Rise of the First Confucian Empire*,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4.

Cai Qingshan, "Favorable policy made China pay heavily" (优惠政策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21st century economic report* （21 世纪经济报道), Shanghai, June 2006.

Cai Xiangsheng, *Study of the warriors of the Yang family* (蔡向升:杨家将研究), Beijing: Renmin, 2007.

Cai Xiaoqian*, Jiangxi Soviet region: memorie on Red Army's westernward run*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Taipei: Zhonggong Yanjiu, 1970.

Callahan, William A.,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10, 2008:749-761, 759.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 Dreams: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

Campbell, Kurt & Brian Andrews, *Explaining the US 'Pivot' to Asia*, London: Chatham House, 2013.

Cannon, Henry Lewin, *The Character and Antecedents of the Charter of Liberties of Henry I*. London: Macmillan, 1909.

Cao Deben, *Studies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曹德本: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1987.

Cao Guanyi, History of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1989.

Cao Jinqing, *China by the Yellow River: a scholarly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2000.

Cao Xueqin, *Dream of Red Chamber* (曹雪芹:红楼梦), Beijing: Renmin Wenxue, (1791) 2008:10.

Cao Zhongchen, *Haijin and overseas trade in Ming era*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Beijing: Renmin, 2005.

Carlson, Benjamin, "A field guide to hazardous China clichés," *Global Post*, January 14, 2014.

CCP CDIC ed., *Selected words of Xi Jinping on toughening party's discipline and rules*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16.

CCP Central Document Bureau 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14.

CCP Central Document Office ed., *Early papers of Mao Zedong 1912-1920* (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1920), Changsha: Hunan, 1995.

CCP Central Document Studies Bureau, *Selections of Xi Jinping's Words on Realizing the China Dream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13

CCP Central Documents, *Mao Zedong chronicle* (毛泽东年谱), 9 volumes,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93) 2013.

CCP Central History, *History of the CCP* (中国共产党历史),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vol. 1, 2002.

CCP Central History, *History of the CCP* (中国共产党历史),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vol. 2, 2010.

CCP Central History,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2008.

CCP Central Party History, *Short history of CCP's secrets keeping work* (中共保密工作简史), Beijing: Jincheng, 1994.

CCP Central, "Vows for joining the party," *CCP Party Charter*, Chapter 1, Article 6, Beijing: CCP, (1982) 2012.

CCP Central, *CCP Central decision on some major issues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Beijing, October 23, 2014.

CCP Central, *Charter of the CCP* (中国共产党章程), Beijing: 18th Party National Congress, 2012.

CCP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Intern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CCP*,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Beijing:Xinhua, June 29, 2015.

CCTV News, "Per capita grain doubled in 60 years (粮食人均占有量 60 年增长一倍), Beijing, September 9, 2009.

CCTV, "Dazu Rock Carvings" (大足石刻), Beijing, June 13, 2015.

Cen Zhongmian, *History of Sui-Tang* (岑仲勉: 隋唐史),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0.

Central News, "Bosses of Hong Kong gangs: follow the orders from Mainland police" (香港黑幫老大:聽命大陸公安), 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 201412080041-67-260409, Taipei, posted, December 8, 2014.

Chai Na, "Chaina micro blog" (拆拿微博), weibo.com/u/3068541965, accessed May 17, 2015.

Chang, Chi-Shen, "Origins of '*Zhongguo*' and '*tianxia*' concepts" (張其賢: "中國" 與 "天下" 概念探源),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東吳政治學報), Taipei, No. 27, 2009: 169-256.

Chang, Chihyun, *Government,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its Chinese Staff*, New York, NY: Routlege, 2013.

Chang, Gordon 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Chang, John K.,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1912-1949*,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

Chang, Jung &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2006.

Chang, Jung, *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 New York, NY: Knopf, 2013.

Chang, Teng-chi, "Exploring the cont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Zhongguo' concept" (張登及: "中國" 概念的內涵與流變小考) *Correspondence of study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Mainland*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2002.

Chao, Rebecca, "Why Do Chinese Billionaires Keep Ending Up in Prison?"

Chao, Zhongchen, *Haijin and overseas trade in Ming era* (晁中辰: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Beijing: Renmin Press, 2005.

Cheek, Timot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en Boda, *China four big families* (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 Beijing: Renmin, (1946)

1955.

Chen Boda, *People's public enemy Chiang Kai-shek*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 Tianjin: Xinhua Shudian, (1948) 1949.

Chen Cheng, *Mr. Chen Cheng memoirs - anti-Japanese war*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 Taipei: Guoshiguang, 2005.

Chen Duxiu, "Defense for the 'New Youth' criminal case" (陳獨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 *New youth* (新青年), Beijing, No. 6-1 (November) 1919.

Chen Duxiu, "To the youth" (陳獨秀:敬告青年), *New youth* (新青年), Beijing, No. 1-1 (September) 1915.

Chen Hanbo, *How I was acting as Mao Zedong's spy* (陳寒波: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 Hong Kong: Ziyou, 1952.

Chen Jin, "Study history from Mao Zedong" (陈晋: 跟毛泽东学历史), mzdlib.com/libszzy/maozedongxingjiushujuku/97.html, accessed June 8, 2015.

Chen Lai, *Core valu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Beijing: Sanlian, 2015.

Chen Lifu, *Lesson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Chen Lifu memoirs*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1994.

Chen Shangsheng ed. *Confucian civilization and China's traditional foreign relations* (陈尚胜: 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08.

Chen Shou,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Zhuge Liang*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 Hangzhou: Zhejiang Guji, (280) 2000.

Chen Tingxiang & Zhou Ding, *Tianxia, world, country: thee evolution of China's view of the outside* (陈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 Shanghai: Sanlian, 2008.

Chen Xiaonong ed., *Final oral memoirs of Chen Boda*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Hong Kong: Yangguang Huangqiu, 2005.

Chen Yaohuang, "War of sad victory and sad defeat: the CCP-KMT civil war" (陳耀煌:慘勝與慘敗的戰爭: 國共內戰), *Glory of hundred years* (百年風華), Taipei, October 2011: 96-97.

Chen Yaohuang, *Communist Party, local elites, peasants: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ubei, Henan and Anhui, 1922-1932*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 1922-1932),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2002.

Chen Yaohuang, *Unific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ebei, 1921-1949*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 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 1921-1949), Taipei,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of Academia Sinica, 2012.

Chen Yinan, "Malaysian communist radio based in China" (陈益南:设在中国的马共广播电台), 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216121175_2.html, 2-16-2015.

Chen Yingque, *Drafts on Tang's political history* (陳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Shanghai: Guji, 1997.

Chen Yingque, *Lectures on history of Wei, Jin and South-North Dynasties*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edited by Wan Shengnan (萬繩楠), Taipei: Zhishu Fang, 1995.

Chen Yinque, " Preface for Deng Guangmin's research on Song's records on offices and officials"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Jinming house series 2* (金明馆丛稿二编), Beijing: Sanlian, (1943) 2001.

Chen Yinque, "Preface to Jiang Bingnan's" (陈寅恪: 赠蒋秉南序), in *Works of Chen Yinque* (陈寅恪文集), Shanghai: Guji Press, (1960s) 1997.

Chen Yinque, *Reply to the Science Academy*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Guangzhou,

December 1, 1953. douban.com/group/topic/17961604/, accessed November 29, 2013.

Chen Yongfa, "Poppy flowers under the red sun: opium trade and Yan'an model (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New history* (新史學), Taipei, 1-4 (December) 1990: 41-117.

Chen Yongfa, *Seventy years of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2 volumes, Taipei: Lianjing, 1998.

Chen Yuan, "The 'one belt one road' and the great chess game for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陈元:谋定"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大棋局), *Caijing* (财经), Beijing, No. 36 (December 22), 2015.

Chen Yun, *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n* (陈云文选), Beijing, Renmin, 198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en, P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Cheng Ganyuan e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Korean War: memoirs of Chines soldiers* (程干远:亲历韩战:中国军人回忆录), New York: Mingjing, 2013.

Cheng Hanchang, *Land system and land reform in China: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成汉昌: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 世纪前半期),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1994.

Cheng Yawen & Wang Yiwei, *Mandate of heaven-the birth of a new type of leader nation* (程亚文,王义桅: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 Beijing: Qunyan, 2015.

Cheng Yinhong, "Why the China-Cuba split 50 years ago?" (程映虹: 五十年前中古缘何分裂?) *Phoenix weekly* (凤凰周刊), Hong Kong, No. 12, (April 27) 2015.

Cheng Zhaoqi, "How the Rape of Nanking is disputed in Japan" (程兆奇:日本如何争议南京大屠杀), public lecture, Shanghai, August 19, 2015.

Cheng, Yinghong, "Ideology and Cosmology: Maoist Discussion on Phys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1 (February) 2006: 109-149.

Chesterton, G.K., *Eugenics and Other Evils*, London & New York: Cassell, 1922.

Chi Zehou, "Random recalls of the CCP's 9th national congress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3, 2003:44-51.

Chiang Kai-shek, *Resisting foreign insult and rejuvenate the nation* (蔣中正: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Speech at Lushan Officers Academy, July 13, 1934.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Brief summary of the 30-year experien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n communists*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Taipei: Zhongyang Wenwu Hongying She, 1956.

Chien Mu, "Introduction" (錢穆:引論), Han Fuzhi ed. *Selected articles on Chinese history* (韓復智:中國通史論文選輯), vol. 1, Taipei: Xuesheng Shuju, 1975.

Chien Mu,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Chiense culture seen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錢穆: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Taipei: Lianjing, 1979.

Chien Mu,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钱穆: 国史大纲),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Shangwu Press, (1939) 1991.

China News Agency: "Grain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Beijing, July 6, 2009.

China News, "Zhang Xueliang oral history published: self recognized as 'indeed CCP' (張學良口述歷史出版:自認"就是共產黨"), *China News*, Beijing, September 12, 2014.

Chong, Ja Ian,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1893-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ou, Eric, *A Man Must Choose: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Patriot*, New York: Knopf, 1963.

Christensen, Thomas J.,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Norton, 2015.

Christensen, Thomas J.,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ung, Jae Ho ed., *Assessing China's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Cipolla, Carlo M.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6 volumes, London & Glasgow: W. Collins, 1972-76.

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lark, Wesley, "Getting Real About China: To Manage China, Fix America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2014.

Clodfelter, Micheal,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to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500-2000*, 2nd edition,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2.

Cohen, Jerome, *The Criminal Proc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lás, Alejandro, *Empire*, Malde, MA: Polity, 2007.

Comyn, Robert Buckley,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 From Its Restoration by Charlemagne to the Accession of Charles V*, London: Allen, vol. 1, 1923.

Confucius, *Analect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5th Century BCE) 2006.

Confucius, *Book of odes-lesser court hymes-north hill* (诗经-小雅-北山), Beijing: Zhonghua Shuju, (prior to 5th Century BCE) 2010.

Confucius, *Book of odes-major court hymns-laboring people* (诗经·大雅·民劳), Beijing: Zhonghua Shuju, (prior to 5th Century BCE) 2010.

Confucius, *Book of rites,* Shengyang: Liaoning Jiaoyu, (5th-3rd centuries BCE) 1997.

Confucius, *Shangshu-vol. 14-decrees* (尚書-14-昭告), Beijing: Zhonghua Shuju (4th century BCE), 1998.

Conquest, Robert, *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 New York, NY: Norton, 2001.

Courtois, Stéphane et al ed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 Mark Kra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PPCC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Guidelines for Peaceful State Construction* (和平建國綱領), adopted January 1946.

Croce, Benedetto,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1.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Cronin, Vincent, *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 Matteo Ricci and his Mission to China*, New York, NY: Fount, 1984.

Crossley, Pamela Kyle, Helen F. Siu, &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Crossley, Pamela Kyle,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rossley, Pamela Kyle, *The Wobbling Pivot, China since 1800: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0.

Crossley, Pamela,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Croxton, Derek, *Westphalia: The Last Christian Peace*, New York, NY: Palgrave-Macmillan, 2013.

CYL Central, *Notice on broadly organizing youth web civilization volunteers army, deeply promoting youth web civilization volunteer activities* (共青团中央关于广泛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深入推进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的通知), CYL Central Document 2015-5, Beijing, February 16, 2015.

CYL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Summary table on the information of youth web civilization volunteers*, (共青团福建省委: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信息汇总表)，Fuzhou, April 29, 2015.

Dai Huang, *Survival after nine deaths* (戴煌:九死一生), Shanghai: Xuelin, 2000.

Dai Qing, "The origin of 'East is red'" (戴晴: "东方红"始末), aisixiang.com/data/3547.html, posted July 11, 2004.

Dai Zhen, *Elaborating comments on Mencius*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8th century) 2008.

Dan Qiusheng, "Chinese power-worshiping" (丹丘生:中国人的权力崇拜), 12-28-2009.

Dang Wei, *Thirty years of new Qing history in the U.S.* (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2012.

Dao Ke, "China's healthcare funds used unfairly" (刀客:中国医疗经费使用不公), *New express news* (新快报), Guangzhou, June 9, 2006.

Davies Jr., John Paton, *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Daxiang Gonghui, "Whom should the Shanghai Jews thank?" (上海犹太人该感谢谁?), August 2, 2015.

De Mesquita, Bruce Bueno &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4 (December) 1995.

De Mesquita, Bruce Bueno et al,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4 (December) 1999.

Deng Guangming, "Study of bureaucracy in Song history (邓广铭: 宋史职官志考证), in *Complete works of Deng Guangming* (邓广铭全集), Vol. 11,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1943) 1995.

Deng Guangming, *Ten lectures on Song history* (邓广铭: 宋史十讲),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8.

Deng Liqun ed., *Diplomatic strategist Mao Zedong* (邓力群:外交战略家毛泽东),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2004.

Deng Xiaomang, "A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 reflection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ducated youth (campaign)" (邓晓芒:对知青 50 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Novemebr 30, 2014.

Deng Xiaoping, "Speeches in the south" (南方谈话) in February 1992.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邓小平文选), Vol. 2, Beijing: Renmin, 1993.

Deng Xiaoping, "Uphold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邓小平文选), Vol. 2, Beijing: Renmin, (1983)1994.

Deng Yunte, *History of famine relief in China*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1937 (1984): 1 & 61.

Deng Zhaowen, "Who are the real vested-interest holders?" (邓聿文:真正的既得利

益者是谁?) aisixiang.com/data/48522.html, posted December 23, 2011.

Deng Zili, *Rough life* (邓自力:坎坷人生), Chengdu: Sichuan Wenyi, 2000.

Deng, Yong &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Dikötter, Frank,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1.

Dikötter, Frank,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Dikötter, Frank,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New York, NY: Bloomsbury Press, 2013.

Ding Renxiang, "Three base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Donggu Ganxinan" (丁仁祥:东固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三个基础), *Open times* (开放时代), Guangzhou, No. 2 (April) 2015.

Ding Shu, *Manmade disaster: Great Leap Forward and Great famine* (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 Hong Kong: Jiushi Niandai, 1991.

Ding Yi, *Politics of secret police in Ming*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Bejing: Qunzhong, (1949) 1983.

Ding Yizhuang & Mark Elliott, "How to write Chinese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fluence and reaction to new Qing history" (定宜庄&欧立德: 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 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 *Historiography review* (历史学评论), Beijing, November 2013: 116-146.

Dirlik, Arif, *Culture and His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Dodsworth, John & Dubravko Mihaljek, *Hong Kong, China: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Stabil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IMF, 1997.

Dong Fu, *Wheat stems green and mustard flowers yellow: great famine in Western Sichuan* (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 Hong Kong: Tianyuan, 2008.

Dong Jieling et al, "Statistical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hisotry" (董洁林等: 从统计视角探讨中国历史科技发展特点), *Correspondence on natural dialectics* (自然辩证法通讯), Beijing, No. 3 (June) 2014.

Dong Shijin, "Letter to Mao Zedong on land reform"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Yanhuang chronicles*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4, 2011.

Dong Shijin, *I got to know the Communist Party* (董時進:我認識了共產黨), Hong Kong: Ziyou, 1951.

Dong, Jielin & Sen Hu eds., *The Rocky Road to Liberty: A Documente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Exclusion*, Saratoga, CA: Javvin Press, 2010.

Dreyer, Edward L.,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New York: Pearson 2006.

Drucker, Peter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s, (1939) 2011.

Du Daozheng, *What else did Zhao Ziyang say? Du daozheng dairy* (趙紫陽還說過什麼? 杜導正日記), Hong Kong: Tiandi Books, 2010.

Du Gangjian, *Human rights ideas in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杜鋼建:中國近百年人權思想), Hone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Du Shangze, "Big strides on the historical match toward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杜尚泽: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January 5, 2016:1.

Dunnell, Ruth W., Mark C. Elliott, Philippe Foret, James A Millwar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Dwight, Timothy & Julian Hawthorne, *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y G.W.F. Hegel*, New York, NY: Colonial Press, (1899) 2007.

Earth Policy Institute, *Eco-Economy Indicator: Grain*,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3

Ebrey, Patricia Buckley &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brey, Patricia Buckley, *Emperor Huiz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brey, Patricia Buckl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brey, Patricia Buckl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conomist, "China's rich list: To get rich is not always glorious,"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9, 2012.

Economist, "China's economy: Not just another fake," *The Economist*, January 14, 2010.

Economist, "China's hidden wealth: China's well-hidden, ill-gotten gains," *The Economist*, August 13, 2010.

Economist, "Post-war China, Alternatively Chiang's China- What if Mao Zedong's Communist Party had lost the Chinese civil war to Chiang Kai-shek's Nationalist Party?" *The Economist*, *The World If Issue*, August 1, 2015.

Economist, "Unproductive production," *The Economist*, October 11, 2014.

Economist, "Xi's History Lessons," *The Economist*, August 15, 2015.

Editing Group, *Time table of wars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Beijing: Jiefangjun: (1985) 2003.

Editing Team, *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 Beijiing: Jingguan Jiaoyue, 1997.

Editorial Board, "Happy American national day: great fighting festival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 *Xinhua daily* (新華日報), July 4, 1944: 1.

Editorial Board, "Hu Jintao promote "Asian spirit"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胡锦涛倡导"亚洲精神"意义重大), Hong Kong: *Wen weipo* (文汇报), April 16, 2011.

Editorial Board, "Sail the tide with wind" (乘风破浪),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January 1, 1958.

Editorial Board, *Standard textbook - 7th grade Chinese history* (标准课本-七年级中国历史) Beijing: Renmin Jiaoyu, vol. 1, (2006) 2013.

Editorial Board, *Standard textbook-7th grade history* (标准课本-七年级历史), Beijing: Renmin Jiaoyu, vol. 2, 2004.

Editorial Board, *Standard textbook-8th grade geography* (标准课本: 八年级地理),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al Press, vol. 1, 2013.

Editorial Board, *Standard textbook-8th grade history* (标准课本-八年纪历史), Beijing: Renmin Jiaoyu, vol. 1, 2004.

Editorial Board, *Standard textbook-8th grade history* (标准课本:八年级历史),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al Press, vol. 2, (2002) 2004.

Editors, "Teacher, please don't' talk about China like that" (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 *Liaoning daily* (辽宁日报), November14, 2014: 1 & 4.

Editors, *Documents of Liu Shaoqi's secrete visit to the USSR* (刘少奇秘密访苏资料),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internal publication, 1998.

Editors,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ong, Liao and Jin* (中國文明史-宋遼金時期), Vol. 6, Taipei: Diqiu Press, 1992.

Editors, *Complete Collections of Song paintings* (宋画全集), Hangzhou: Zhejinag Daxue, 2008.

Editors, *Holy politics of two rejuvenating reigns of imperial Song*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Beijing, 4 volumes, National Library (12th Century) 2007.

Editors, *Records of Chinese military advisors aiding Vietnam against France*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Beijing: CCP History Press, 2002.

Edwards, Walter, "Forging Tradition for a Holy War: The Hakkō Ichiu Tower in Miyazaki and Japanese Wartime Ideolog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9-2, 2003: 289-324.

Ehrlichman, John, *The China Card,*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1986.

Eisenstadt, Shmuel Noah,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0.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Malden, MA: Blakcwell, 1994.

Elleman, Bruce A. & Stephen Kotkin eds.,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Armon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10.

Elliott, Mark & Peter N. Stearns,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arson, 2009.

Elliott, Mark C.,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Making Inner Asia Empire at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Elvin, Mark,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merson, John, "Yang Chu's Discovery of the Bod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6-4 (October) 1996: 533-566.

Emperor Kangxi, Edict in 1719 on overseas trade, cited in Guo Chengkang, "Qing emperors' China view"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Studies of Qing history* (清史研究), Beijing, No. 4, 2005: 1-19.

Emperor Qianlong, *Royal record of ten-perfect* (乾隆:御製十全記), Beijing: Palace Museum, 1792.

Emperor Yongzheng, *Dayi juemi lu* (雍正:大义觉迷录), Beijing: Zhongguo Chengshi, (1729) 1999.

Endo, Homare, *Mao Zedong: the man colluding with the Japnese military* (遠藤誉: 毛沢東:日本軍と共謀した男), Tokyo: Shinchosha, 2015.

Epoch Times, *Nine revi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 verdict against the CCP* (九评共产党:一份对中国共产党的判决书), New York: Boda, 2004.

Esherick, Joseph & Mary Backus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sherick, Joseph W. & C.X. George Wei eds.,*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London: Routledge, 2014.

Esherick, Joseph W.,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Modern China*, 24-2, April 1998: 135-161.

Ezrow, Natasha M. & Erica Frantz, *Dictators and Dictatorships: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ir Leaders,*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Fairbank, John King & Edwin O. Reischauer,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in, 1958.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Fairbank, John King,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2, 1942. an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Fairbank, John 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2009.

Fan Chaofu, "Remembering comrade Zhang Xuesi" (范朝福:怀念张学思同志),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December 12, 1978.

Fan Shuzhi, History of the late-Ming (樊树志: 晚明史), Shanghai: Fudan Daxue, 2003.

Fan Wenlan, *Abbreviated general hisotry of China*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vol. 2, Beijing: Renmin, 1953.

Fan Wenlan, *Abbreviated general hisotry of China*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vol. 3, Beijing: Renmin, 1965.

Fan Ye, *Book of Latter Han* (范晔:后汉书), vols. 6-9, Beijing: Zhonghua Shuju (445) 2000.

Fang Chengfeng,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Northern Song*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Beijing: Beijing Daxue, 2016.

Fang Hao, *History of China-West communication* (方豪:中西交通史), vol. 3, Taipei: Zhonghua Wenhua, 1953.

Fang Kecheng, "Don't hurt me anymore: the countries that 'hurt Chinese feelings'"(方可成:不要再来伤害我: 那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 fangkc.cn/2008/12/donot-hurt-chinese/; arctosia.com/archives/511, accessed January 10, 2015.

Fang Kecheng, *Old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方可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Beijing: Rimin Ribao, 2014.

Fang Shaowei, "Chinese worship of power" (方绍伟:中国人的权力信仰), blog.sina.com.cn/s/blog_723bef350101967d.html, 2013.

Fang Yi, "State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方烨:中国社保改革的现状), *Economic reference* (经济参考报), Beijing, July 2, 2013.

Farris, Johnathan, "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 An Architecture of Sino-Western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uildings & Landscapes: Journal of th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Forum*, volume 14, 2007: 66-83.

Fei Xiaotong, *Rural China* (费孝通:乡土中国), Beijing: Beijing, 2005.

Fei Xiaotong, *The multiplicity-singularity of Zhonghua nation*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 2003.

Fei, Si-yen,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enby, Jonathan, "The Contest of the Century-review," *The Guardian*, April 10, 2014.

Fenby, Jonathan,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New York,

NY: Free Press, 2003.

Feng Enrong, *Collection of views for total Westernization* (馮恩榮:全盤西化言論集), Guangzhou: Lingnan Daxue, 1935.

Feng Guifen, *Protest from Xiaofen house*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1861) 2002.

Feng Guorong, *The side of Chinese history 2* ((冯国荣:中国历史的侧面 2: 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 Changchun: Jilin Wenshi, 2015.

Feng Haiwen, "How hard to buy CDIC" (馮海聞:擺平中紀委有多難), *Sun* (太阳报), Hong Kong, June25, 2015.

Feng Xiang & Shi Yan, "Searching for the secret life of 'carpenter' father" (冯翔 &石岩: 寻找"木匠"父亲的隐秘身世), *Southern* weekend (南方周末), Guangzhou, May 1, 2014.

Feng Xuerong, "If can't sell for money, why want power?" (冯学荣:不能卖钱, 要权力作甚？), blog.sina.com.cn/s/blog_4f0523780101sqa6.html, posted March 13, 2014.

Feng Xuerong, "It's time to rectify history" (冯学荣: 是该还原历史的时候了), blog.sina.com.cn/s/blog_4f0523780101mcfc.html, posted May 7, 2013.

Feng Xuerong, "Stories of revolutionaries counterfeit money" (冯学荣:革命家伪造钞票的故事), blog.sina.com.cn/s/blog_4f0523780101jrnh.html, posted March 11, 2013.

Feng Xuerong, "Truth about concessions" (冯学荣:租界真相), blog.sina.com.cn/s/blog_4f0523780101irhx.html, posted February 15, 2013.

Feng Xuerong, *Experiencing Beiyang: from Republic to civil war 1912-1928* (冯学荣: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 1912～1928), Beijing: Zhongguo Gongren, 2014-A.

Feng Xuerong, *Hard to face the reality* (冯学荣:不忍面对的真相), Beijing: Jiuzhou, 2915.

Feng Xuerong, *The side of Chinese history 2* (冯学荣: 中国历史的侧面 2), Changchun: Jilin Wenshi, 2015.

Feng Xuerong, *Why did Japan invade China: From Jiawu War to July 7th Incident* (冯学荣: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 Beijing: Jincheng, 2014.

Feng Yilu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Xubang Battle* (馮亦魯:徐蚌戰役見聞錄), Hong Kong: Chunqiu Zhazhi, 1963.

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Fic, Victor, "Huxley vs. Orwell: China Today (interview with Jeffrey Wasserstrom)," *Asia Sentinel*, March 18, 2014.

Figes, Orlando,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7.

Finlay, Robert, "China, the West, and World History in Joseph Needham'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1-2, Fall 2000: 265-303.

Forbes, Andrew D. W.,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Ford, Christopher L., *The Mind of Empire: China's History and Modern Foreign Relations*,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Foster, John, *The Church in T'ang Dynasty*, London: Macmillan, 1939.

Foucault, Michel, "Life of the Infamous Men," in *Power, Truth, Strategy,*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and Meaghan Morris, Sydney: Feral, 1979.

Frank, André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ank, Andre, "Review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1, 2001: 180–182.

Freeland, Chrystia, "The U.S. capitalist love affair with Communist China," Reuters, *Opinion*, April 29, 2011.

Freitas, Nathan, "The Great Firewall Inverts," talk at Berkma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15, 2015.

Friedberg, Aaron L.,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NY: W. W. Norton, 2012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Kay Ann Johnso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iedrich, Carl J., &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Fu Bilian, "'Changed' overseas investment" (付碧莲: "变卦的"海外投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news* (国际金融报), Beijing, February 9, 2015:1.

Fu Guoyong, "Another rarely-known 16-words policy" (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7461, posted April 17, 2011.

Fu Guoyong, "Wild lily flowers and the death of Wang Shiwei" (傅国涌:野百合花与王实味之死), 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0b0u.html, posted August 27, 2007.

Fu Guoyong, *Discover Nianba City* (傅国涌:发现廿八都), Changsha: Hunan Wenyi, 2005.

Fu Guoyong, *From Gong Zizhen to John Leighton Stuart* (傅国涌: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Nanjing: Jiangsu Wenyi, 2010.

Fu Lecheng, *Chinese general history-Ming and Qing* (傅乐成: 中国通史-明清史), Beijing: Jiuzhou Press, (1978) 2010.

Fu Lecheng, *Chinese general history-Song Liao Jin Yuan history* (傅乐成: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 Beijing: Jiuzhou Press, (1978) 2010.

Fu Lecheng, *Chinese history-history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傅樂成: 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史), Taipei: Zhongwen, 1989.

Fu Leping, "The Japanese veterans of the fourth field army I know" (傅乐平:我认识的四野日本老兵), *Phoenix weekly* (凤凰周刊), Hong Kong, No. 26, 2006.

Fukuzawa Yukichi (福澤諭吉), "On leaving Asia" (脱亜論 *datsu-a ron*), *Jiji Shimpo* (時事新報), Tokyo, March 16, 1885.

Fung, Edmund S. K.,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48) 1997.

Galtung, Marte Kjær & Stig Stenslie, *49 Myths About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Gao Ertai, *Looking for home* (高爾泰:尋找家園), vols 2-3, Taipei: Yinke, 2009.

Gao Gao & Yan Jiaqi, *Ten-year hsiotry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高皋, 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Tianjin: Tianjin Renmin Press, 1986.

Gao Hua, "Reinvestigating Lin Biao incident" (高华: "林彪事件"再调查), August 1, 2008. news.163.com/08/0801/16/4I9AN21D00012Q9L.html, accessed May 17, 2015.

Gao Hua, *How did the red sun rise: history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Gao Long, "Poppy flower under the red sun: the opium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s in the 1940s" (高龙: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 年代边区鸦片经济), 2012, zhenhua.163. com/13/0718/15/9430NBMO000464MI_all.html, accessed December 16,

2013.

Gao Wenqian, *Zhou Enlai in his last years*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Hong Kong: Mingjing, 2003.

Garver, John W.,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Xi'an Inciden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6, 1991: 145-175.

Garver, John W., *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Garver, John W., *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Ge Jianxiong & Cao Shuji, *Chinese demographic history* (葛健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Vol. 5, *Qing Era* (清时期), Shanghai: Fudan Daxue, 2001.

Ge Jianxiong & Cao Shuji, *Chinese demographic history* (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Vol. 4, *Ming Era* (明时期), Shanghai: Fudan Daxue, 2000.

Ge Jianxiong,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China" (葛剑雄: 我国历代人口数目统计), Beijing: Xinhua, 2006.

Ge Jianxiong, "Truth of the 'Xuanwu gate mutiny'" (葛剑雄: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National humanity history* (国家人文历史), Beijing, September 8, 2015.

Ge Jianxiong, *Unification and division*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8.

Ge Jinaxiong, "On the Fudan edition of Chinese demographic history" (葛剑雄: 谈复旦版中国人口史), *Wenhui reading weekly* (文汇读书周报), Shanghai, February 26, 2009.

Ge Zhaoguang, "Imagined tributation" (葛兆光:想象的朝贡), *Social science weekly* (社会科学报), Shanghai, September 8, 2015.

Ge Zhaoguang, *Imagining the foreign land: Reading notes on Korean documents on missions to the North in Chinese in the Yi Dynasty* (葛兆光:想象异域: 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4.

George, Alexander L.,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Action: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Gernet, Jacques,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rnet, Jacques,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Gillin, Donald G., *Falsifying China's History: The Case of Sterling Seagrave's The Soong Dynast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1986.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lad, Betty, "Why Tyrants Go Too Far: Malignant Narcissism and Absolute Power,"

Goldstein, Avery,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oldstein, Azar,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ity Press, 2006.

Goldstein, Jonathan ed., *The Jews of Chin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Goncharov, Sergei, John Lewis, Litai Xue,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ong Chu, *Gong Chu memoirs* (龔楚回憶錄), Hong Kong: Mingbao, 1978.

Gong Shi, "The distorted war of Eight Powers" (共识:被歪曲的八国联军之战), 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40618107997.html, posted June 18, 2014.

Gong Yanming, *Study of Yue Fei* (龚延明:岳飞研究), Beijing: Renmin, 2008.

Gong Ying, *History of ethnic policy in China* (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 Chengdu: Sichuan Renmin, 2006.

Grammaticas, Damian, "China's 'memory holes' swallow up Melissa Chan," *BBC News,* May 9, 2012.

Greene, Robert, *The 48 Laws of Power*, New York, NY: Peguine, (1998) 2000.

Griffin, Nicholas, *Ping-Pong Diplomacy: The Secret History Behind the Gam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NY: Scribner, 2014.

Gross, Le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1948,"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1, January 1948: 20-41.

Group, Joint Research ed., *China in the 1930s*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vol. 1, 2006.

Gu Guanyuan, "Siku quanshu and the new siku quanshu" (顾关元: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 *Renmin Ribao-haiwai ban* (People's daily-overseas edition), Beijing, August 8, 2001.

Gu Weihua, "Zhang Yihe: sad long road, sprits back" (顾维华:章诒和:悲兮远道,魂兮归来), Shanghai: *Oriental morning news*, (东方早报), April 10, 2009: C15.

Gu Xuewen, "The sickness of science rooted in culture," (顾学文: 科学的病,出在文化上), *Jiefang daily* (解放日报), Shanghai, December 11, 2015:13.

Gu Yanwu, *Collection of daily learning* (顾炎武 :日知录), Shanghai: Guji , (17th Century), 2006.

Gu Yanwu, *Poems and paper of Gu Tingling* (顾亭林诗文集), Beijing: Zhonghua shuju, vol. 2, (17th century) 2008.

Gu, Weijun (Vi Kyuin Wellington Koo), *Gu Weijun memoirs* (顾维钧回忆录), 8 volum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3-1994.

Guan Zhong (edited by Liu Xiang), *Book of Guanzi- herding people* (管子-牧民), vol. 1,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st Century BCE) 2009.

Guo Chengtang, *Chen Duxiu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郭成棠: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Taipei: Lianjing, 1992.

Guo Daohui, "The initial reasoning for Mao's launch of rectification"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2, 2009: 12-18.

Guo Hualun (Guo Qian), *On CCP history* (郭華倫<郭潛>: 中共史論), Taipe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s. 1-3, 1969, vol. 4, 1971.

Guo Luoji, "Zhou Yang ordered to catch rightists according to name lists" (郭罗基:周扬奉命按名单抓右派), *Remembrance* (记忆), Beijing: E-journal, No. 118, August 2014: 3-8.

Guo Shiyou, "Courage and hisotical statue of politicians" (郭世佑:政治改革与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12, 2014: 47-54.

Guo Songtao, *Guo songtao diary* (郭嵩焘日记), vol. 3, Changsha: Hunan Renmin, (1879) 1983.

Guo, Xuezhi, *China's Security State: Philosophy, Evolut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Guo, Yingjie & Wanning Sun eds., *Unequ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Gurtov, Mel, *Will This Be China's Century? A Skeptic's View,*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3.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1987.

Hai Yuncang, "The secretive 'internal reference' that reaches Zhongnanhai directly"

(海运仓:那些直达中南海的神秘“内参”), 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4-12/2853384.html, accessed December 11, 2014.

Hallam, Henry, *Historic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London: John Murray, 1880.

Halper, Stefan,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10.

Han Fei, *Book of Han Fei* (韩非子), Shanghai: Guji, (3rd century BCE) 2007.

Han Guopan, *Exploring the economy of Southern dynasties* (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1963.

Han Min, *History of the Muslim uprising in the Tongzhi era of the Qing* (韩敏: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 Xian: Shangxi Renmin, 2006.

Han Yi, “Brief analysis on the features of academic history in Song era” (韩毅: 略论宋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Beijing: Chinese Science Academy, November 25, 2014.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3.

Hansen, Valerie,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hrough 1600*, New York: Norton, 2000.

Hao Jing, “Letter to Song’s Lianhuai govenor,” (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in Hao Jing, *Lord Hao Wenzhong Lingchuan papers*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Taiyuan: Shanxi Renmin, (1260) 2006.

Harr, B. J. ter,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Hartwell, Robert M.,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2 (February)1962:153-62.

He Cangchui, *Food security* (何昌垂:粮食安全), Beijing: Kexue Wenxian, 2013

He Fang, “China’s lessons on the Korean War issue” (何方: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9, 2013.

He Fang,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ing of Korean” (何方: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 21ccom.net/articles/sdbb/2013/1226/97720.html, posted January 9, 2014.

He Fang, *Notes on Party History-from Zunyi Meeting to Yanan Rectification*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Hong Kong: Liwen Publisher, 2005.

He Ping & Huang Wenguang, *Deadly games of China’s powerful: the secret report on the Bo Xilai incident* (何頻,黃聞光: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薄熙來事件秘密報告, English version: *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Hong Kong: Lingxiu , 2013.

Hendrix, Steve, “Chinese 'Truth' - Take Two,” *The Washington Post Blog,* August 14, 2008.

Herbst, Jeffrey, *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Hessler, Peter, *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NY: Harper, 2006

Hevia, James,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Hidalgo, César, *Why Information Grows: The Evolution of Order, from Atoms to Economi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15.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Ho, Ping-ti,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earch for the Roots of its Longev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5-4 (August) 1976: 547-554.

Hoffman, Philip, *Why Did Europe Conquer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Hollander, Paul,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s (1981) 1997.

Hooper, Beverley, *China Stands Up: Ending the Western Presence, 1948-1950*, New York:Allen & Unwin, 1986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mmunist Chinese political movement colle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opened 2014.

Höpel, Thomas, *The French-German Borderlands: Borderlands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inz, Germany: Institute of European History, 2012.

Hou Yangfang, *Chinese demographic history*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 vol. 6, Shanghai: Fudan Daxue, 2001.

Hsiao, Kung-chua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1: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ixth Century, A.D.*, Translated by F. W. Mot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Hsiung, James C. ed. *The Xi Jingping Era: His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ward the China Dream*, New York, NY: CN Times, 2016.

Hsu, Immanuel Chung-yueh,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Hu Huanyong,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胡焕庸:中國人口之分佈), *Gegraphy* (地理學報), No. 2, 1935.

Hu Huanyong, *Selected works on demographic geography by Hu Huanyong* (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 Beijing: Zhongguo Caizhengjingji, 1990.

Hu Jintao,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the great cau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 (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Seeking truth* (求实), Beijing: CCP Central Committee, No.1. 2008: 4.

Hu Jintao,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build together a harmonious Asia" (胡锦涛: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 Keynote speech at the Boao Asian Forum, Boao, CCTV, April 15, 2011.

Hu Jintao, "Report to the 17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胡锦涛:十七大政治报告), Beijing, October 15, 2007.

Hu Jintao, "Report to the 18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胡锦涛:十八大政治报告), Beijing, November 8, 2012.

Hu Jintao, *Speech at the national work conference on politics and law* (胡锦涛: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Beijing, December 26, 2007.

Hu Pengci, "The origin of 'four greats'" (四个伟大的由来), *Yanhuna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1, 2014.

Hu Pengci, "Why Liu Shoaqi was bold at the 'Meeting of Seven Thousands People'" (胡鹏池: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 August 4, 2015.

Hu Ping, *People's domestication, avoidance, and rebellion* (胡平: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 Hong Kong: Asian Science, 1999.

Hu Ping, *The Thought Remolding Campaig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translated by Philip F. Williams and Yenna Wu,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Hu Qiaomu, *Hu Qiaomu remembers Mao Zedong*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Beijing: Renmin, (1994) 2003.

Hu Shi, "Full world-ization and total westernization" (胡適: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in *Hu Shi and Sino-Western cultures* (胡適與中西文化), Taipei: Shuiniu She, 1965.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18, (Nov.) 1941: 26-35

Hu Xianzhong ed., *How was the elite destroyed?* (胡显中: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 ?) Hong Kong: Wuqi Xueshe, 2012.

Hu Xingdou, "How sad my China: China has become a country that fakes everywhere (胡星斗:哀我中华: 中国已经沦为无处不造假的国家), *China report weekly* (中国报道周刊), August 12, 2008.

Hu Zhian, "Fate of the Central special case teams personnel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胡治安: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No. 9, 2014: 30-31.

Hua Cheng, "Education in the ROC era, always at the front of the world" (华成:民国时期的教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 blog.sina.com.cn/s/blog_600e38b00101qbw2.html, posted February 20, 2014.

Hua Guofeng, *Unite, to struggle for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great power* (华国锋:团结起来,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Beijing: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o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ebruary 26, 1978.

Hua Yishi, "Song Yongyi on the truth of the "golden era"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CP creation of the state" (華逸士:宋永毅談中共建國初期 "黄金時代"的真相), *The events* (大事件), New York, No. 42 (April 6), 2015.

Huan Qiu, "Shocking: the death toll of eight-years resistance war is 40 million or 7 million?" (震撼: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 4000 万还是 700 万?) *Global focus* (环球聚焦), July 7, 2005.

Huang Aihe, "Lanfang: a Chinese 'country' floating in the south sea (黄艾禾:兰芳-飘在南洋的华人之"国"), *National history* (国家历史), Chengdu, No. 6, 2009.

Huang Chih-Lien, *Studies of Celestial system of rule by rituals*,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Beijing: Renmin Daxue, 3 volumes, 1994.

Huang Hanmin, "Estimate of national and Shanghai industrial output in the 1930s" (黄汉民:1930 年代上海和全国工业产值的估计), in Du Xuncheng et al, *Collection of articles to celebrate the 9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Wang Jingyu* (杜恂诚: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Beijing: Renmin, 2007.

Huang Jianxin & Han Sanping (directors),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建党伟业 the great founding of the party), historical fiction movie produced to celebrate the CCP's 90th birthday, Beijing, 2011.

Huang Jingjing, "'Silent Contest' silenced," *Global Times*, Beijing, November 17, 2013.

Huang Jinsheng, "The case-teams behind the key and critical cases" (黄金生:大案要案背后的专案组), *National humanitary history* (国家人文历史), Beijng, March 27, 2014:18-22.

Huang Liang, "Stick to 'three supremacies' forever" (黄亮:始终坚持 "三个至上"), Beijing, 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4/0110/c241220-24084550.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Huang Minxing, "Empires as international systems: Tang and Abbasid Caliphate" (黄民兴: 作为国际体系的帝国:唐朝与阿拔斯王朝的比较), Liu Debin ed., *The Birtish school*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刘德斌: 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史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1: 133-142.

Huang Renyu (Ray), *Grand history of China*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Beijing: Sanlian, 2007.

Huang Renyu, *Reading Chiang Kai-shek's dia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nd history*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1998.

Huang Wenxiong, *History of Chinese cannibalism* (黄文雄:中國食人史), Taipei: Qianjin Press, 2005.

Huang Zhangjin, "Great Qing's GDP and the indemnity of Sino-Japanese War" (黄章晋:大清的 GDP 与甲午战争赔偿), theory.gmw.cn/2010-12/21/content_1485070.htm,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3.

Huang Zhangjin, "State-enterprise destroyed the Song" (黄章晋:亡宋者, 国有制也). 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01521953.html. Posted October 15, 2010.

Huang Zongxi, *Memos for the upcoming visitor before dawn-on law*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原法),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7th Century) 1981-A.

Huang Zongxi, *Memos for the upcoming visitor before dawn-on ruler*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原君),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7th Century) 1981-B.

Huang, Philip,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l61-2, May 2002.

Huang, Ray,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uang Zheng, *Liu Shaoqi's last years*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Beijing:Jiuzhou, 2011.

Hui, Victoria Tin-Bor, "How China Was Ruled?" *The American Interest*, March/April 2008.

Hui, Victoria Tin-Bor, "War, formation of the state and civil rights: comparative study of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with early modern Europe" (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世界经济与政治), Beijing, No. 9, 2008: 6-20.

Hui, Victoria Tin-Bor, *War &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ng, Ho-fung, *Prote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ions, Riots, and Petitions in the Mid-Qing Dynas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Hung, Ho-f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Hung, Wu ed.,*Tenth-century China and Beyond: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 Multi-centered Age,* Chicago:Art Media Resources, 2012.

Huxley, Aldous, *Brave New Worl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2.

Hwang, Byong Moo,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XIV, No. 2, 2010.

Hwang, Jang-yop (황장엽), *Hwang Jang Yop's Memoirs*, Cumberland, MD: Zeitgeist 2006.

Hymes, Robert P. &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C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of the World Bank,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f World Economies*: *Summary of Results and Findings of the*

2011, Washington DC: IBRD, 2014.

Ikenberry, G. John,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Ikenberry, G. John, Wang Jisi, and Zhu Feng eds.,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Order: Ideas, Traditions,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Global Vis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43-68.

IMF, "China: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Foreign Currency Liquidity," Washington, DC: IMF, 10/2014.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4*, Washington, DC: IMF, 2014.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Concise textbook of Chinese history*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2012.

Israel, John,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raeli, Raphael, *Islam in China: Religion, Ethnicity, Culture, and Poli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Jacobs, Andrew, "Non-Communist Parties Lend China an Air of Pluralism, Without the Mes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13: A6.

Jacobs, Dan,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Jacobs, Justin M., *Xinjia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gnton Press, 2016.

Jen, Yu-w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Jenkins, Philip,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Jersild, Austin, *Sharing the Bomb among Friends: The Dilemmas of Sino-Soviet Strategic Cooperation*, CWIHP e-Dossier No. 43, 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 2013.

Ji Qiufeng, "Grand unification: concept, scope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 (计秋枫:大一统:概念,范围及其历史影响), *Guangming daily* (光明日报), Beijing, April 27, 2008.

Jia Zhifang, *My life's dossier*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 Nanjing: Jiangsu Wenyi, 2009.

Jian Bozan, *History of Qin-Han* (翦伯赞:秦汉史), Hong Kong: China Books, 1984.

Jian Che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Jian Feng, "Looking at Song by it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剑锋:从社会经济发展看宋朝), *Study times* (学习时报), Beijing, August 23, 2009.

Jiang Fuchong, "Studies of Chanyuan treaty" (蒋复璁:澶渊之盟的研究), in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宋史研究集), Issue 2, Taipei, 1964.

Jiang Gongtao & Zhang Ming, *Zhognguo tongshi-Mingqing shi* (Chinese general history-Ming and Qing), Beijing: Jiuzhou Press, (1978) 2010.

Jiang Linp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groups of 'liberated soldiers'" (江林平: "解放战士"群体的产生), *Party documents* (党的文献) bimonthly, Beijing: CCP Central Documents Bureau, 3 (May) 2012: 96-103.

Jiang Mei, "To put 'Chinese history' back inside 'world history'" (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 *Reviews of global history* (全球史评论), Beijing, No. 7, 2014.

Jiang Qing, *Political Confucianism* (蒋庆:政治儒学), Beijing: Sanlian, 2003

Jiang Rong, *Wolf totem* (姜戎: 狼图腾), Wuhan: Changjiang Wenyi, 2004: 378-401.

Jiang Tingyu,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Strategic thought by Deng Xiaoping" (姜廷玉: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People's net* (人民网), Beijing, August 12, 2014.

Jiang Yingfeng,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e backward for 2000 years" (江因风:国画书法落后 2000 年) *Art war* (艺术战争), chuansongme.com/n/420872, posted April 4,, 2014.

Jiang Yongjing & Liu Weikai,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MT-CCP peace and war* (蔣永敬, 劉維開: 蔣介石與國共和戰), Taipei: Shangwu, 2013.

Jiang Zemin, "Report to the 15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江泽民:十五大政治报告), Beijing, September 12, 1997.

Jiang Zemin, Preface of *Concise textbook of Chinese history* (江泽民: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2012.

Jiang Zemin, *Selected works of Jiang Zemin* (江泽民文选), Beijing: Renmin, 2006.

Jin Chongji ed.,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金冲及:毛泽东传), 3 volumes,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03 & 2004.

Jin Chongji, *Biography of Liu Shaoqi* (金冲及:刘少奇传),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98.

Jin Chongji, *The history of a book* (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14.

Jin Congji, "Daily life in the concessions in China" (金冲及:中国租界里的日常生活), *Reading weekly* (读书周报), Shanghai, September 17, 2004.

Jin Guantao & Liu Qinfeng, *Rise and crisis- On the super stabl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金观涛 &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Beijing: Fali, 2011.

Jin Hui, "Memorandum on 'Three-Year natural disaster'" (金辉: "三年自然灾害" 备忘录), *Society* (社会), Shanghai, No. Z2, 1993: 13-22.

Jin Shenghe & Xie Xihong, *Changping battle* (靳生禾/谢鸿喜:长平之战), Taiyuan: Shanxi Renmin, 1998.

Jin Xingyao, *Qing's pen-calamities* (金性尧: 清代笔祸), Beijing: Zijingcheng, 2010.

Jin Yinan, *Hardship and glory* (金一南:苦难辉煌), Beijing: Huayi, 2010。

Jin Zhong ed. *Fift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China* (金鐘:共產中國五十年), Hong Kong: Kaifang, 1999.

Jing Chu, "Also on the sick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荆楚: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 blog.boxun.com/hero/jingchu/27_1.shtml, acessed September 29, 2014.

Johnson, Keith & Dan De Luce, "U.S. Gears Up to Challenge Beijing's 'Great Wall of Sand',"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2, 2015.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nes, Eric,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03.

Joseph, Philip,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a stud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New York, NY: Octagon Books, 1928.

Kan Huai-chen ed., *The concepts of tianxia and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甘懷真編: 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 Taipei: Taiwan Daxue, 2007.

Kang Youwei, *Datong shu* (*Book of great unity* (康有为:大同书), Shanghai: Shanghai Guji (1902) 2005.

Kang Youwei, *Third submission to the emperor* (康有为:上皇帝第三书), 1898. In Zhang Yong ed., *Reference documents of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s-late Qing to republic* (张勇: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 vol. 1,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5.

Kang, David Chan-oo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Kantorowicz, Ernst H.,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Karl, Rebecca E.,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 Concise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Kaufman, Alison Adcock, "The 'Century of Humiliation': Then and Now: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acific Focus*, 25-1, 2010: 1–33.

Ke Yuehai et al, "Y Chromosome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originated from Africa" (柯越海等:Y 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中国人起源于非洲),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科学通报), Beijing, No. 5, 2001.

Keightley, David N.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Kennan, George F.,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4) 1947: 566–582.

Kennan, George F.,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Khatri1, Naresh, Eric Tsang & Thomas Begley, "Cronyism: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 2006: 61–75.

King, Gary, Jennifer Pan &Margaret E. Robert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s, May 17, 2016

Kingston, Jeff,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disparities and stifled initiative," *The Japan Times*, June 2, 2013.

Kirkland, Russell, *Taoism: The Enduring Tra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NY: Penguin, 2011

Kissinger, Henry, *The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NY: Simon & Shuster, 1979.

Kissinger, Henry,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Penguin, 2014.

KMT Central, *Penetrating look at the CCP* (中國共產黨之透視), Shanghai: Dahai, 1935.

Knoblock, John,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s. I-I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90 & 1994.

Kohn, Livia, *The Taoist Experience: An Anthology,*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3.

Kołakowski, Leszek, *Freedom, Fame, Lying And Betrayal: Essays On Everyday Lif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Koł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3 volumes, New York: Norton, (1978) 2005.

Kong Hanbin, "The transplant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model in China" (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强化), in Sino-Russian History Society ed., *History and realt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vol. 2,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2010.

Kong Li, *Inquisitions in the Qing era* (孔立: 清代文字狱),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0.

Konoe, Fumimaro (近衛文麿), "Second Declaration to China," November 3, 1938. Collected in Gu Weijun, *Gu Weijun memoirs* (顾维钧回忆录), vol. 2-B,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5: 357-359.

Korb, Lawrence J., "Turning the Asia Pivot Into a Real 'Obama Doctrine'," *Defense One Newsletter*, June 12, 2014.

Kraus, Richard Cur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roeber, Arthur R., "Here is Xi's China: Get used to it," *China File,* December 11, 2014.

Ku Hung-Ming (Gu Ho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king: Peking Daily News, 1915.

Kuai Tong & Liu Xiang,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蒯通/刘向:战国策),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nd Century BCE) 2006.

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Kuo, Lily, "China's economy became a tiny bit more equal in 2013," qz.com/168619, January 20, 2014.

Kwong, Luke S.K.,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1984.

Lagerkvist, Johan, *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2010.

Lahart, Justin, "With Less Chinese Support, BRICs Tumb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14.

Lai Hairong, "Lie low hiding is value not means, shall never expire" (赖海榕: 韬光养晦是价值不是手段永远不会过时), laihairong.blog.caixin.com/archives/140869. January 4, 2016.

Lampton, David & James Mann, "What's your China fantasy," *Foreign Policy*, May 15, 2007.

Lampton, David, "How China is Ruled: Why It's Getting Harder for Beijing to Govern," *Foreign Affairs*, 93-1, 2014:74-84.

Lampton, David,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Cambirdge Univestiy Press, 2003.

Landes, David 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NY: Norton, 1998.

Lang Jun "The biggest black dot in Lin Biao's life: plan and command the war of starvation in Changchun" (朗钧:林彪人生最大污点-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 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16111366.html, accessed August 28, 2014.

Langlois, John 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Lao Yu, "Qi Gong and Mao Zedong" (老愚:启功与毛泽东), *Financial Times in Chinese*, posted December 25, 2014.

Lattimore,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1951.

Leading Group, ed., *Collection of the studies on Zheng He's sailings 1905-2005*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905-2005), Beijing: Haiyang, 2005.

Lee, Erika,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Lee, James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y, 1700-20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ei Yi, "Jiawu war and the change of views of state in China" (雷颐:甲午战争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变迁), Beijing, *Economy observer* (经济观察报), August 22，2014.

Lei Yi, "Taboos of words" (雷颐:词汇的禁忌), Beijing, *Economy observer* (经济观察报), July 21, 2010.

Lei Yi, *Li Hongzhang and the last 40 years of the Qing*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Taiyuan: Shanxi Renmin, 2008.

Leng Rong et al eds. *Chronicles of Deng Xiaoping* (冷容等: 邓小平年谱), Vol. 2, Beijing: Central Documents Press, 2004.

Lensen, George, *The Damned Inheritanc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es, 1924-1935*, Tallahassee FL: Diplomatic Press, 1974.

Leonard, Mark, *What Does China Think?*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2008

Levenson, Joseph,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Levenson, Joseph,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Levenson, Joseph, *Modern China and its Confucian Past*, vol. 1,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Levine, Steven I.,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Marshall Mission and Manchuria." *Diplomatic History*, 3-4, 1979: 349–375.

Lewis, Mark Edward & Meuyu Hsieh, "The Politics of Tianxia in Ha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a Trans-cultural Empir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Tianxia Workshop,"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Leys, Simon (Pierre Ryckman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NY: St Martin's, 1971.

Li Biya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Tang Empire and its local lords*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2015.

Li Cheng, "China's Team of Rivals,"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Li Cheng,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8.

Li Cheng, *China's Leaders*, Lam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Li Chengpeng, "On talking" (李承鹏北大演讲录: 说话), public lec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November 18, 2012, blog.sina.com.cn/s/blog_3df2803d0101asm8.html.

Li Chengpeng, "Reading history but don't believe love anymore (李承鹏:看着历史书却不相信爱情了), 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d7u.html, accessed February 8, 2014.

Li Chengyu, "Mao's killing quotas," *China Rights Forum*, New York, No. 2, 2005.: 41-44.

Li Dandan & Lu Xiaoping, "Total market mobilization: ministries first ever joint effort to save the stock market" (李丹丹 &卢晓平:全市场总动员:部委首次联动救股市), gov.cn/zhengce/2015-07/09/content_2894278.htm, posted July 9, 2015.

Li Danhui,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s in 1969: origin and results"(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当代中国史研究), No. 3, 1993.

Li Fan, "Why the current idealoty is becoming quite leftist" (李凡:为什么现在的意识形态变得比较左), cn.nytimes.com/china/20130624/cc24lifan1/, posted June 24, 2013.

Li Fangchun, "Bitterness, revolutionary conversion and thought power" (李放春:苦, 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 *Open times* (开放时代), Guangzhou, No. 10, 2010: 5-35.

Li Fangzhou, "Use history to buil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李方舟:以史为鉴, 文化自信), *Guangming net* (光明网), Beijing, October 14, 2014.

Li Feng, *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Li Fion & Kyoungwha Kim, "China's Reserves Retreat From $4 Trillion Mark as Outflows Seen," *Bloomberg News*, October 16, 2014.

Li Hongzhang, *Memo on reconsidering not cut steamboat building* (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 1877. Cited in Liang Qiuchao, *Biography of Li Hongzhang* (梁启超:李鸿章传), Guangzhou: Baihua, (1901) 2009.

Li Jing, "First round of Sino-American economic dialogue " (李静:首轮中美经济对话), China News Agency, July 29, 2009.

Li Jingde ed., *Master Zhu's words* (黎靖德:朱子语类), 8 volum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270) 1999.

Li Konghuai,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李孔怀: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Shanghai: Fudan Daxue, 2006.

Li Ling, *The only rule: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in Sun Zi* (李零:《孙子》的斗争哲学)， Beijing: Salina, 2010.

Li Ling, *Fate determines life and death and fortune is all up to the heave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in Zhou Yi* (李零:《周易》的自然哲学), Beijing:Sanlian, 2013.

Li Peng, "What type of life experience is two designations," (李鹏:被双规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club.business.sohu.com/enjoy/thread/30u9z84k48j, posted March 3, 2015.

Li Qingfeng ed., *History banned by the* CCP (李清锋:中共禁止的历史), Deer Park, NY: Haya, 2013.

Li Ran ed., *Illustrated Twenty-four Filial Exemplars*, (李然: 二十四孝图说), Shanghai: Shanghai Daxue, (Yuan Dynasty) 2006.

Li Rui, *Li Rui on Mao Zedong* (李鋭談毛澤東), Hong Kong: Shidai Guoji, 2008.

Li Rui, *Real records of Lushan Conference*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Zhengzhou: Henan Renmin, 1999.

Li Rui, *Witness accou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2 volumes, Haikou: Nanfang, 1999.

Li Rui, *Young Mao Zedong* (李锐:早年毛泽东),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1993.

Li Sheng, *Hisotry of the Confucian religion in China* (李申:中国儒教史), 2 volume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1998.

Li Tang, *West Jin* (李唐:西晋), Hong Kong: Hongye, 1962.

Li Tao, *Extended addition to chronicles for the rulers*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2th Century) 2004.

Li Tianrui, "Unseal the official pennames" (李天锐:揭秘官方笔名), *Clean politics outlook* (廉政瞭望), Chengdu, No. 18, October 30, 2014.

Li Tieyin, "To have our own historiography" (李铁映: 要有自己的历史观), *Chinese social science news* (中国社会科学报), Beijing, February 27, 2015.

Li Wen, "Special interview of Hao Bocun" (李文:专访郝伯村), BBC in Chinese, Taipei, July 2, 2015.

Li Xiaen, "Emperors' face projects of the various dynasties" (李夏恩:各朝皇帝的面子工程), *New weekly* (新周刊), Guangzhou, No. 421 (June 15), 2014: 118-125.

Li Xiaolin & Tang Minggang eds., *Reading of the poems by Mao Zedong* (李晓琳&唐名刚:毛泽东诗词阅读鉴赏), Changchun:Jilin Wenshi, 2005.

Li Xuetong,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 by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before the July 7th incident" (李学通: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 *Studies of anti-Japanese war* (抗日战争研究), No. 1, 2003: 1-18.

Li Yanyan, "Must arrest several tendencies to protect ideological security with micro blogging" (李艳艳: 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 *Red flag drafts* (红旗文稿), Beijing, No. 23 (December 13), 2014.

Li Zehou & Liu Zaifu, *Goodbye to revolution-review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李泽厚, 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Hong Kong: Tiandi, 1997.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94) 2011.

Li Zhi, "Burned book-On innocense" (李贽: 焚书-童心说), *Collected works of Li Zhi* (李贽文集), Beijing: Yanshan, (1590) 1998.

Li Zhiti ed., *Give ideals some time* (李志题:给理想一点时间), Chengdu: Sichuan Wenyi, 2016.

Li Zhiting, "Scholars on 'New Qing History': sample of 'new imperialism" historiography" (李治亭: 学者评 "新清史": "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Chinese social science news* (中国社会科学报), Beijing, April 20, 2105.

Li Zhiting, *China's grain shipping history* (李治亭:中國漕運史), Taipei: Wenjin, 1997.

Li Zhongxin ed., *Study on China's community policing* (李忠信:中国社区警务研究), Beijing: Qunzhong, 1999.

Li Zhuang, "The confiscated assets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the people (李庄:被没收资产应该给民众一个交代), *Southern metro news* (南方都市报), Guangzhou, December 3, 2013.

Li Zuopeng, *Li Zuopeng memoirs* (李作鵬回憶錄) Hong Kong: Beixing, vol. 2, 2011.

Li, Li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1927-2012),"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15.

Li, Zhaoji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uhan, Hubei, Vol. 1-1, 2002.

Liang Jiabin, *Study of the Guangdong thirteen firms*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Gaungzhou: Guangdong Renmin, 1999.

Liang Qichao, "On young China"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Yingbingshe collections* (饮冰室合集), vol. 5,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00) 1989.

Liang Qichao, "Value of Sun Wen" (梁啓超:孫文的價值), *Morning news* (晨報), Beijing, March 13, 1925.

Liang Qichao, *About the Wuxu coup*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Hong Kong: Zhonghua Shuju, (1899) 1957.

Liang Qichao, *Complete collections of Yingbing chamber*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12 volum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897-1929) 1983.

Liang Qichao,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history* (梁啓超: 歷史上中華民族之觀察), *Yingbingshi zhuanji*, Vol. 27, Shanghai: Zhonghua Press (1907) 1941.

Liang Qichao, *On the major trend of changes i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s*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Shanghai: Guji Press <1902> 2001.

Liang Xiaosheng, *Depressed Chinese* (梁晓声:郁闷的中国人), Beijing: Guangming Ribao, 2012.

Liang Zhiyuan, "On the 'sepcial cases' in Bo County," (梁志远:亳县 "特殊案件"的记述),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7, 2014: 39-44.

Liao Min-Shu, *New thought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Qing era*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Taipei: Chengchi Daxue, 2013.

Liao Yiwu, *Chats with the lowest social strata in China* (廖亦武:中國底層訪談錄), 3

voluemes, Taipei: Maitian, 2002.

Liao Yiwu, *Last landlords: Interviews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land reform*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土改幸存者采访录), 2 volumes, New York: Mingjing, 2008.

Lieberthal, Kenneth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New York, NY: W. W. Norton, 2005

Lim, Louisa,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Lim, Yves-Heng, "How (Dis)Satisfied is China? A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92, 2015: 280-297.

Lin Baohua, "Why the CCP ever exaggerating the death toll of resistance war?"(林保华:中共為何越來越誇大抗戰死亡人數?), *Soutehrn* news (南方快报), Kaohsiung, Taiwan, September 14, 2005.

Lin Biao, "Long live the victory of people's war"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September 3, 1965:1.

Lin Ganquan, "On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Qin-Han feudal despotism" (林甘泉:论秦汉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Series on the history of Qin-Han II* (秦汉史论丛 2), Xian: Shangxi Renmin, 1983.

Lin Zhe, "Mao Zedong dismisses rule of law, self-declaring heaven-less and lawless (林喆:毛泽东轻视法制, 自称无法无天), Hong Kong: Phoenix TV, January 5, 2013.

Lin Liguo et al, *Outline of project 571* (林立果等:五七一工程纪要), drafted in 1971. Beijing: *CCP Central Document 24* (中共中央文件 1972-24 号), 1972.

Lin Mu, "Two designations: CCP's meat-grinder in new era" (林睦:双规:新时代的中共绞肉机), blog.boxun.com/hero/linmu/2_1.shtml, accessed January 27, 2016.

Lin Mu, *Dreams still empty when candles are out* (林牧:烛烬梦犹虚), Hong Kong: Xin Shiji, 2002.

Lin Shanshan, "Man self-reports stories of dismantling listening devices (林珊珊:男子自述为官员拆窃听器经历),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Guangzhou, December 6, 2012.

Lin Yifu, *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2.

Lin Yunhui & Gu Xunzhong, *The rhapsody of people's communes* (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 Zhengzhou: Henan Renmin, 1995.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NY: John Day Company, 1935.

Lincoln, W. Bruce, *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 Siberia and the Russians*, Ith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nda, "How '1984' is China? – Complexities of Censor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Chinese Nightingale*, April 3, 2013.

Link, Perry,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Linz, Juan J. &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Linz, Juan J.,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Liu Baiwen, "2600-year old salt monopoly may end in 2016" (刘百稳, 延续了 2600

年食盐专营 2016 年或终结), *Chinese business* (华商报), Beijing, November 21, 2014.

Liu Bo, *Origin-authenticating the Chinese sour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流波: 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 , Changsha: Hunan Renmin, 2008.

Liu Fengyun, Mao Jianzhong & Liu Wenpeng eds.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Qing Dynasty* (刘凤云,茅建中,刘文鹏: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 2 volumes, Beijing: Renmin Daxue, 2012.

Liu Fengyun, *Remarks in red: management of bureacrats by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刘凤云:朱批: 康雍乾用人与治吏), Beijing:Dangjian, 2015.

Liu Guohua & Zhang Qingzhi, "'Red Star Over China': an exemplary work of foreign propaganda by the CCP" (刘国华,张青枝: "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典范), *Party documents* (党的文献), Beijing: CCP Central Documents Bureau, No. 3 (May) 2011: 125-130.

Liu Guoyin, *On Chinese culture* (劉果因: 論中國文化), Kuala Lumpur: Zhonghua Huitang, 1986: 33-36 & 200-201.

Liu Haif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imperial exam in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刘海峰: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Academic monthly* (学术月刊), Beijing, December, 2006: 136-142.

Liu Haifeng, "Imperial exam system: an examination system with global influence (刘海峰: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 *Beijing examination news* (北京考试报), November 11, 2004:16.

Liu Huaqing, *Liu Huaqing memoirs* (刘华清回忆录), Beijing: PLA, 2004.

Liu Huo, "A glance of campaigns in 30 years" (刘火:三十年间运动一览), *Literature and history* (文史月刊), Taiyuan, No. 2, 2010:26-30.

Liu Jinfeng, "History felt by a historian" (刘晋锋:一个历史学家经历的历史), ohistory.org/newsdetail.aspx?id=655, posted December 30, 2013.

Liu Liyan, "What does '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mean?" (柳立言:何謂 "唐宋變革"?) *Chinese cultural and history forum* (中華文史論叢), Shanghai, No. 81, 2006:126.

Liu Mingfu, *China dream* (刘明复:中国梦), Beijing: Zhongguo youyi, 2010.

Liu Pujiang, "Family's ancestral law: Another study of Song taizhu's vow and its tablet (刘浦江: 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记事碑), *Culture and history* (文史), No. 3, 2012: 1-16.

Liu Xiang ed., *Books of Rites - Record of dykes* (劉向:禮記-坊記), Taipei: Shangwu, (1st century BCE) 1981.

Liu Xiaobo, "My 19-year ties with *Kaifang* (劉曉波:我與《開放》結緣十九年), *Open* (開放), Hong Kong, December 19, 2006.

Liu Xi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ould not separate" (刘欣:文史哲不该分家), *Chongqing youth* daily (重庆青年报), November 20, 2014: D4.

Liu Xu et al, *Old book of Tang* (刘昫:旧唐书), vol. 199.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0th Century) 1977.

Liu Yang, "General Bureau of TV and Radio starts to control resist-Japan mindless TV dramas"(刘阳:广电总局整治抗战雷剧),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May 17, 2013.

Liu Yazhou, *Treatise on the west* (刘亚洲:西部论), 2004. Excepts in *Phoenix weekly* (鳳凰週刊), Hong Kong, August 5, 2010.

Liu Yongcheng & Zhao Gang, "Trends of changes of real income of Chinese agricultrual laborores in 17-18 centuries" (刘永成,赵冈: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农业雇工的实质工资变动趋势), First National Archives, *Ming-Qing archives and studies of history* (第一档案

馆: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vol. 2,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8: 874-875.

Liu Yuewu, "Assimilation and unification (柳岳武: 一统与统一), *Jianghuai forum* (江淮论坛), Hefei, No. 3, 2008.

Liu Zhiqing, *Rethinking after all the love and hatred: Sino-Soviet relations of 70 years* (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 Jinan: Huanghe, 1998.

Liu Zhongjing, "Evolution of world system and China's nation-building" (刘仲敬:世界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国家塑造),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文化纵横), No. 4 (August), 2014: 73-79.

Liu Zhongjing, "Guo Mouruo proliferated" (刘仲敬:泛滥的郭沫若), May 7, 2015.

Liu Zhongjing, "Quiet Russians" (刘仲敬:沉静的俄国人), August 11, 2015.

Liu Zhongjing, "The Game of the Far East in the 20th Century: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刘仲敬:苏联与日本: 20 世纪远东的博弈者), Public Lecture, Beijing: Phoenix News Salon II, July 26, 2015.

Liu Zhongjing, "The remolding of the world order after World War I" (刘仲敬: 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 public lecture in Guangzhou, March 14, 2015,

Liu Zhongjing, *Events of the Republican history* (刘仲敬:民国记事本末), Nanning: Guangxi Shifan Daxue, 8 volumes, 2013.

Liu Zhongjing, *From Huaxia to China* (刘仲敬:从华夏到中国), Nanning: Guangxi shifan daxue, 2014.

Liu Zuo & Li Weiguang eds. *Taxat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bases* (刘佐,李炜光: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 Beijing, Zhongguo Shuiwu, 2011.

Liu, Tiewa,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3-87, 2014: 556-574.

Liu, Yawei & Justine Zheng Ren. "An Emerging Consensus on the US Threat: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LA offic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6, 2014: 255-274.

Locke, John,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Hackett, (1690) 1980.

Loke, Beverley, "Conceptualising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Negotiations toward a Post-Second World War Orde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4-2, 2013: 209-226.

Long Yingtai, *Grand rivers great seas 1949* (龍應台:大江大海 1949), Hong Kong: Tiandi Tushu, 2009.

Lovell, Julia,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 London: Picador, 2011.

Lu Binkuan, *Essence of the ROC Constitution* (吕炳寬:中華民國憲法精義), Taipei: Wunan Tushu, 2005: chapters 3-16.

Lu Hanchao, *China's first visiting official: Biography of Robert Hart* (卢汉超: 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 Shanghai: Shanghai Shehui Kexue , (1986) 2009.

Lu Lin et al, *Oral history of the CCP 1949-1978* (鲁林等: 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 1949-1978), Jinan: Jinan , 2002.

Lu Shuzhe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1956-1978" (吕书正:1956-1978 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Beijing, No. 1, 2003.

Lu Xun, "Letter to Cao Juren" (鲁迅: 致曹聚仁信), June 18, 1933. *Completed works of Lu Xun* (鲁迅全集), Beijing: Renmin Wenxue, vol. 12. (1933) 1981.

Lu Xun, "We are not fooled anymore" (魯迅:我們不再受騙了), *Polaris* (北斗), Shanghai, Vol. 2-2 (May 6) 1932.

Luo Ergang, *Outline history of Taiping Tianguo*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7) 1947.

Luo Pinghan, *Hisory of land reform campaign*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 Fuzhou, Fujian Renmin, 2005.

Luo Xianglin, *Study of the Republic on West Bruno by Luo Fangbo et al* (羅香林: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 Kalimantan Barat, Indonesia: Zhongguo Xueshe, 1961.

Luo Zhengyu, "Preface to Wang Guowei papers" (罗振玉:王忠悫遗书序), cited in Zhou Yan, *Wang Guowei and politics in the ROC* (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Beijing: Jiuzhou, 2013.

Luo, Zhitian,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 *Modern Asian Studies*, 27-2, 1993: 297-319.

Lüthi, Lorenz M., "Restoring Chaos to History: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June) 2012: 378-397.

Lüthi, Lorenz M.,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 Jianta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orges glory" (马建堂:科学发展铸就辉煌), *Seeking truth* (求是), Beijing, June 18, 2012.

Ma Kegui ed., *Comparative study of feudalism in China and the West* (马克垚: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Beijing: Xuelin Press, 1996.

Ma Qibin, *The 40-year rule of the CCP* (马齐彬: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Beijing: Zhanggong Dangshi Ziliao, (1989) 1991.

Ma Rong, "Does China have the risk of national division in the 21st century-I" (马戎: 21 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上), *Leaders* (领导者), Beijing, No. 38 (February) 2011: 88-108.

Ma Xiangp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making of one Xinhua internal reporting that shock the country" (马祥平:一篇震动全国的新华社内参的产生前后), ah.xinhua.org/jiandu/2001-07/09/content_62628.htm, accessed December 11, 2014.

MacFarquhar, Roderick &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chan, Tibo, "Kleptocracy," in Ronald Hamowy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ibertarian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8.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translated by Harvey Mansfiel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32) 1998.

Mackerras, Colin,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MacMillan, Margaret,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2008.

Maddison, Angus et al,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6.

Maddison, Angus,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2nd edition,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Brussels: OECD, 2001.

Mallory, James P. &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UK: Thames & Hudson, (2000) 2008.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84.

Mancall, Mark,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nn, James,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New York, NY: Penguin, 2007.

Manning, Kimberley Ens & Felix Wernheuer eds.,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BC Press, 2012.

Mao Haijian, *Collapse of celestial dynasty: re-study the Opium War*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Beijing: Sanlian, 1995.

Mao Yushi, "War and peace" (茅于轼:战争与和平), 2013.

Mao Zedong, "American imperialism is the common enemy of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Japan (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 conversation with Japanese delegation on June 21, 1960. In *Selected works on diplomacy by Mao Zedong* (毛泽东外交文选), Beijing: Shijie Zhishi, 1994: 438.

Mao Zedong, "Comments on Beidaihe meeting's industrial documents (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 September 2, 1958. *Mao Zedong pape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vol. 7,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92.

Mao Zedong, "Forewords of *Communists*"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选集), Vol. 2, Beijing: Renmin, (1939) 1991.

Mao Zedong, "Greatest friendship" (毛澤東:最偉大的友誼),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March 9, 1953:1.

Mao Zedong, "Issues of war and strategy" (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选集), Beijing: Renmin , (1938) 1991.

Mao Zedong, "Key points of land reform work in newly liberated areas"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选集), vol. 4, Beijing: Renmin, (1948) 2003.

Mao Zedong, "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论人民民主专政)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选集), Beijing: Renmin, vol. 4, (1949) 1991: 1468-1482.

Mao Zedong, "Serve the people" (为人民服务),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选集), vol. 3, (1944) 1991.

Mao Zedong,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unan-Republic of Hunan" (毛澤東: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 in *Dagong daily* (大公報), Changsha, September 3, 1920: 2.

Mao Zedong, *Mao Zedong early words 1912-1920* (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1920), Changsha: Hunan, 1995.

Mao Zedong, "Emulating Lu You" (毛泽东:仿陆放翁), in *Mao Zedong writing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vol. 7, (1958) 1992:648.

Mao Zedong, "Sepeech to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in *Mao Zedong writing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vol. 8, (1959) 1993:522-524.

Mao Zedong, *Mao Zedong Xuanji* (毛泽东选集), vol. 4, Beijing: Renmin, (1949) 1965.

Mao Zedong, Speech at the first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the 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August 30, 1956.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毛泽东选集), Beijing: Renmin , Vol. 5, 1977.

Mao Zedong, "Reply to Reuters Reporter" (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 *Xinhua daily* (新华日报), Chongqing, September 27, 1945.

Marks, Robert B., *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Mattis, Peter, "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 2015

McDonald, Edward, *Learning Chinese, Turning Chinese: Challenges to Becoming Sinophone in a Globalised World,* Londong: Routledge, 2011.

McGregor, Richard,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NY: Harper, 2012

McGregor, Richard,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2011.

McNeal, Edgar Holmes & Oliver J. Thatcher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 Selected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Mencius, *Mengzi-Gaozi xia* (孟子.告子下), Taiyuan: Shanxi guji , (3rd Century BCE) 2004.

Mencius, *Mengzi-Liang Huiwang* (孟子-梁惠王), Taiyuan: Shanxi guji, (3rd Century BCE) 2004.

Meng Sen, *Textbook on Qing history* (孟森: 清史讲义),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36) 2006.

Meng Xing, *Who's in charge: the stories of the delegates to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CP* (孟醒: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 Beijing: Remin, 2009.

Meng Zhaogeng,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Chen Li, son of Chen Bulei (孟昭庚:陈布雷之子陈砾的非凡人生), *Survey of party's history* (党史纵览), No. 1 (January) 2013: 31-33.

Meng, Xin, Nancy Qian & Pierre Yared,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March 21, 2015.

Michael, Franz, *China through the Ages: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

Mikalson, Jon D., *Ancient Greek Religion*,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9.

Mirsky, Jonathan, "Many Poisoned Rivers," *Literary Review*, London, July 2010.

Mishra, Pankaj,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2.

Mitcham, Chad,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nd Japan, 1949-1979: Grain, Trade and Diplomac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5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Miyazaki, Ichisada,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translated by Conrad Schirokau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yazaki, Shijo, *Monographs on Song history* in *Complete works of Shijo Miyazaki* (宫崎市定全集), vols. 9-12, Tokyo: Iwanami Shoten, 1978.

Moloughney, Brian and Peter Zarrow eds.,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Montesquieu, M. de, *The Complete Works of M. de Montesquieu*, Vol. 1, *The Spirit of Laws*, London: T. Evan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777) 2009.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 1989.

Moore, Thomas G.,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1948.

Morris, Ian, *War! What Is It Good For?: Confl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Morrow, James 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Randolph M. Siverson & Alastair Smith,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Mote, F.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te, Frederick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u Zhongsan, *Way of politics and way of governance* (牟中三: 政道與治道), Taipei: Taiwan Xuesheng, 1991.

Mu Guangren, "Enlightenment, new enlightenment, and re-enlightenment as I know" (穆广仁: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2, 2012:8-10.

Mungello, D.E.,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4th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2-5.

Muo Yueda, *Statistical history of Song, Liao, Jin Yuan* (莫曰达:宋辽金元统计史), Fuzhou: Fujian Statistical Bureau, October 24, 2012.

Murong Xuecun, "Corrup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5: A23.

Naito, Konan, "General views on Tang and Song eras"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観), in *Completed works of Konan Narito* (内藤湖南全集), vol. 8, Tokyo: Chikuma Shobo, (1922) 1969.

Nathan, Andrew J. &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Naughton, Barry J.,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Neal. Larry & Jeffrey Williams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apitalism*, 2 volum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Needham, Joseph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7 volu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2004.

Ni Tao et al, "China dream, Africa dream, world dream" (倪涛等: 中国梦非洲梦世界梦),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March 26, 2013:2.

Nickel, Lukas,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 UK, 76-3 (October) 2013: 413-447.

Nie Ou, "How much investment already made for One Belt One Roadin the past two years?" (聂欧: "一带一路"这两年投了多少钱?) *Economic national weekly* (财经国家周刊), Beijing, December 25, 2015.

Niu Jun ed., Conspectus history of PRC foreign relations (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Nixon, Richard, "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ay 29, 1972.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Woolley, John 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ws/?pid=3438, accessed May 24, 2014.

Nixon, Richard,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NY: Simon & Shuster, 1978

North, Douglass C. &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North, Douglass C., John Joseph Wallis,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North, Douglass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Y: Norton,1982.

O'Dowd, Edward C.,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7.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Economic Outlook for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India 2014,* Paris: OECD Library, November 2013.

Orwell, George, *1984,*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49.

Orwell, George, *The Animal Far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45.

Osnos, Evan, "Confucius comes home: Move over, Mao," *The New Yorker*, January 13, 2014: 30-35.

Ou Jiwen et al eds., *Archiv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xi* (区济文等: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18 volumes, Nanning: Internal Publication, 1988.

Ouyang Xiu, *New book of Tang* (欧阳修:新唐书), vol. 200.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1th Century) 1977.

Palace Museum, *Archives of Chinese Diplomatic Documents* (中國外交檔案), Taipei: accessed October, 2011.

Palace Museum, *The Pentaglot Dictionary* (御製五體清文鑑), Beijing: Minzu, (1794) 1957.

Palace Museum, *Archives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Qing* (清代文字狱档),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9 vlolumes, (1934) 2011.

Pan Guang, *The Jew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4.

Pan Ruizhi, "Herdsman of prefecture" (彭瑞芝:州牧) in *Chinese encyclopedia* (中華百科全書), Taipei: Chinese Wenhua Daxue, 1983.

Pan Wei, *Rule by law and superstition of democracy: a legalist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world order* (潘維: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與世界秩序), Hong Kong: Shehui Kexue, 2003.

Pan Xulan, *Various topics on Taiping* (潘旭澜:太平杂说), Tianjin: Baihua Wenyi: 2000.

Pang Zhongying ed., *AIIB:The Chinese wisdom for global governance* (庞中英:亚投行: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 Beijing:Renmin, 2016.

Pantsov, Alexander V. & Steven I. Levine,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ntsov, Alexander V., &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12.

Patrick, Stewart, "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

Pauley, Bruce F., *Hitler, Stalin, and Mussolini: Totalitaria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8.

Pei Minxin. "Crony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eech at Hudso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1, 2014.

Pei Yiran, "Stories of marriage and love in Yanan" (裴毅然:延安婚恋故事), *Tongzhou gongjin* (同舟共进), Guangzhou, June 2012.

Peng Guangqian, "Three comments on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彭光谦:三论战略机遇期), 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9/c_124472782.htm, posted March 19, 2013.

People's Daily Chief Editor, *Internal reference* (人民日报总编室:内部参阅), Beijing, classified weekly for bureau chief and higher, No. 406, April 15, 1998.

Pepper, Suzanne, "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1 (February) 2004.

Pepper, Suzanne,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Perdue, Peter C., "The Tenacious Tributary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10.1080/10670564.2015.1030949, published online May 7, 2015.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rlez, Jane "Shadow of Brutal '79 War Darkens Vietnam's View of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4: A6.

Perry, Elizabeth J.,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1- 4 (July) 1989: 579-591.

Perry, Elizabeth,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er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eterson, Willar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9, Part One: The Ch'ing Empire to 18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ettis, Michael, *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ew Research Center, "China's Image,"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March 9, 2015.

Phillips, Tom, "Chinese spin doctors urged to spread 'positive energy' online," *The Telegraph*, January 18, 2013.

Pillsbury, Michael, "Misunderstanding China: How did Western policy makers and academics repeatedly get China so wro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7, 2014.

Pillsbury, Michael,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2015

Pines, Yuri, *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inker, Steve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Peguine, 2011.

Pipes, Richard,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Pipes, Richard,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Random, (1993) 2011.

Pirenne, Henri,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translated by I.E. Clegg, Orlando, FL: Harcourt, (1936) 2014.

PLA Military Science Academy, *War history of the PLA*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Beijing: Junshi Kexue, 1987.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380 BCE) 1991.

Platt, Stephen R.,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Vintage, 2012.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1944) 2001.

Polastron, Lucien X., *Books on Fire: The Destruction of Libraries throughout History*, Inner Traditions 2007.

Political Psychology, 23-1 (March) 2002:1-37.

Polo, Marc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by Ronald Latham,NewYork, NY: Penguine, (14th century) 1956.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mfret, John, *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2006.

Pong, David, *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opper, Karl,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umes, London: Routledge, 1945.

Powelson, John P., *A History of Wealth and Poverty: Why a Few Nations are Rich and Many Poor,* Chapter 11, "China: The Puzzles of Histor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RC Central Government, "100 details on publication inspection" (出版审查 100 条明细), site.douban.com/248815/widget/notes/18105233/note/496500597/, April 28, 2015.

PRC Central Government, *Chinese nation* (中华民族), Beijing: 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6.htm. Accessed December 6, 2013.

PRC Foreign Ministry, *Sino-French Communiqué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中法建交公报), Beijing, January 27, 1964.

PRC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Personnel Training Bureau, *Basic textbook on public security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治安基层基础教程), Beijing: Qunzhong, 1999.

PRC Ministry of Treasury,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treasury 2011* (2011 中国财政基本情况), Beijing, 2012.

Pritchett, Lant & Marla Spivack, *Estimating Income/Expenditure Differences across Populations: New Fun with Old Engel's Law*,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339, Cambridge, MA: Harvard CGD, 2013.

Pye, Lucian W.,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uary) 1993.

Pye, Lucian W.,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Qi Benyu, "Hearing 'the May 7th Decree' talked by Chairman Mao in person" (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 "五七指示"), 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22497544.html, posted December 24, 2013.

Qi Yanbin, "Five insurances and one fund accounts for nearly half of wages" (齐雁冰: "五险一金"占工资额近半), *Beijing youth daily* (北京青年报), January 5, 2015.

Qian Liqun, *1948: chaos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钱理群: 1948 天地玄黄), Jinan: Shandong Jiaoyu, (1998) 2002.

Qian Liqun, *Mao Zedong era and post-Mao Zedong era 1949-2009*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2 volunes, Taipei: Lianjing, 2012.

Qian Qianyi, "Post-autumn poem number 13" (后秋兴之十三). *Herdman's collections* (钱谦益:牧斋杂著), vol. 2, Shanghai: Guji, (17th century) 2007.

Qian Wenjun,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War" (钱文军:朝鲜战争 50 年祭), tieba.baidu.com/p/15896912, posted October 25, 2001.

Qian, Liqun, *Mao Zedong era and post-Mao Zedong era 1949-2009*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vol. 1, Taipei: Lianjing Press, 2012.

Qiao Zhizhong, "The complex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o-historical views in China and Japan (乔治忠:中日两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纠结),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天津社会科学), No. 4, 2013.

Qin Hui, "China uses its '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to forge shocking competiveness" (秦晖:中国以 "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 January 2, 2016.

Qin Hui,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mostly discussing fake issues" (秦晖: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 qinhui09q.blogchina.com/2370682.html, January 19, 2015.

Qin Hui, "Different images of Republican history-3" (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 3),

Southern weekend (南方周末), Guangzhou, November 11, 2012.

Qin Hui, "Practice of nationalism: the process of China rose up" (秦晖:民族主义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Southern weekend* (南方周末), 2 parts, Guangzhou, January 23 & February 6, 2012.

Qin Hui, "The Qin ideology is to treat the people as the enemy" (秦晖:秦朝意识形态是与民为敌), public lecture, chuansong.me/n/1631488, August 15, 2015,

Qin Quanyao, "Hu Xijin and the PLA daily: who's lying" (秦全耀:胡锡进和解放军报谁在说谎), bbs.tianya.cn/post-free-4388141-1.shtml, posted June 6, 2014.

Qin Yaqing ed. *International order* (秦亚青:国际秩序), Beijing:Xin Shijie, 2007.

Qin Zijin, "The challenge of jumping over the wall for Mainland netzens" (卿子衿:大陸網民的翻墻難題), inmediahk.net/node/1030500, posted January 13, 2015.

Qiu Huizuo, *Qiu Huizuo memoirs* (邱會作回憶錄), Hong Kong: Xin Shiji, vol. 2, 2011.

Qiu Shaoping, "They sold son to fund the Party activities" (邱少平: 为筹党的活动经费他们忍痛卖掉儿子), *Redrock chronicle* (红岩春秋), Chongqing, No. 2, 2013.

Qiu Shi, *Major events and the inside of decion-making in the* republic (邱石: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 2 volumes, Beijing: Jingji Ribao, 1997.

Qu Tongli, " The Emergence and the Regional Variability of Modern Humans and Their Behavior" (曲彤丽: 世界不同地区现代人及现代行为的出现与区域特征), *Anthropologica sinica* (人类学学报), Beijing, 31-3, 2012: 269-278.

Qu Yuzhong, Ways and laws of China: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翟玉忠: 道法中国: 21 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and *China saves the world: Chinese culture deals with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y* (中国拯救世界: 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华文化),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2008 & 2010.

Quintana-Murci, Lluís et al, "Genetic evidence of an early exit of Homo sapiens sapiens from Africa through eastern Africa," *Nature Genetics*, 23, 1999: 437-441.

Radchenko, Sergey,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an Yunfei, "Chronicle of criticizing Hu Shi campaign" (冉云飞:胡适批判运动编年录), 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21329733.html, accessed May 17, 2014.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NY: 2013.

Rank, Michael, "Orwell's 1984 in China: Big Brother in every Bookshop,"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1-23-2, June 9, 2014.

Ransom, Ian and Ryan McNeil, "Medals obscure cost of China's state-run sports regime," *Reuters*, August 9, 2012.

Rao Yi, *Rao on* science (饶议科学), Shanghai: Shanghai Keji Jjiaoyu, 2009.

Rawski, Evelyn 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4 (November) 1996: 829-850.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Reid, Anthony,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Pacific*,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8.

Reilly, James, "A Wave to Worry About? Public opinion,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s anti-Japan protes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6, 2014: 197-215.

Reilly, Thomas H.,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bellion and the Blasphemy of Empire*,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Renmin Net, "Ten super rich Chinese in prison" (中国监狱中的十大富豪), August 14, 2014.

Rhoads, Edward J. M.,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Rhodes, Emily, "China bans Haruki Murakami's '1984': George Orwell would have seen the irony," *The Spectator*, September 27, 2012.

Richardson, Sophie,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bbins, Helen H.,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 With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ROC, *Internal affairs statistical report, year 102* (102 年內政統計通報), Taipei: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2013.

Rosecrance, Richard N. &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4

Rothwell, Matthew,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2012.

Rowe, William T.,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we, William T.,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ummel, R.J., *China's Bloody Centu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Rummel, Rudolph J.,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s,1991.

Ruocheng, Ying & Claire Conceison, *Voices Carry: Behind Bars and Backstage during China's Revolution and Reform*,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2009.

Ryu, In-sok, *Completed works* (柳麟錫全集), Haerbin: Chaoxian minzu, 1990.

Safire, William, "Useful Idiots of the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87.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987.

Sant, Van John, Peter Mauch & Yoneyuki Sugita, *The A to Z of United States-Japan Relation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10.

Saunders, J. J.,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Schäfer, Dagmar ed., *Cultures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in Chinese History*. Boston, MA: Brill, 2012.

Scheidel, Walter ed., *Rome and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chell, Orville &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2013

Schenk, Catherine,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1965*,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1.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chwartz, Benjamin I.,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cott, David,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840-1949: Power, Presence, and Perceptions in a Century of Humili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Scott, David, *China Stands Up: The PRC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Scott, James C.,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eagrave, Sterling, *The Soong Dynasty*, New York, NY: Harper, 1985.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vised editio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Y: M E Sharpe,1995.

Service, John S.,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Shambaugh, David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Shambaugh, David, "China's Soft-Power Push,"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5.

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7, 2015.

Shambaugh,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an Shaoji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Mao Zedong*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 Taipei: Jinglian, 2001.

Shan Shaojie, *Mao Zedong: Persecuting people and fearing history* (单少杰:毛泽东: 整人与惧怕历史), 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2341,accessed August 4, 2015.

Shang Yang, *Book of Lord Shang* (商君书), Beijing: Zhonghua Shuju, (4th century BCE) 2009.

Shangdu Wenhua, "Destruction of Yuanming Garden" (商都文化:圆明园的毁灭), cul. shangdu.com/chinacul/20110906/278_428070.shtml, posted September 6, 2011.

Shanghai Government, *Files of Web Writers* (上海市网络信息员档案)，May 2015.

Shen Hu, "China's Gini Index at 0.61, University Report Says," *Caixin*, Beijing, english. caixin.com/2012-12-10/100470648.html, posted December 12, 2012.

Shen Yongping, *Tolerating or separating the communists? Rectify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沈勇平: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 Hong Kong: Zhongguo Guoji Wenhua, 2 volumes, 2013.

Shen Zhihua & Yang Kuisong, *China and the Indochian warI (*沈志華, 楊奎松: 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 Hong Kong: Tiandi, 2000.

Shen Zhihua, "China's policy of dealing with land border disputes during the Cold War," (沈志華:冷戰年代中國處理陸地邊界糾紛的方針), *21st century*, Hong Kong, No. 6, 2014: 22-32.

Shen Zhihua, "Shocking inside story of Sino-Korean relations" (沈志华:中朝关系的惊天内幕), 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9-03/102952867.shtml, posted September 3, 2013.

Shen Zhihua, *Choice at the corss road-China in 1956-1957*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1956-1957 的), Guangzhou:Guangdong Renmin, 2013-A.

Shen Zhihua, *Helpless choice: Cold War and the fate of Sino-Soviet alliance*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2 volume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2013.

Shen Zhihua, *Korean war revealed* (沈志華:朝鮮戰爭揭秘), Hong Kong: Tiandi Press, 1995.

Shen Zhihua, *Korean war: declassified documents from Russian archives* (沈志華: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3.

Shen Zhihua, *Mao Zedong, Stalin, and Korean War* (沈志华:毛泽东, 斯大林与朝鲜战

争),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2003.

Shen, Zhihua & Danhui L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heng Xuebin, "Why Indonesia massacr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Chinese?" (谌旭彬: 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 *Brief history* (短史记), Shenzhen, No. 484, April 20, 2016.

Shi Tingyong,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ooks banned and destroyed in Qing* (施廷镛:*清代禁毁书目题注*), Beijing: Shumu Wenxian, (1925) 2004.

Shi Xiangjun, *General study of Mao Zedong thought* (史向军:毛泽东思想概论), Xian, Shaanxi Renmin, 2002.

Shi Yijun, "Folk chats about Wang Hongwen and Jiang Qing of the 'Gang of Four'" (史义军: 世说"四人帮"之江青,王洪文), November 20, 2014.

Shih, Chih-yu & Teng-chi Chang, "The China Studies that Defend Chineseness: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na Centrism in the Divided Sino-phone World." in Herbert S. Yee ed., *China's Rise: 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1: 280-297.

Shirk, Susan,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icular, Terry, "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Inequality in Foc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vol. 2-2, (August) 2013: 1-5.

Sima Guang, *Chronicles for the rulers* (司马光: 资治通鉴),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1th Century) 2009.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司马迁:史记),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nd Century BCE) 2013.

Sina, "2014 Hurun richest Chinese" (2014 胡润百富榜), *Sina finance* (新浪财经), Beijing, September 23, 2014.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ccessed March 9, 2015.

Smarlo Ma, *Witne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 New York: Mingjing, 2004.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London: George Bell, (1776) 1892.

Smith, Arthur 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NY: Fleming H. Revell, 5th edition, 1894.

Smith, Richard J., *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 Culture, 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Smith, Richard J., *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NY: KTO Press, 1978.

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Sohu, "'Rule the country with internal reference' becomes Chinese character" ("内参治国"成中国特色), *Click today* (点击今日), Bejing, vol. 1083, January 23, 2013.

Song Jian, "Ten-generation relay of studying abroad over one hundred years" (宋健: 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 *Guangming daily* (光明日报), Beijing, April 15, 2003.

Song Xi, "Academics in Song and the spirit of Song studies" (宋晞:宋代學術與宋學精神), *Collections on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宋史研究集), vol. 26, Taipei: Guoli Bianyiguan, 1997.

Song Xiujie, "*Wang Yang arranges striking against gangs in Guangdong* (宋秀杰:汪洋部署广东打黑), *Xinhua News Dispatch,* Beijing, February 10, 2012.

Song Yongyi ed.,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truth and collective memory*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Hong Kong: Tianyuan Shuwu, 2007.

Song Yongyi ed., *Top secret documents of Anti-Rightists* (宋永毅:反右绝密文件), 12 volumes e-book, New York: Guoshi, 2015.

Song, Yongyi e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Song, Yongyi ed., *The Chinese Great Leap Forward Great Famine Database* (1958–1962)*,* DVD,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Song, Yongyi et al eds., *Databases of Chinese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he 1950s: From Land Reform to the State-Private Partnership,1949-1956*.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2015.

Spence, Jonathan D.,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NY: Norton, 1996.

Spence, Jonathan D.,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Penguin, 1979.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Spence, Jonathan D.,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New York, NY: Peguine (1969) 1980.

Spence, Jonathan D.,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Penguin, 2001.

Spruyt, Hendrik,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An Analysis of Systems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anden, Naomi ed., *Demystifying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Statistical Bureau, "Reform and opening forged gl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wrote new chapter (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November 6, 2013: 11.

Statistical Bureau, *Chinese demographic statistics-2012* (中国人口统计 2012), Beijing, 2013.

Statistical Bureau, *Chinese statistical abstract 2012*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2012.

Statistical Bureau*,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tistical report 2012* (2012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Beijing: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13.

Statistical Bureau, *Release of major data from the 6th national census*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 Beijing: SSB, April 28, 2011.

Stigler, George J., "Monopoly,"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08.

Stoler, Mark A., *George C. Marshall: Soldier-Statesman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Woodbridge CT: Twayne Publishers, 1989.

Stoll, Ira, "Elizabeth Warren Praising Communist China as a Model for America," New York, *The* Sun, July 30, 2012.

Strauss, Julia C.,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1, (June) 2002: 80-105.

Stuart, John L.,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54.

Su Changhe, "Comparing Chinese style democracy with American style democracy," (苏长和: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September 5-6, 2014.

Su Weimin, "Yang Shangkun on so-called 'secret recording'" (苏维民: 杨尚昆谈所谓"秘密录音"), *China news digest* (华夏文摘), Gaithersburg, MD, Extra Issue no. 652, June 10,

2008. cnd.org/CR/ZK08/cr484.gb.html, accessed April 13, 2015.

Su Zuxiang, *"Han language today gets ever more despicable* " (今天的汉语越来越猥琐), April 27, 2016.

Sun Wenliang & Li Zhiting, *Brief history of the Ming-Qing war* (孙文良,李治亭: 明清战争史略), Nanjing; Jiangsu Jiaoyu, 2005.

Sun Xiali, "Police must not 'get darkened by closing to the dark'" too close to the Dissecting the police-gangster collusion in China" (孙夏力:警察切忌 "近墨者黑") & several reports on the subject, *Global people* (环球人物), Beijing, No. 29 (November 6), 2009.

Sun Yao, *Textbook on hukou management* (孙尧:户口管理学教程), Beijing, Qunzhong Press,1994.

Sun Yat-sen, *Guideline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孫文: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Guangzhou, Passed by the 1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MT, 1924.

Sun Yat-sen, *Sun Wen-Joffe Manifesto* (孫文越飛宣言), Shanghai, January 26, 1923.

Sun Yat-sen,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ceremony of Guangdong's No. One Woman's Normal School (孫中山: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 April 4, 1924. In *Complete works of Sun Yat-sen* (孫中山全集), vol. 10,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1.

Sun Ye, "Summary of the recent studies on 'Needham puzzle' in economics circles" (孙晔: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 "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Teaching and research* (教学与研究), Beijing, No. 3, 2010: 86-91.

Sun Zi, *The Art of War*, New York, edited by John Minford, NY: Penguin Classics, 2003

Sun Zuomin, *Exploring the issues of Chinese peanset wars* (孙祚民: 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 Shanghai: Xin Zhishi, 1956.

Sun, Anna, *Confucianism as a World Religion: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n, Yat-sen, *The Triple Demism of Sun Yat-Sen*, translated by Pasquale d'Elia, New York, NY: AMS Press, 1931: 36-48.

Sutter, Rober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Swaine, Michael,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Swanbrow, Diane, "Income inequality now greater in China than in US," *Michigan News*, April 28, 2014.

Swope, Kenneth M.,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Norman, OK: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2009.

Taagepera, Rein,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 Growth-Decline Curves, 600 B.C. to 600 A.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3, issue 3/4, 1979: 115-138.

Tabacco, Giovanni,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Medieval Italy: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Rule*, translated by Rosalind B. Jens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akao, Tairazei, *Records of history and "orthodoxy"* (平勢隆郎: 史記の「正統」), Tokyo: Kodansha, 2007.

Talbott, Strobe, *The Great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Ancient Empires, Modern States, 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Nation*,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08.

Tang Baolin,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 3 volum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Tang Chi-hua,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Chinese diplomacy*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2014.

Tang Degan, *Seventy years of the late Qing*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Taipei: Yuanliu, 1998.

Tang Degang & Wang Shujun, *Zhang Xueliang's century legend: his oral memoirs* (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 Jinan: Shandong Youyi , 2002.

Tang Shiping,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唐世平:多了解一点世界), *Southern windows* (南风窗), Guangzhou, February 5, 2015.

Tang Yijie et al eds, *History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汤一介:中国儒学史), Vol.1/9,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1.

Tang Zhen, *Hidden book-cmaber chats* (唐甄: 潜书-室语), Beijiing: Zhonghua Shuju, (1705) 1984.

Tang Zheng, "Ode democracy: for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唐徵: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Xinhua daily* (新華日報), July 4, 1943: 4.

Tanner, Harold M.,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Siping, 1946*,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anner, Harold M., *Where Chiang Kai-shek Lost China: The Liao-Shen Campaign, 1948*,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Tao Juyin, *Soldiers in charge-stories of the Beiyang warlords rule 1895-1928* (陶菊隐: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1895-1928), 5 volumes, Haikou: Hainan, (1959) 2006.

Tao Xizhe, *Expose the inside of China's Internet control* (陶西喆: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 New York, N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07.

Tao, Jing-shen,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Taubman, William,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NY: Norton, 2004.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9.

Taylor, S.J., *Stalin's Apologist: Walter Duranty: The New York Times's Man in Mosc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0.

Teiwes, Frederick,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Armonk, NY: M.E. Sharpe, 1979.

Temple, Robert,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Rochester, VT: Inner Traditions, 2007.

Tencent Review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hina 60-year foreign aid* (腾讯评论:中国六十年对外援助的得与失), view.news.qq.com/zt2010/aid60/index.htm,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5.

Teng Xun Web Portal, *How to assess the economic accomplishments during Mao era* (该怎样评价毛时代的经济成就), view.news.qq.com/zt2012/mzdjj/bak.htm, accessed January 2, 2014.

Teng Xuyan, *Don't believe true history will all vanish* (滕叙兖:不信青史尽成灰), Beijing: Chinese Youth Press, 2014;

Teng, Ssu-yu &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Terrill, Ross, *Mao: A Biograp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Terrill, Ross,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New York, NY: Penguin Classics, (5th century BCE) 1954.

Tilly, Charles,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ecure or otherwise," in Emmanuel Adler &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Malden, MA: Blackwell, 1990.

Toby, Ronald,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okugawa, Mitsukuni et al, *大日本史* (徳川光圀: Dai nihonshi, Grand Hisory of Japan), various volumes, Tokyo, Japan: Dai nihon yūben-kai, (18-19 centuries) 1928.

Tong Zhiwei, *Research report on the striking-against gangs type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Chongqing* (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 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 Law Conference Papers*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论文集) vol. 2, Xian, 2011.

Tsai, Kellee S.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Tsai, Shih-Shan Henry,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5.

Tsiang Tingfu,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Taipei: Shangwu, (1938) 2013.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Tucker, Nancy Bernkopf, *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Tudda, Chris, *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 1969-1972*,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uidao Bolinqiang, "Ridiculous 'Opium War'"(推到柏林墙:啼笑皆非的 "鸦片战争"), bbs.tianya.cn/post-no05-154539-1.shtml, posted February 12, 2010.

Tuo Tuo et al, *Jin history* (脱脱:金史),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345) 1975.

Tuo Tuo et al, *Liao history* (脱脱:辽史),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345) 1974.

Tuo Tuo et al, *Song history* (脱脱,宋史),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4th Century) 1986.

Twichett, Denis &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wichett, Denis C. & Herbert Frank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wichett, Denis C.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AD-Part 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wichett, Denis C.,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 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 Ann Arbor, MI: China Society, 1976.

U.S. Congress, *Hearing: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Capitol Hill, August 3-4, 2006.

U.S. Department of Labor, *Consumer Expenditures in 2010*, Report 1037, Washington, DC, USDL, 20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mbating Kleptocracy," Washington, DC: IIP Digital, DOS, December 6, 200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hina White Paper*, edited by Lyman Van Slyk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U.S. EPA,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ata," accessed November 20, 2014.

U.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Receipts by Source as Percentages of GDP: 1934–2018*, Table 2.3. 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accessed January 2, 2014.

U.S. State Department, *Implementation of 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Washington, DC: DOS, May 18, 1954.

U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UN, October 25, 1971.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New York, NY: UNDP, 2013.

Unger, Jonathan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US Embassy to Beijing, "Contacts On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Cable 07beijing7107, November 14, 2007, accessed May 28, 2014.

van Ginneken, Jaap, *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Piao*, New York, NY: Penguin, 1976.

Vandenberg, Paul, Lilibeth Poot & Jeffrey Miyamoto, "Th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 around the Glob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ion and Slowdown," *ADBI Working Paper*, No. 519,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March 2015.

Vincent, Nicholas, *Magna Cart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ladimirov, Peter,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Von Glahn, Richard,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von Glahn, Richard,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Wademan, Andrew, *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Wakeman, Frederic, "Model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in Kenneth Lieberth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68-102.

Walder, Andrew G.,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Waldron, Arthur, "A Bit of a Maverick,"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July 1, 2015.

Waley-Cohen, Joanna, *The Sextants of Beijing: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2000.

Walker, Anne Collins, *China Calls: Paving the Way for Nixon's Historic Journey to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elfield, 2012.

Walker, Richard L.,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Wallechinsky, David, *20th Century: History With the Boring Parts Left Out*,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96.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Y: McGraw Hill, 1979.

Wan Fang & Li Jinghui, "CCP may seal away forever some historic records" (*万方*&李京慧:中共或将一些历史文件永远尘封), *Deutsche Welle* news in Chinese, October 20, 2014.

Wang Binbin, *Shadows not yet faded away* (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2010.

Wang Dazhao, "Total national model and Olympic glory" (汪大昭:举国体制与奥运辉煌),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August, 9, 2012.

Wang Di, "New policy of the late Qing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hools"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近代史研究), Beijing, 3, 1987.

Wang Dingbao, *Collection of Tang words* (王定保:唐摭言), Shanghai: Guji, vol. 1. (10th Century) 1978.

Wang Dongyang, "Per capita grain can't be less than 430 kg" (王东阳: 人均粮食 430 公斤必不可少),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Research Report, May 27, 2013.

Wang Fan, "Rationally fa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王帆:理性对待国际竞争),

Global times (环球时报), Beijing, November 2, 2006.

Wang Fei-Ling & Esi A. Elliot, "China in Africa: Presence, Perception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90, October 2014: 1012-1032.

Wang Fei-Ling, "To Incorporate China-A New China Policy for a New Er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ashington, DC: CSIS, Vol. 21-1 (Winter) 1998: 67-81

Wang Fei-Ling, "China grapples with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PP," *NIKKEI Asian Review*, Tokyo, November 23-29, 2015:46-47.

Wang Fei-Ling, "China's Four-R Strateg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Resisting, Reducing, Replacing and Reordering," Mahendra Gaur ed., *Studies on China*, New Delhi, Ind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2015.

Wang Fei-Ling, "China's Grand Experiments," *The Diplomat*, December 12, 2011.

Wang Fei-Ling, "Heading off fears of a resurgent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1, 2006.

Wang Fei-Ling,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Pre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 St Martin's, 1998.

Wang Fei-Ling,*Organization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China's Hukou Syste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ang Fuchun, "Analysis of using barbarians to control barbarians diplomacy of the late-Qing government" (王福春:晚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析论),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研究), Beijing, No. 2, 1998.

Wang Fuzhi, *Notes on reading Tongjian* (王夫之:读通鉴论), vol. 18, Beijiing: Zhonghua Shuju, (1691) 2004.

Wang Gungwu, *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3.

Wang Gungwu, *Tianxia and Empire: External Chinese Perspectives, Inaugural Tsai Lec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Wang Guowei, "Epigraphy in the Song Era"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 *Wang Guowei works* (王国维遗书), vol. 5, Shangahi: Guji Shudian, (1926) 1983.

Wang Hongqi, *Witnessing "Mountain eagle country"* (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 Beijing: Xinhua, 2008.

Wang Jiafan, *Floating sailing: Journey of the Ming & Qing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otry (王家范: 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 Beijing: Beishida, 2011.

Wang Jiafan, *General analysis of Chinese history*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Shanghai: Huadong Shida, 2000.

Wang Jian et al, *New warring states era* (王建等:新战国时代), Beijing: Xinhua Press, 2004.

Wang Jianmin, *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 Taipei: Zhongwen Tushu, 3 volumes, 1974.

Wang Jianying,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CP organizations*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 Beijing: Hongqi, 1983.

Wang Jisi, "The 'Two Orders' and the Fu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two-way-street/two-orders-and-future-china-us-relations, posted July 9, 2015.

Wang Li, "98 days in room 3 of the DIC base" (王立:纪委办案基地 3 号房的 98 天), jsbh.net/index.php/article/read/aid/4908, posted December 18, 2015.

Wang Ming, *Fifty years of the CCP* (王明:中共五十年), Shanghai: Dongfang, (1974) 2004.

Wang Nianyi ed., *Research materials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王年一:文化大

革命研究资料), 3 volumes,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88A.

Wang Nianyi, *The age of great chaos*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Zhengzhou: Henan Renmin, 1988.

Wang Ping, *Wang Ping memoirs* (王平回忆录), Beijing: PLA, 1992.

Wang Qingxin, "Inspiration of the Chunqiu Chinese tianxia order" (王庆新:春秋华夏天下秩序的启示),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科学), Beijing, No. 1, 2011: 59-85.

Wang Qisheng, *Party members, Party power and party struggle*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Beijing: Huawen, 2010.

Wang Jung-tzu, *Re-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Qing Empire: response to new Qing history* (汪榮祖: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 回應新清史), Taipei: Yuanliu, 2014.

Wang Ruohan, "Death of Zeng Chengjie: behind the secret execution (王若翰:曾成杰之死-秘密处决背后), *Xinmin weekly* (新民周刊), Shanghai, No. 29 (July) 2013.

Wang Ruoshui, *A rediscovered Mao Zedong*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 Hong Kong: Mingbao Press, 2002.

Wang Shu, "First expose of the staff at the CDIC" (王姝:中纪委编制首度揭秘), *Beijing news* (新京报), December 10, 2014.

Wang Tianyou & Gao Xianshou, *History of Ming: an era of many personalities*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 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 Taipei: Sanmin Shuju, 2008.

Wang Tianyou, *Study of the state organizations of the Ming era* (王天有: 明代国家机构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1992.

Wang Xiao "Why China has so many traitors" (王霄:中国为什么汉奸多), aisixiang.com/data/8314.html, posted August 21, 2005.

Wang Xiaobo, "My view of Sinology" (我看国学) and "Wisdom and Sinology" (智慧与国学), in his posthumous book *The Silent Majority*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Beijing, Chinese Youth Press, (1997) 2005.

Wang Xiuqiang, "China's per unit GDP energy consumption is 2.5 times of world's average" (王秀强:中国单位 GDP 能耗达世界均值 2.5 倍), *21st century economic report* (21 世纪经济报道), Beijing, November 30, 2013.

Wang Yanan, *Study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politics*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1948) 1981.

Wang Yao, "Notes on the Tang-Tibet treaty tablet (王尧:唐蕃会盟碑疏释), *Historical research* (历史研究), Beijing, No. 4, 1980: 94-104.

Wang Yeh-chien,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Wang Yi, "Analyzing the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王毅:试析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制度建设), *State of foreign theories* (国外理论动态), Beijing, No. 8, 2013.

Wang Yizhou, *Creative involve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5.

Wang Yong, "Jinx of super rich-list" (王永:富豪榜的诅咒), blog.ifeng.com/article/3791035.html, posted December 19, 2009.

Wang Youqin, "Don't forget th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王友琴: 不要忘記文革的本質), *Open* (開放), Hong Kong, No. 6, 2006.

Wang Yu San ed.,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n Unorthodox Approach,* New York: Greenwood, 1990.

Wang Yuan-K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ng Yunsheng,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six decdes*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7 volumes, Tianjin: Dagongbao, 1934.

Wang Zengyu, *Initial study of military system in Song dynasty*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Chapter 6,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3) 2011.

Wang Zengyu, *New biography of Yue Fei* (王曾瑜:岳飞新传), Shijiazhuang: Hebei Renmin, 2007.

Wang Zhaoming, *Sun Yat-sen will* (汪兆銘:總理遺囑), *Morning news* (晨報), Beijing, March 14, 1925.

Wang Zhe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Wang Zhengzhong,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Xian: Shangxi Renmin, 1994.

Wang Zhiren, "Natural environment, geopolitics, new technology and Qin's unification of China" (王志润: 自然环境, 地缘政治, 新技术与秦统一中国), *New orient* (新东方), Haikou, No. 4, 2002.

Wang Zhixin, *Outlin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Shanghai: Shanghai Guji, (1940) 2011.

Wang Zhongmu, *History of Wei, Jin and South-North Dynasties*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2013.

Wang Zuohua, "Exactly how many enemies were annihilated by our military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王作化: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究竟多少), CCP News Site, //cpc.people.com.cn/GB/68742/77130/77131/7267512.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3.

Wasserstrom, Jeffrey 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Watson, Burton, *Basic Writings of Mo Tzu, Hsün Tzu, and Han Fei Tzu*,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Watson, Burton, *Mozi: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Weber, Max,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15) 1968.

Wei Li, "What's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the PRC?" (蔚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由来是什么?), October 11, 2014.

Wei Yuan, *Maps and information about seas and countries* (魏源:海国图志), Zhengzhou, Henan: Zhongzhou Guji, (1843/52) 1999.

Wen Huan ed., *Cannot bear to read history carefully* (文欢:历史不忍细看), Zhengzhou: Henan Wenyi, 2008.

Wen Jiabao, Press Conference, Beijing: Xinhua, March 14, 2012.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spring 1992): 391-425.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Wesson, Robert G.,*The Imperial Order*, Berkeley, CA: UC Press, 1967.

Westad, Odd Arne,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Westad, Od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hite, T.H., *The Once and Future King*, New York: Penguin, (1939) 1987.

Whiting, Allen,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Wickham, Chris,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Illuminating the Dark Ages 400-1000*, New York: Penguin, 2010.

Williams, Frederick Well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 NY: Scribner's, 1912.

Williams, Stephen & Gerard Friell, *Theodosius: The Empire at Ba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ilson, Dick, *Mao: the People's Emperor*, Austin, TX: Futura Publications, 1980.

Wilson, Sandra,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London, UK: Routledge, 2002.

Wine, Michael, "China Approves Law Governing Armed Police For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9: A6.

Wittfogel, Karl A.,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Doctrine and Real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6-4 (October) 1964: 463-474.

Wittfogel, Karl August,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Wolf, Naomi, *The End of America: Letter of Warning to a Young Patriot*,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7.

Wolin, Richard,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Wong, Roy 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Wood, Frances,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1998.

Woodside, Alxandaer, "Emperors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n Kenneth Lieberthal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World Bank, "GDP Per Unit of Energy Use," World Bank database, accessed November 20, 2014.

World Bank, GDP growth data,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4.

World Watch, "Grain Production Falls and Prices Surge," worldwatch.org/node/5440, accessed December 6, 2013.

Wou, Odoric Y.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Wu Bangguo (吴邦国), *Speech to the 4th Meeting of the 11th PRC NPC*, Beijing: Xinhua New Agency, March 10, 2011.

Wu De, *Records of a decade of events* (吴德:十年风雨记事), 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2004.

Wu Faxian, *Time was hard-Wu Faxian memoirs*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Hong Kong: Beixing, 2006.

Wu Gou, "18 different details between Song and Qing dynasties" (吴钩:宋朝与清朝的 18 个细节对比), October 10, 2014.

Wu Gou, "A dynasty standing at the modern doorstep" (吴钩: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 *Essay* (随笔), Guangzhou: Southern Weekend, No. 4, 2014.

Wu Gou, "The happy life of Song residents with dual citizenship" (吴钩:宋朝双重国

籍居民的幸福生活), August 7, 2015.

Wu Gou, "The liberal 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y" (吴钩: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Oriental forum* (东方论坛), Qingdao, No. 5, 2012.

Wu Gou, "When the Chinese started to kneel?" (吴钩: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跪的), January 4, 2016.

Wu Hao, "Shen Anna: The red woman spy who 'felt Chiang Kai-she's pause'" (吴皓: 沈安娜: "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女谍), *History reference* (文史参考), Beijing, No. 14, (July) 2010: 58-61.

Wu Hui, *Study on per mu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ese history*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Beijng: Nongye, 1985.

Wu Jiaxiang, *Public all-under-heaven: Multi-center governance and legal rights under dual-subject* (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Nanning: Guangxi Shifan Daxue, 2013.

Wu Lijin, *Mao Anying at the Korean war zone* (武立金: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Beijing: Zuojia, 2006.

Wu Naigong, *Lixue in Song and Ming* (吴乃恭:宋明理学), Changchun: Jilin Wenshi, 1994.

Wu Si, "Speech at the Hong Kong book exhibit" (吴思: 在香港书展的讲话), *Ming-pao* (明报), Hong Kong, July 22, 2014.

Wu Si, *Rule of rewarding blood* (吴思: 血酬定律), Beijing: Shewen, (2003) 2009.

Wu Si, *Sub-rules: the real games in Chinese history*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01) 2009.

Wu Songdi, *Chinese demographic history*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 Vol. 3, *Liao, Song, Jin, Yuan Era* (辽宋金元时期),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00.

Wu Tianchi, *Draft history of Western Xia* (吴天墀:西夏史稿), Nanning: Guangxi Shifan Daxue, 2009.

Wu Xinzhi, "Comparative study of early humans in China and Europe" (吴新智:中国和欧洲早期智人的比较研究), *Anthropology sinica* (人类学学报), Beijing, No. 4, 1988: 286-293.

Wu Xinzhi, "Evidence of multiregional human evolution hypothesis from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s*, Beijing, 4-5, 2006.

Wu Zhili, "The germs warfare in 1952 was a false alarm" (吴之理:1952 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11, 2013.

Wu, Guoguang,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Xi Jinping, "China does not accept any arbitration" (习近平:中国不接受任何仲裁), Beijing:Xinhua, July 12, 2016.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ligious work"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Beijing:Xinhua, April 23, 2016.

Xi Jinping,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broadest patriotic united front"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Beijing: Xinhua, May 20, 2015.

Xi Jinping, "Keynote speech" (习近平:主旨发言) at the Summit of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Shanghai, CCTV, May 20, 2014.

Xi Jinping, "Leading cadres must learn some history"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speech to the CCP Central Party School, *Study times* (学习时报), Beijing, September 2011.

Xi Jinping, "Letter to the 22nd Internaitoan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einces," Jinan,

August 23, 2015.

Xi Jinping, "Remember history, create future" (习近平: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in Moscow's *Russian Daily*, May 7, 2015—Chinese version in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May 8, 2015: 1.

Xi Jinping, *Digested statements on the China Dream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fo the Chinese nation*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13.

Xi Jinping, *Selected words of Xi Jinping on toughening party's discipline and rules*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2016.

Xi Jinping, *To solidly establish the right kind views of the motherland and nationhood among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习近平: 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 Speech at the Second Xinjiang Work Forum, Beijing, *Xinhua*, May 29, 2014.

Xi Jinping, "Speech a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s" (习近平: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Beijing, August 19, 2014. *China Digital Times,* posted November 11, 2014.

Xi Xuan & Jin Chunming, *Short history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 简史), Beijing: CCP Party History, 2006.

Xia Xinzheng,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thought reform of intellectuals right after the state-building" (夏杏珍: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Red flag monographs* (红旗文稿), Beijing, No. 21, November 5, 2014.

Xiao Chunlei, "Jap pirates: a dynastic lie" (萧春雷: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Beijing, No. 2, 2012.

Xiao Duojie ed., *The erratic Mao Zedong* (萧铎洁:翻云覆雨毛泽东), Beijing, online publication, 2009.

Xiao Gongqin, "New policy of the late Qing and th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萧功秦: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战略与管理), Beijing, 1993: 61-66.

Xiao Gongqin, "The debate on making constitution in late-Qing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today (萧功秦: 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中华文史), July 9, 2007.

Xiao Jun, *Yan'an diaries 1940-1945* (蕭軍:延安日記 1940-1945), 2 volu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ao Ke, Li Rui, Gong Yuezhi et al,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I experienced* (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1998.

Xiao Li, "CCP's funding sources during the resisting Japanese war" (晓理:抗战时期中共经费来源), *People's digest* (人民文摘), Beijing, No. 3, 2014:73.

Xiao Qiqing, *New exploration of Yuan era history* (蕭啟慶: 元代史新探), Taipei, Taiwan: Xinwenfeng Tushu, 1985.

Xiao Shimei, *Mao Zedong ruses* (萧诗美:毛泽东谋略), Changsha: Hunan, 1993.

Xiao Shimei, *Study of Mao Zedong ruses* (萧诗美:毛泽东谋略学), Beijing: Zhongguo Changan, 2004.

Xiao Shu, *Early voice of history: the solemn promises half century ago* (笑蜀: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Shantou: Shantou Daxue, 1999.

Xiao Xian, "Chinese Jews and Chinese Muslims in Histo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肖宪: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比较研究), in Center for Jewsih Studies in Shanghai ed.,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Jewish and Israeli studies* (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vol. 1, 2007.

Xiao Xiang, "Mao Zedong's attitude to life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 famine" (萧象:毛泽东对于人的生命态度与大饥荒的悲剧发生), September 3, 2012.

Xie Bin,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public* (謝彬:民國政黨史), Shanghai: Xueshu Yanjiu Zhonghui, 1926. Cited in CCP Central Party History Bureau, *History of the CCP* (中国共产党历史),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vol. 1, 2002: 12.

Xie Canglin & Wan Fangzheng,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inquisition* (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 Nanchang: Jiangxi Gaoxiao, 1996.

Xie Chuntao, "Where do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CCP rule come from?"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从哪里来?), *Seeking truth* (求是), Beijing, Juluy 31, 2014.

Xie Guiping, "'Great Leap Forward' campaign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Wuwei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谢贵平: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 *Modern China Studies*, Princeton, NJ. 93-2, 2006.

Xie Xiaodong, "Pure Han people no longer exists (谢小东: 纯种汉人已经不存在), *Beijing news* (新京报), February 15, 2007.

Xie Yixian et 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1949-2009* (谢益显等:当代中国外交史 *1949-2009*), Beijing: Zhongguo Qingnian, 2009.

Xie Yong ed., *Chu Anping: depression like a river* (谢泳: 储安平: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Beijing: Zhongguo Qingnian, 1999.

Xie Yong ed., *Luo Longji* (谢泳:罗隆基), Beijing: Zhongguo Qingnian, 1999.

Xie Yong, "Criticizing Hu Shi and <Materials on Hu Shi thoughts>" (胡适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Guangzhou, *Open era* (开放时代), No. 6, 2006.

Xie Youtian, *The secret of the CCP empowerment* (谢幼田:中共坐大之謎), New York: Mingjing, 2002.

Xie Yu et 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in Chinese 2014* (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July 25, 2014.

Xie, Tao & Benjamin I. Page, "American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s a World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5), 2010: 479–501.

Xin Haonian, *Which is the New China: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NY: Blue Sky Publishing, vol. 1, 1999.

Xin Lijian, "How many people died in China abnormally after 1945 (信力建:1945 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May 6, 2011.

Xin Lijian, "Suppressing and eliminat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信力建:镇反与肃反), blog.ifeng.com/article/1876838.html, posted November 26, 2008.

Xin Yunxing, "The loss and fantasy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辛允星:天朝的迷失与幻觉), aisixiang.com/data/89797.html, posted June 26, 2015.

Xin Ziling, "Five evidences of Mao's family rule plan" (辛子陵:毛搞家天下的五個證據), Hong Kong, open.com.hk/content.php?id=295#.Vbu4ZbdfKm4, posted June 13, 2011.

Xin Ziling, "Korean War 60 years ago"(辛子陵:韩战 60 年), June25, 2010.

Xin Ziling, "Mao Zedong, successor and 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辛子陵:毛泽东, 接班人与文革起源), posted April 12, 2015.

Xin Ziling, "Trace Mao Zedong's real thinking of succession" (辛子陵: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 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15.html, posted June 12, 2012.

Xin Ziling, *Complete Biography of Zedong*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 4 volumes, Hong Kong: Liwen Publisher, 1993.

Xin Ziling, *The crash of the red sun: the eternal achievements and crimes of Mao Zedong*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 Hong Kong: Shuzuofang, e-edition, 2009.

Xing Heming, "CCP's thinking and reform of the Soviet model before and after the 8th party congress (邢和明: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当代中国史研究), Beijing, 12-1, 2005:16-23.

Xinhua, "CDIC: 180 thousand were punished by party's and state's disciplines last year (中纪委:去年 18 万受党纪政纪处分), *Beijing news* (新京报), Beijing, January 10, 2014.

Xinhua, "Words banned in news reports" (新华社公布的第一批新闻报道禁用词), *Chongqing reporting* news (渝刊通讯), Congqing, No. 2, July 21, 2014: 1-3.

Xinhua, "Democratic parties" (民主党派),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3.

Xinhua, "Push for more just and more rational global governance"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October 13, 2015: 1.

Xinhua, "Total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11.7 trillion last year, share of GDP reached a new record," *Xinhua Daily Telegraph*, Beijing, January 23, 2013.

Xinhua, "Vows for join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different eras"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January 27, 2016.

Xinhua, *Major events in the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gov.cn/jrzg/2009-10/03/content_1432074.htm, accessed August 4, 2015.

Xiong Peiyun, "*Return to the Song dynasty in dreams* (熊培云:梦里回到宋朝), *Southern weekly* (南方周末), Guangzhou, April 23, 2009.

Xiong Xianghui, *My life in intelligence and diplomacy*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1999.

Xu Jian, "Reasses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徐坚: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问题研究), Beijing, No. 2, 2014.

Xu Jiansheng & Xu Weiguo, *Study of the economic policy in late-Qing and early Republic* (徐建生,徐卫国: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2001.

Xu Jilin, "A critique of the surge of Chinese statism in the last ten years" (许纪霖: 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批判), aisixiang.com/data/41945.html, posted July 5, 2011.

Xu Jilin, "The second day after revolution: thoughts and politics in China's 'Weimar era'," (许纪霖: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 "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 *Open times* (开放时代), Guangzhou, No. 3 (June) 2014.

Xu Lejing, "Our country's three types of official spending exceeded 900 billion" (徐乐静:我国三公消费突破 9000 亿), *China news* (中国新闻), Beijing: Xinhua, March 25, 2013.

Xu Lingxiang, *Biography of Li Kenong and other red spies* (徐林祥:李克农传及其他红谍), Hefei: Anhui Renmin, (1997) 2008.

Xu Mengqiu ed., *Records of Red Army's Long March* (徐梦秋:红军长征记), published as Liu Tong ed., *Personal accounts of Long March-original records from the Red Army long marchers* (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36) 2006.

Xu Pei, *Shameless foreigners* (徐沛:无耻的洋人), bookepub.com, posted 2012.

Xu Xiaonian, "From Qin to Qing is not feudal society" (许小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Economic observation daily* (经济观察报), Beijing, February 18, 2008.

Xu Xiliang, "How did logic die in China" (许锡良:中国的逻辑是怎样死亡的), 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12850.shtml, accessed January 5, 2015.

Xu Xiliang, "Chinese are unpralledely sutpid on power issue" (许锡良:中国人在权力问题上其蠢无比), 21ccom.net/articles/dlpl/whpl/2012/0721/64163.html, posted July 21, 2012.

Xu Yan, "Sino-Soviet border armed clashes on Zhengbao Island in 1969" (徐焰:1969

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 *World affairs* (世界知识), Beijing, No. 13 (June 22) 2006.

Xu Yan, *Report on the past issues in Zhongnanhai* (徐焰: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vol. 2, 2010.

Xu Zerong, "Secret radio of the Malarysian Communist Party in Hunan exposed" (徐澤榮:馬共秘密電台湖南曝光), *Asian weekly* (亞洲週刊), Hong Kong, No. 26 (July 2), 2000.

Xu Zhucheng, *Personal experience of 1957* (徐铸成:亲历 1957),Wuhan: Hubei Renmin, 2003.

Xu, Xin, *The Jews of Kaifeng, China: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New York, NY: KTAV Publishing House, 2003.

Xuan Feng et al, "Ten thousands taxes for the middle class" (炫风:中产万税) & Shen Ding et al, "Who moved Mr. A's tax bills" (沈玎: 谁动了 Mr. A 的税单), *Southern metropolis weekly* (南都周刊), Guangzhou, No. 48 (December 13) 2010: 24-28 & 29-40.

Xue (Hsieh) Fucheng, *The European Diary of Hsieh Fucheng*, translated by Helen H. Chien, New York, NY: Palgrave, 2013.

Xue Juzheng,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薛居正:旧五代史) vol. 17-6, Beijing: Zhonghua Shuju, (954) 1976. Ouyang Xiu,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欧阳修: 新五代史), vol. 42,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053) 1974.

Xue Lishan, "Wang Hui Gan Yang are statists after all" (薛利山:汪暉甘陽原是國家主義者), *Open* (開放), Hong Kong, No. 4, 2011.

Xun Kuan, *Book of Xun* Zi (荀子), Shanghai: Guji, (3rd century BCE) 2012.

Yamaga, Soko, *Facts of central dynasty* (山鹿素行:中朝事実), two volumes, Osaka, Japan: Yamamoto Ayatomo-do, (1669) 1925.

Yan Changgui & Yang Yinlu, "True or false of a historical allegation (阎长贵,杨银禄: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3, 2010.

Yan Changhai, "Truthfulness in history textbook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less than 5%? (颜昌海: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 5%?), December 6, 2013.

Yan Fu, "Decision view for saving" (嚴復:救亡决論), *Zhili daily* (直報), Tianjin, June 18, 1895.

Yan Leb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four cleaning campaign I witnessed" (晏乐斌:我经历的整风整社与四清运动),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No. 12, 2015: 69-72.

Yan Mingfu, *Yan Mingfu memoir* (阎明复回忆录), Beijing: Renmin, 2 volumes, 2015.

Yan Jing, "Chinese Jews by the Yellow River" (颜菁:黄河岸边的中国犹太人), *Beijing youth daily* (北京青年报), Beijing, August 13, 2002.

Yan Shenlang, "China's opening in 1972" (延伸浪:1972 年的中国对外开放), blog.sina.com.cn/s/blog_44405b990102v49v.html, accessed January 17, 2015.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Vol. 6-2, 2015.

Yan Xuetong, "Security interest is state's first interest (阎学通:安全利益是国家首要利益). *Global Times* (环球时报), Beijing, May 30, 2006.

Yan Xuetong, "Xun Zi'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Vol. 2, 2008, 135–165.

Yan Xuetong, *The transfer of world power*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5.

Yan, Xuetong et al,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Yang Di, "Individual tax law unchangeable for 30 years" (杨迪: 35 年改不动的个税

法), *Chinese newsweek* (中国新闻周刊), Beijing, March 24, 2015.

Yang Jisheng, "Collective hereditary system and 'field of power'" (杨继绳:集体世袭与 "权力场"), *Yanhuang chronicles* (*炎黄春秋)*, No. 6, 2008: 50-52.

Yang Jisheng, *Tombstone: Record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in the 60s*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Hong Kong: Tiandi Books, 2 volumes, 2008 (Abbreviated English edition,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ranslated by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2

Yang Kuisong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Yang Kuisong, "Comparative study of 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Lec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pril 2010.

Yang Kuisong, "Q&A on the income of party-state cadr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Southern weekend* (南方周末), Guangzhou, August 29, 2007.

Yang Kuisong, "Study of 'suppress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ampaign in new China (杨奎松:新中国 "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History monthly* (史学月刊), Beijing, No. 1, 2006: 46-62.

Yang Kuisong, "The early death of 'the China way' 60 years ago" (杨奎松:六十年前 "中国道路"夭折始末), *CP members* (共产党员), No. 6, 2011: 48-49.

Yang Kuisong, "Why did the CCP win the revolution?" (杨奎松:中共为何能取得革命胜利?) September 11, 2014.

Yang Kuisong, *Glancing ROC personalities*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2009.

Yang Kuisong, *New study of Xian Incident: The puzz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Xueliang and the CCP*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Nanjing: Jiangsu Renmin, 2006.

Yang Kuisong, *Read history, seek truth* (杨奎松: 读史求实),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2011.

Yang Kuis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CP and Moscow 1920-1960*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1920-1960), Taipei: Haixiao Chuban, 1997.

Yang Kuisong,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the PRC*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Nanchang, Jianxi Renmin , vol. 1, 2009.

Yang Min, "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name list of 'the third tier'" (杨敏: "第三梯队"名单建立前后), *Chinese newsweek* (中国新闻周刊), No. 675, September 4, 2014.

Yang Shiqun, *Lessons from Chinese history* (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2012.

Yang Shitai, "On the legal system of private land owne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Era," (杨士泰:试论民国初期的土地私有权法律制度), *Hebei law science* (河北法学), Vol. 27-6, 2009: 95-99.

Yang Shuda, *On the grand meaning of Spring and Autumn* (杨树达:春秋大义述), Shanghai: Shanghai Guji, (1944) 2007: 8-25.

Yang Tianshi, *Seeking history overseas*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1998.

Yang Xianhui, *Jiabiangou stories*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Guangzhou: Huacheng, 2008.

Yang Xiaokai, "Pros and cons for Chinese unification" (杨小凯:中国统一之利弊) *Beijing spring* (北京之春), Flushing, NY, No. 10, 1999: 77-113.

Yang, Dali,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Yang, Guobi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Yao Baihui,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Sino-French Communiqué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姚百慧:中法建交公报形成考释),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当代中国史研究), Beijing, No. 2, 2013.

Yao Dali, "No more old stories of 'Sinciz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new Qing history'" (姚大力:不再说 "汉化"的旧故事: 可以从 "新清史"学习什么), *Oriental morning* (东方早报), Shanghai, April 5, 2015.

Yao Jinyuan, *Official list of the banned and destroyed books in Qing* (姚覲遠: 清代禁毀書目), Hangzhou: Chijinzai, 1882.

Yao Shanbi, "Xushui Great Leap Forward" (尧山壁:徐水大跃进), *Essays selected* (杂文选刊), Changchun, No. 9, 2010: 48-49.

Yao Shaner, *One hundred top Rightists in China* (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Beijing: Zhaohua, 1993.

Yao Tinglin, *Notes over the years* (姚廷遴: 历年记), Shanghai: Renmin, (18^{th} century) 1982.

Ye Jing, *Days in Yan'an* (叶晶:我们在延安), 12 episodes of documentary film, Beijing: Central News Studio, 2012.

Ye Qing, *General Chinese financial history: Five Dynasties and two Songs* (叶青:中国财政通史-五代两宋), Beijing: Zhongguo Caizheng Jingji, 2006.

Ye Tan, *Great debate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views: Comparing Sima Guang and Wang Anshi* (叶坦:传统经济观大争论-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Ye Tan, Great reform: Song Shenzong and the reform campaigns in the 11^{th} century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 Beijing: Sanlian 1996.

Ye Zicheng & Long Quanlin, *China-ism: the grand wisdom of the 500-years China system* (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 Beijing: Renmin, 2013.

Yi Baisha, "Commenting Confucius (易白沙: 孔子評議), *New youth* (新青年), Vol。1-6 & vol, 2-1, Beijing, (June & September) 1916.

Yi Wa (Song Lin), *Looking for the great famine survivors* (依娃<宋琳>: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New York: Mingjing, 2013.

Yi Zhongtian, *End of the empire*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Shanghai: Fudan Daxue, 2007.

Yin Qi, *Pan Hannian's intelligence career* (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Beijing: Renmin Wenxue, 1996: 116-168.

Yin Yungong, "Deng Xiaoping and 'internal reference'" (尹韵公:邓小平与 "内参"), *CCP documents* (党的文献), Beijing, No. 6, November 2012.

Ying Shusheng, "Mao Zedong and the 3^{rd} 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conference" (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Yanhuang chronicle*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5, 2014: 3-7.

Yoshitake, Oka, *Konoe Fumima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okyo: Library of Japan, 1983.

Yu Hongjun, "Forge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于洪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speech,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February 3, 2016.

Yu Hua, *China in Ten Words*, translated by Allan Barr,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2011.

Yu Jie et al, "Move Mao Zedong remains" (余杰:迁移毛泽东遗体), blog.boxun.com/

hero/yujie/123_1.shtml, accessed June 1, 2014.

Yu Keping, "Introduction to officialism" (俞可平:官本主义引论), *Academic frontier* (学术前沿), Beijing, No. 25 (May), 2013: 52-61.

Yu Keping, "Democracy or populism" (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 *China Governance Review* (中国治理评论), Beijing, No. 5, October 2014: 5-6 & 9.

Yu Ligong,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rise of churches in China* (于力工: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的興起), Taipei: Huaxuan, 2012.

Yu Shengwu, "Elucidating Chin" (于省吾: 释中国), in Wang Yuanhua ed. *Elucidating China* (王元化: 释中国),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1998: 1515-1524.

Yu Shicun, "How do we read history today?" (余世存:今天怎样读历史？), *Divine land* (神州), Beijing, No. 19 (July) 2012: 23-28.

Yu Xiaoji et al, "From two digits to 80 million"(余晓洁:从两位数到八千万), *Xinhua News Dispatch*, Beijing, June 25, 2011.

Yu Xiguang, "Various assertions on the death toll of the Great Leap and my own view" (余习广:大饥荒死难数字众家之说与我的一家之言), April 25, 2015.

Yu Yang, *Brotherhood China* (于阳:江湖中国), 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2006.

Yu Yang, *China's political clock* (于阳:中国的政治时钟) 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2016.

Yu Ying-shih, *Zhu Xi's historical world*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Beijing: Sanlian Press, 2004.

Yu Youjun (于幼军), Public Lecture a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December 16, 2015.

Yu, Ying-Shi,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Yuan Gang, "On civil servants, cadres, and bureaucracy" (袁刚:谈公务员,干部和官僚制), *Study and exploration* (学习与探索) Beijing, No. 3, 2007.

Yuan Hongdao, *Complete works of Yuan Zhonglang*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 Shanghai: Guji, (17th century) 1981.

Yuan Tengfei, *This history is rather reliable: teaching Chinese history*, (袁腾飞: 这个历史挺靠谱-袁腾飞讲中国史), 3 volumes, Changsha: Hunan Remin (2012) 2013.

Yuan Weishi, "Modernization and history textbooks"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Beijing, *Chinese youth daily* (中国青年报), January 11, 2006.

Yuan Weishi, "The precious beginning of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my view of the late-Qing reform" (袁伟时:20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November 28, 2013.

Yuan Zhipeng, "Review the study of Shangyuan treaty" (袁志鹏:澶渊之盟研究述论), *Journal of Hengshui college* (衡水学院学报), 12-3. June 2010: 67-70.

Yue Guo, "Mao Anying during the Patriotic War," (岳果:卫国战争期间的毛岸英), *PPCC daily* (人民政协报), Beijing, May 7, 2015: 9.

Yunos, Rozan, "Saga of Lanfang Republic," *The Brunei Times*, May 23, 2011.

Zarrow, Peter,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Zelman, Kathleen M., "Estimated Calorie Requirements," webmd.com/diet/features/ estimated-calorie-requirement, accessed Dcember 6, 2013.

Zeng Guofan, *Call to fight the Yue bandits* (曾国藩:讨粤匪檄), in *Zeng Guofang classic quotations* (曾国藩经典语录), Changsha: Hunan Daxue (1854) 2013.

Zeng Yanxiu, "Chen Boda as an official and a scholar" (曾彦修: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Yanhuang chronicles* (炎黄春秋), Beijing, No. 1, 2012: 28-33.

Zeng Yi & Guo Xiaodong, *What's universal? Whoe values?* (曾亦 & 郭晓东:何谓普世?谁之价值?), Shanghai: Huadong Shida, 2013.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Zhang Aijing, "Chinese mainlanders visiting Japan jumped 88.2%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张艾京: 2014 上半年中國大陸訪日人數破百萬 猛增 88.2%), *Chinese news net,* (中國新聞網), July 25, 2014.

Zhang Baijia, "Change self and influence the world: Exploring the basic outline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20th century"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 *Chinese social science* (中国社会科学), Beijing, No. 1, 2002: 4-19.

Zhang Chi-hsiung, "Origin of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rinciple" (张启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起源), Wu Zhipan et al eds., *Values of East Asia* (吴志攀等:东亚的价值),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Zhang Dai, *Stongbox books* (张岱: 石匮书), vol. 1, Shanghai: Guji, (1655) 2008.

Zhang Dali, *Second history* (张大力: 第二历史), Changsha: Hunan Meishu, 2010.

Zhang Duanyi, *Notes of precious ears* (张端义:贵耳集),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13th Century) 2005.

Zhang Fan,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1.

Zhang Feng, "Deconstructing the tributary system"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科学), Beijing, No. 2, 2010: 33-62.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Vol. 2-4, 2009.

Zhang Feng, "The Tianxia System: World Order in a Chinese Utopia," *Global Asia*, Seoul, Korea, Vol. 4-4, 2010: 112.

Zhang Fentian, *China's imperial ideology*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 Beijing: Renmin Daxue: 2004.

Zhang Guangda, *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and modern academics* (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 Nanning: Guangxi Shifan Daxue, 2008.

Zhang Guangda, *Preliminary selection of geo-historiography series on the western region*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Shanghai: Guji, 1995;

Zhang Guotao, *My memoirs* (張國燾:我的回憶), Hong Kong: Mingbao, 1966.

Zhang Haiyang, "Unwavering sticking to the Party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military" (张海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PLA daily* (解放军报), Beijing, December 4, 2013.

Zhang Hongjie, "Emperor dream in Chinese history" (张宏杰: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梦), Gongshi Lecture, Beijing, August 28, 2015.

Zhang Hongjie, "From Spring-Autumn to Ming-Qing: the 'great regress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 (张宏杰: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 *Tongzhou gongjin* (同舟共进), Guangzhou, No. 11, 2013: 73-77.

Zhang Hongji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张宏杰: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 *Forward on the same boat* (同舟共进), Guangzhou, No. 2, 2010: 33-35.

Zhang Hongjie, *Five fates of Chinese emerpors*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Taiyuan: Shanxi Renmin, 2007.

Zhang Hongjie, *It's exhausting to rule the world* (张宏杰:坐天下很累), Changchun: Jilin Chuban, 2012.

Zhang Jiansong, "Archive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observer team" (张建松:美军观察组档案), chuansong.me/n/1626476, posted August 20, 2015.

Zhang Jinjin: "Was Tang Taizong a barbarian or not" (张晶晶:唐太宗是不是胡人), *Earth* (大地), Beijing, No. 3, 2003.

Zhang Jie, "Yan'an's economic "miracle" (张杰:延安的经济 "奇迹"), *Caijing Digest* (财经文摘), Beijing, September 27, 2012.

Zhang Lei, "Invisible footprints of online commentators," *Global Times*, Beijing, February 5, 2010.

Zhang Lei, "What's consequence of 'exposes' twisting party's history?" (张磊:以 "揭秘"为噱头歪曲党史, 是什么后果?) *China discipline inspection daily* (中国纪检监察报), Beijing, December 19, 2015: 1.

Zhang Liangui, "With utmost respect to welcome home the remains of the Volunteers (张琏瑰:用最大敬意迎志愿军遗骸回国), Beijing: *Global times* (环球时报), December 20, 2013.

Zhang Ming, "Parent-officials, 'people's servents' or professional officials" (张鸣:父母官, "公仆" 还是职业官僚?), *Chinese newsweek* (中国新闻周刊), December 1, 2006.

Zhang Ming, "The aura over the Zhang father and son" (张鸣: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21ccom.net/html/2016/xiandai_0203/1438_3.html, posted February 3, 2016.

Zhang Monan, "Breaking China's Investment Addiction," *Project Syndicated*, February 14, 2013.

Zhang Qi, "Interview of Yasheng Huang," *Economic observation news* (经济观察 *Jingji guancha bao*), Beijing, July 4, 2011.

Zhang Qifan, "Tentative analysis of emperor and elites co-rule tianxia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 *Jinan journal* (暨南学报), Guangzhou, No. 6, 2001.

Zhang Qinyan, "Real identity of the 'Study group' exposed" (张婧艳: "学习小组"真实身份曝光),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9410, accessed October 26, 2014.

Zhang Sheng, *Coming from war - record of the life of Zhang Aiping*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人生记录), Beijing: Chinese Youth, 2005.

Zhang Sheng, *Coming from war-record of the life of Zhang Aiping*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人生记录), Beijing: Chinese Youth, 2008.

Zhang, Shu,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Zhang Shuguang, "Tianxia theory and world order" (张曙光:天下理论与世界秩序),

Zhang Shuguang, (Chairman of Tianze Institute), *Chinese opinions: interviews with economists* (张曙光:意见中国: 经济学家访谈录), Issue 41, (March) 2011.

Zhang Shusheng, "Last memo to the throne" (張樹聲:遺折), *Memos of Zhang Shusheng* (張靖達公奏議), Taipei: Wenhai, vol. 8, (1884) 1968.

Zhang Taiyan, "Republic of China explained" (章炳麟:中華民國解), Tokyo, *Minbao* (民报) No. 15, July 5, 1907.

Zhang Weiying, "The danger of language corruption" (张维迎:语言腐败及其危害), *Power of ideas*, Xian: Xibei Daxue, 2014.

Zhang Weiying, "The root cause of China's backwardness for thousands years is the monopoly of the mind" (张维迎:中国数千年停滞不前, 根在思想垄断), 1--26-2015.

Zhang Xianyun, "On the horse management and herding in Northern Song era (张显

运:试论北宋时期的马监牧地), *Lanzhou journal* (兰州学刊), Lanzhou, No. 8 (August) 2012: 55-60.

Zhang Xiqing et al, *New study on Chanyuan treaty* (张希清:澶渊之盟新论),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2007.

Zhang Xiq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Beijing: Xinhua, 1993.

Zhang Xueliang, *Confession about Xian Incident*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1956, in *Hope* (希望) magazine, Taipei, July 1964.

Zhang Xueliang, *Miscellaneous memoirs* (*Zhayi suigan manlu* (張學良:雜憶隨感漫錄), Taipei: Lishi Zhiku, (1957) 2002.

Zhang Yihe, *Waning moon over the Yangtze river* (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Zhang Yinlin, *Outline Chinese History prior to Eastern Han* (張蔭麟:東漢前中國史綱), Chongqing: Qingnian Shudian, 2nd edition, 1944.

Zhang Yimou, *Hero* (张艺谋:英雄), film, Beijing, 2004.

Zhang Yonghe & Zhang Kaiyuan, *Biography of Luo Fangbo* (张永和&张开源: 罗芳伯传), Jakarta: Heping Shuju, 2003.

Zhang Youchun, "Four wav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张由存:收入分配的四次浪潮), *Chinese wealth* (中国财富), Beijing, September 7, 2009.

Zhang Yufa,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1900-49" (张玉法: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 1900-1949), *Historiography monthly* (史学月刊), No. 3, 2006 :83-91.

Zhang Zanbo, *Fallings from the sky* (张赞波:天降),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2009.

Zhang Zhenglong, *White snow, red blood* (张正隆:雪白血红), Beijing: PLA, 1989.

Zhang Zhidong, *Exhortation to Study* (张之洞:劝学篇), Changchun, Jilin Chuban Jituan, (1898) 2011.

Zhang Zhong, "Exposing Xinyang incident" (章重:信阳事件揭秘), *Party history* (党史天地), Wuhan, No. 4, 2004: 42-44.

Zhang Zhongxing, *On going with the flow* (张中行:顺生论),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6.

Zhanggong District, "Zhanggong district net-propaganda deparment email files" (章贡地区网宣部邮箱打包), chinagfw.org/2014/12/blog-post.html, December 16, 2014.

Zhao Dingxin, *The wars of East Zhou and the birth of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Shanghai: Huadong Shida, 2006.

Zhao Fengnian, "The distor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ngol-Yuan and its serious damage" (赵丰年: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 October 2, 2015.

Zhao Jialiang & Liang Xiaoqi, *Old story under the half tombstone: Gao Gang in Beijing* (趙家梁, 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 Hong Kong: Dafen, 2008.

Zhao Libin, *National stance and modern pursuits* (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 Beijing: Sanlian, 2005.

Zhao Suisheng, "Rethinking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imperial cycle and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y 7, 2015.

Zhao Tingyang, *Tianxia system: a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n a world institution*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Nanjing: Jiangsu Jiaoyu, 2005.

Zhao Xiaowei, "Commercial banks brooded by private economy: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during Beiyang era" (赵孝威:民营经济催生商业银行-北洋政府时期财经

状况), *Fortune world* (财富世界), Vancouver, Canada, No. 4, 2013: 90-97.

Zhao, Yong,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 Why China Has the Best (and Worst)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4.

Zheng Jiaming et al, "Summary of the study of Ming-Qing's isolation policy in the past 50 years" (郑佳明 等: 近 50 年明清闭关政策研究综述), *Hunan social sciences* (湖南社会科学), Changsha, No. 6, 2002.

Zheng Qingping & Huang Xiyuan, *History of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郑庆平&黄希源:中国农业经济史), Beijing: Renmin Daxue, 1989.

Zheng Yefu, *On trust* (郑也夫:信任论), Beijing: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2001: 119.

Zheng Yi, *One hundred random events evolved into one inevitability: On why the KMT lost and moved to Taiwan* (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 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 youpai.org/read.php?id=1311, posted January 7, 2007.

Zheng Yi, *Red monument* (鄭義:紅色紀念碑), Taipei: Huashi Wenhua, 1993.

Zhong Qiguang, *Zhong Qiguang memoirs* (钟期光回忆录), Beijing: PLA, 1995.

Zhou Chicheng, "Xun Zi Holds That Human Nature is Simple and Uncarved, Not Evil," *Social Sicneces in China*, Beijing, 35-1 (January) 2014: 116-135.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ributary system" (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科学), Beijing, No. 1, 2011: 29-58.

Zhou Liangxiao & Gu Juying, *History of Yuan* (周良霄, 顾菊英:元代史),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1993.

Zhou Liangxiao, *Emperors and Imperial power*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 Shanghai: Guji, 1999.

Zhou Tianyong, *Chinese opinions: interviews with economists* (周天勇: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 Issue 13, (July) 2010.

Zhou Wangyan, "180 days of total darkness of a land bureau chief whose leg was broken" (周旺炎:被打断腿的国土局长暗无天日的 180 天), bbs.tianya.cn/post-free-3038799-1.shtml, both accessed June 8, 2015.

Zhou Xin,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ools in China* (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 Jinan: Shangdong Keji, 2004.

Zhou Xueguang, "From 'Huang Zongxi law' to empire logic," (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 *Open times* (开放时代), Guangzhou, No. 4 (August), 2014.

Zhou Zongqi, *Qing's literary inquisition*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 Beijing: Renmin Wenxue, 2010.

Zhu Dake, "Ancient families of gods in China" (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 2 volumes, Shanghai: Dongfang, 2014.

Zhu Hongzhao, *Yan'an used to be heaven* (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 Xian: Shaanxi Renmin, 2012.

Zhu Peixian, "Discipline cadres work this way" (朱佩娴:纪检干部这样办案),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Beijing, February 13, 2015:11.

Zhu Xi, *Notes on the four* books (朱熹:四书集注), Changsha: Yuelu Shushe, (12th century) 2004.

Zhu Ying, *Economic policy and reform measures in late-Qing*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1996.

Zhu, R.X. et al, "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 *Nature*, 431(September 30) 2004: 559-562.

Zhuang Zhou, *Zhuangzi-outer chapters-mountains and woods No. 20* (庄子-外篇-山木

20), Beijing: Zhonghua Shuju, (4th-2nd centuries BCE) 2007.
Zoellick, Robert B.,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September 21, 2005.
Zubov, Andrei ed., *History of Russia, XX Century* (Андре́й Зу́б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Moscow: AST, 2 vols, 2009.

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作者：王飞凌(Fei-Ling Wang)
翻译、校对：王飞凌、刘骥
英文原版 -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中文繁体字版- 台湾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旗文化出版社，2018年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 ©2019 王飞凌 fw@gatech.edu
(如欲商业印刷、发行本书的简体字中文版，请务必事先取得作者的书面授权许可)

本书通过对中国宏观历史的全面性重新解读，提出了一个简明的分析框架，揭示崛起的中国力量的本质及其对现行世界秩序的影响。它试图回答两个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世界应当怎样回应？本书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世界秩序的根本理念和悠久传统，即中华秩序，是建立在以秦汉政体为代表的儒化法家之上的世界帝国制度，以统一天下(即整个已知世界)的天命自居。除了一些间断(尤其是宋代的国际关系体系)外，中华秩序在19世纪末之前反复统治了欧亚大陆东部达两千多年。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秦汉式政体的一个新复辟，但是尚无一个传统必需的中华世界帝国秩序。于是它一直都为了政权的安全，对外(与现行世界秩序)对内(与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作不懈的斗争。本书还对于中华文明史上真正的三段黄金时代提供了新发现、新见解，解释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历史大分野，分析了推动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梦。

作者王飞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现任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 成员。曾任教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和美国空军学院，在中国、法国、意大利、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澳门的十一所大学担任过兼职、荣誉或客座教授/研究员。已出版中英文著作六种(含合编两种)和论文数十篇 (其中一些被译为法、意、韩、日文发表)。联系电邮：fw@gatech.edu。

关于本书英文版：
“这是一本重要的、扎实而有力的原创性著作，分析研究了从古代到可见未来的中华国家制度的优劣与长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 Edward Friedman。

“这是一本杰作。作者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作了一个宏大、全面乃至史诗般的评议。其观点与分析证据充分、令人信服；其引证的中文和英文资料之丰富和多样令人惊叹。未来的许多年里，每一个 想要认真了解中国及其世界地位的学生，都会将此书作为必读书”。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Daniel C. Lynch。

“这是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华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充满创意、令人兴奋的宏大探讨。它必将成为一本经典著作”。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Ming Xia。

“这是一本极富启迪的书。... 高度推荐”。 美国《选择》(*Choice*) 杂志。

“本书是关于中国、中国人民及其各种统治者，许多世纪以来世界观历史的一个权威分析”。美国《克莱芒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杂志。

“作者观点的陈述和论证是如此的周全彻底、极为高超，任何想要谈论‘中国模式’的人都应该被要求阅读此书。...凭借其启迪性和创新性的论点，本书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模式之意义和影响的理想读物”。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杂志。